演化经济学译丛

穷国的国富论

下卷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

The Other Canon of Economics:

A Selection on Essays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挪威] 埃里克·S. 赖纳特 [中国] 贾根良 主编

贾根良 王中华等 译

贾根良 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穷国的国富论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相信，主流经济学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概念结构已经丧失了处理经济变化过程的能力，也难以对决定经济如何孕育变化并对变化做出调整的制度进行分析。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们正在发展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学分析模式，这种模式把经济变迁看作是演化过程，并明确地把分析焦点集中在塑造变迁过程的经济制度上。作为这种阵营的经济学家，我们相信，演化与制度经济学更适合于分析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适合于分析目前的发达经济。这本论文集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导论和概括性的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理查德·R. 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

由颇具独创力的挪威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S. 赖纳特与其合作者主编的论文集介绍了经济发展的演化观。它至少说明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对发展的理解就存在着非历史的抽象方法与演化方法之间的冲突。对于深受马克思演化经济学和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影响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两卷论文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视野。许多章节对中国如何在日益开放的经济中促进发展带来了迥异于传统的新灵感。

——丹麦奥尔堡大学和中国清华大学的教授
本特·阿克·伦德瓦尔（Beng-Åe Lundvall）

由埃里克·S.赖纳特等主编的这两卷重要而方便的论文集将对正在出现的演化发展经济学做出重大的贡献。近几十年来，人们对理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和现实相关性已经有相当大的不满，特别是对它在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蹂躏性政策后果更加不满。这两卷论文集所提供的观点正视经济是在不断演化和变革的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因此，一种正确的经济学必然是历史的和制度的；换言之，所有的经济学都是发展经济学。

——联合国经济发展事务助理秘书长、
国际发展经济学联合会主席
乔莫（Jomo K. S.）

ISBN 978-7-04-020274-8
9 787040 202748 >
（上、下卷）总定价
68.00 元

演化经济学译丛

穷国的国富论 下卷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

The Other Canon of Economics:

A Selection on Essays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挪威] 埃里克·S. 赖纳特 [中国] 贾根良 主编
贾根良 王中华等 译
贾根良 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2006－7678 号

The Other Canon of Economics by Erik S. Reinert and Jia Genlia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挪）赖纳特（Reinert，E. S.），贾根良主编；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演化经济学译丛/贾根良主编）

书名原文：The Other Canon of Economics：A Selection on Essays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Economics

ISBN 978－7－04－020274－8

Ⅰ．穷…　Ⅱ．①赖…②贾…③贾…　Ⅲ．发展经济学－文集　Ⅳ．F06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0624 号

策划编辑 刘清田　**责任编辑** 顾　瑶　**封面设计** 刘晓翔
责任绘图 朱　静　**版式设计** 王　莹　**责任校对** 胡晓琪
责任印制 张泽业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787×960　1/16		
本册印张	24.7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总 印 张	46.75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本册字数	380 000	**总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0274－001

埃里克·S. 赖纳特

贾根良

埃里克·S. 赖纳特（Erik S. Reinert） 世界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与发展经济学家，替代性教规基金会（the Other Canon Foundation）主席和创建者，挪威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和塔林技术大学（爱沙尼亚）“发展战略与技术管理”教授。他诞生于挪威奥斯陆，就读于瑞士圣加仑大学（经济学）、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2004年主编出版了《全球化、经济发展与不平等：一种替代性的视野》，2005年结集出版了对德国经济学的长期研究成果——《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德国经济学：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发展顾问，他强调产业政策、创新的前提条件与管理、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使用五种语言在世界各地进行讲演并举办研讨班，还担任秘鲁ESAN大学和马来西亚亚欧研究所等单位的访问教授。

贾根良　1999年至2005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教授、产业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作为引进人才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担任天津商学院等一些大学的兼职教授。曾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70多篇，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主要著作有《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创新、制度多样性与东亚经济的演化》和《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等。

演化经济学译丛

- 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
- 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
- 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
- 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
- 创新经济学、新技术与结构变迁
- 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管理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技术与创新
- 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 下卷）

封面设计：刘晓翔

内容简介

本书下卷包括两编：第三编经济史与当代欠发达国家；第四编欠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思想史。

第三编的第十章用熊彼特的观点分析了贫困和欠发达问题，贫困被看作是缺乏熊彼特动态的结果。第十一章进一步把这种熊彼特式的分析扩展到了对重商主义的研究。重商主义时期是一个欧洲各国通过模仿自己最成功的竞争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结构而得到发展的历史时期。所谓殖民地，就是不被允许进行这种模仿的国家，这些国家因此陷入贫困的境地。

第十二章描述了荷兰共和国作为第一个成功的欧洲民族国家在1500年到1750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怎样被欧洲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所分析和解释。第十三章则对今天流行的“竞争力”术语和表达类似含义的其他概念进行了澄清，分析的焦点是从相对贫困到富裕国家的转变过程之中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

克里斯托弗·弗里曼是“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术语的创造者，在第十四章中，他讨论了这种体系在不同的地理层次上的互补性以及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十五章深入到经济增长活动的特定的方面，通过聚焦技术变迁集群的历时变化，解释了创新的机会窗口怎样开启和关闭，因此，经济发展就变成了一种对移动的目标的追赶。

第四编讨论的是欠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思想史。第十六章讨论了发展经济学作为替代性教规类型的经济理论在1650年到1950年期间的德国所保持的连续性。第十七章讨论的是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作为半边缘化地区的发展理论与经济政策。第十八章讨论了熊彼特所称的经济学中的第一篇科学论文——舍拉1613年的《简论》。第十九章通过德国经济学家威尔纳·桑巴特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追溯了熊彼特经济学的起源。本书的最后一章即第二十章则按照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老”制度学派的传统，讨论了技术经济变迁的地理学维度。

本书的阅读对象是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中的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研究生和本科生，特别是对于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科技管理、国际贸易、公共政策、国际关系、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史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本书更具重要的参考价值。本书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历史和当代现实依据，也为建设能使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郑 重 声 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 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传　　真：(010) 82086060

E - mail：dd@he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　　编：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 58581118

目 录

第三编 经济史与当代欠发达国家

第十章 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2）

1. 引言（2）
2. 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平衡增长理论与不平衡增长理论（3）
3. 技术变迁与熊彼特式欠发达（9）
4. 加勒比海地区三个“熊彼特式欠发达”的例子（15）
5. 循环流转与人类扮演的两种经济角色（20）
6. 结论：熊彼特式欠发达——过去和现在的政策结论（24）

第十一章 重商主义与经济发展：熊彼特动态、制度建设与国际评价基准（33）

1. 关于重商主义的争论：一个简要概述（33）
2. 心智变化与文艺复兴时期财富创造的源泉（38）
3. 对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的考察：作为国家评价基准的重商主义（39）
4. 重商主义动态与制度：活动特定的经济增长和情境特定的经济政策（45）
5. 为什么成功的重商主义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被误解的重商主义者亚当·斯密（48）
6. 结论：作为经济发展必由之路的重商主义（52）

附录：具有协同性发展型国家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从1485年（亨利七世）的英格兰到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的政策手段和工具的连续性——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56）

第十二章　评价成功的基准：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70）
1. 增长的发动机：对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早期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72）
2. 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不完全竞争、熊彼特租金和协同效应（74）
3. 荷兰共和国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80）
4. 由协同效应与多样性所产生的发展：17 世纪代尔夫特的案例（85）
5. 要素和问题（88）
6. 荷兰共和国的衰落（97）

第十三章　竞争力及其思想先驱：五百年跨国比较的视角（114）
1. 竞争力——“公司行话”侵入经济理论（114）
2. 来自过去的行话——竞争力的历史对应名词（120）
3. 结论——竞争力代表着对动态不完全竞争的追求（133）

第十四章　大陆、国家和次国家的创新体系：互补性与经济增长（140）
1. 引言（140）
2. 国家体系的概念（145）
3. 英国国家体系（146）
4.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152）
5. 20 世纪后进国家的追赶（155）
6. 结论（164）
7. 对未来的推测（170）

第十五章　技术变迁与作为移动目标的发展机会（178）
1. 技术变迁和发展（178）
2. 产品周期、发展和进入障碍的变化（179）
3. 技术、体系、革命和范式（183）
4. 学会利用变动机会的发展（190）
5. 经验积累和未来的机会窗口（195）
6. 当前范式中的发展问题（199）

第四编　欠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思想史

第十六章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德国经济学：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18）
1. 德国经济学传统历久不变的特征（220）
2. 官房学派经济政策：从泽肯道夫（1626—1692）到霍尼克（1640—1714）（223）
3. 18 世纪：学院型经济学与经济学专业分工的出现（229）
4.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历史学派”（231）

5.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协会（234）
6. 德国 1945—1947：摩根索计划验证德国经济学传统（238）
第十七章　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启蒙运动时期半边缘化地区的发展理论与政策（246）
1. 引言（246）
2. 现代社会早期意大利从核心地位转向半边缘化地位：以美第奇大公和都铎计划为例（249）
3. 后经院哲学的先驱：伯特罗和舍拉（252）
4. 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政治经济学流派——加利亚尼、吉诺维西、韦里和贝卡利亚（255）
5. 重农学派以及意大利人对这一理论的反应（257）
6. 数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神秘化”（259）
7. 人力资本、制度和文明社会（261）
8. 制造业、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发展（263）
9. 从理想家园（Ben Commune）到公共福利（Felicita Pubblica）：意大利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延续性（从经院哲学到启蒙运动）（265）
第十八章　早期的国家创新体系：以舍拉 1613 年的《简论》为例（283）
1. 引言——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商主义（284）
2. 舍拉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287）
3. 舍拉在经济分析史中的地位（289）
4. 对《简论》的剖析（291）
5. 舍拉的研究方法（293）
6. 舍拉提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294）
7. 舍拉论制造业与报酬递增（296）
8. 舍拉的人口理论（299）
9. “大贸易”和累积因果理论（300）
10. 政府的政策（302）
11. 结束语（304）
第十九章　经济学中的创造性毁灭：尼采、桑巴特和熊彼特（318）
1. “创造性毁灭”的流行（318）
2. 尼采之前的创造性毁灭（321）
3. 尼采和创造性毁灭（326）
4. 经济学中的尼采：从桑巴特到熊彼特（336）
5. 尼采与他逝世百年时的经济学（339）

第二十章　卡尔·比切尔与技术经济变迁的地理学维度：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355）

1. 阶段论思想——从塔西佗到卡尔·比切尔和卡罗特·佩雷斯（355）
2. 发展阶段、后现代社会与经济理论中的“和谐”（360）
3. 以人类为中心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核心的人类及其需要（365）
4. 阶段论与经济发展：概述（367）
5. 比切尔的四个技术—地理经济阶段（376）
6. 四个阶段中的收入分配问题（379）
7. 各个阶段是“必经之路”吗？或者是否可能存在着捷径？（380）
8. 结论及简要的政策含义（383）

第三编　经济史与当代欠发达国家

第十章　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 …… 2
第十一章　重商主义与经济发展：熊彼特动态、制度建设与国际评价基准 …… 33
第十二章　评价成功的基准：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 …… 70
第十三章　竞争力及其思想先驱：五百年跨国比较的视角 …… 114
第十四章　大陆、国家和次国家的创新体系：互补性与经济增长 …… 140
第十五章　技术变迁与作为移动目标的发展机会 …… 178

第十章　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1]

埃里克·S. 赖纳特

1. 引言[1]

技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技术与经济（OECD－TEP，Technology and Economy）的一项大型研究项目把技术的作用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增长演化理论作为研究的焦点。然而，熊彼特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只是用来研究工业化国家的增长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被用来研究欠发达问题。就作者所知，本文是运用熊彼特技术变迁理论来分析贫穷和欠发达问题的首次尝试。“熊彼特式的贫穷”这个术语听起来确实有点自相矛盾。

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熊彼特经济学的动态性除了用于解释财富的创造过程以外，还隐含了相对贫穷理论的原理。本文试图说明技术变迁在“熊彼特式欠发达”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学的德国传统（熊彼特的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向来被认为包含了**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基本原理。李斯特（Friedrich List）、马克思（Karl Marx）和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都分别强调了不平衡增长的各个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技术变迁处于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与一直以来就忽视技术变迁因素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传统（Anglo-Saxon tradition）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自 19 世纪 90 年

---

① 原载 Derek H. Aldcroft, Ross E. Catterall (eds.), Rich Nations-Poor Nations: The Long-Run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1996, pp. 161 ~ 188.

代以来，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产生了以平衡增长为内涵的增长和贸易理论，这里“平衡增长”意味着世界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的趋同化（即要素价格均等化）。

本章结构如下：第二节从**不平衡**增长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角度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传统和德国经济学传统进行比较。第三节提出技术变迁与欠发达的关系问题，讨论导致技术变迁收益分配不平等的两种关键性机制：第一是在“技术前沿”上的推进极端不平衡的结果，第二是技术收益的古典型扩散方式与共谋型扩散方式（classical and collusive spreads of technological gains）。第四节说明这些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了加勒比海地区三个“熊彼特式欠发达”案例的产生。第五节指出技术变迁的上述特点有可能使经济生活中每个人所扮演的两种不同角色，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而这两种角色只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下或者在“**对称贸易**”（symmetrical trade）理论的特殊情况下才被视为是同一的。最后一节讨论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由技术变迁的古典型扩散方式与共谋型扩散方式所导致的消费者与生产者这两种不同角色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在19世纪初美国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2. 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平衡增长理论与不平衡增长理论

李斯特、马克思和熊彼特都是对德语区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论根植于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尽管李斯特比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旧历史学派的起始点要早，但是他的研究明显地属于“原始历史学派”（proto-historical school）。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可以回溯到“官房学”的时代，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尼克（Wilhelm von Hornic，1684）[2]。三位作者——李斯特、马克思和熊彼特——在经济发展动态视角上的观点极其相似。如果把他们的理论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传统（这个传统为当今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相比，这一点尤其明显。德国传统产生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而盎格鲁—撒克逊新古典经济学则倾向于**平衡**增长理论。当新古典经济学被转化为国际经济政策时，这一点尤其明显，更好的理论被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就经济政策而言，这两大思想体系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就在

于：生产的空间布局问题对德国经济政策来说非常关键，而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理论中却不成其为问题。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一个交换理论，而德国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所关注的是生产。在德国理论中，生产环境上的不同将导致财富的差别。

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前，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增长理论也是不平衡增长理论。我在别的地方（Reinert，1994）曾提到重商主义（mercantilist）关于经济增长具有活动特定性（activity-specific）的观点，即经济增长发生在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之中，而不发生在其他活动中。需要注意的是，在19世纪，指导美国经济政策的经济理论（与“常青藤”大学所讲授的理论相反）是“德国式”的。李斯特19世纪20年代曾长期在美国居住，这显然为德国理论与美国汉密尔顿主义思想（Hamiltonian thoughts）在经济政策方面提供了交流的土壤。同样，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其所采用的经济理论也是基于德国**国家**主义的经济理论，而公开反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ical）导向的英国经济理论。

马克思与熊彼特之间的共同点被熊彼特本人欣然接受，尤其是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1912、1934）日文版前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熊彼特在其中说明了他是如何探寻“经济体系能量的源泉的，这个源泉自身将打破任何可能达到的均衡……我当初并不清楚……这些思想和目的正是马克思的学说中所蕴含的”。熊彼特指出，这两种理论体系的相似之处“被整体上的广泛差异所湮灭了”。克莱蒙斯（Clemence R. V.，1951）翻译并重新介绍了日本版的这个前言。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许多作者对马克思和熊彼特进行比较。在一个收录了“熊彼特相关研究”著作共1 916本的研究文献目录中，有77本把马克思和熊彼特相提并论（Augello，1990）。[3]

尽管二者不乏共同之处，但是两大经济学家之间“整体上的广泛差异”在他们的现代信奉者之间继续存在。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式的特殊劳动分工发生在熊彼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例如对于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熊彼特主义说明创造性的一面；而马克思主义关注破坏性的一面——在英国以及印度市场被英国纺织品垄断后，孟加拉纺织工人的白骨遍布印度平原。熊彼特主义者创造了发展理论，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创造了欠发达理论。然而，两种理论体系都隐含着对方的要点。马克思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相区别）创造了发展的动态理论（尽管发展存在不平衡性），认为“离开持续的生产工具革命，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存在”。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1976，126～138 页）在评论马克思的技术观点时指出，与其他因素相比，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源于持续创新的不完全竞争。

熊彼特有关“动态收入不平等”思想的类似描述体现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认为“上层社会如同一直住满了旅客的旅馆，但旅客处于不断更换之中”（熊彼特，1912、1934，第 156 页）。[4] 与马克思相反，熊彼特对上层阶级之外的群体的研究兴趣非常有限。马克思的理论与熊彼特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在于两者从根本上都是一种不平衡增长理论，这也是二者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之处。因此，收入分配问题是任何“德国式”理论研究的内在要素，而这种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范式中却不存在。

如果我们把当今世界与马克思写作时的时代背景相比较就会发现，两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发展改变了分配问题的地理格局，使它从国内问题转变为国际问题。首先，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成功的再分配机制已经减轻了国内的收入分配矛盾；其次，“全球化”已使当今的国际劳动分工取代了过去的国内分工，尤其是在工业商品领域。在此意义上，分配矛盾逐渐从国内（阶级之间）转移到国际领域（国家之间）。消除贫困意义上的国家收入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许多工业化国家所解决，尤其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和日本。工业化国家内部再分配的巨大成本很少被讨论，特别是不会在理论的层面上被讨论。

自亚当·斯密以来，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一直是世界主义的。分配问题在英国古典理论中不是核心问题。但是，正如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952）所指出的，在实际经济政策中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在国家层面上被考虑的。在新古典理论中，国家和国际的收入分配问题被排除在其简化假设之外。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些假设通常具体体现为两点基本假设：完全信息和不存在报酬递增。正是这两个违反事实的假设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盲点的产生，表现在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之间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上。在完全信息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些假设的基础上，任何经济增长理论都会自动成为平衡增长理论。这些假设消除了斯密式“劳动分工”的形成原因，即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差异和

专业机器带来的固定成本。完全信息看起来难以与“人力资本”相协调；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也难以与固定成本存在相协调，而正是固定成本导致了各种程度的“最低有效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ize）。不管怎样，这两点假设将英国经济学变成了经济学的世界主义学派。与此相对，19 世纪的德国经济学成了国民经济学或国家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 and Vokswirtschaft），而迄今为止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仍在使用这些术语。在这些理论中，所设置的严格假设则相对较少。

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着深厚的德国历史学派理论背景。今天的研究者之所以不了解这些理论根源，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德国历史学派被翻译的著作数量很少，故该学派的传统不为德语之外的世界所熟知，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82）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其中的例外（Backhaus，1995）。其次，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熊彼特和马克思的追随者有意和无意地对两位领导者的原始思想进行了“加工”（cultivated）。在信奉共产主义的社会中，马克思的教义被发展成为另一种宗教产品，即“神圣思想”（immaculate conception），马克思被视为不可能借鉴了那些卑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罗雪尔的思想（Roscher，1854）。

罗雪尔曾好几次引用了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832）和尤尔（Ure，1835）的著作，他可能是深入地理解技术变迁与大量生产的经济学的首位经济学家。“罗雪尔勾画出了大规模工业的形象，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报酬递增和成本递减”（Streissler，1994，p. 1）。罗雪尔也专门指出了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尽管巴贝奇和尤尔曾专门写过与大规模工业经济学有关的论文，但首次把这些创见纳入完整的经济理论（holistic economic theory）的却是罗雪尔。罗雪尔的著作有 26 个版本，曾是一代德国人的标准教科书。马克思与其他德国学派学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认同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对罗雪尔以及其他德国历史学派传统而言是“非德国的”，是“英国式”的理论。德国经济学对规模经济的重视可以追溯到罗雪尔以前的胡弗兰德（Hufeland G.，1807）和赫尔曼（Hermann F. B. W.，1832）。罗雪尔也曾几次提到安东尼奥·舍拉（Serra，1613）；舍拉的论文首次把国家富裕与报酬递增以及国家贫穷与报酬递增的缺乏联系在一起。

显然，熊彼特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世界中的所谓原创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之外的经济学界对熊彼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传统无知的结果。大多数熊彼特主义者，尤其是非德国人，可能会对一本新近的德文著作感到惊奇。这本书把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Schumpeter，1942）看成是几十年前一次德国国内争论的重新阐释（reworking）。作者特别认真地指出，只不过熊彼特既没有提到争论本身，也没有提到争论的积极参与者桑巴特（Appel，1992）。[5]

所有这些都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亚当·斯密提出了“劳动分工”重要性的伟大创见，但他本人没能认识到其中的组织含义。他假定所有市场会像他那个时代的农产品市场那样完美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也曾专门指出，他所处时代的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劳动分工的缺乏。亚当·斯密只是部分地看到了缺乏劳动分工与完全竞争之间的联系，但却很不彻底。新古典理论，与任何关于不同层次劳动分工的影响的后续研究一样，忽略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多样性。新古典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关于已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交换的理论，它根本不能解释生产条件多样性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定价行为的影响。新古典理论似乎不能接受固定成本的存在，这是因为固定成本会导致报酬递增。亚当·斯密未能认清其劳动分工思想的必要组织影响，而看起来我们都是这一不幸事实的受害者。劳动分工使企业根据最终产品生产所必需的制造、装配和销售等过程来组织生产。根据定义，用于机器装备投资的固定成本会导致最低有效规模、规模报酬、进入壁垒和不完全竞争的出现。这种看法在传统上构成了德国经济学的一部分，肯定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范式，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尤其如此。在参考巴贝奇的理论的基础上，罗森伯格（Rosenberg，1994）对经济思想史中的“劳动分工”进行了有趣的讨论。

由此，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经济政策的长期模式就出现了，即一直以来“德国式”不平衡增长理论主导着所有工业化国家的起飞阶段，其中包括15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英国。在这些国家达到“技术前沿”之后，它们的经济政策都经历了一个向“英国式”经济政策的转变过程。那时工业活动的报酬递增已经由增长障碍（对于那些未参与这些活动的国家来说）转变成了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机

制。报酬递增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会成为障碍；但随着一国经济逐步工业化，报酬递增变成了重要“助手”（ally）。因此，对于依赖自然资源的穷国来说，由于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的存在，自由贸易就被视为贫困的陷阱。对于参与规模报酬递增的活动的国家来说，这些因素的存在反而成为它们支持自由贸易的原因。这一思想的可能最早的贡献参见查尔斯·金（Charles King，1721）。在一种成功的战略中，报酬递增肯定是起飞初期阶段经济政策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德国式”理论总是存在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早期阶段。一旦一个国家进入报酬递增和动态不完全竞争的良性循环，那么在经济理论中排除报酬递增在短期内就不会对其经济造成损害。因此，从前的那些落后国家在成功后就都转向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理论，尤其是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领域，在短期内这不会对它们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

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类似的”，它们都同样承担着促进国家福利的任务。在德国经济理论中，那些因“历史性报酬递增”而表现出动态不完全竞争特点的经济活动要优于其他经济活动。如果一国想要赶上世界上领先的国家，那么，它就必须从事这些“较好”的活动。

德国经济理论一直是落后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这包括当初还是落后国家的英国在内。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是“领先者”的理论；当德国理论把一国送上国际领先地位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就会上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富国一直都在试图“出口”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尽管它们自己仍坚持德国思想。美国把自由贸易强加给日本和拉美，但自己对本国的产业却坚持极端严厉的保护政策，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当今**有管理的自由贸易**（managed free trade）试图达到同样的目的——在本国充分发挥德国理论的优势，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推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在当今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除一些城市小国外，所有富国都曾经历过一个德国经济政策的长期阶段，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阶段都持续了至少一百年的时间。相反，你很难找到一个曾经历过这样阶段的穷国。德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把竞争与对制造业的保护结合起来。在当时，这种思想在惠特利（George Whatley，1774）的《贸易原理——自由和保护是最佳支持手段：工业是使制成品价格低廉的唯一途径》中得到了很好

的反映。该书的第二版包含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对这一主题的一些赞美性评论。

3. 技术变迁与熊彼特式欠发达

正如上一节所说明的，在德国经济理论中，就产生动态技术变迁和报酬递增而言，一些经济活动要优于另一些活动。英国经济理论往往忽视这些因素。因此，按照英国理论的看法，所有经济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所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对于经济活动的这一假设正是均衡的必要条件。报酬递增在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中还很重要，但是在后来的版本中就不重要了。因此，马歇尔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产业政策方案：“对那些遵从报酬递减法则的商品征税，并以此对那些报酬递增效应明显的商品提供补贴。”因为报酬递增的存在与均衡不相容，所以这一看法在后来的版本中就被迫放弃了。作为马歇尔早期研究理论起点的报酬递增“法则”，在后来的版本中就被简化成了一种“趋势”，并最终在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推波助澜”下从主流经济理论中消失了。今天，新贸易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正着手重新发现报酬递增（而不是报酬递减）的作用。对这些模型最出色的概述可以参见维斯帕金（Verspagen B.，1992），也可参见罗默（Paul Romer，1994）。今天从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中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与19世纪90年代的马歇尔（Marshall，1890）、19世纪50年代的罗雪尔或1613年的舍拉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由于强调“历史性报酬递增”的作用，熊彼特的动态体系保留了德国历史学派其他经济学家的特点，保留了产生不平衡增长的经济体系的特点。我的“熊彼特式欠发达”的概念与下面将要谈到的技术变迁的两个方面有关。这两种机制共同建立在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的存在、不完全信息和进入壁垒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不完全竞争基础之上。

3.1 “技术前沿”的不平衡推进

技术知识经常被假设为以知识的技术“前沿”的形式向前发展。“前沿”这个词表达了边界线是以相当有秩序且平衡的过程向前推进的。这多少使人联想到美国的疆界在历史上从东向西扩展的过程。我认为这种有秩序“前沿”的视角妨碍了我们对富裕和贫穷

的正确理解。技术变迁的历史模式与其说像一个有秩序的前沿，不如说更像一个散点图。技术进步在某些领域中发展非常迅速，遥遥领先于其他技术；但在另一些领域中，技术“前沿”几百年以来有可能几乎一点进展也没有。无论何时，对新技术的探索连同技术变迁自身都——用罗森伯格的话说就是——“聚焦于”（Rosenberg，1976，第六章）技术问题的特定领域和时机。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集中于石制工具行业，青铜时代则表现在青铜工具上，而机器时代则反映在机械化水平上。即使是在进入机器时代两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些活动没有实现机械化，如理发、摘草莓和缝制棒球等。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维赛克（Henry Vethake）所说：“如果技术水平都以同等速度提高的话，很明显它们对物品的交换价值不会造成影响。”在完全信息和规模报酬不变的体系中，技术变迁不会对财富分配产生任何影响。新古典经济理论几乎完全无视维赛克的创见。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的论文则是一个例外。在这篇论文中，卢卡斯提出了一个有关不同部门之间学习速度差异的正式模型。作为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卢卡斯对学习不平衡的具体影响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公正评论：“诸如此类对人类福利有重要影响的问题太令人震撼了，你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很难再去思考别的问题了。”

3.2 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的两种方式

在完全竞争情况下，技术进步将以向最终消费者提供较低价格商品的方式扩散。在我的一篇论文（Reinert，1994）中，我指出这个假设已经由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提出。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相反，在该文中我提出，为了弄清国家穷富的机制，有必要先理解技术变迁的收益分配的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创造财富而另一种方式只是维持现状：

- 对于消费者来说，以较低的价格或较高的质量购买产品。我把它称为技术进步收益分配的古典形式，因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均已阐明这将是技术改进的结果。这种机制在生产和市场的条件类似于新古典理论中的假设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 对于生产企业中的雇主和工人以及生产国政府来说，获得较高的应税收入。我把它称为技术进步收益分配的共谋形式（collusive form），这是因为实际生产国各方力量（资本、劳动和政府），尽管不是“密谋”，却也是在共谋占有这些收益。这一机制起作用

的条件是技术进步伴随着进入壁垒的创造，报酬递增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共谋形式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1914年1月把工人的日工资由原先平均2.34美元/9小时提高到5美元/8小时（Raff，1988，387）。古典形式的典型例子表现在超市中标志码扫描仪的使用，这种技术改造不会表现为超市职员工资的提高。哈佛大学格里利克斯（Zwi Griliches）运用这个例子来表明我所称的"看不见的经济增长"效应，即成本减少和质量改进，这在任何统计资料中都得不到反映（Business Week，1994）。

大多数技术进步同时包含技术变迁收益分配的古典和共谋效应。我们所测度的经济增长大多反映了共谋效应。伴随着较高的进入壁垒和竞争的更不充分，共谋型技术变迁通常影响生产的最低有效规模。古典型技术进步在生产组织中发生时，不会改变企业或产业的结构，主要表现在最终产品价格的降低方面。古典型技术进步不影响劳工的讨价还价能力。古典型技术进步发生的条件并不与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有大的出入，它在农业和传统服务部门中最常见。通常，一项新发明首先形成一个短期的垄断时期，它允许收益的共谋扩散发挥作用；然而随着该技术的逐渐普及，技术收益的扩散会日益导致价格降低，而不是工资和利润水平的提高。表10－1说明了技术变迁古典型和共谋型扩散方式的特点。

表10－1　生产率提高的两种扩散模式之特征

模式特征	共谋模式	古典模式
投资的可分割性	不可分割；以整体的形式	可分割
信息的充分程度	不完全（如专利、内部的研发）	完全（存在技术的竞争性市场）
从用户公司角度来看的技术来源	内部或外部的大型模块特点，也即高度的规模经济	外部
进入壁垒	增加	不变
产业结构	集中度提高	无影响
规模经济	增加	不变
市场份额	非常重要	不重要

续表

模式特征	共谋模式	古典模式
利润的扩散方式		
测量出的 GNP	高度可见	不体现（“索洛悖论”）
利润水平	风险增加：可能获得更大的利润或遭到更大损失	不变
货币工资	增加	不体现
（国民）真实工资	提高	提高
价格水平	不变	降低
贸易条件	不变	与产业所经历的技术进步相悖
两种模式中创新的例子	新药生产、大型计算机制造业、汽车涂料生产	电器、电话、缝纫机、个人计算机、分散性涂料生产、集装箱
体现在	提供最新产品或工艺流程的工业中	第一和第三产业，使用新的基础技术；成熟的工业中

在典型的工业化国家，工资形式的劳动要素支付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70%。我们所测度的历史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技术进步对货币工资的影响。古典技术进步则往往不留什么痕迹。近十年来，由于配第定律（Petty's law）的作用，随着服务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技术变迁的古典型扩散在经济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由于服务生产的分散性质（其经典定义是服务产品必须在消费地生产），与以福特制工厂为特征的传统规模经济相比，多地点运作的范围经济日益成为服务部门的成功因素。新技术的使用对传统服务部门劳动技能是替代而不是提高，这就导致了古典型而不是共谋型技术进步分配机制在服务部门发挥主导作用。“索洛悖论”，即计算机的作用随处可见，但唯独在政府统计资料中体现不出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服务部门中复杂的计量问题与古典效应的共同作用。

技术收益扩散的古典方式与计量问题紧密相关。我们测量到的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服务部门的就业日益增加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传统服务部门发生了“看不见的经济增长”（由于结算扫描仪的使用所导致的零售店交易成本的降低等）。然而，本文主要研究技术变迁对国家间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技术变迁所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衡量问题不在本文研究主题之列。

在集体讨价还价过程中，共谋方式通常被视为是“公平”的。如果一个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由此带来的部分收益就应该归该企业内部劳动者所有。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曾出版过一系列关于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全面调查报告，报告详细讨论了我所描述的技术进步收益分配的古典和共谋形式。这些调查报告引发了1935—1940年间一些著作的出版（Bell，1940；Moulton，1935；Nourse and Drury，1938），其中的部分著作直接讨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中的扩散方式。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框架中，我所指的古典方式被称为“由价格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共谋方式则被称为“由货币工资提高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总的来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尽管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古典方式相对更受欢迎，但工业中产品和劳动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却使这一点不可能实现。这一系列研究指出了由工业中的共谋方式和农业中的古典方式所导致的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在以“挣工资的人与农场主之间的冲突”为标题的一段中，摩尔顿（Moulton H. G.，1935，124～125）对共谋方式导致的国家收入的分配问题有以下评论。我们请读者也来研究这段话，并且用在接近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原材料和工业产成品的第三世界国家来替代美国农场主。

> “在考虑价格降低方式（古典方式）而不是工资提高方式（共谋方式）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后者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然而这一点明显没有被认识到。源于工资提高方式的工农业人口收入和购买能力之间的不对称导致了经济生活中两大部分之间的失衡，进而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在农业人口的收入保持不变时，城市人口的收入却逐步在提高。因此，即使工业品的价格没有表现出伴随工资上涨而上升的趋势，农业和工业人口之间经济地位的不平衡状况也将呈现出明显的恶化趋

势。[6] 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工资提高而工业品价格也上升的趋势，因此农场主的购买力实际上往往在下降。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农业人口对日益增多的工业品购买力不足，将限制工业企业所赖以运行的生产规模。

为提高货币工资以保持较高生活水平的努力，导致了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之间一场持久而深刻的矛盾。即使这意味着多少会带来工业品价格的提高，城市人口也要为较高工资进行斗争。农场主则长期为他们所不得不购买的商品的较低价格而斗争。这场斗争表现为（19 世纪）70 年代（美国）所谓的‘保护农业社运动’（granger movement），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传统的南方农业会反对高保护关税，以及农场主以各种形式反对托拉斯、垄断组织和联合体等。”

这段话描述了一国内部同处于生产技术水平前沿的两大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美国农场主和工人的生产率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一个集团富裕而另一个集团依旧贫穷。与此同时，另外一位美国作者（Rochester，1940）在其《农场主贫穷的原因》一书中从极端左派的观点解释了这一现象。为什么在拥有世界上可能最肥沃的土壤的情况下，世界上效率水平最高的农场主仍旧处于贫穷状态？下面我将说明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

农场主生产率的提高以古典方式表现在价格的降低上，而他们生产工业品的交易伙伴的生产率的提高却以共谋方式表现为工资水平的提高。在完全信息和不存在规模经济的新古典世界中，这当然不算什么问题，这是因为：与工业生产相比，每个农场主都会在他的后院生产拖拉机和其他生产工具而不会造成任何效率损失。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农场主面临着较高的进入壁垒，因为“完全信息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些条件根本就不存在。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农民饱受了“熊彼特式欠发达”之苦。

现在假设这两个集团处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工业国和农业国，两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那么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差距将会比 20 世纪 30 年代末布鲁金斯研究所所担心的更大。把这两个生产者集团放在两个不同的国家能消除美国国内重要的分配机制的作用。农业需要较少的劳动力和更多的资本，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场向工业地区转移，以及城市工人工资对农业工资造成一定压力，这些都是重要的分配机制。因为城市和工业地区的税基更大，所以农村地区的

基础设施、学校和其他政府服务需要得到工业区的大量补贴。最后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农场主的确拥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尽管其人数正在逐渐地稳步下降。摩尔顿曾提到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兴起的保护农业社运动，这些活动为后来影响收入分配的立法提供了基础，例如铁路和公共设施管制条例、反垄断法和邮政储蓄银行的设立办法以及由政府负责的包裹邮递业务等。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如果美国国内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分别生活在两个不同国家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和一个极端富裕的工业国。尽管两个集团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但其中之一仍然处于“熊彼特式欠发达”的困境之中。

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稍后我将运用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例子来说明是不完全竞争而不是相对效率导致了贫穷与富裕。从单个个人或国家的视角可以看出，经济活动的选择要比相对效率更重要。对个人和国家而言，存在着优化的途径可供选择。

长期以来，工业化国家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往往使国内产业租金的分配更趋公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作为庞大的再分配机器的政府部门支配了（represents）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多半。欧盟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转移机制，尤其是在农业部门内部。这些再分配措施的特点是：它们被当作政治任务来实施，而且，尽管所涉及的人数众多，但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这种分配失衡产生的根本原因。琼·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正确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没有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理论，但令人诧异的是从表面上来看它竟然不需要该理论。

4. 加勒比海地区三个“熊彼特式欠发达”的例子

美国国内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部门）之间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例子表明，贫富与效率的高低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在更大程度上**与选择在哪个部门中有效率**有关。如果一个国家在错误选择的部门中很有效率，熊彼特式欠发达就会发生。这一机制同样适用于个人，比如一国国内效率最高的刷盘子的人的收入要比效率最高的律师低得多。

技术前沿（该名词属使用不当）推进的不平衡以及技术变迁收益的古典型和共谋型扩散方式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上述问题的产生。这些机制得以发挥作用是由于熊彼特所称的“历史性报

酬递增”，即用经济增长来衡量的技术变迁伴随着更高的固定成本，并带来更显著的规模经济。与传统服务部门常常不可见的增长相反，这种“可见的”技术变迁是在由以规模和知识为基础的两种重要的进入壁垒所保护的、非常不完善的竞争环境中所发生的，这两种进入壁垒交互作用并日益累积，造成了缪尔达尔恶性循环（Myrdalian vicious circles）。

标准假设条件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类似”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相对于其他产业，一个产业较快的技术进步将被快速的调整措施所抵消，这些调整措施包括“完全信息”、“完全预见”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等。在实际生活中，巨大的信息差异、知识差异、有限视野和巨大的递增报酬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把一国与其历史起始路径联系起来。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例子中，历史起始路径是指这些国家被迫曾经走过的发展轨道。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来考察加勒比海岛国的例子中熊彼特式欠发达是如何发生的。三个例子将表明，是经济活动的选择而不是效率决定着一国的富裕与贫穷。

4.1　古巴：烟草与蔗糖的对比

1940 年，古巴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出版了一本著作，该书成功地记述了烟草和蔗糖如何以不同方式改变着古巴的社会和历史。“这两种巨大的植物，植物王国中的两名成员，它们共同繁茂生长于古巴这块土地，并且这里的气候和生态很适宜它们的成长。在古巴的不同地区，都有最适合种植这两种植物的土地，并且气候和土壤里的化学成分也是如此。”（Ortiz，1947，p. 7）

从经济角度来看，古巴显然拥有生产这两种植物的绝对优势。然而对古巴来说，一种植物——烟草——创造了财富；而另一种植物——蔗糖——却导致了贫穷。烟草和蔗糖的对比与前面段落中我们所见证的美国工业与农业部门不平衡增长的例子很类似。在美国和古巴的这两个例子中，我们所研究的都是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两种生产活动，其中一种活动导致富裕而另一种活动却产生贫穷。两个例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处我们考察的是两种作为工业产品生产原料的农业产品。我们必须跳出“坏”农业和“好”工业的标准分类法来考察实际经济的运行机制。

在古巴社会中，烟草是英雄而蔗糖是乡巴佬。主产于岛西部的

烟草造就了中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而产于岛其他地区的蔗糖却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烟草的种植和采摘需要专门技能，烟叶的收获是个性化的劳动，产品的市场价格依赖于采摘者的技能。烟草孕育了技能、独立性和一定的财富。“蔗糖是一个无个性特征的（anonymous）产业，它只需要资本家的监工监督下的大批奴隶和雇佣工人的劳动”（Ortiz，1947，p. 65）。与烟草需要必要的技术、细心和鉴别不同，蔗糖只需要砍伐时的蛮力。烟草需要个性化的劳动和劳动分工，而蔗糖意味着批量生产的商品。烟草的品牌与原产地联系在一起，而“蔗糖像奴隶一样，不留名字地走向世界”。烟草的价格稳定，而蔗糖的价格剧烈波动。一个熟练的烟草采摘工人可以区分出七八十种颜色深浅不同的烟叶，但是所有的蔗糖都一样。烟叶收获的时机选择至关重要，而甘蔗砍伐的时机却不是那么重要。烟草的收获需要用锐利的小刀一片片细心切割以保证植物的其他部分完好无损，而人们却用大砍刀用力砍伐甘蔗。种甘蔗是一门生计，而种烟草却是一门艺术。

因此，奥尔蒂斯说，烟草工人不仅比赤贫的蔗糖工人富裕，而且“更有礼貌，更有智慧”。烟草代表着财富与智慧，而蔗糖则象征着贫穷和无知。蔗糖由外国资本控制，而烟草由国内资本所主导。“在古巴历史上，蔗糖代表着西班牙专制，而烟草则由国内解放者所控制。蔗糖一直纵容外来干涉。”“蔗糖向来优先吸纳奴隶劳动力，而烟草则倾向于自由的人。蔗糖依靠暴力手段来引进黑人，而烟草则鼓励白人的自愿移民。”

进入壁垒的差异肯定是导致古巴式对比状况的生产和市场销售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古巴烟草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少数品牌产品之一。古巴两种产品的生产在世界上均拥有绝对优势，但一种产品导致富裕而另一种产品却导致贫穷，这与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例子类似。与古巴的例子相似，美国既拥有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农业，也拥有生产率最高的工业，然而美国农场主贫穷而工人却很富裕。在美国和古巴的这两个例子中，同处世界效率水平领先地位的行业却导致那些专门生产一种产品的群体富裕，而生产另一种产品的群体却依旧贫穷。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农场主和古巴蔗糖工人面临着技术变迁收益扩散的古典效应，而美国工业和古巴烟草生产却面临着技术变迁收益扩散的共谋效应。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蔗糖提纯的技术进步速度比烟草行业快得多，

但是烟草工人的收入水平却一直比蔗糖工人高。从所涉及国家的角度来看，不完全竞争和技术进步的停滞肯定要比技术进步和完全竞争好。美国农业和古巴蔗糖业遭受了“熊彼特式欠发达”，而对应的工业和烟草业却没有。

《古巴对比》的原作出版50年之后，一位身居海外的古巴作者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岛自诉》的书献给费尔南多·奥尔蒂斯（Benitez Rojo，1989）。书名本身就很清楚，尽管政权体系在变，但蔗糖生产的内在特点仍然影响着古巴（不仅古巴，其他地区亦是如此）并决定着古巴的经济命运。

两年前，两位美籍拉美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本关于两个加勒比国家的著作：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牙买加的政治经济结构研究（Hillman and D'Agostino，1992）。尽管两国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存在巨大差异：一个源于西班牙传统，一个属英国传统，然而作者的研究表明，两国存在着相似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并且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在没有参考奥尔蒂斯结论的前提下，他们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两国的命运都受到生产蔗糖的经济力量的影响。不论过去如何，生产同样的产品将导致两国的相似性。

许多现代研究都很重视这一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蔗糖生产者的极端贫困问题。这些研究的标题表明对社会的忧虑正是他们的研究初衷，如《饥饿的庄稼：贫困与蔗糖业》（Coote，1987）和《苦涩的蔗糖》（Lemoine，1985）等。对于其国内缺乏效率的糖业生产——欧洲甜菜糖和美国蔗糖等（beet sugar in Europe and cane sugar in the US），发达国家实施的补贴政策和来自以玉米为原料的糖业生产者的竞争，共同导致了“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的凄凉局面。几年前，针对工业化国家的糖业政策，《经济学家》杂志曾发表过一篇以《受制于补贴》为标题的封面文章，该文把这一政策称为“一个以征收富人的税来毁灭穷人的个案”（The Economist，1985）。

4.2 海地——棒球与高尔夫球的对比

今天，对于在多米尼加糖业中工作的海地的季节性工人来说，他们处于糖业体系底层的地位依旧没有任何改变（Lemoine，1985）。然而，海地共和国在世界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产品——主要向美国市场提供的棒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熊彼特式欠发达”的典型案例。

经济学家们根据标准产业分类法通过将产业分门别类的方法来弄清产业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生产国存在个体劳动产品（individual products）的情况下，即使某些产品被视为属于同一产业内部，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巨大差异。工业国的高尔夫球生产率居世界领先水平，工人工资为平均每小时 9 美元；世界上棒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是海地，工人平均每天工作 10 小时，每小时工资为 30 美分。虽然上述两个工人群体处于同一个产业并且其生产效率均居世界领先水平，但他们的工资比率却大约是 30 比 1。

在同样为各种体育活动提供球类的产业内部，为什么不存在要素价格均等化因素？一个从技术角度出发的解释是：棒球的生产还没有进入机器时代，它们不得不依靠手工缝制，即使在美国亦是如此。创造性破坏的潮流还没有渗透进这个小的行业。借用佩蕾斯（C. Perez）和弗里曼（C. Freeman）的概念来描述，棒球制造业是一个行将灭绝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残余。

与糖的生产一样，棒球制造的自身特点也包含了贫穷和欠发达的因素。因为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所以新技术不会被开发出来。“干中学”效应没有在海地发生，这是因为棒球生产中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学习”。海地人的工作中既没有资本也没有机器，因为即使美国的全部资本都投入到棒球机械化的研究中，这也很难实现。重商主义者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具有活动特定性——经济增长在一些产业发生而不在另一些产业发生。他们是正确的。

当海地把棒球卖到美国，然后买回高尔夫球时，一小时的美国劳动被换成 30 小时的海地劳动。即使存在美国棒球缝制者生产效率并不比海地高这一事实，情况依然如此。这就是“熊彼特式欠发达”所导致的“不平等交换”的后果。

4.3 多米尼加共和国与睡衣生产的技术进步

多米尼加共和国在人均资本拥有量上要比海地高很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扎弗拉（Zafra）产糖区的收获季节，多米尼加能够支付得起所引进的比本国便宜的劳动力成本。过去十年中，多米尼加提供了起码 40 万个制造业的新工作岗位。大多数人对来自制造业的经济增长和较高工资充满期待。毕竟，美国的财富不也正是建立在制造业的基础之上吗？

然而令每个人感到惊讶的是，这 40 万个制造业岗位并没有带来任何可衡量意义上的福利的提高。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无论是否

存在技术变迁，熊彼特式欠发达市场机制对生产过程都起到配置作用。多米尼加使用进口布料来生产衣服。十五年前，其向美国出口的睡衣会加上写有“布料产于美国，多米尼加剪裁和缝纫”的标签。大约十年后，标签变成：“布料产于美国，美国剪裁，多米尼加缝纫”。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服装产业受到一项新技术——激光剪裁技术——冲击的结果。受此影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含量大大减少了，从而劳动成本对最终产品不再是一个关键因素。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剪裁工序转而回到了美国。

只要源于不完全竞争的技术前沿推进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极端不平衡的现象，自由贸易就会导致世界经济中出现熊彼特式欠发达。根据市场的逻辑，缺乏技术进步进而缺乏创造性破坏的生产过程就会被“承包”（be farmed out）给穷国。在某些情况下，当一个巨大的封闭市场吸纳了（absorb）一个相对贫穷的小国的时候，技术水平落后的产品生产的“承包”（farming out）可能会对双方都有利。欧盟接纳相对较穷的小国葡萄牙，这一事实被证明对各方都有好处，正如第三世界的一些人进入第一世界国家从事刷盘子工作，对各方都有好处一样。[7] 然而，当今世界贫富人口的比例使这种“吸收”战略——使穷国更富裕的努力——不可行。西德政府在吸纳相对富裕且较小的东德时所面临的巨额成本就证明了这一点。

5. 循环流转与人类扮演的两种经济角色

如果世界是一个大舞台，其中每个人必须扮演各自角色的话，那么在经济意义上我们都同时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方面，作为生产者我们生产商品；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我们消费商品。我们生产的和消费的商品互相交换。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局限于生产方面，此时这两种角色被割裂开来，即生产者不再是消费者。经济学家们已经放弃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由同一个人来扮演的情况进行研究。其中家庭经济已经被归入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之中。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交换，而不是生产。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人类的这两种角色之间存在着完美的和谐。这就是罗宾斯（Robbins，1952）所谈到的由经济理论假设所导致的和谐状态（Harmonielehre）的一个方面。作为生产者的人类决不会与他的另一种角色即消费者的角色发生利害冲

突。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个人与社会整体所面临的境况很相似。只不过个人有可能优化自己的策略，而国家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对个人而言，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选择一门职业，意味着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两种角色之间的权衡实现。个人能够不断使自己的收入最优化。我们很容易想象，人作为消费者一方可以拒绝自身作为生产者一方关于减少当前消费以进入法学院学习的建议。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角色之间的理性争论可能导致这样的结论，即当事人放弃刷盘子工作去上法学院的选择有可能令其境况得到改善；这就是说，用放弃当前消费以换回今后更好的名声和更多的消费。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通常，职业的优化选择伴随着当前收入与未来收入之间的权衡问题。经济学家们在实际层面或“人力资本”的伪装之下，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职业优化选择的问题。当然经济学家们，甚或传统的贸易理论家们，决不会因为价格均等化就在眼前——刷盘子的人会挣得和律师一样多——就要求他们自己的孩子坚持刷盘子的工作。对于有可能成为律师的人来说，这确实很容易产生一个令人信服的李嘉图式的论断（Ricardian-style argument），即如果他坚持刷盘子而不是努力成为一名律师的话，世界将会变得更富裕。

为什么这种优化选择适合于个人而不适合于国家呢？大家都同意我们的孩子最好做律师而不是去饭馆里刷盘子。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不能从概念上把这个结论扩展到专门刷盘子与专门从事律师职业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情况呢？为什么对个人来说明显的是一条优化之路，而对诸如地区或国家之类的个人的集合体却不行呢？为什么在面临同类选择问题时，经济学家们给个人和集体所提出的建议却是相反的呢？个人可以通过更换职业来改善自身状况，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想过要给参与世界劳动分工的国家一些与上述例子中情况类似的建议呢？

答案是相当简单的：新古典理论通过简化的方法——假定其不存在——把刷盘子和律师这两种职业之间相区别的所有特征都给抽象掉了。在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下，律师将与刷盘子的人拿同样的薪水。在这些条件下，经济中每个人的工资都相同，不存在权衡和优化过程。

与“进入壁垒”有关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固定成本、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变迁的速度以及本书上卷第一章第六节中经济活

动的“质量指数”所列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个人工资以及产业利润率之间的差别。质量指数反映了从完全竞争到垄断的一系列变化，而且任何经济活动均可在图中得到反映。指数排名的高低反映了经济活动对个人较高工资和商品出口国较高生活水平的支持程度。

换句话说，质量指数反映了个人或国家可获得的“产业利润”水平的高低。熊彼特的“历史性报酬递增”，即规模与技术变迁的相互作用是创造高质量活动的重要因素。[8] 国际分工中专门从事低质量经济活动的结果导致了熊彼特式欠发达的形成。

重商主义和官房主义的国家战略都强调经济增长是活动特定的，即经济增长在一些经济活动中而不在另一些活动中发生（Reinert，1994）。为了富强，正如本人（Reinert，1995）的讨论所指出的那样，一国必须从事增强本国国家生产力的活动。这是15世纪末以来英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其他类似的国家包括法国（始于17世纪）、德国（始于过去的官房主义时代以及19世纪30年代的关税同盟）、美国（始于19世纪20年代）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不论何时都要通过奖励、补贴和保护来进行工业化活动。通过挑选出工业化过程所应该从事的经济活动，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发展出了一套“国家创新体系”。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国家创新曲线的斜率得到了优化。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进入壁垒确保了“工业租金”的形成，正是“工业租金”导致欧洲国家与其殖民地在生活质量上的差距。那些在联合国统计资料中被归入“新拓居地”（areas of recent settlement）的“白人”殖民地是其中的例外。这些国家维持了以前宗主国的战略，即保护和支持本地产业，即使针对母国亦是如此。

李嘉图贸易理论排除了导致“工业租金”产生的所有因素。正是我们给自己的孩子或其他人提供职业选择方面的建议时所拥有的直觉，使我们经济中的“工业租金”变为现实。当我们分析国际关系时，这种隐形的知识被自动排除了，于是我们进入了假定一切导致不平衡增长的因素都不存在的李嘉图式世界。尽管我们直觉上知道律师要比刷盘子的人富裕，但是为什么李嘉图和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能够使我们确信刷盘子的国家会和律师的国家一样富裕呢？

在一个劳动分工导致不同程度的不完全竞争、规模效应以及不

同知识类型形成不同市场价值的世界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注定要发生的。分配失衡形成的原因本质上不是由于不同程度的报酬递增和进入壁垒的存在，而是由于不同经济活动包含着不同程度的这些特点。正是不完全竞争程度的不对称性，而不是不完全竞争本身，导致了相对的贫穷和富裕。在所有经济活动都拥有相同程度的不完全信息和报酬递增这种非常特殊的假设情况下，我们仍然会得到平等的收入分配。这种情况对应于在质量指数上得分相同的职业之间发生交易的状况，如律师与医生之间。这种例子在18世纪英国论述“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的著作中可以明确地被发现，其中查尔斯·金把“制成品”与其他“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清楚地列为“好”的贸易（King，1720）。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发现“报酬递增”是一种重要的不平衡发展机制（Krugman，1979；1981）之后，他就从一个自由贸易怀疑者转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贸易鼓吹者（Krugman，1994）。克鲁格曼的这一转变看起来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情况”，即当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建立在相同程度的报酬递增或这种贸易是建立在相同程度的不完全信息之上时，报酬递增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就被正确地视作支持自由贸易的额外理由。这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如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大型汽车贸易以及律师与看病等；双方彼此都从对方的专业化中得到了好处（尤其是源自固定成本和信息优势），而且收入分配不会受到影响。这种具有相同质量指数的经济活动之间的交易，如律师和医生，我们把它称为对称贸易（symmetrical trade）。然而，如果一个实行自给自足且同时包括律师和刷盘子人的国家，突然放开进行自由贸易，那么一个国家将会专门从事律师事务而另一个国家专门从事刷盘子。不对称贸易由此而形成，它会对收入分配造成严重影响，即富国愈富而穷国愈穷。这可以简单地解释东欧在3年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0%～40%的原因。这正是李斯特所看到的拿破仑下台后法国的局面，他也因此从自由贸易的信奉者转变成了工业化和“国家生产力”的促进者（在这里，“国家生产力”的概念有点模糊，现在通常使用没有很好地被定义的“竞争力”这个概念）。

那些专门从事没有“历史性报酬递增”和“工业租金”的活动的国家为交易受损的一方，这些国家会变穷。只有在任务分工形成的经济活动“相类似”并且它们有着相同程度的“规模效应、不完

全信息和进入壁垒”这两个条件被满足的情况下，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才不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我们周围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根据其特点明显是各种各样的，因此，劳动分工的日益深化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日趋扩大，这种情况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存在的。

6. 结论：熊彼特式欠发达——过去和现在的政策结论

在没有参考几百年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重新发现了报酬递增效应。新理论为我们理解不平衡增长打开了一扇窗口，但它们却很难被转化成实际的政策，至少就第一世界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而言是如此，然而正是在政策制定领域，这些新理论本可以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在美国经济学会1993年的会议论文和记录中，编辑给新贸易理论部分起了一个很恰当的标题，即“自由贸易：（理论）勇气的丧失?”（《美国经济评论》，1993，ⅳ）。

这种情况产生的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学家们不愿用观察到的经济事实来检验经济理论模型。经济理论模型与实际的相关性几乎从来没有得到有关世界经济运行的实际观察资料的检验。在前面部分曾提到保罗·克鲁格曼1981年的论文，这篇论文实际上包含了关于国际贸易如何为一方创造了财富而在另一方却制造了贫穷的描述。克鲁格曼重新发现并用数学公式推导了19世纪支持工业保护的主要观点，然而他并不清楚正是这些观点使自己的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这仅仅是克鲁格曼的模型之一。另外一个较早的模型出现在“一篇有关星际贸易的精妙（clever）论文中，论文假定商品从一个星际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被运送到另一个星际，由此导致的相对时间的改变造成了不同偏好下的不同利率”（Dixit，1993，p. 173）。这些理论中的一部分对人类福利很重要，其他部分却不怎么重要。只要对真实世界的检验不是经济模型的一部分——聪明和与事实无关才是理论成功的主要标准——那么，这些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就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智力游戏而已。在一定意义上，这并没有错。模拟游戏，如象棋等，也是完全合法的。然而如果公众，尤其是那些负责第三世界经济政策制定的人，被误导并相信这些经济模型与世界经济的真实过程有任何直接联系的话，那么问题就产生了。

科林·克拉克在其《经济发展的条件》（Colin Clark，1940，

Ⅶ～Ⅷ）一书前言中的这些感慨，对现在来说比对他写作的年代更加有效：

> “我离开学术界只是因为我原来在……大学的同事（缺乏①）智力完整性和公众精神。他们对解决经济问题的理论思路而不是科学思路的持久热衷令我感到非常沮丧。至少在那些最热烈地谈论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人当中，看来很少有人明白科学方法的构成，也即对所有观察到的事实作出精心的系统化梳理，从这些事实出发提出假说，并在这些假说的基础之上得出新的结论，然后再用进一步观察到的事实对这些结论加以检验。他们阅读浩如烟海的文献，运用理论推导试图解决现代经济学中出奇复杂的问题，但通常一点也不参考对实际情况的观察——如果不是可悲的话，这也是可笑的……所有的理论必须根据观察到的事实不断地被检验，并再次被检验，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必须被无情地拒绝，这一根本的科学原则仍有待于掌握。”

观察到的或典型的事实是，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伴随着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而对此两大集团之间并没有改变的行动（movement）。同样结果也发生在欧盟内部：市场的扩大需要再分配力度的加大。欧盟每年都在增加用于再分配的货币金额，在欧盟的工业化国家中，这种增加额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一半。另一个关键的典型事实是：经济福利的增加与其说是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国家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不如说是对经济活动进行选择的结果。那些与发达国家“最好的实践”相比其生产有效率的国家依旧贫穷的情况，被我称为“熊彼特式欠发达”。

从新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逐渐产生的政策含义，与从1613年到1890年的舍拉、罗雪尔以及早期的马歇尔等作者之间的观点不存在根本性区别。这些新理论重新发现了重商主义产业政策的实质，即在这个经济活动对于提高国家收入水平具有不同潜能的世界上，我们可以选择更优的路径。这些看法曾在第一世界的政策中被使用，但现在却从第一世界针对第二世界（即前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所制定的政策中消失了，而它们对第二和第

① 从上下文关系来看，加上“缺乏”两字才易于理解。——译者注

三世界却有着最大的影响。

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普通的律师都比饭馆中效率最高的刷盘子的人挣得多。对于刷盘子的人来说，与无所作为（即自由放任）的选择——“尽管工资低，但毕竟刷盘子是我在社会上的比较优势”相比较而言，通过学习成为一名律师是一条最佳的道路。陷于熊彼特式欠发达的国家面临着类似的情况。海地可以通过生产比美国生产效率低的高尔夫球来改善国民福利，而不是用人均30小时生产的棒球来交换美国人均1小时生产的高尔夫球。即使美国可以在高尔夫球的生产上维持十倍于海地的效率，然而根据当今球类商品的价格，海地在高尔夫球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也要比专业化和自由贸易条件下富裕三倍。相对于自由贸易，球类的自给自足能够使海地的境况得到改善。那么海地应该如何获得资本呢？这可以通过采取与法学院学生相类似的办法得到解决，即先贷款，然后再用将来的“工业租金”来偿还。

在一个报酬递增程度不同与技术进步收益的共谋效应和古典效应并存的体系中，一些国家可以通过自给自足的办法获得比自由贸易条件下更好的境况。这就是大多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包括该学派的领导人——威纳尔·桑巴特，从根本上反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同样实行自由贸易的根本原因。海地的例子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采取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所开创的最佳道路，即产业保护的美国体系，正是这一体系使美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发展成了世界强国，这绝不是一种牵强的理论观点。

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一样，同为北美工业保护精神领袖的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把个人的情况与国家作了比较，他指出：“如果个人可以这样做，那么，国家也应该如此”（Raymond，1820，p. 115）。雷蒙德的观点的核心是优化选择：处于保护之下的美国工业品价格的提高完全可以由工资的提高来弥补，因为世界各地工业工人的工资要远比农民高。[9] 在19世纪美国经济的例子中，人们通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两种角色之间的权衡，得出的结论是：自由贸易是一种次优选择。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出现了很多熊彼特式欠发达的例子，在这些地方存在着类似的最佳道路可以被探索。对这些道路的探索需要经济学家们更大的“理论勇气”，并自觉地转向科林·克拉克所谓的“事实与科学研究”，以弥补当今主流理论的不足。

注释

1 本文是在作者为1994年8月第五届熊彼特年会（the 5th Conference of the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Society）提交的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感谢本书编辑和基思·史密斯（Keith Smith）提供的帮助。

2 霍尼克的重要著作在1684至1784年间出现了16个版本，全是德文版。这比当时最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在版本数量上多得多。孟的《英国的财富》从1664年开始共出版了8个英文版本和6个翻译版本，蔡尔德（Child）的《1690年简要观察》（Brief Observations of 1690）达到10个英文版本和2个翻译版本。关于霍尼克之后“原始历史学派”有关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参看Tribe（1988）。

3 在意大利语的出版物中出现的把马克思与熊彼特相比较的书籍和杂志数量最多，总共有23种。其次是日文书籍和杂志。

4 这部分没有在1912年的德文版中出现。

5 ‘Ohne auf Sombart und die allgemeine Literatur der zwanziger und dreissiger Jahre hinzuweisen, bot Schumpeter（in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tnokratie*）im wesentlichen nur dass, was bereits Jahrzehnte zuvor in den deutschen Diskussionen iiber die “Zukunft der Kapitalismus” geschrieben und gesagt worden war, wobei er freilich die gesellschaftlich konservativen Folgerungen, die bei Sombart in der Forderung nach Reagrarisierung und Autarkie gipfelten, nicht ubernahm’（Appel 1992, 260）.

6 这一点应该与20世纪50年代初普雷维什—辛格（Prebish - Singer）命题所引发的贸易条件争论作一比较。摩尔顿提出了贸易条件不变而一个群体变富、另一个群体变穷的机制。笔者的“共谋”方式和摩尔顿的观点反映了辛格而不是普雷维什的正确性，参见辛格1949年名为《投资国和购买国之间的收益分配》的论文，重新收录在辛格（Singer, 1964）中。

7 1994年，瑞士的泰米尔移民面临着被驱逐的威胁，结果他们却有一个政治支持者，即饭馆所有者协会，因为这些人依靠移民为他们刷盘子。

8 “质量指数”可以被视为解释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的“高质量工作”和“低质量工作”的一种努力。专业从事“低质量工作”的国家，如海地，会遭受熊彼特式欠发达。

9 克拉克（Clark, 1940）很好地记录了这种工资差别，例如，他发现，挪威的农业工资水平只是工业工资水平的8%（可能忽略了食宿费用）。

参考文献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2), May 1993.

Appel, M. (1992), Werner Sombart. Theoretiker und Historiker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Marburg: Metropolis.

Augello, M. M. (1990),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A Reference Guide, Berlin: Springer-Verlag.

Babbage, C. (1832),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Charles Knight.

Backhaus, J. (1995),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Social Scientist, 3 vols, Marburg: Metropolis.

Bell, S. (1940), Productivity, Wages, and National Incom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enìtez Rojo, A. (1989), La is la que se repite, Hanover, New Hampshire: Ediciones del Norte.

Business Week (1994), 'America's New Growth Economy', 16 May.

Clark, C. (1940),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Clemence, R. V. (1951), Essays of J. A. Schumpeter,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Coote, B. (1987), The Hunger Crop. Poverty and the Sugar Industry, Oxford: Oxfam.

Dixit, A. (1993), 'In Honor of Paul Krugman: Winner of the John Bates Clark Meda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Hermann, F. B. W. (1832), Staatswirt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Munich: A. Weber.

Hillman, R. S. and D'Agostino, T. J. (1992), Distant Neighbours in the Caribbea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and Jama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Praeger.

Hufeland, G. (J807), Neue Grundlegung der Staatswirthschaftskunst, durch Prüfung und Berichtigung ihrer Hauptbegriffe von Gut, Werth, Preis, Geld und Volksvermögen mit ununterbrochener Rücksicht auf die bisherigen Systeme, Giessen and Wetlar: Tasche & Müller.

King, C. (1721), The British Merchant or Commerce Preserved, 3 vols, London: John Darby.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

Krugman, P. (1981), 'Trade, Accumul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

Krugraan, P. (1994), 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New York: Norton.

Lemoine, M. (1985), Bitter Sugar, London: Zed Books.

Lucas, R. (1988), 'On the Mechanis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Marshall, A.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Moulton, H. G. (1935), Income and Economic Progres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urse, E. and Drury, H. (1938), Industrial Price Policies and Economic Progres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Ortiz, F. (1940), Contrapunteo Cubano del Tabaco y el Azúcar, Havana: Jesus Montero. Second edition: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8.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de Onìs (1947),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ronoslaw Malinowski.

Raff, D. M. R. (1988), 'Wage 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ive-Dollar Day at For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Raymond, D. (1820), Thoughts on Political Economy, Baltimore: Fielding Lucas.

Reinert, E. S. (1994), 'Catching-up from way behind: a third world view perspective on first world history', in J. Fagerberg et al. (eds).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Trade and Growth, Aldershot: Edward Elgar.

Reinert, E. S. (1995),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Predecessors—a 500 year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Economic Dynamics and Structural Change, March.

Robbins, L. (1952),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in Engl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Rochester, A. (1940), Why Farmers are Poor.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Romer, P. M. (1994),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Roscher, W. (1854),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okonomie, Stuttgart: Cotta.

Roscher, W. (1882),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Callaghan & Co.

Rosenberg, N. (1976),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nberg, N. (1994), Exploring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economics,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umpeter, J. 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12.

Schumpeter, J. A. (1942), Capital,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Serra, A. (1613),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i regni d'oro e 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 Napoli: Lazzaro Scoriggio.

Singer, H. (1949),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reproduced in Singer (1964).

Singer, H. (1964),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Change, New York: McGraw-Hill.

Streissler, E. W.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Prospects of Small-scale Enterpri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ixth Annual Heilbronn

Symposium in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Wilhelm Roscher (1817—1894). A Centenary Reappraisal', June 1994.

The Economist (1985), 'Enslaved by Subsidies', 10 August.

Tribe, K. (1988), Governing Economy. The Reformation of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re, A. (1835),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Charles Knight.

Verspagen, B. (1992), '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s: A Survey',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14.

Vethake, H. (1844),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n, Philadelphia: J. W. Moore.

Von Homick, W. (1684), Osterreich iiber alles wann es nur will, Nurnberg: n. p.

Whatley, G. (1774), Principles of trade. Fredom and protection are its best suport. Industry, the only means to render manufactures cheap, London: Brotherton and Sewell.

第十一章　重商主义与经济发展：熊彼特动态、制度建设与国际评价基准[1]

埃里克·S. 赖纳特、索菲斯·赖纳特

对于从天文学到动物学的大多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言，文艺复兴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分水岭。通常，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知识变革时期。直到今天，达·芬奇（da Vinci）、伽利略（Galileo）和马基亚维利（Machiavelli）的时代仍旧影响着我们研究文化、科学和人类共存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展是如何被扩展到“意大利之外的范围”的（Braudel，1991）。这些发展扩展的前提条件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小型城市国家的生产力使其大部分居民能够脱离贫困。在这些城市里，原来的封建主义仅使极少数人富有，而使大多数人处于凄惨境地；而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城市首次见证了由工匠、商人和公务员所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

1. 关于重商主义的争论：一个简要概述

在经济学的论著中，对文艺复兴时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假设这300年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同质性，并试图将其一并纳入“重商主义”的标题之下，这种观点是对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多样性的长期历史阶段的相当肤浅的认识。当前普遍的看法是，重商主义是

① 原载 Jomo KS & Erik S. Reinert (editors),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How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Have Addressed Development, Zed, 2005, pp. 1 ~ 23. ——译者注

“一种非理性的社会秩序”（Ekelund and Tollison，1981：6），其基本特点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都犯了将黄金和财富混为一谈的严重错误。重商主义的实践被认为是“米达斯谬误”（Midas①Fallacy（黄金拜物教 chrysohedonism②）），追随了神话中可以点石成金的国王。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这一米达斯谬误就成了对重商主义的一般性解释，在当代的经济思想史中仍能找到。然而，自罗马时代以来，米达斯的传说就被作为一种告诫，而重商主义者们自己就用它来明确地驳斥这种财富观（Barbon，1696）。最近，两位美国作者对重商主义提出了一种似乎是替代性的解释，将其视为一种非生产性寻租的社会（Ekelund and Tollison，1981）。

这两种对重商主义（一般为前斯密经济学）的标准解释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既然从现代城市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的已知人类文明是此前人类全部才智的产物，那么，怎么能够把经济学排除在外呢？对于其研究者从不考虑有关经济实践的“实际”经验知识（参见马格努松论赫克歇尔，Magnusson，1994：15）的一门学科来说，除了判给重商主义严重的方法论谬误、错误的经济政策和错误的目标这些罪名外，它还能说些什么吗？在某种意义上，重商主义的产生就像是一个非理性的“地狱”，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光辉成就相比犹如稻草人般孱弱。但是，如果没有前一个历史时期“愚蠢”和“非理性”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亲身经历却未曾关注过的工业革命有可能出现吗？只有在“命定说”这种偏执的编年史传统中，美国的伟大成就才在不考虑政策的情况下被看作是神赐的产物。但是，我们怎能忽视如下历史事实呢？自 1791 年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开始，重商主义的核心原则支配美国经济长达一百多年之久[1]。在那段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著作的标题证实了重商主义是其思想的源泉。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我们可否大胆地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中，重商主义者实际上所奉行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明智的？在本章中，我们将表明，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实际上，我们认为，以生产为核心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一个国家从贫困到富裕的必由之路，

① 米达斯：希腊神话中弗利治亚（Phrygia）的国王，相传其十分贪财，求神赐予自己点物成金的法术。——译者注

② 相信黄金为幸福之源（the belief that all happiness lies in gold）。——译者注

它是从1485年的英格兰到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所奉行的经济政策。我们认为，作为一般性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state）的基本原则的“重商主义”政策工具在长时间内基本上没有变化，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某些方面会变得复杂一些，但却保持着同样的基本原则，请见本章附录。我们认为，它代表着遍及欧洲的重商主义的典型的经济学原则和政策工具的总和，这种重商主义包括了其地区性的变种——德国的官房主义（Cameralism）和法国的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

解读重商主义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实际上几乎没有经济思想史学者阅读过原始文本。在讨论前面提及的埃克兰（Ekelund）和托莱森（Tollison）的工作时，马格努松（Magnusson，1994：15）认为：“他们也对重商主义者们实际上说了什么毫无兴趣”，这种情况在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分支都有所体现。进一步而言，对于重商主义的分析经常受到佩罗塔（Perrotta，1993：21）所称的“先兆论”（precursorism）[①] 的损害，也就是说，这种分析不依照相关情境来评判经济思想，而是认为任何经济思想要么是关于某种健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理的、令人意外的早期预知，要么就是一个毫无希望的错误理论的例证（Ashley，1920：Ⅱ，381）。

此外，重商主义的研究者们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掌握超过一种或两种语言的文献资料。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到重商主义的经济原理和政策在泛欧洲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情况，特别是在1650年至1770年这段时间内尤其如此。由于在瑞典重商主义体系的研究中一直被公认为权威的埃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1931）[2] 的影响，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埃利·赫克歇尔对他不同意的重商主义传统进行了相当静态的分析，把它描述成了原始的和没有分析的。同样，第一个西班牙语重商主义文献的编撰者曼努埃尔·卡梅隆（Manuel Colmeiro）近来转向了经济自由主义，因而也开始强烈地反对他以前试图描述的体系。总而言之，现代有关重商主义历史的著作几乎写得像阿提拉（Attila）和他的匈人（Huns）所负责撰

① 原文为percursorism（极端草率主义）疑为precursorism的笔误。——译者注

写的罗马帝国史一样歪曲①。

我们对于重商主义的解释是基于在原来的历史情境中对重商主义文献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种解释与意大利的卡西莫·佩罗塔（Cosimo Perrotta，1988，1991，1993）、西班牙的欧涅埃内斯特·鲁奇（Ernest Lluch，1973，1997，2000）和瑞典的拉斯·马格努松（Lars Magnusson，1991，1994）等欧洲同事近期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新”的、情境特定的解释大致相当于德国历史学派对于重商主义的看法，该学派的大多数人认为重商主义与（现代）国家的诞生是相互依存的。[3]

在我们看来，斯密的米达斯谬误方法以及埃克兰和托莱森的寻租方法在结论上是根本错误的，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仍认为有关重商主义的这两种理论也具有一定价值，因为它们抓住了重商主义者试图说明的问题的不同侧面。实际上，金银的外流是影响着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问题的即时显示器（acute symptom），因而也是当代学者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4] 早期重商主义者的政策建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简单地通过调控金融变量，试图治愈金融领域中出现的症候，这是一种简化论和平民主义（simplistic and populist）的政策建议；另一类则试图在生产领域中探寻产生问题的原因，我们把它称之为“关于实体经济（the real economy）的重商主义者”（real Ökonomische Merkantilisten）。[5] 所有重商主义者之间最激烈的争论都是在这两派学者之间展开的，是在“货币主义者”和“生产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在1610年到1613年的那不勒斯，它是在德·桑蒂斯（de Santis）与舍拉（Serra）之间展开的；而在1622年到1623的英格兰，则是在米森登（Misselden）和马林斯（Malynes）之间展开的。然而，到17世纪晚期，重商主义者明显地更加倾向于强调“实体经济”。约翰·洛克（John Locke，1691/1696）是最后一个纯货币主义者之一。18世纪20年代，反复出现的金融泡沫使短期内又出现了大量的对投机活动进行论述的著作。

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一直占据主流的“生产主义者”，

① “匈人”是欧洲人对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西迁的一支的称谓，“匈人”大约于公元四世纪进入欧洲，是使罗马人闻风丧胆、俯首称臣的征服者。按照作者的看法，阿提拉（Attila）和他的匈人（Huns）站在征服者的立场上对罗马帝国进行了明显不公正的贬损和歪曲。——译者注

实际上，大多数的重商主义者在他们的分析中都非常明确地阐明，财富的关键取决于生产层面而非金融层面。[6] 由于现代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金融与货币问题，对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重商主义者，因此他们倾向于与重商主义者相左的观点。近来治理阿根廷经济危机所采用的政策与大多数重商主义者始终提倡的政策是相反的，（这些解决危机的政策）导致了阿根廷工业化进程的倒退（de-industrializing），并且为了追求错误的货币目标而将工资减半。

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更为奇特的一个方面表现在明确地将“完全竞争”或“商品竞争”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性状态和目标之后，反而排除了“非正常”利润存在的状况。经济的“正常”参与者只是一个对价格毫无影响力的农民。在他们看来，从钢铁巨擘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比尔·盖茨（Bill Gates），这些历史上的成功者只是具有消极含义的“寻租者”。人们仅仅是从这种新古典主义或新奥地利（Neo-Austrian）学派的视角来理解埃克兰和托莱森对于重商主义的看法；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看法却指明了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民之间的“完全竞争”从来不会产生出数量巨大的财富。即使是在当代的美国和欧盟国家中，最有效率的农民仍然需要大量的补贴来实现适当的收入水平。我们认为，斯密之前的经济学仅仅是一种系统构建的、“熊彼特主义”的动态不完全竞争。15 世纪晚期所诞生的（对于工业化而非财产收入）的专利权和贸易保护是当时最为有效的两种制度，它们都是为了实现这种动态不完全竞争而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具有时间限制的市场力量。与当代任何商人的理解一样，重商主义者们认识到“完全竞争”状况不能够累积出任何巨额财富，也不能实现经济增长。

正如已经讨论过的（Reinert and Daastoel，2004），动态的租金能够在三个经济层面上得以扩展：①对企业家而言是以利润形式体现；②对雇员而言是以雇佣金形式体现；③通过政府不断增长的税收方式体现。在技术快速变迁的条件下——就像通过新技术所实现的“生产率大爆发”（Perez，2004）那样——这种“三重寻租”表现为一个制造业国家巨大的正和博弈。我们认为，重商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为了实现这一“三重寻租”过程。在亚当·斯密之前 300 年所创立的专利权、（贸易）保护及学徒制等制度和在他的著作发表大约 100 年前所建立的科学院都有助于扩大经济的整体规模，提高利润、工资收入和政府的税收能力。

2. 心智变化与文艺复兴时期财富创造的源泉

对于经济发展的恰当理解是重商主义者的一项创新。最近，当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声明“全球化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时候（Soros，2004），他不言自明地触及了经济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在文艺复兴末期就凸显出来的关于发展理念的重要问题。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人们认为世界是一个有限区域，存在于宇宙守恒的循环体系之中。这种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Politics，1328b，Ⅶ，Ⅸ，3）所创立的传统零和宇宙观，通过经院哲学学派（Scholastics）的承继，主导了现代社会早期之前的欧洲天文学。[7] 当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在谈到“由于一国的成功必然以另一国衰落为代价，并且成功是盛衰无常和往复循环的，因此不可能使所有人同时感到满意”的时候，他的看法就包含了这一观点的内容（Browne，1643，ⅩⅦ），而早期关于“贸易平衡”的讨论也与“一人所得必为他人所失”的理论密切相关（见 Finkelstein 书中的 St. Jerome，Finkelstein，2000：89）。因而，对于社会动乱的恐惧束缚了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在文艺复兴的晚期，这种看法的影响才缓慢地消逝了。

各种因素的结合解除了这种零和主义世界观的束缚。[8] 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能找到许多摆脱这一桎梏的必要条件存在的痕迹，但是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具备了至关重要的充分条件，进而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以及后来在欧洲其他地区实现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首先，当时财富的创造无可否认地向城市倾斜是协同（synergic）效应的结果，佛罗伦萨（Florentine）的财政大臣（chancellor）布鲁内托·拉帝尼（Brunetto Latini，ca. 1210—1294）称之为“共同利益”（common good）。这种使某些城市十分富有的巧妙的妥协精神（ben comune）（见 Reinert 和 Daastoel 书中的 Machiavelli，1997）来自于一种社会有机和谐的状态，它将社会比喻为身体，同时也是经院哲学的遗产之一。[9] 这种协同性共同利益的思想是许多重商主义者论著的轴线。必须强调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个人作用的重要发现是建立在社会的协同性共同利益之上的。正如后来的德国经济学那样，重商主义对于必须考察的社会和个体利益采用的是一种二重视角，而在此之前，人们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看作是替代性的（见本文集中索菲斯·赖纳特的文章）。

其次，将社会视为零和博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世界观逐渐让

位于通过创新来产生新财富的理念。实际上，当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77 年在牛津因为“可疑的创新”（innovation）而被捕时，“创新”这个词还具有潜在异端行为的含义。但在 300 多年后，当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撰写《论创新》（An Essay on Innovations）时，“创新”却被看作是人类福利和快乐的新载体。在这期间，“创新”（innovation）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发生了变化（Reinert and Daastoel，1997）。新的科学突破、地理上和科学上的发现逐渐改变了静止的中世纪世界观。这种对于无限扩展的宇宙的进一步理解，是重商主义者们重新认识经济问题的前提条件：正如宇宙是无限扩展的那样，经济亦可如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构建全新的欧洲宇宙学的过程中，在创新和探索、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协同作用（Grafton，1996）。

再次，宗教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接纳创新。在土耳其人（Turks）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之后，拜占庭（Byzantine）的哲学家们迁往意大利，并且带来了他们的宗教观：对于人类的作用的看法更为开放，将人类视为共同的创造者而非上帝蓝图的单纯接受者。确实，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类使得发明和创新的生活成了一种快乐的职责（Reinert and Daastoel，1997）。因此，在 1600 年左右，就像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大西洋》（New Atlantis）中所描述的那样，人类所面临的已经是无疆界的新知识，使人类从“大自然的旁观者变成了其所有者和支配者”（Koyré，1957：Ⅶ）。

多次出任意大利总理的历史学家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谈及了从经院主义到重商主义的转变：“经院主义是在均衡的框架内考察秩序问题，而重商主义则是在增长的框架内考察秩序问题。”（Fanfani，1955：149）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均衡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它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向经院主义回归的倾向（Reinert，2000a）。

3. 对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的考察：作为国家评价基准的重商主义

佩罗塔（Perrotta，1993：19）认为，“诞生于 16 世纪的重商主义是对西班牙衰落的反应”。我们还认为，17 世纪和 18 世纪重商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对于荷兰共和国和柯尔贝尔的法国取得成功的反应。最好的重商主义作家是那些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而不是那

些致力于“抽象推理”的人。建立一项国家经济政策的合乎逻辑的办法是观察其他国家中可行的和不可行的相关政策。在欧洲，既有富裕的地区，也有贫穷的地区。对于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济体的考察成为刺激后进国家寻求（适当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动力。因而，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不是诞生在像威尼斯或者荷兰共和国这样的、将获取财富视为“自然而然”（事情）的富裕和成功的地区，而是产生在较为贫穷的城市和国家（Laspeyres，1863/1961）。这些城市和国家试图理解在欧洲其他地区陷入贫困之时，究竟是何种因素创造出了少数富裕的“岛屿”（其中的某些“岛屿”并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富裕，这就为他们探寻致富的原因提供了部分线索）。

因此，我们认为，重商主义的关键工具之一，也是重商主义的启示，就是评价成功国家或者失败国家，这种评价的实践早在15世纪晚期就已存在。从1550年左右开始，欧洲出现了一个国家经济衰败的典型例证——西班牙；以及两个无可置疑的经济成功例证——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基本问题是相对简单的。每个人都知道，大量的金银从美洲流入西班牙，然而从1550年左右开始，金银的输入没有使西班牙实现普遍富裕这一事实日益明显。这些金银最终流入了那些一般来说没有金银矿藏的国家。财富从原材料的产出国输出——即便这些原材料是金银——而流入具有多门类制造业部门的国家。

在1550年左右之后，西班牙开始不断地向国外银行借贷，并且逐渐丧失了金融自主权。对于诸如葡萄酒和橄榄油等西班牙农产品供应的垄断造成了（伊比利亚）半岛内食品价格奇高，加之黄金的（大量）输入，最终导致了失控的通货膨胀。此前在欧洲市场内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丝绸、钢铁等西班牙工业消失了。该国的工业化程度开始退化，并且大量进口商品，使得从美洲殖民地输入的黄金以同样的甚至是更快的速度流出西班牙。受到垄断权以及葡萄酒、橄榄油等农产品十分缺乏供给弹性（双重）保护的富裕农民，可以购买使之免于交税的贵族头衔。教会的财产和机构也是免于交税的，这使得那些在进口商品浪潮中幸存下来的工匠和工场主来承担纳税义务。富有权势的梅西塔（Mesta）是牧羊人的组织，它通过向王室贷款来提高自己的权力，成为国中之国。属于教会永久保有的大片

（mortmain）[10]土地任其荒芜。一个庞大的神职人员阶级的存在使得对于手工劳动的普遍蔑视情绪更加强烈；大量的失业、就业不足以及大量的乞丐构成了一幅西班牙迅速衰落（时期）的简明画卷。在西班牙，财富来源于不能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金融交易；来源于物权收入（censos），即金融信贷和抵押；还来源于利权（juros），即特权——用信贷交换而来的、由国王赐予的头衔和权利。而在当时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西班牙的经济学家们对于国家经济弊病的成因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提出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的对策。美国历史学家厄尔·汉密尔顿（Earl Hamilton，1932：237）指出："无论是那些道德理论家们对于至关重要的社会弊病提出的如此有效的诊断，还是统治者如此全然地漠视这些可靠的建议，这些情况在历史上都是鲜有所闻的。"

在欧洲经济图景的另一面，我们考察的是荷兰联省（the united Dutch provinces）。从焦万尼·伯特罗（Giovanni Botero，1588/1621）开始，到1683年"伟大的柯尔贝尔"（the Great Colbert）逝世（可以说是成功的法国经济政策消亡之时）之后，许多（奉行）重商主义的地区一直聚集着大量的财富。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整个欧洲，从焦万尼·博塔罗（Giovanni Botero，1588）、托马索·坎帕尼拉（Tommaso Cammpanella，1602）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吉诺维西（Antonio Genovesi，18世纪70年代）到德国以外的首位经济学教授、瑞典的安德斯·博赫（Anders Berch，1747），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这样一个共同观点：制造业是真正的金矿，它比现实的金矿更有价值。西班牙重商主义者吉罗尼莫·德·乌茨塔瑞斯（Geronymo de Uztariz，1724/1752，并为Goyeneche作序，1717）的主要作品被译成了英文和法文。他是一个西班牙人，但在荷兰和意大利生活了23年，从一个特别有利的角度（就上述观点）进行了评述。乌茨塔瑞斯的结论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制造业）是比波托西（Potosi）更加丰饶的矿藏。"[11]

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董事、最著名的重商主义者之一的约书亚·柴尔德（Josiah Child）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掌握世界贸易，就必须效仿荷兰人，他们既是最卑劣的商人又是最优秀的制造业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具备向所有的市场和客户（Humors）提供服务的能力。"（柴尔德，1693：90）。藉此他谈到了将重商主义作为经济政策的评价基准这一思想。类似地，

柴尔德用对“荷兰人（Netherlanders）经济急速增长”的评述作为他1668年著作的开头，认为它是“当代的罪恶和未来永世的奇迹”。他又写道，“而且，他们（荷兰人）藉以领先的方法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可以为其他大多数国家所仿效……就此我将努力在下文中予以阐明”（Child，1668）。当时的法国观察家于埃（Huet，1712/1722）也许把这一点表述得最为详尽，他发现不仅存在着以制造业为专业的国家——在16世纪早期，这样的国家意味着制造业吸纳了该国近30%的劳动力——而且也出现了包含着古代意大利巧妙妥协精神的一种协同体系。对于大多数敏锐的观察家来说，事情很明显，荷兰的财富仰仗于制造业协同的相互依赖性、远程贸易以及渔业，这与安东尼奥·舍拉对威尼斯体系的解释相类似：“一种要素会提高其他要素的功用，反之亦然。”

一个关于17世纪的荷兰城市代尔夫特（Delft）的简要的案例研究表明了创造知识的行为的多样化基础和看似无关行为之间的溢出效应（spillovers）是如何产生协同体的。在代尔夫特，确实存在着一个紧密联系的、有关海洋的科学艺术的集群（cluster），它使得创新从经济体的不同部门中跃然而生。代尔夫特的案例将那些在类似的生产与科学的集群中存在的、被传统的德国观点当作资本主义的重要推动力的部门和要素聚合起来，全部包容在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之中：

- 对于军事力量的需求，即如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战争与资本主义》中指出的那样，在本案例中指的是海军（Sombart，1913a）。
- 对于享乐的需求，即如维尔纳·桑巴特的《享乐与资本主义》中指出的那样，在本案例中指的是艺术（Sombart，1914b）。
- 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即如维尔纳·桑巴特在其论述资本主义的著作（Sombart，1902/1928）和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谓的“随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时指出的那样。

在导致代尔夫特出人意料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三种力量是相互作用的，而将这三种看似无关的领域——海战、艺术和科学进步——统一起来的奇特职业是透镜研磨者们的玻璃透镜制造业。

荷兰艺术家发明了油画和在画布上作画的方法。这些发明的原材料——亚麻油、亚麻和大麻纤维广泛应用于荷兰的造船业并且可以随时获取，但是对于其他流派的艺术家而言，这些原材料就不是

随时可以获取的了。在17世纪，代尔夫特取代佛罗伦萨，逐渐成为发达的玻璃透镜制造中心。这里还出现了显微镜的重要改进（Ruestow，1996）。代尔夫特的自然科学家、显微镜的制造者安托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发现他制作的手持透镜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纺织品的质量检查（Huerta，2002：33），因此在当时的主要工业——羊毛纺织业和他的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协同性。类似地，通过代尔夫特画家杨·维梅尔（Jan Vermeer，1632—1675）的作品，使透镜制造业和弗兰德斯（Flemish）艺术的发展融为一体，并将艺术史与科技史联系起来。杨·维梅尔的绘画技法包括通过透镜和照相暗盒（camera obscura）（一种类似于原始照相机的装置）来检查其作品的基本色彩。在代尔夫特，维梅尔还热情地参与了身边的各种发现和探索活动：荷兰海军的地理发现，以及那些由于列文虎克及其同事对于显微镜的改进才成为可能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12]虽然海军和商业航海是双筒望远镜用透镜的最大需求者，但是如前所述，自然科学家和早期的显微镜制造者也是透镜的需求者。因而，代尔夫特的透镜研磨者们形成了极其重要的、打破常规的产业集群的核心，这个集群包括了诸如海军、羊毛工业、维梅尔之类的画家、自然科学家和显微镜的制造者等各种各样的参与者。

在当时的荷兰，另一个与战争（海军）、享乐（艺术）和“随意的好奇心”（科学）都有联系的生产过程是地图绘制。作为一个海上强国，荷兰不仅需要双筒望远镜和其他的海军装备，还需要最新的地图。[13]一个作家评述了维梅尔“对于地图的狂热”，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他对于地图和探索活动的兴趣都有明显的体现。这种兼具协同性和累积性的因果联系，及其创造出来的路径依赖效应，毫无疑问地成为知识创造和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Arthur，1989）。然而，它们既不可能单凭定量的方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复制，也不可能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加以展现。

当时，所有研究荷兰共和国的经济学家们都观察和论述了这种经济活动的极丰富的多样性，这一点在早期的经济杂志中也有论及（Zincke，1746—1767）。多样性的作用和能够产生创造力的意外收获（serendipity）使我们回归到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社会中的“单一经营”问题，这些理论认为那些相互进行交易的职业之间不可能出现这种具有创造力的联系。牛奶生产商的社团与橡胶生产

商的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贸易联系。通过模仿荷兰的经济结构而不是模仿荷兰的经济政策，并且通过吸取西班牙的教训，重商主义者们表述了他们对普遍的经济原则的认识：

• 经济发展是活动特定的（activity-specific），经济发展是由那些特定的经济行为（制造业）而不是由其他因素创造出来的。（由于停滞不前的生产率、报酬递减和单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农业社会中没有协同性。）[14]

• 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协同性的过程：劳动分工和职业种类越多，财富就越多（在1613年舍拉的著作中就明确表达了这一论断）。

• 根据下列因素确定制造业的（门类）认定、支持和保护措施：

a）其创造财富的能力

b）其创造就业的能力

c）其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能力

d）其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能力

• 从18世纪开始，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有益的协同性就是至关重要的：成功的农业仅存在于制造业也取得成功的地区（这是当时德国的尤斯蒂（Justi）、意大利的加利亚尼（Galiani）和英格兰的休谟（Hume）的看法）[15]。一般来说，重商主义者因为没有关于经济发展的“模型”而受到指责。在我们看来，无论是从时间上而言——从16世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最早的作者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还是从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空间上讲，（重商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模型）始终是明确存在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本质是，通过将国家引入能够产生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报酬递增产业来使个人和公众都从中受益。换言之，当我们认为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时候，我们不仅被动地认可了个人利益，而且有意识地创造出了一种为了加强、驾驭和引导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诸如专利权和贸易保护的新制度。

我们认为，坚持上述原理是包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韩国在内的、所有已经由穷变富的国家的必经之路。正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指出的，当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倡导者们）不允许他们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殖民地遵从这些原则时，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地区被“从通向富裕的梯子上踢了下去”。

重商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重商主义者的经济政策建议高度依赖于具体的情境——在某种情境下制造业的保护政策是正确的，而在另一种情境下提倡自由贸易也是正确的——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建议则与情境无关。

4. 重商主义动态与制度：活动特定的经济增长和情境特定的经济政策

在过去10年中，经济制度一直是关于经济发展争论的最前沿问题。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是协同演化的(co-evolve)，因而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企图——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需求拉动或者供给推进而产生的——很容易陷入鸡和蛋之类的问题之中。从很早的时候起，重商主义对于制度的看法一直就是：在本质上，制度建构是一种需求拉动现象，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制度（类型）。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在其后近两个世纪的社会科学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在最文明的欧洲地区和最荒凉野蛮的新印度（New India）地区之间，人们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来源于土壤、气候或者人种，而是来源于人文艺术。"弗朗西斯·培根对于问题的因果关系颇有见地：人的行为——其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制度(类型)。最近，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2003）运用类似的逻辑来讨论技术变迁和人类制度之间的关系。

1769年，德国科学家约翰·雅各布·梅因（Johan Jacob Meyen）写道："我们知道，原始人是不会改进他们的习惯和制度的，后来，为了创建有益的工业，才出现了其他方法。"（Reinert，2000a）他表述了一种在当时被看作常识的因果关系。这种观点显然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标准看法是相反的：世界银行认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表现不佳应该归因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对于重商主义者而言，如果只是孤立地考察促进众多关键性制度建立的工业化战略，而不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试图理解欧洲（经济）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15世纪晚期在威尼斯发明的专利权制度证明了这一点，而如果抛开那些在16世纪建立英国羊毛工业时采用的、在都铎王朝时期（Tudor）极为成功的发展战略所形成的特定情境，我们也不能理解在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统治下的英格兰建立起来的学徒制度。如果不考虑德国为创建农业以外的经

济活动所采用的政策，我们就不能解释18世纪、特别是由哥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所倡导的科学院体系的建立。这些多样化的战略生成了新的制度安排。

如果脱离国家在摆脱原材料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时所面临的特殊情境，我们就难以理解这些重商主义者的制度安排，此时采用的战略是不能用华盛顿共识的新古典主义框架进行解释的。我们认为，目前对于制度的看法是在生成这些制度的情景之外来考察制度的。实际上，这些制度中的大多数只是那些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内在逻辑相悖的、范围更加宽泛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脱离那些由其支持和维护的生产体系而考察制度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中建立科学院的想法是选错了解决问题的目标。历史事实表明，只有那些已经建立起一定水平的制造业/或者其他报酬递增活动的社会，才产生过“正确的”制度或者某一水平的“竞争力”。数百年的经验表明，如果离开了“从事适当种类的经济活动”，人们是不可能解决当今流行的“建立正确的制度”这种问题的。

也许重商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最为重要的方法论区别是，重商主义者像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商人那样，认识到经济行为具有异质性。整个殖民体系都是建立在这一重要的见解的基础之上的。英国的重商主义者查尔斯·达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1696/1771）写道：“只有那些亚麻和大麻的价格便宜、普通工人的薪金低廉的国家才适于建立亚麻制造业。”另一方面，羊毛制造业能够维持高得多的工资水平。当1699年英格兰国王禁止爱尔兰出口羊毛制品的时候，他由此认识到英格兰正在力图使它的爱尔兰殖民地处于“欠发达状态”。正如达维南特（Davenant，1699：275）所言：“如果有避免（外来）侵害的方法，那么明智的国家就不会被他国力量所左右而走向毁灭。”

亦如一篇论述德国官房主义的文章所言，重商主义者们十分明白他们在使殖民地保持贫困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这一战略视为世界力量博弈中理所当然的部分，而一些人通过声言其他人都采用同样的做法来为这一行为辩解，认为因而英格兰也必须采用同样的政策。像18世纪50年代德国的尤斯蒂（Justi）那样，一些人认为，如果殖民地的人民知道他们在受到愚弄，那么，殖民主义将很

快就会终结。无疑，这正是在由于被禁止建立制造业而受到损害的美国所发生的事情。

通过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而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厂，英格兰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财富增长。因而，坚持以下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 禁止所有黑人编织亚麻或羊毛制品、纺羊毛线或者梳理羊毛，在任何制铁工厂或者铁钉和铁条加工工厂工作，还禁止他们从事诸如制帽业、制袜业、制革业等任何种类的制造行业……当然，如果他们建立起制造业，政府就必须阻止他们的发展，我们不能期望这项任务还能像现在这样完成起来那么容易（Gee，1738：81）。

当殖民地要求建立他们自己的制造业之时，要通过允许殖民地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其原材料的方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 由于受到为促进自己的发展而参与到整个欧洲的自由市场中这一想法的诱惑，殖民地的人民会努力提高自己的（产出）能力，来满足不断拓展的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庞大需求，而他们的佼佼者将很快在制造业中脱颖而出，那么唯一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利益与之发生冲突……（Decker，1744/1751）。

在我们看来，现在的情况是相同的。在过去的10年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倒退了（Reinert，2003/2004），但是为了能够向欧洲和美国出口其农产品，（必须遵守的）承诺使他们在政治上陷入绝境。

如前所述，在15世纪晚期发明的两个重要的重商主义制度是专利权（为保护新知识）和贸易保护（为建立制造业而不是为了财政收入的目的）。当然，这两者都违反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信条。令人好奇的是，专利权和贸易保护这对孪生的制度——对于知识经济动力学一致性基本认识的产物——是怎样被分别当作今天的英雄和恶棍的。为了促进新知识发展而造成人为租金的专利权以及其正确性被吹捧为世界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为了使这种产品能够扩展到新的地域并产生制造业租金的贸易保护则被视为最邪恶的妖魔。这一观点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历史上所有成功的追赶战略——从1485年的英格兰起持续300余年——都依赖于对那些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经济行为的培育、促进和保护。当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坚持有利于富国的重商主

义制度（即专利权），而力图消灭有利于穷国的孪生制度（即贸易保护）。

当然，重商主义者所建立的主要制度是国家（Reinert，1999）。卡西莫·佩罗塔将重商主义视为一种进口替代战略，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将重商主义视为一种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building）的实践活动。它们是关于重商主义的互补性而非对立性的看法。正如施穆勒对于重商主义的描述："该体系的本质不在于某种关于货币的或者贸易平衡的信条，不在于关税壁垒、保护性关税或者航海法规，而是在于某些远为重要的事情——即在于（它产生的）社会及其组织、国家（机构）及其制度体系的整体性转变，在于用民族国家的经济来替代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经济。"（Schmoller，1896：51）

因此，重商主义者的经济政策具有很强的情境特定性质。而从重商主义者的立场看来，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具有与美国旧西部（the Old US West）的"万灵药"（cure-all）相同的缺点；它们就像过去的蛇油（江湖医生的万能药）那样不可信。

5. 为什么成功的重商主义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被误解的重商主义者亚当·斯密

我们同意卡西莫·佩罗塔对于重商主义的看法，重商主义的核心是一种进口替代政策（Perrotta，1988，1994），是一种为了在报酬递增领域中建立国家的比较优势的政策。[16]用托马斯·孟（Thomas Mun，1621）的话来说，就是从"自然行为"到"人工行为"的转变；而用麦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话来说，就是从"一个自然比较优势"到"人造比较优势"的转变。波特（Michael Porter，1990）提出了一个与重商主义完全一致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Reinert，2000b）。

如果这是某国所采用的发展战略的话，我们预计重商主义者会在工业化目标实现之后不再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这正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大部分重商主义者，以及从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19世纪美国经济学界中所有最为深刻的经济学家，[17]都认识到了对制造业进行贸易保护的真正目的，他们实际上都认为在具有不同制造业分工的国家之间进行的国际贸易是一种正和博弈

活动。在英格兰的都铎王朝之后，第一个成功的重商主义体系——来源于拉菲马斯（Laffemas，1597）的著作——是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时期由柯尔贝尔所建立的。柯尔贝尔文集（Clément 编撰，1861—1872）中的许多文献表明，这位“法国公司”的经理在努力地建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鼓励国际贸易，并试图在国际层面上重建那些被早期的研究者（Botero，1590）限定在城市国家层面上（Cole，1931，1937）的协同性。然而，柯尔贝尔已经把重商主义政策视为临时性政策，并且“将贸易保护性关税称为帮助制造业学会走路的拐杖，然后就扔掉它”（Ingram，1888：41）。同时代的人们可以发现，作为这个时期的领先国家的荷兰共和国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保持着较低的关税水平，只是在 18 世纪 20 年代，当它进入衰落过程后期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才提高了关税壁垒。

英国重商主义者约翰·凯利（John Cary，1696）、西奥多·詹森（Theodore Janssen，1713）和查尔斯·金（Charles King，1721）讨论了什么是“好的”和“坏的”贸易体系，这和基于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的克鲁格曼贸易理论（Krugman，1980）（后来被放弃了[18]）是完全一致的（也参见 Graham，1923）。在整个 18 世纪，詹森和金的体系极具影响力。它是以国家为基础来对某个国家的（政策）体系进行评价（This was judged on a nation by nation basis.）。“好的贸易”是从他国进口原材料并向其出口制成品，“坏的贸易”是从他国进口制成品并向其出口原材料。而最终制成品之间的交易对于所有参与国来讲都是“好的贸易”。这也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得以成名的原理（List，1841）。同时，他也是一个重要的重商主义者，并且支持建立一个实现制造业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Reinert，1998）。李斯特也将重商主义看作是通向实现平等经济主体之间全球性自由贸易的必由之路。换言之，成功的重商主义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早期有益于制造业的贸易保护政策，随后因为限制了制成品进入国际市场而成为制造业取得成功的障碍。大多数重商主义者的著作都强调了关于制造业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假设，并由安东尼奥·舍拉明确地表述出来。然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撰写了英格兰最为成熟的重商主义著作，在他对于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将诸如技术、创新和制度等重要要素整合起来，而亚当·斯密随后却将这些要素排除在经济学之

外。两部近期的德文版译著证实了斯图亚特在当时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

在整个现代“重商主义”的初期，十分明确的一点是，普遍的自由贸易只会使那些最富裕的国家（16 和 17 世纪的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以及此后的英格兰）获益。在美国存在相同的经济分析结论：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人）主张对制造业实行贸易保护（Raymond，1820；Carey，1821），而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则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有关著作的书名明确表达了这种新变化的信息——《对制造业和商业课征关税的破坏性影响》（The Destructive Influence of the Tariff upon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Schoenhof，1885）。在 1830 年左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记述美国（经济情况）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这一发展的结果：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当美国经过一个世纪的贸易保护而完成工业化进程、其人口达到 1 亿人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后，就会进入美国要求与全世界进行自由贸易的时代（Reinert，1998）。如果不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谓的“重商主义”理解为通向自由贸易的必由之路，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他的著作，当出现所有国家在动态的、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领域都具有比较优势方面的平衡状态之时，自由贸易就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了。

一般来说，在考察其相应的经济政策时，人们可以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亚当·斯密看作相互矛盾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另一个则是典型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解读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而对其著作的引用远多于认真的解读。在与法国重农学派人士（French physiocrats）会面的前后，亚当·斯密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差别，《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也包含了一些多少带有“重商主义者”色彩的章节。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亚当·斯密的这种早期与晚期思想的对立导致了一场德文标题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的辩论。《国富论》内容的这种多样性使后世出现了多种节译本，诸如在瑞典就首先翻译了斯密作为重商主义者的大部分章节。结果是，每一个欧洲国家都至少有一种亚当·斯密的译本。

在其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论》（Smith，1795/1810）中，亚当·斯密对于得益于新兴制造业增长的“杰出的政府体系”（the great system of government）进行了热情的讨论。有意思的是，斯密

认为，不应该通过帮助供应商或消费者的办法来促进新兴制造业的成长，而是应该通过改进“杰出的政府体系”来实现这一目标（Smith，1759/1810，第一卷：320）。

实际上，可以认为亚当·斯密也是一个“受误解的重商主义者”，他坚定地支持过去的重商主义政策，到后来才认为（已经领先的）英格兰将不再需要这些政策。换言之，亚当·斯密起到了后来的舒恩霍夫（参见上述内容）在美国所发挥的同样作用。诸如专利权和贸易保护这类曾被用于推进创新的政策，在18世纪70年代有时则被用来阻止创新活动，以及向国王提供金融支持。亚当·斯密对于保护英国制造业免于荷兰竞争威胁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十分赞赏，他认为“如果完全遵从了最缜密的智慧的指引，它们（法案）同样是明智的……”，而且认为它们（法案）“也许是英格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为明智的”（斯密，1776/1976：Ⅰ，486～487）。总之，斯密阐述了一种能够成功地自我持续的发展形式，它是一种滚雪球效应，它来源于以往明智的贸易保护主义方法（的政策后果）。在《国富论》中，只是在“能够支持进口替代这个关键性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目标的时候”和“当消费者宁愿选择国内工业产品而非外国工业产品之时”（Smith，1776/1976：477），斯密才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术语。这是指“市场”已经发挥了以往由贸易保护政策所起到的作用的时期，此时的制造业已经不再需要这种贸易保护了。如果人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亚当·斯密和查尔斯·金、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一样，都认为重商主义政策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虽然亚当·斯密（的观点）是矛盾的，但我们可以认为不列颠从这种矛盾中获益匪浅。无可置疑的是，读过斯密著作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注意到一个论点：斯密认为，美国人希望建立自己的制造业是十分愚蠢的（当斯密的书面世之时，英美正处于战争状态）；而在同一著作的另一部分中，斯密坚称只有具备制造业的国家才能赢得战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才是经济学家，这正是莱昂尼尔·罗宾斯爵士（Lord Lionel Robbins）的名篇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能够提倡那些他们认为有害于自己的国家却有利于整个世界的方法的话，那么我们就错了”（Robbins，1952：10～11）。毫不奇怪的是，后来汉密尔顿有关美国工业化政策（Hamilton，1791）

的灵感来源于英国重商主义者（特别是 Malachy Postlethwayt），而不是亚当·斯密。“不要按英国教你的去做，而要按英国做的去做”成为新兴的美国的信条。现在，类似的明智的经济政策信条则是：“不要按美国教你的去做，而要按美国做的去做。”

6. 结论：作为经济发展必由之路的重商主义

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向自己的孩子提出忠告的时候都表现出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甚至是最忠实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也不会遵从他们所假定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即工资和利率在全球将趋于相等，因此就告诉他们自己的孩子不要在意其职业选择——成为采番茄的人或者成为律师。然而，同样的经济学家们在向第三世界的孩子们发表武断的建议之时，却建议这些国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实行专业化。一般来说，这意味着在提供廉价劳动力为简单的装配工作来生产原材料的方面进行专业化。也就是说，只要有个工作就行。

在自己孩子的未来面临关键性选择时，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采摘黄瓜和番茄的职业所获得的财富要远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中需要技能的职业。那么，为什么在一个每个人都专门从事摘黄瓜和番茄（当今墨西哥的成长性产业）的国家比工业化国家更为贫穷的时候，人们还对重商主义的建议充耳不闻呢？我们指的是托尔斯坦·凡勃伦，他声称教育会污染和毁灭人类的许多优秀本质。当然，现在那些开明的经济学家也建议墨西哥应该在教育上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是墨西哥的比较优势却在那些不需要太多知识的经济活动上。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提供廉价的、缺乏教育的劳动力。因而，对教育进行投资就意味着对失业者或向国外移民的人提供培训。

在本文中，我们已经谈到那些影响经济政策的重商主义者们致力于增强国内生产能力。必须注意的是，16 世纪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主义时代，当时在欧洲大学中的外国学生比例比现在高得多。早在 1550 年，这一世界主义的欧洲舞台就向经济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分别提供了成败两方面的、鲜活而生动的研究案例。佩罗塔说，“在重商主义时期，一个幽灵困扰着欧洲”，“它是对于像西班牙那样虽然富有黄金却缺乏生产能力，由于不利的贸易逆差而最终导致失败的恐惧”（Perrotta，1993：18）。幸运的是，除了西班牙的失败例子以外，还存在着两个成功的案例：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记述了在英格兰十分贫穷而勃艮第十分富有的英国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第一个极为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是如何在国王亨利七世（King Henry Ⅶ）时期运用英国的原材料产生出巨大的财富的。英格兰在都铎王朝时建立羊毛制造业部门的成功经验向世界表明，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讲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的成功是上帝无形之手的产物——原材料的缺乏迫使他们转向制造业——但还是有可能通过开明的政策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起点得到同样的结果。

主流的经济战略是在缺乏对于有关报酬递增和单位成本递减理论的必要了解的前提条件下解决市场份额的最大化问题，在从生产到金融和广告的所有行业中，都隐含着这一战略。同理，重商主义者也无需对那些存在于他们所观察的各种现象中隐含的机制进行解释。对于财富创造过程背后累积性和协同性要素的识别，是安东尼奥·舍拉1613年的著作得以成名的原因，而且我们认为他在理论上远远胜过其他理论家，诸如很久以后研究同一类问题的缪尔达尔（Myrdal）等人。为了向重商主义者学习，必须要理解他们所运用的重商主义（政策），一般来说他们并没有解释采用这些政策的原因。

我们认为，某些重商主义的基本经济原理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永恒。在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王国（Babylonia）和今天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中，复利的作用是一样的。[19]一个遇到资金流动问题的现代企业的处境与500年前的情境是基本一致的，而且无论一个现代国家专业化生产的产品成本是上升（报酬递减）还是下降（报酬递增），① 都会得到与舍拉在1613年所记述的情形非常类似的结果。[20]实际上，我们认为所有“现实经济的（realÖkonomische）重商主义者”的基本政策建议——投资于制造业、大规模劳动分工、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增加城市人口——都致力于创造某种动态性的协同效应，它们是以能够创造出可持续性财富和就业机会、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熊彼特所谓的“历史性报酬递增”为基础的。[21]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副主编和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2003：49）近来为《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撰写了一篇文章，文中他认为富国和穷国之间的

① 此处原文为“...would（diminishing returns）or fall（increasing returns）increase a nation...”，根据上下文，疑为作者存在笔误。——译者注

“差距”“反映了那些领悟了资本主义（本质）的国家的成功和那些对此缺乏正确理解的国家的失败”。然而，人们忽略了重商主义是所有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石这一事实。为《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撰稿的哈佛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最近驳斥了对于由不断增长的中国纺织品出口而造成的失业的忧虑，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被那种认为进口坏出口好的17世纪重商主义（思想）所支配”。将这两篇发表在世界上在经济政策问题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上的文章放在一起时，就勾勒出了一幅使当代经济争论充满真实的历史谬论的全景：自由主义总是“对的”，而“贸易保护主义”总是错的。重商主义也许是在经济分析史中最有争议的“主义”（Magnusson，1994），总是作为那些象征着破坏性寻租者体系的荒谬行为的替罪羊，而这些破坏性寻租者是犯了将黄金和财富混为一谈的根本性错误。这种观点的扩散反映了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上，经济学家们对于它们的历史存在着共同的严重误解。

我们认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在正确情境中的）重商主义者们真知灼见的正确性：1）在缺乏制造业/报酬递增部门的情况下，单凭原材料的生产不能使国家致富；2）一个缺乏效率的制造业/报酬递增部门可以保证比没有制造业部门（的情况）高得多的生活生平。因此，大规模的工业化倒退是对子孙的犯罪（Reinert，2003，2004）。周而复始，这些原理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会再度复苏：在1550年以后贫困不断增长的西班牙，在一个世纪后经济出现衰退的意大利，在18世纪70年代大饥荒的巴黎，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后饱受苦难的法国，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的美国，重商主义都作为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的基础。重商主义解决了19世纪欧洲大陆的“社会问题”，它帮助在1950年比坦桑尼亚（Tanzania）还贫困的韩国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饱受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 Plan）蹂躏的德国得以致富（见本文集中Reinert的文章）。我们认为，虽然报酬递增行为可以部分地从制造业向服务行业转移，但是重商主义所谓经济活动特定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的协同性本质等真知灼见依旧有效。然而，这些却是主流经济学中的空白。这些空白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的产物，它是以先验的假设而非以培根的方法所实际观察到的现象为（分析的）基础的，现在李嘉图的这种方法已经落伍，成为无视经

济现实观察结果的空谈。对于那些一般来说由于其殖民地历史而尚未经历成功的重商主义阶段的国家而言，这些经济理论的空白使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饱受苦难。

附录

具有协同性发展型国家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从1485年（亨利七世）的英格兰到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的政策手段和工具的连续性——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光阴似箭，本质自现。

山姆（Sam），钢琴师，（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1. 一般来讲，可以观察到财富创造的协同效应是由报酬递增活动及其持续机制所产生的。认识到“我们从事了错误的行业”。要选准报酬递增活动并对其进行支持并保护。

2. 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对于所选定的经济活动采取临时性垄断/专利权/贸易保护的措施。

3. 认识到发展是一个具有协同性的现象，因此需要有一个多样化的制造业部门（“使劳动分工最大化”（Serra，1613），以及对荷兰共和国和威尼斯的考察）。

4. 丰富的实际证据表明，制造业部门可以一举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特有的三个政策问题：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就业和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5. 吸引外国人到选定的行业中工作（历史上，宗教迫害的作用曾经十分重要）。

6. 对拥有地产的贵族进行适当的抑制（这一点从亨利七世到韩国都适用）。（重农学派是地主们反抗这一政策的工具）

7. 对选定的活动实行所得税宽减（tax break）。

8. 对选定的活动实行信贷优惠。

9. 对选定的活动实行出口补贴。

10. 对农业部门大力支持，尽管单凭农业部门无法使国家摆脱贫困状态。

11. 重视学习和教育（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的学徒制度，Child（1693））；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和尤斯蒂（也有类似论述）。

12. 对有价值的知识实行专利保护（自15世纪90年代的威尼斯起）。

13. 为使原材料价格高于（与之）竞争的国家，对其征收经常性出口税/设置出口壁垒（开始于15世纪晚期的亨利七世，他的政策极为有效地迅速摧毁了美第奇佛罗伦萨的羊毛工业）。

注释

1　我们认为，甚至是《剑桥美国经济史》论述这一问题的章节也属于“命定说”的传统（Engerman and Sokoloff，2000）。

2　他也是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3　布伦塔诺（Brentano，1827—1829），艾森哈特（Eisenhart，1881），拉斯佩勒斯（Laspeyres，1863/1961），施穆勒（Schmoller，1897/1967），桑巴特（Sombart，1902/1928，1913a，1913b）。

4　这类似于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曾被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称为“进口能力的残缺”。

5　熊彼特对于安东尼奥·舍拉（Antonio Serra）1613 年的论文的认识特别阐明了这一观点：“问题在于如果整体的经济过程能够正常运行，那么货币要素就能够自我维系而不需要任何的具体政策来干预。”（熊彼特，1954：195；见本文集中索菲斯·赖纳特（Sophus Reinert）的论文）

6　见塞利格曼（Seligman，1920）以及赖纳特和赖纳特（Reinert and Reinert，2004）对“货币主义者”和“生产主义者”之间的辩论的讨论。

7　例如，见巴拉赛尔苏（Paracelsus，1951：38～44）和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80/1958：48）的重要论著。

8　我们在赖纳特和赖纳特的论文中对这些细节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见 Reinert and Reinert，2004）。

9　熊彼特所指的“经院主义公共物品”。也见索菲斯·赖纳特（Sophus Reinert，2003）。

10　mortmain 是指非卖土地。

11　波托西（Potosi），位于现在的玻利维亚（Bolivia），海拔约 4 000 米，曾是世界上最富的银矿，是当时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12　列文虎克是他的邻居维梅尔的财产遗嘱执行人。

13　随着地图绘制技术从木刻变为铜版，（海军）装备的制造者也同样使用铜，荷兰人取代意大利人成为此类产品最大的制造商。

14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也认识到，应该向报酬递减的经济行为征税，并对报酬递增的经济行为提供补助（Marshall，1890：452）。类似地，在汉斯·辛格（Hans Singer，1950/1964）的著作中论述了在农业领域（较低的价格）中和工业领域（较高的价格）中技术变迁具有不同效果，这一事实支持了认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观点。也可参见赖纳特（Reinert，1980，1996）。

15　现代的经济史学家们赞同此处因果关系的重商主义解释：“大量证据表明，城市化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原因而非结果。”这是普拉克在其著作中（Prak，2001）所引用的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Hoffman）的论述。

16　这是 16、17、18 世纪经济思想的基本主旨（leitmotif），并且建立了全欧洲范围内成功的工业化政策的基础。它体现在英国重商主义者的著作中，诸如米森登（Misselden，1623），孟（Mun，1664），柴尔德（Child，1693：3，8，100～101）凯利（Cary，1695：1），巴本（Barbon，1696），达维南特（Davenant，1696），金（King，1721）和威

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著作中。也参见本文集中埃里克·赖纳特和索菲斯·赖纳特的章节。

17　参见哈德森（Hudson）对于19世纪美国工业战略的讨论。

18　巴格瓦蒂（Bhagwati，2002：31）坚信“（克鲁格曼的）公司会倒退回自由贸易状态”。

19　当被问及何种力量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的时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回应道：“复利。”实际上，可以认为古巴比伦创建了一套比我们今天更好的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每隔一段不同的和不一定的时间，国王将会取消所有的非商业性债务，这样就使每个人都拥有“清白的纪录”。在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中记载的重复使用这种政策的大赦年（Jubilee），成了旨在免除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福音2000年运动”（Jubilee 2000 movement）的根据。

20　赖纳特（Reinert，1980）证明发展中国家易于在报酬递减的领域内从事生产，并且发现当（发展中国家的）产量减少时，成本会下降。也可参见赖纳特（Reinert，1996）。

21　熊彼特的这个术语指的是技术变迁和报酬递增的联合效应，由于在前者（理论）的考察维度内新技术是无法得到的，所以在理论上它们是可分的，而在实践中常不是如此。

参考文献

Arthur, Brian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99 (394): 116 ~ 131.

Ashley, William (1920).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Putnam, New York.

Barbon, Nicholas (1696). A Discourse Concerning Coining the New Money Lighter. Richard Chiswell, London.

Berch, Anders (1747). Inledning til Almänna Hushålningen, innefattande Grunden til Politie, Oeconomieoch Cameralwetenskaperna. Lars Salvius, Stockholm.

Botero, Giovanni (1590). Della Ragione di Stato. Libri Dieci, this work also contains Delle Cause dellaGrandezza delle Cittá , libri tre. Vicenzio Pellagalo, Rome.

Botero, Giovanni (1622). Relazioni Universali. Alessandro Vecchi, Venice.

Bhagwati, Jagdish (2002). Free Trade Toda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Bouwsma, William James (2000).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 1550 - 1640.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Braudel, Fernand (1991). Out of Italy, 1450 - 1650. Flammarion, Paris.

Brentano, Lujo (1927—1929). Ein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Englands. 3 volumes, Gustav Fischer, Jena.

Browne, Thomas (1643). Religio Medici. Andew Crooke, London.

Carey, Mathew (1822).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 or, the most certain means of promoting the wealth, power, resources and happiness of nations: applied particularly to the United States. H. C. Carey & I. Lea, Philadelphia.

Cary, John (1696/1745).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East India Trade. T. Osborne, London.

Child, Josuah (1681). 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East-India Trade. Printed for the Honourable the EastI ndia Company, London.

Child, Josuah (1688). Brief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rade and Interest of Money. Elizabeth Calvert & Henry Mortlock, London.

Clément, Pierre ed (1861—1872). Lettres, Instructiones et Mémoires de Colbert. 7 Volumes in 10 + 1 Volume 'Errata Général et Table Analytique'. Imprimerie Impériale/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Cole, Charles Woolsey (1931). French Mercantilist Doctrines Before Colbert. R. R. Smith, New York.

Cole, Charles Woolsey (1937). 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Davenant, Charles (1696/1995). An Essay on the East-India Trade. n. p., London.

Decker, Mathew (1744/1751). An Essay on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Foreign Trade. George Faulkner, Dublin.

Defoe, Daniel (1728). A Plan of English Commerce. Printed for Charles Rivington, London.

Eisenhart, Hugo (1881).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Gustav

Fischer, Jena.

Ekelund, Robert B. and Robert D. Tollison (1981). Mercantilism as a rent-seeking society: economic 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College Station.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L. Sokoloff (2000).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sation, 1790—1914'. In Engerman, Stanley L & Robert E. Gallm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367 ~ 401.

Fanfani, Amintore (1955). Storia delle dottrine economiche dall'-antichità al XIX secolo. Giuseppe Principato, Milan.

Finkelstein, Andrea (2000). Harmony and the Balanc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Gee, Joshua (1729).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Great Britain Considered. Bettesworth & Hitch, London.

Goyeneche, Pedro Francisco (1717). Comercio de Holanda, o el gran thesoro historial y político defloreciente comercio, que los holandeses tienen en todos sus estados y señoríos del mundo. Imprenta Real, por J. Rodríguez Escobar, Madrid.

Graham, Frank (1923). 'Some Aspects of Protection further consider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7: 199 ~ 227.

Hamilton, Alexander (1791). A Report on the Manufac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http://www. juntosociety. com/i _ documents/ah _ rom. htm

Hamilton, Earl (1932). 'Spanish Mercantilism before 1700'. In

Facts and Factors in Economic History Articles by former Students of Edwin Francis G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214 ~ 239.

Heckscher, Eli Filip (1931). Merkantilismen: Ett Led i den Ekonomiska Politikens Historia. P. A. Norstedt, Stockholm.

Hudson, Michael (2004). 'Technical progress and obsolescence of capitals and skill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US industrial policy'. In Erik S. Reinert [ed.] (2004).

Huerta, Robert D. (2003). Giants of Delft. Johannes Vermeer and the Natural Philosophers: The Parallel Search for Knowledge during the Age of Discovery.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Lewisburg.

Huet, Pierre Daniel (1722). A View of the Durch Trade in all the States, Empires, and Kingdoms of the World. C. King and J. Stagg, London. Second edition, first edition, 1717.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1712.

Hume, David (1767).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6 volumes. A. Millar, London.

Ingram, John Kells (1888). A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Black, Edinburgh.

Justi,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1760). Die Natur und das Wesen der Staaten, als die Grundwissenschaft der Staatskunst, der Policey, und aller Regierungswissenschaften, desgleichen als die Quelle aller Gesetze, abgehandelt. Johann Heinrich Rüdigers, Berlin.

Janssen, Theodore (1713). 'General Maxims in Trade, Particularly Applied to the Commer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In King (1721).

King, Charles. (1721). The British Merchant; or, Commerce Preserv'd. 3 volumes. John Darby, London.

Koyré, Alexandre (1957).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Krugman, Paul (1980).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Laspeyres, Etienne (1863/1961). Geschichte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Anschauungen der Niederländer und ihrer Litteratur zur Zeit der Republik. de Graaf, Nieuwkoop.

Laffemas, Barthélemy (1597). Reiglement (sic) general pour dresser les manufactures en ce rayaume, et couper le cours des draps de soye, & autres merchandises qui perdent & ruynent l'Estat: qui est le vray moyen de remettre la France en sa splendeur, & de faire gaigner les pauvres... Claude de Monstr'oil and Jean Richter, Paris.

Latini, Brunetto (1284/1993). The Book of the Treasure (Li livres dou tresor). Garland Publishing, New York.

List, Friedrich. (1841/1959).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yklos Verlag, Basel: 12. (This part of the foreword was not translat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1885).

Lluch, Ernest (1973). El pensament econòmic a Catalunya. Edicions 62, Barcelona.

Lluch, Ernest (1997). 'Cameralism beyond the Germanic World: A Note of Tribe'.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5 (2): 85~99.

Lluch, Ernest (2000). 'El cameralismo en España' in Enrique Fuentes Quintana (ed) Economia y Economistas Españoles, Vol. 3, Galax-

ia Gutenberg, Barcelona, pp. 721 ~ 728.

Locke, John (1691/1696).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s,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Awnsham & Churchil, London.

Magnusson, Lars (1991). Merkantilismen. Ett ekonomiskt tänkande formuleras, Stockholm, SNS Förlag, English edition: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Routledge, London.

Magnusson, Lars [ed.] (1993). Mercantilist Economics. Kluwer, Boston.

Marshall, Alfred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London.

Misselden, Edward (1623). The Circle of Commerce or the Balance of Trade. Printed by Iohn Dawson for Nicholas Bourne, London.

Mun, Thomas (1664).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J. G. for T. Clark, London.

[Paracelsus] Hohenheim, Aureol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1951). Selected Writings of Paracelsus.

Jacobi, Jola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Perez, Carlota (2004).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Paradigm Shift and Socio-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rik S. Reinert [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errotta, Cosimo (1988). Produzione e Lavoro Produttivo nel Mercantilismo e nell'Illuminismo. Congedo Editore, Galatina.

Perrotta, Cosimo (1991). 'Is the Mercantilist Theory of the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really erroneou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3 (2): 301 ~ 336.

Perrotta, Cosimo (1994). 'Early Spanish Mercantilism: The First Analysis of Underdevelopment'. In Magnusson (1993): 17 ~ 58.

Porter, Michael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acmillan, London.

Praak, Maarten (2001). 'Early Modern Capitalism: an Introduction'. In Maarten Prak [ed.]. Early Modern Capitalism: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400 - 1800. Routledge, London: 1 ~ 21.

Raymond, Daniel (1820).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Fielding Lucas, Baltimore.

Reinert, Erik S. (1980).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conomic Mechanisms of Underdevelopment. University Microfilms, Ann Arbor.

Reinert, Erik S. (1996).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The dilemma of resource-based economies under a free trade regime'. In Stein Hansen, Jan Hesselberg and Helge Hveem [ed.].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 Environment: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Oslo, Oslo. Available on www. othercanon. org.

Reinert, Erik S. (1998). 'Raw Material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or, Why List (the Protectionist) and Cobden (the Free Trader) Both Agreed on Free Trade in Corn. In Geraint Parry, Asif Qureshi, and Hillel Steiner [eds.]. Freedom and Trade, 1846—1996. Routledge, London.

Reinert, Erik S. (1999).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6 (4/5). A shorter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Pier Angelo Toninelli [ed.].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Reinert, Erik S. (2000a). 'Full Circle: Economics from Scholasticism through Innovation and back into Mathematical Scholasticism. Reflections around a 1769 price essay: "Why is it that Economics so Far has Gained so Few Advantages from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7 (4/5). Available on www. othercanon. org.

Reinert, Erik S. (2000b). 'Karl Bücher and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Techno-Economic Change'. In Jürgen Backhaus [ed.]. Karl Bücher: Theory, History Anthropology, Non-Market Economies. Metropolis Verlag, Marburg.

Reinert, Erik S. (2003). "Increasing Poverty in a Globalised World: Marshall Plans and Morgenthau Plans as Mechanisms of Polarisation of World Incomes". In Chang Ha-Joon [ed.]. Rethin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them, London.

Reinert, Erik S. (2004). Globalization in the Periphery as a Morgenthau Plan: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Mongolia in the 1990s. In Reinert [ed.], 2004.

Reinert, Erik S. [ed.] (2004).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Reinert, Erik S. (in this working paper). 'Benchmarking Success: The Dutch Republic (1500—1750) as seen by Contemporary European Economists'.

Reinert, Erik S. & Arno Daastøl (1997). '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Economic Innovations: The Religious Gestalt-switch and the Duty to Invent as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 (2/3): 233 ~ 283.

Reinert, Erik S. & Arno Daastøl (2004). 'The Other Cano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Economics. Its Role as an Immaterial and Production-based Canon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In Reinert [ed.] (2004).

Reinert, Sophus (2003). 'Darwin and the Body Politic: Schäffle, Veblen and the biological metaphor shift in econom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th Heilbronn Confere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une. On www. othercanon. org.

Reinert, Sophus & Erik S. Reinert (Forthcoming, 2004). 'An Early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Case of Antono Serra (1613)'.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 (1).

Robbins, Lionel (1952).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in Engl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London.

Ruestow, Edward G. (1996). The Microscope in the Dutch Republic: The Shaping of Discov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choenhof, Jacob (1885). The Destructive Influence of the Tariff upon Manufacture and Commerce and the Figures and Facts Relating Thereto. 2nd edition, New York Free Trade Club, New York.

Serra, Antonio (1613).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 Oro e l' 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 Lazzaro Scorriggio, Naples.

Schmoller, Gustav (1897/1967).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

torical Significance. Macmillan, New York, 1897: 50 ~ 51 (reprinted Kelley 1967).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54).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Singer, Hans W. (1950/1964).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Change. McGraw-Hill, New York.

Smith, Adam (1759/1812).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 Collected Works. Cadell and Davies, London.

Smith, Adam (1776/19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Sombart, Werner (1913a). Krieg und Kapitalismus. Duncker & Humblot, Munich & Leipzig.

Sombart, Werner (1913b). Luxus und Kapitalismus. Duncker & Humblot, Munich & Leipzig.

Sombart, Werner (1902/1928).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Duncker & Humblot, Munich & Leipzig.

Steadman, Philip (2001). Vermeer's Cam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Steuart, James (1767).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which are particularly considered population, agriculture, trade, industry, money, coin, interest, circulation, banks, exchange, public credit, and taxes. 2 Volumes. A. Millar & T. Cadell, London.

Uztariz, Geronymo (1724/1751).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erce and Maritime Affairs. 2 vols. John and James Rivington, London.

Zincke, Georg Heinrich, editor (1746—1767). Leipziger Sammlungen von Wirthschafftlichen Policey-, Cammer- und Finantz-Sachen. 192 issues in 17 volumes. Erster (bis) Sechzehender Band (und) General-Register, Leipzig.

第十二章　评价成功的基准：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1]

埃里克·S. 赖纳特

本文利用与荷兰共和国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对这个国家进行考察。一般来说，经济思想史通常将这些前斯密主义（pre-Smithian）的经济学家们一并贴上了具有贬义的“重商主义者”标签。正如阿什利（Ashley）在大约一个世纪前就明确指出的那样，在标准的辉格党人（Whig）的定义下，经济思想史中的任何思想，要么是对于某种完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原理的令人惊喜的早期预想，要么是无可救药的错误理论的例证，而不是通过相关的特定情境对其进行判断（Ashley，1920：Ⅱ，381）。

我将指出，作为理解荷兰共和国兴衰的工具，重商主义在分析上明显地具有某些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那些重商主义者或者前李嘉图主义（pre-Ricardian）经济学家们拥有比现代经济学家更为多样的分析工具，而且，前李嘉图主义体系已经包含了现代经济学家们正在试图重新引入主流经济学的许多经济要素。具体的例子包括：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逐渐被排除于经济学之外的要素——创新（这一点是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到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67）的重要著作所形成的英国经济学的一部分）、技术、报酬递增、制度、地理学、协同效应（synergies）和路径依赖；作为经济

① 将出版于 Gelderblom，Oscar（edito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utch Republic，Aldershot，Ashgate，2007. ——译者注

增长承载者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存在着质的差别；经济政策应该是情境特定的（context-specific）的思想；为什么经济发展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均等的（uneven）这个整体性的基本问题等。由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经济理论逐渐地不再关注技术和产业的兴衰，转而关注价格和贸易。因而，与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相比，就荷兰和国（的兴衰）来说，当时的重商主义者们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内容）。

从生产角度来看，重商主义既可作为国家建设（的工具）（Schmoller，1897/1976），又可作为一种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Perrotta，1993），当时，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① 在这两方面，荷兰共和国为欧洲所有的落后国家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这些启示并非来自于荷兰的具体政策，而是来自于对在（与荷兰）差别巨大的环境、条件和情境中，为了实现与荷兰的生产体系（所产生的）相同的经济成就而应采用的具体政策问题的思考。当时的经济学家将国家（管理）和商人的公司管理大体上等同起来，但他们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国家新增价值（GDP）和就业的最大化。正如公司可能亏损甚至破产一样，国家也可能在这种动态博弈中失败。在这方面，自1550年左右以来，欧洲大陆出现了一个贫困和失败不断增长的突出案例：西班牙（Perrotta，1993）；和一两个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和不同凡响的成功案例：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此后，当意大利城邦（city-states）在荷兰共和国兴起之后走向衰落的事实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之时，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荷兰和其他国家在与意大利人的博弈中模仿意大利人并击败了他们。[1]

对于早期敏锐的观察者来说，威尼斯和荷兰致富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穷国之所以穷困就在于它缺乏那些在威尼斯和荷兰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缺乏这些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或者这些经济活动不够强大，并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正如约书亚·柴尔德（Josuha Child）在解释他1688年的经济论文的目的时所言："使（荷兰）处于领先地位的手段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其他国家所模仿的……这正是我在下文中所要努力阐明的主

① 对于重商主义的一般性讨论参见本书第十一章。——译者注

题（Child，1688）。”在1613年，安东尼奥·舍拉（Antonio Serra）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证实了重商主义是使威尼斯实现富裕、那不勒斯（Naples）陷于贫穷的原因（Serra，1613；Reinert and Reinert，2003）。就其本质而言，柴尔德、舍拉和他们同时代的学者们所运用的方法论是运用基准来评价，是一种对于成功和失败国家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理论化的努力。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正是重商主义的核心特征。

1. 增长的发动机：对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早期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

佩罗塔（Perrotta，1993：19）认为，“重商主义的产生是对于16世纪西班牙衰落的反应”。进而，人们可以认为，重商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对17世纪和18世纪荷兰共和国、英格兰都铎王朝（Tudor）以及柯尔贝尔（Colbert）时期法国的经济成就的反应。最优秀的重商主义作者是那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而不是那些致力于所谓“抽象思维”活动的人。用于制定特定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种实际的和合理的方法是：考察在其他国家中那些可行的和不可行的相关政策。因此，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是在像威尼斯或荷兰共和国那样把财富看作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成功和富裕的地区诞生的，而是在更贫穷的城市和民族国家中产生的，他们力图理解成功者在处于贫困状态的欧洲地区如何创造出了少数富裕的“岛屿”。这是埃蒂恩·拉斯佩勒斯（Etienne Laspeyres）的主要见解之一，他几乎对在共和国时期的荷兰本国作者所有的经济文献都进行了研究（Laspeyres，1863/1961）。[2]

对于成功国家和不成功国家的评价活动，始于15世纪晚期亨利七世（Henry Ⅶ）和英格兰都铎王朝时期（见下文）。其中的部分成果是，发现了欧洲早期经济发展明显地向城市倾斜。某些城市积累了财富，但绝非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基本问题相对简单。众所周知，来自美洲的大量金银涌入了西班牙，然而从1550年左右开始，愈发明显的事实是金银的输入并没有导致西班牙的普遍富裕。这些金银最终流入了那些一般来说没有（金银）矿产的国家。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财富和购买力离开了那些生产原材料的国家（即便其所生产的原材料是金银），而聚集到了那些制造业部门多样化的国家。从16世纪晚期到整个18世纪，制造业是比金矿本身更有价值的真正的“金矿”这一论点，在全欧洲范围内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得到了论证：从意大利的焦万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1590）到托马索·坎帕尼拉（Tommaso Cammpanella，1602）和安东尼奥·吉诺维西（Antonio Genovesi，18世纪70年代），再到西班牙的罗尼莫·德·乌茨塔瑞斯（Gerónimo de Uztáriz，1724/1751：9），以及德国以外的首位经济学教授、瑞典的安德斯·博赫（Anders Berch，1747：217：217）均是如此。

在前斯密主义经济学中，制造业的建立被作为促进社会文明的广泛任务中的一部分。被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称为18世纪最聪明的人的意大利经济学家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1728—1787）认为，“有希望通过制造业治愈人性中的两个最大缺陷：迷信和奴隶制”（Galiani，1770/1959：116）。1769年，约翰·雅各布·梅因（Johan Jacob Meyen）总结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我们知道，原始国家不会为了建立有益的制造业而改变自己的风俗和习惯，但是有其他办法（实现这一点）……”[3]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种时代精神中包含着以下观点：只有在像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这样自然资源贫乏、几乎不可耕种的不毛之地，这种（经济）发展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而在其他地区，这种在托马斯·孟（Thomas Mun，1621）的术语中被称为从“自然活动”到“人工活动”的、由舍拉（Serra，1613）所发现的从报酬递减活动（农业）到报酬递增活动（制造业）的转变过程就需要高压的政府政策（来干预实现）。在此，外国的经济学家和统治者们所共同关注的对象，与其说是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成就，不如说是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政策。

当时的荷兰共和国对于成功的商业活动和其所带来的利润的看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也存在着很大差别。任何时代的商人势必要追逐利润，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完全竞争”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利润，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能够创造国家财富的经济成就实际上存在于熊彼特主义动态不完全竞争之中，是那种能够扩大经济资源规模的租金。在我看来，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成就是这种动态熊彼特主义寻租（rent-seeking）行为的成功例证。我认为，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在这种视角下，经济发展就是一种与特定的成功寻租行为密切相关的状态。如果资本主义意味着获取利润，那么在

通过市场和政策手段使这些利润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就是一种成功地创造利润（不完全是“正常”利润）的过程。如果经济系统中行为者的目的是为了创造“租金”，那么总是认为寻租行为“有问题”的看法就毫无意义。因此，我对于重商主义的分析方法与埃克兰和托莱森（Ekelund and Tollison，1981）的完全不同，而是接近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分析方法，他的分析根据是否能够扩大可供分配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区分“好的”和“坏的”资本家，同时也隐含地区分了“好的”和“坏的”租金。[4]荷兰共和国所创造和聚集的多数租金都（扩大了可供分配的经济资源的规模）。

在我看来，对于早期经济发展的成功（即早期成功的寻租行为）的研究，对解释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差异也是十分有益的。诸如复利、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等最具影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永恒的。正如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指出的那样，当圣经《创世纪》（Genesis）中提到“土地不能供养所有人”的时候，证明了在人类历史的最初时期就出现了报酬递减的现象。报酬递减的存在使经济学成了一种“阴郁的科学”。类似地，我将阐述一种相反的机制——报酬递增，它是使欧洲早期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的协同效应和累积机制的核心。对荷兰共和国时期经济学家们（著作）的研究表明，这些重商主义思想在荷兰共和国发生了作用，他们（经济学家们）对于重商主义的明确含义和复杂内容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

2. 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不完全竞争、熊彼特租金和协同效应

2.1　动态租金与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也许，在终结经院主义哲学并开创文艺复兴的经济学上最重要的突破性进展，就是认识到经济财富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这种关于扩展性经济世界的新的世界观，与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扩展性地理学和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扩展性宇宙学是同时产生的（参看 Reinert & Reinert，本书上卷第七章）。（多次出任总理的）意大利经济史学家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概括了这种由经院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变：“经院主义是在均衡的框架内考察秩序问题，而重商主义则是在增长的框架内考察秩序问题。”（Fanfani，1955：149）

来自意大利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的焦万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1590），是最早明确地认识到世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过程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一，他认识到一个行为者的所得并不必然是另一个行为者的所失。从最初阶段起就十分清楚的是，制造业是使世界脱离零和博弈模式的主要力量。在其《国家的理性》（Ragino di Stato）一书中，博特罗写道，“这就是制造业的力量，新西班牙（New Spain）或者秘鲁的金银矿都无法与之相比，对于天主教国王来说，米兰的商业税收比波托西（Potosi）和哈里斯克（Jalisco）的矿藏更具价值。意大利是这样一个国度……那里没有重要的金银矿，法国也没有，但是两国都得益于制造业，都拥有大量的金钱和珍宝。”（Botero，1590：152）。

因而，这种并不必然减少他人财富（而实现）的利润或租金就出现了，特别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租金更是这样，它与封建社会的租金是不同的。我的论点是，所有像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格兰这样最为成功的欧洲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过程中都能够大量获得三种类型的租金，这些租金都会扩大此类国家的经济规模。这三种类型的租金是：

- 制造业租金，是农业中所缺乏的报酬递增的核心（Serra，1613）；
- 远程贸易租金；
- 基于原材料的租金，由于具体情况不同而存在差异。

在威尼斯，基于原材料的租金是来自食盐（贸易）。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rik Lane）评述到，年轻的威尼斯共和国不愿卷入战争，但一定要保护在其领地中的盐田（Lane，1973：58）。食盐是第一种远程贸易的非奢侈品，从古代中国到犹加敦（Yucatan）的玛雅（Mayas），对食盐的管制一直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对食盐供应的控制会产生权力，政府一般都会将这种商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例如在古代中国。食盐对于威尼斯共和国金融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让—克劳德·豪克奎特（Jean-Claude Hocquet）的《威尼斯的盐业财富》（Il Sale a la Fortuna di Venezia）中有很好的记述（Hocquet，1990）。[5]

在荷兰共和国，受管制的原材料是鱼。荷兰渔业的发展过程附带着多种重要的熊彼特主义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由威廉·布尔姆（William Buerem）发现的鲱鱼的腌制和卤制工艺，他于1347年逝

世，后来查理五世（Charles Ⅴ）为他树立了一座雕像。为了完全利用这项新发明，就需要有第二项创新：一种大船，可载18～30人的鲱鱼船（herring buss）[①]，一种可以在海上对鱼进行加工和腌制的“加工船”，它最多可出海8周（de Vries & van der Woude，1997：244）。到1600年，这项技术已经发育成熟，并在其后的200年中保持不变。

在英格兰，基于原材料的租金来自于羊毛。从1485年开始，对于羊毛工业的控制和利用奠定了都铎王朝经济战略的基础。对羊毛征收出口税是都铎王朝实现英格兰工业化战略中的一个关键性要素。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728）阐述了1485年即位的都铎王朝第一代国王亨利七世的观点：以确保英格兰的竞争者要比英国的生产商支付更高的原材料成本为基础，实现（英格兰的）工业化。由于在勃艮第（Burgundy）的姨母家长大，亨利七世（1457—1509）发现当地的普遍的富裕状况是由运用英国原材料的羊毛纺织业带来的（Defoe，1728，Reinert，1994）。在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后，亨利开始鼓励本国的羊毛制造业发展，并且逐渐提高原毛（raw wool）的出口关税和成品布的进口关税。在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时期，在具备了足够的制造能力之后，羊毛出口就被禁止了。在佛罗伦萨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的效果，这些政策在那里导致了经济的总体衰退和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分散投资于丝绸业的努力。

这些类型的租金通过不同的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上扩散。更大规模的劳动分工不断增长，新的经济活动要求劳动者具有更多的技能，创造出具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各种可能性（参见下述第四点），对于劳动力的竞争更为激烈，赚取财富的各种替代性方法提高了工资水平，像19世纪的美国那样的“高工资战略”在政治上成为可能。随着这些租金的不断增长，国家的税基也同样扩大了。德国官房主义者们观察到，运用机械从事生产的人能够比仅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支付更高的税金，因此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就成为增加国家收入的战略中合乎逻辑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认为，那些成功的商人们聚集起来的使经济规模扩大的租金

① 17世纪在英格兰和荷兰通用的一种渔船。——译者注

也会影响到工人和整个国家，因而在三重寻租体系的三个层面上——企业家/资本家、工人、政府——都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对于理解农业租金不能以同样的方法传播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参见下文），这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涓滴论（the trickle-down theory）[①] 发挥作用的原因。制造业体系（Sombart，1902/1928）通过不同的机制产生了一种租金分享形式。赖纳特（Reinert，1980 and 1996）对这些机制进行了研究。

2.2 路径依赖与协同效应

"真实的情况是，一旦商业活动改变了发展路径，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使其回到原路上来。"

皮埃尔·丹尼尔·于埃（Pierre Daniel Huet，1630—1721），《在全部国家中的荷兰贸易概览》，1772（A view of the Dutch Trade in All the State，*1772*）。

先进的重商主义者们具有对于社会的系统性认识，他们在不同的复杂层次上，将前面提到的协同效应和累积性生产要素的交互作用视为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真正动力。这些累积性机制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效应，因此正如前面于埃所言，一旦商业活动改变了发展路径就很难使其回到原路上来。约书亚·吉（Joshua Gee）在他1729年的论著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 "一个国家的贸易具有巨大的重要作用（原文如此），这是必须审慎权衡的事情，因为数百万人的幸福或苦难将维系于此。在企业起步阶段的一个微小失误，可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不良后果。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商业贸易获得巨大的财富，也可能由于缺乏（对于商业）应有的关注而陷入贫困。"（黑体是赖纳特所加）

类似于今天的企业战略学者们探讨行业市场份额的重要性，重商主义者也对国民财富的"粘性"和累积性进行过大量的探讨。在这两种情况下，交易量都是降低成本、继而获得更多市场权力的关键所在。那些试图效仿荷兰共和国的国家清楚地认识到，荷兰人的战略是薄利多销（例如 Uztáriz，1724/1751），而且这一战略给可能

① "涓滴论"（Trickle-down theory，又译作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滴漏理论）也称作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又译作渗漏效应、滴漏效应），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这被称作是"涓滴效应"。——译者注

的竞争者造成了强大的进入障碍。那些正在追赶荷兰共和国的国家不仅需要通过关税和补贴来抵消荷兰在贸易和制造业领域已经建立起来的累积性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而且这些落后国家还要面临那些来自领先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服务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报酬递增”而形成的严重阻碍（Lane，1979：45～48）。

当时最为复杂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安东尼奥·舍拉（Serra，1613）用于分析威尼斯富裕和那不勒斯贫困原因的模型，它也非常适于分析荷兰共和国的情况。舍拉模型的内容是：“制造业行业的数量和多样性”（即劳动分工的程度）、“人口的素质”、“大规模商业的存在”、经济政策（“国家的规则”）——在报酬递增存在的条件下扩张制造业规模（但不是扩大原材料生产规模）——等因素相互强化，继而创造出一个自我强化的经济增长的体系（Reinert & Reinert，2003；本书第十九章）：

> 威尼斯“得益于其扩张性的制造业；吸引大量人口来到此地的原因不仅是（通常认为的）贸易活动本身，而且是这两个原因（制造业和商业）同时存在的结果，因为这两个因素能够相互加强：在制造业的影响下，由商业和地理环境因素产生的大规模群聚活动不断增长；由于商业产生的大规模群聚活动使制造业实现了增长；商业同样可以由于人们大规模的群聚来实现增长。”（Serra，1613，1999 年 Reinert 译）

在《英国商业计划》（Plan of English Commerce）（1728）中，丹尼尔·笛福提出了一个关于累积性因果联系的更为简单的体系，其中存在着制造业和航海业相互加强的交互作用：

制造业提供商品；
航海提供海运（服务）；
制造业是穷人的生活来源；
航海是水手的生活支柱；
制造业支配海外的金钱；
航海将金钱载回国内；
制造业生产出船舶；
航海用船舶进行贸易；
制造业是财富；
航海是力量。

“总之，制造业为国内就业服务，航海为海外就业服务，两者

合一似乎会使整个忙碌的世界都运转起来；它们似乎会携手（joyn）激励那些勤勉的国家，而且如果管理得当的话，就一定会使世界富裕起来。”（Defoe，1730：68～69，黑体部分是赖纳特所加）

正如皮尔特·德·拉·考特（Pieter de la Court）在有关荷兰共和国的《荷兰的财富》（Interest van Holland，1662/1702）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我们可以用维系某种经济结构所必需的全部“支柱”作为同时表述必要性和多因素相互关系的一种不同形式。“支柱”的比喻有效地表达了“所有要素都是必要的”这样一个信息。

“航海、渔业、商业和制造业是国家的四大支柱；在任何不利条件下都不应削弱或妨碍它们，因为正是它们将其他国家的人带入本国，才维持了居民生活，使国家更加富裕。”（黑体强调部分是赖纳特所加）

与于埃（Huet，1630年生）和乌茨塔瑞斯（Uztáriz，1670年生）同时代的作者们都强调了在荷兰共和国中渔业和制造业之间协同效应的重要性：制造业和渔业共同创造的财富要多于单凭制造业所创造出来财富。今天，在强调荷兰共和国的渔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众多前向和后向的关系的时候，当代学者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de Vies 和 van der Woude，1997：236，268）。通过观察到靠近制造业地区的农业收益出现增长（这一事实）体现出来的这种联系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也许是18世纪早期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新创见。大卫·休谟在他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1767，卷三）中写道，“农业……从未得到过比制造业的增长更为有效的促进。”荷兰的渔业和制造业部门联合起来所发挥的作用，与18世纪和19世纪众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在农业部门的现代化过程中制造业部门单独地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荷兰共和国沿海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内陆地区的两倍，这也部分地反映出沿海地区的资本集中度更高①（de Vies 和 van der Woude 文中参考的 J. L. van Zanden 的著作，1997：230～231）。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用农业与多样化的制造业部门的接近程度来解释这种重要共同性的形成原因；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和现代发展经济学家们都忽略了这一真知灼见。荷兰共和国其他地区的农业产出（率）与欧洲其他地区相当，而沿海地

① 原文此处为 grater：磨碎东西的人，疑为 greater 的笔误。——译者注

区的生产率是较高的。

焦万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1544 年生）在评论荷兰的发明、模仿以及制造业的力量的时候，也谈到了荷兰农业的力量。牧场和奶牛“生产出大量的牛奶”，并且“由于向德国、英格兰和西班牙等周边国家的大量出口，据称奶酪和黄油每年给荷兰带来超过一百万金币的收入”。当时荷兰的绵羊“能生 3～4 只羊羔，母牛一般会生 2 只牛犊；没有亲眼见过的人是不会相信这里的奶牛能够产出如此之多的牛奶的”（Botero，1596/1622：48）。

3. 荷兰共和国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

一般来说，经济思想史学家们会指出，在荷兰共和国缺少“重要的理论”。拉斯佩勒斯（Laspeyres，1863/1961）考察了来自荷兰共和国时期的 644 份有关经济实务和行政管理的出版物，却发现它们几乎没有任何的理论成分。然而，从 16 世纪晚期直到 18 世纪，荷兰之外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对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成功以及后来的衰落加以评论，并且试图从荷兰的经验中为本国的发展提取教益。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成功和同时期与之形成对照的西班牙经济政策的失败，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灵感。来自美洲的黄金大量涌入西班牙，而同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西班牙人那样缺少金银”（Huet，1722，vii）。重商主义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此，我们将金银看作是代表购买力的财富，而不是“珍宝”。

凯恩斯指出，“（经济）情况越差，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就越难发挥作用”。在贸易和制造业都占据先发优势的荷兰共和国，可以在比落后国家少得多的政策干预条件下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从本质上讲，荷兰的经济政策和荷兰的经济学大体上是实用主义的，基本上是对其邻国政策的反应，并且像拉斯佩勒斯所说的那样，很难像在法国那样轻易地发现荷兰经济政策背后的原则（Laspeyres，1863：134）。然而，我认为，荷兰经济政策背后的目标与柯尔贝尔的法国没有多大差别。由于荷兰是第一个获得先发优势的国家，所以直到 18 世纪其邻国的追赶政策有能力损害荷兰制造业之前，荷兰都没有必要广泛地运用关税壁垒来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然而，荷兰共和国把制造业置于优先地位的做法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德·拉·考特在当时所说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人们极力发展制造业，在 1614 年，他们向埃克斯（Aix）和其他地方的雇主和工匠们

许诺，要提供大量的金钱吸引他们到阿姆斯特丹来工作和定居，有人告诉我们，（雇主和工匠们）接受了这些条件。”（在 McCullagh 的著作中引用，1846：267）荷兰的目标与法国、英国以及后来德国的重商主义作者们所遵循的那些目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内容上和相应政策上存在着差异。

正如一本研究这一主题的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Goyeneche，1717）：他们（荷兰人）的“巨额财富”和“他们如何成为所有欧洲商业活动的绝对主宰”吸引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浓厚兴趣。正如在 18 世纪欧洲人认为中国人已经找到了哲学家的真谛（philosophers' stone）那样，很早以前欧洲人就认为荷兰人找到了经济学家的真谛（economists' stone）——实现全民富裕的关键。下面的内容就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基础。

- 经济发展是活动特定的（activity-specific），它产生于特定的经济活动（制造业），而不是来源其他的经济活动（农业是生产率停滞的、报酬递减的和没有协同效应的单一经营模式）。
- 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协同效应的过程：劳动分工越细、专业种类越多，财富就越多（这一点在舍拉 1613 年的著作中就已经十分明确地被阐述了）。
- 根据下列准则对制造业进行确定、支持和贸易保护：

a）创造财富的能力；

b）产生就业机会的能力；

c）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能力；

d）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的能力。

- 从 18 世纪开始，重点强调了制造业与农业之间的有益的协同效应：只有在制造业存在的地方才会有成功的农业（德国的莱布尼茨和尤斯蒂（Justi），意大利的加利亚尼 Galiani，英格兰的休谟）。

法国人饶有兴趣地观察了他们邻居——荷兰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亨利七世时期的进口（rudimentary）关税法规是专门针对荷兰纺织品而制定的（法国，1581 年敕令），法国执行的第一项重商主义政策也是如此（Laffemas，1597）。在被同时代几乎所有的欧洲人一致称为“伟大的柯尔贝尔”的大量信件中，保存了数以百计的有关荷兰政治经济情况的文字资料（Clément，1861—1872）。柯尔贝尔抱怨道，荷兰禁止进口法国商品，还“模仿和伪造”法国的产品（于埃对后者也有同样的抱怨）。虽然荷兰早期针对法国的贸易保护

主义政策是在冲突或者战争时期出现的（正如拉斯佩勒斯所评述的那样，大约从1725年开始），但是在衰落时期出现的系统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才使荷兰的贸易政策变得明显起来。

在我看来，皮埃尔·丹尼尔·于埃（1630—1721）是对荷兰共和国的经济问题最有趣的、并且显然是最具影响力的法国观察家。在《荷兰贸易观察》（A View of the Dutch Trade）中，于埃通过一个关于荷兰发明和创新的表格将荷兰有益的经济政策的历史回溯到第一个千年之前的时代。他还引用了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关于荷兰人勤勉本质的论述。于埃是柯尔贝尔的合作者，还是法国王子的老师，他对于荷兰经济的研究是应柯尔贝尔的要求进行的。于埃做过阿夫朗什（Avranches）的主教，但是1699年他在巴黎退休并加入耶稣会（the Jesuits），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生命的最后22年。多种译著表明了于埃研究荷兰共和国的著作的影响（原著出版于1712年）。这些译著中有西班牙文版（Goyeneche，1717），而在1722年已经出版了英译本的第二版（Huet，1722），当时最有影响的德国官房主义者基尔格·海因里希·岑克（Georg Heinrich Zincke，1692—1769）对1717年的（于埃著作的）德文版进行了通篇的评述，并且为这位杰出的作者撰写了传记（Zincke，1748：552～578）。

查尔斯·杜托（Charles Dutot）是（法国）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的一个出纳员。在他的著作《对于法国财政和商业的政治反思》（Political Reflections upon the Finance and Commerce of France，1739）中，引用了皮尔特·德·拉·考特的发现作为全书的结尾（见前面2.2节内容）[①]："航海、渔业、商业和制造业是国家的四大支柱。"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是航海、渔业、商业和制造业，再加上外国人的作用等要素，都是大多数国外评论者们试图解释荷兰财富的来源时所常见的。

在英格兰，当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荷兰共和国，并且曾经写过一部后来遗失在海中的《荷兰节俭（方法）集萃》（Collection of the Frugalities of Holland）。根据他自己对于荷兰的观察，他提出

① 原文为"under point 2.4 above"，疑为"under point 2.2 above"的笔误。——译者注

了关于不同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后来被称为“配第法则”（“Petty's Law”）。配第发现，首先是第一产业占据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后是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最快，最后则是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部门将会占据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与所有的前斯密经济学家一样，配第把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变当作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对于后进者来说，这个转变过程就需要关税（进行保护）。必须指出的是，当时“自由贸易”这个术语是指没有贸易垄断，而非没有关税。（Seligman，1920，ix）。

早期经济发展明显向城市倾斜的倾向促使配第建议英格兰应该仿照荷兰，实现工业化，并且从海外购买其所需的粮食。通过对荷兰的观察，配第发现人口密度显然是致富的秘诀之一。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们一样，配第不仅希望尽快地增加人口（总量），还希望通过减少不列颠的原来就人烟稀少地区的人口来尽量增加伦敦的人口。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英国重商主义者几乎都会提到荷兰，大多数人都把荷兰当作仿效的榜样。约书亚·柴尔德运用一个评论作为他 1668 年的著作的开头：“荷兰人巨大的经济增长（成就）受到了同时代人的嫉妒，并且（这种经济增长的成就）可能是永远的奇迹。”（Child，1668）在柴尔德 1693 年的书中，他转而把荷兰作为仿效的榜样：“如果我们试图控制全世界的贸易，我们就必须仿效那些在贸易中最为卑劣的、在制造业方面最为出色的荷兰人（的做法），这样我们才有能力为所有的市场和客户提供服务。”（Child，1693：90）

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们首先认识到城市的协同性增长是劳动分工和发明的产物，它只可能在制造业中产生，而不会在原材料的生产过程中出现。由佛罗伦萨的亚里奥斯托·圭洽尔迪尼（Lodovico Guicciardini，1521—1589）撰写的 Descrittione di tutti i Paesi Bassi, altrimenti detti Germania inferiore（Guicciardini，1567）是一份研究荷兰的早期著作，并且被广泛引用。亚里奥斯托是意大利半岛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圭洽尔迪尼（Fransceso Guicciardini，1483—1540）的侄子。在《论城市的伟大作用》（On the greatnesse of Cities，1588 年意大利文版名为 Sulle Grandezze delle Città，英文版于 1607 年出版）中，焦万尼·搏特罗不仅将城市当作制造业的摇篮，而且把它作为欧洲的自由、文化和财富的发源地。

在从世界整体层次上论述地理学和人种学的最早著作（之一

的）《联系的世界》（Relationi Universali）中，焦万尼·博特罗将圭洽尔迪尼的工作作为其素材来源的一部分，但很明显他也亲自访问过荷兰。博特罗记述了荷兰同时具备“发明者”和“模仿者”的“熊彼特主义”特征，并列出了一份部分荷兰发明的清单。博塔罗承袭了早期意大利经济学家们的风格，对于“人的特征”加以强调：荷兰人“饮酒放纵”、“（宗教）信仰淡漠”（believe lightly），并且“连妇女都颇具商业才能”（Betero，1596/1622：49）。在18世纪（settecento），安东尼奥·吉诺维西和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等意大利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是如何在制造业和贸易领域中取代意大利先前所占据的领先地位、从而导致意大利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一比较分析为引发（19世纪为解放和统一的）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智力发酵剂”提供了重要的成分（S. Reinert，2005）。

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成功与同时期西班牙的衰落（开始于1550年左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班牙的经济学家们自然会对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成就非常感兴趣。西班牙的经济衰落并不是由于缺乏来自本国经济学家们的足够的经济建议而引起的（Hamilton，1932）。西班牙经济学家吉罗尼莫·德·乌茨塔瑞斯（1670—1732）广受关注的原因不仅是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商业和海洋理论与实践》（Theoricay practica de comercioy de marina，1724/1751）中包含了有关荷兰共和国的大量参考文献，而且是在荷兰近20年的军事生涯中，乌茨塔瑞斯所获得的亲身体验。在1705年成为西西里岛（Sicily）西班牙总督的首相之前，他加入了布鲁塞尔的皇家科学院（the Royal Academy at Brussels），在服兵役和后来成为步兵团上尉的这段时间内，他一直在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服役（Hamilton 1935，Fernandez Durán 1999）。通过乌茨塔瑞斯，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各种思潮在当时的欧洲是如何传播的。他的著作被译成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乌茨塔瑞斯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前面提到的为于埃《荷兰的商业》（Commerce de Holland）一书1717年的西班牙文译本所撰写的前言（Goyeneche，1717）。乌茨塔瑞斯的结论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制造业）是比波托西更加丰饶的矿藏”[6]，并且他还开列出旨在使西班牙的经济与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更加相似的、长长的政策工具清单。

在德国，法伊特·路德维希·冯·泽肯道夫（Veit Ludwig von

Seckendorff）被称为“官房主义的亚当·斯密（Small，1999）”，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在30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1618—1648）之后的重建过程中，在为萨克森—哥达的厄恩斯特·普法尔茨公爵（虔诚者）（Duke Ernst der Fromme（the Pious）of Sachsen-Gotha）服务期间，泽肯道夫为众多德意志小国的治理树立了一个榜样。泽肯道夫陪同厄恩斯特伯爵（Count Ernst）访问过荷兰，泽肯道夫所观察到的荷兰的财富和对宗教的宽容（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tolleis，1995：158）。从对荷兰共和国的访问经历中，泽肯道夫开始理解对于制造业的迫切需求以及人口集中程度的重要性。经济活动必须集聚起来而非分散地进行，这一论点由安东尼奥·舍拉在1613年提升到理论层面。因而，泽肯道夫的经济政策包括：鼓励发展制造业；将乡村的工匠迁入城镇，这些工匠在城镇里很可能会生活得更好；鼓励农业的拓展以及增加土地产品附加值的活动。

在17世纪晚期，诸如菲利普·威廉·冯·霍尼克（Philipp Wilhelm von Hörnigk）等作者承袭了官房主义的传统，同时更加重视完整的经济要素（体系）。与当时英格兰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一样，霍尼克早期提倡“政治计算”，他计算出了在一个成功的荷兰城市中的工匠们的收入。早期的经济学期刊中，也经常提到荷兰的有关制度和实际事例（Zincke，1746—1767；Bergius，1767—1780；Beckmannn，1770—1806）。对于国家衰败的一般性原因（Bielfeld，1760）以及荷兰共和国繁荣的特殊情况（Justi，1760），德国经济学家雅各布·弗莱德里希·冯·比勒费尔德（Jakob Friedrich von Bielfeld，1717—1770）和约翰·海因里希·高特劳布·冯·尤斯蒂（Joha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1717—1771）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和详细的描述（见本章第6节）。

4. 由协同效应与多样性所产生的发展：17世纪代尔夫特的案例

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早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强烈的城市倾向，它支持了那种认为更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累积性因果联系的起点的观点（Serra，1613，Reinert & Reinert 2003）。当色诺芬（Xenophon）提出可以通过扩大城市规模来解决城市的某些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这种“系统性报酬递增”的情况。大规模的劳动分工通过培训过程使学习的潜能实现最大化。

于埃和乌茨塔瑞斯这些最了解荷兰共和国情况的外国经济学家们，不倦地枚举每个荷兰城市各种制造业部门，反复强调巨大的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对于17世纪的荷兰城市代尔夫特（Delft）的案例研究表明，知识生产活动的多样化基础和看似无关行为之间的溢出效应是能够创造出协同效应的。毫无疑问，其他的荷兰城市也存在交互活动性知识的类似案例。在代尔夫特，我们能够辨别出一个紧密联系的海洋—科学—艺术集群，在这个集群中，创新活动从各不相同的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中不断产生。代尔夫特的案例把那些在完全相同的生产—科学集群中的部门和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在德国的传统观点中，这些部门和要素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推动力：

- 对于军事力量的需求，即如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战争与资本主义”中指出的那样，在本案例中指的是海军（Sombart，1913a）。
- 对于享乐的需求，即如维尔纳·桑巴特的“享乐与资本主义”中指出的那样，在本案例中指的是艺术（Sombart，1914b）。
- 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即如维尔纳·桑巴特在其论述资本主义的著作（Sombart，1902/1928）和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谓的“随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时指出的那样。

在导致代尔夫特出人意料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三种力量是相互作用的，而将这三种[①]看似无关的领域——毛纺业、海战、艺术和科学进步——统一起来的奇特职业是透镜研磨者们的玻璃透镜制造业。[7]

博特罗（Betero，1588）强调过一个事实：荷兰艺术家发明了油画和在画布上作画的方法。这些发明的原材料——亚麻油、亚麻和大麻纤维广泛应用于荷兰的造船业并且可以随时获取，但是对于其他流派的艺术家而言，这些原材料就不是可以随时获取的了。在17世纪，代尔夫特取代佛罗伦萨，逐渐成为发达的玻璃透镜制造中心。这里还出现了显微镜的重要改进（Ruestow，1996）。代尔夫特的自然科学家、显微镜的制造者，安托尼·范·列文虎克（Antoni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van Leeuwenhoek）发现他制作的手持透镜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纺织品的质量检查（Huerta，2002：33），因此在当时的主要工业——羊毛纺织业和他的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同性。类似地，通过代尔夫特画家杨·维梅尔（Jan Vermeer，1632—1675）的作品，使透镜制造业和弗兰德斯（Flemish）艺术的发展融为一体，并将艺术史与科技史联系起来。杨·维梅尔的绘画技法包括通过透镜和照相暗盒（camera obscura）（一种类似于原始照相机的装置）来检查其作品的基本色彩。在代尔夫特，维梅尔还热情地参与了身边的各种发现和探索活动：荷兰海军的地理发现，以及那些由于列文虎克及其同事们对于显微镜的改进才成为可能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8]列文虎克“还与艺术家社团保持着广泛的和十分密切的联系，因为他对于显微镜的研究和那些以制图员为职业的艺术家们（的工作）有着长期的和密切的相互联系”（Ruestow，1996：182n）。虽然海军和商业航海是双筒望远镜用透镜的最大需求者，但是如前所述，自然科学家和早期的显微镜制造者也是透镜的需求者。因而，代尔夫特的透镜研磨者们形成了极其重要的、打破常规的产业集群的核心，这个集群包括了诸如海军、羊毛工业、维梅尔之类的画家、自然科学家和显微镜的制造者等各种各样的参与者。

在当时的荷兰，另一个与战争（海军）、享乐（艺术）和“随意的好奇心”（科学）都有联系的生产过程是地图绘制。作为一个海上强国，荷兰不仅需要双筒望远镜和其他的海军装备，还需要最新的地图。[9]一个作家评述了维梅尔“对于地图的狂热”，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他对于地图和探索活动的兴趣都有明显的体现。这种兼具协同效应和累积性的因果联系，及其创造出来的路径依赖效应，毫无疑问地成为知识创造和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

当时，所有研究荷兰共和国的经济学家们都观察和论述了这种经济活动的巨大的多样性，这一点在早期的经济杂志中也有论及（Zincke，1746—1767）。多样性的作用和能够产生创造力的意外收获（serendipity）使我们回归到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单一经营”问题，而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不可能出现在17世纪的代尔夫特所观察到的那些具有创造力的联系。一般而言，农业社群之间很少进行贸易。通过模仿荷兰的经济结构而不是模仿荷兰的经济政策，并且通过吸取西班牙的教训，重商主义者构建出了他们的经济政策体系。

5. 要素和问题

5.1 作为原始驱动力的自然资源稀缺性

实际上，每个作者都把这一因素作为荷兰成功背后的一个根本性原因，而荷兰人德·拉·考特（在其著作中）则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荷兰糟糕的自然条件。他说道："我们的国家从自己的自然禀赋中几乎一无所得。"（第9章，第1部分）麦克莱（McCullagh，1864，卷2：270）也引用了这一表述。和许多作者一样，约书亚·吉将荷兰的贸易战争归结为缺乏有价值的土地的一个结果。

博特罗（Betero，1599/1622）对荷兰资源稀缺但产品丰裕的情况进行了评述。原材料的稀缺促成了由相同的原材料制成的商品的大量涌现："在没有葡萄、亚麻、木材和耕地极少的情况下，荷兰却不可思议地富有葡萄酒、亚麻布、船舶和粮食。"（Botero，1590/1622：57）荷兰不仅缺乏自然资源，而且其港口（状况）也"非常恶劣"（McCullagh，1846：12）。乌茨塔瑞斯这样评述了荷兰的荒凉、缺乏粮食生产的可能性和在其他领域的专业化之间的联系：

> "对于国家（治理）的原则，（荷兰的）人民在理论上是如此纯熟，在实践中又是如此认真地对待，使得其他国家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劣势地位。尽管大自然所赋予他们的那一小块沙质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如此地恶名昭彰，但是荷兰一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完成的贸易额却超过了法国和英格兰强大（贸易）能力的总和。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国家（即荷兰）的荒凉迫使他们必须具备更加灵活的原则以及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航运计划。进而，在商业的帮助下，荷兰的人口变得如此稠密，以至于他们将所有的宽阔河流、港区、海湾、沼泽和荒地都变成了富庶的牧场，而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保证其居民食品供应的需要。该区域1/4的土地不能耕种，另外的1/4是牧场，其余的面积要么被水覆盖，要么不能生产水果、牧草以及任何对生活有益的作物，某些作者坚持认为，（荷兰的）收成不能满足其消费总额的1/4，这是人们劳作的最恶劣的自然环境。"（Uztáriz，1751：149～150）

后来，一个英国作者对于严酷的自然环境是如何塑造出荷兰人近乎英雄的性格进行了如下评述：

> "早期的法里孙（Frisian）民族生活在那些经常破损但又经常被修缮的堤坝之中，他们通过每一次新的灾难学习如何改

进他们此前的应急方法，即使这些修理方法有效也不盲目自信，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体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和从不气馁的精神，是记述他们国家生活的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首要的、或许是最伟大的事实。由此看来，他们的诸如无畏的冒险精神、大胆和坚忍等的品质似乎就是自然而生、令人信服的。不分昼夜、经年累月、无论长幼，每个人都在警惕着，唯恐他们的国家沉入大海！有什么样的工作会比这项工作使他们更加卖力吗？”（McCullagh，1846：8）

5.2　人民

在《高卢战记》（Commentaries）中，恺撒（Caesar）观察到，就发明和模仿而言，低地国家的人民是非常勤勉和刻苦的。用他的话就是，Est summae genus solertiae，atque ad ad omnia imitanda quae a quoquo traduntur aptissimum（拉丁文）

于埃，《荷兰贸易概览》，1722

早期的经济学家对于舍拉（Serra，1613）所称的“人民的品质”更为关注。在舍拉的书中，热那亚人（the Genovese）比威尼斯人（the Venetians）更加勤劳地工作，但是其他要素（如地理位置）导致威尼斯人成为最富有的人。在“人们的品质”方面，早期经济学家给予荷兰很高的评价，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般来说人们的勤勉精神与自然资源的稀缺状况是密切联系的——基本上一个因素是另一个的结果。需要是发明（和模仿）之母，对于大多数当时的经济观察家们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Montesquieu，1748）。

由于（当时的人们）认为精神（因素）是如此重要，对于落后国家而言，（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就是有意识地改变和塑造精神（因素）。人们认为，逐利行为不是人类的天性而是后天的素养。正如在洛（Lowe）的译文中，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急于表明的那样：“平民永远不会改变他们平庸的步调，除非你揪着他们的鼻子和耳朵（强迫他们）去实现自己的利益。”（Lowe，1988：21）。制造业和贸易被当作“恰当”习俗的承载者（Hirschman，1977）。

博特罗（Betero，1590：49）对荷兰人给予如下评论：“他们爱好音乐……他们能够迅速而顺利地模仿他们所见到的一切。他们发明了油画艺术、彩色玻璃以及其他许多高雅的事物。”他还说道：

“在体型上，荷兰人优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人，而荷兰

> 妇女也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妇女更加美丽，同时他们（荷兰人）在政策和财富方面也不逊于其他国家。他们保持了老一代（荷兰人）凶暴勇猛的传统，而作为一个具有航海传统的富裕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势力值得他们尊重。”

如果有人赞同历史的循环理论的话（Kindleberger，1996：14 ff），这里谈到的荷兰一直是处于（历史循环的）急剧上升阶段的，而200年之后，一个德国作者观察到，荷兰共和国表现出同样强烈的下降的特征（一个匿名的意大利旅行者（1786）和比勒费尔德（Bielfeld，1760），见本文第6节）。

博特罗很羡慕荷兰妇女的技能：“在商业和贸易方面，（荷兰）妇女也具有很强的能力，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能读会写，并且通晓多种语言。”（Betero，1590：49）然而，他也认为荷兰人是实用主义者，并且比较冷漠：“他们容易忘记侮辱和恩惠，从不坚定地记恨或者热爱。”亚当·斯密说道：“（在荷兰），一个人如果不经商就是落伍的人。”（Smith，1776/1976，Ⅰ，108）

后来，瑞典人概括了重商主义者的讨论，强调了人口密度。此人是在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执掌经济学教席的安德斯·博赫的一个学生。

> “国民经济中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比荷兰共和国的例子更为清楚的了。实际上，他们不具备任何的国内（资源），但是仍然依靠其众多人民的勤奋超越了拥有强大力量却人口稀少和懒惰成性的西班牙。（荷兰人）非常了解如何利用他人的愚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发现，由于缺少人口，虽然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金银矿藏、最好的港口和最丰饶的土地，西班牙还是处于贫困状态。另一方面，虽然只拥有糟糕的港口和世界上最差的气候，庞大的人口数量使荷兰联省（the United Provinces）具备了强大的力量。”（Westbeck，1747：4～5）

从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和色诺芬的Poroi时期开始，国外移民（特别是通过他们带来的技术所体现）的重要性就是一个恒久的主题（Zincke，1753）。一般来说，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压迫有助于国外技术的涌入，事实上荷兰和（始于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都在有意识地利用（移民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与之相反，威尼斯共和国却禁止那些受到死刑威胁的技术工人的迁移（Reinert，

1999)。卡洛·萨勒尼（Carlo Salerni，1782/1996）记述了为了获得优质毛织品的生产技术，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 of England）在1331年如何从佛兰德（Flanders）招募了一个叫约翰·肯普（John Kemp）的人；而在1667年，他（肯普）的同乡布里维尔（Bevver）将精细印染技术[①]引入了英格兰（Salerni，1782/1996：81)。

在其第一部著作 Het Welvaeren der Stad Leyden 中，皮尔特·德·拉·考特实际上将移民的流入看作了城市经济增长推动力的核心。莱顿（Leyden）的繁荣并不是那些为促进制造业发展而制定的明智法规或者行会组织（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由于邻近地区发生战争而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采取对外国人征收高于当地水平的税赋的政策。这一原则对于追赶者也同样适用。否则，一旦租金、奢侈税等成本太高，制造业就会被迫向乡村转移(Laspeyres，1863：185～186)。

麦克莱写道："各个种族和教派的外来者不仅确信荷兰是他们的避难所，而且在那里他们还会受到欢迎；并且（荷兰）特别努力地吸引那些拥有有益于国家繁荣的技能的人们，使他们在自己伟大的城镇永久性地定居下来。"（McCullagh，1846，卷2：267)。不同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技术，佛兰德的新教徒带来了透孔织品和丝织品方面的技术，而一般来说犹太人则在印染和化学方面技艺纯熟。

早期的经济学家也谈到了荷兰人的制度、"组织能力"以及他们作为商品和航运服务供给者的可靠性。在许多层面上，荷兰人有意识地进行了制度建设。格鲁修（Grotius）的《公海》一书（Mare Liberum）的直接目的就在于推翻西班牙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排他性航海统治权（McCullagh，1846，卷Ⅱ：334)。亚当·斯密时代哥廷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在他的《发明史》（History of Inventions，London，1798）中记载道："在1404年，佛兰德地区布鲁日（Bruges）的行政长官要求巴塞罗那(Barcelona）的行政长官告知汇票交易中的实践惯例。"（Beckmannn，1798，卷2：462)。正如柯尔贝尔抱怨荷兰人模仿法国产品一样，长期以来，荷兰人向他人学习的能力一直是他们的一个重要

① 此处原文为 fine dying，根据上下文疑为 fine dyeing 的笔误。——译者注

特点。

5.3　工业和对制造业的崇拜

“（荷兰人）只花费1个佛罗林（Florin ①）来购买来自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the West Indies）的原材料，特别是丝、铁和库切尼拉（cochinilla，一种红色染料），而他们却以10至100佛罗林的价格将制成品返销西班牙。通过这种方法，欧洲的其他国家给西班牙带来的羞辱要远远大于西班牙强加给印第安人的耻辱。西班牙人以价值大致相等的小饰品去交换（印第安人的）金银，却以无价回购自己的原材料，这使西班牙人成了整个欧洲的笑柄。”

西班牙财政大臣路易·奥蒂斯（Luis Ortiz）致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为防止货币流出王国而致国王的备忘录》，马德里，1558年。

路易·奥蒂斯的报告是我所谓的欧洲“制造业崇拜”现象的一个早期例证。此后大约200年，在讨论德国的制成品进口问题时，岑克重复了同样的观点：“最重要的是，荷兰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凭借自己的制造和贸易方面的技艺，使我们从他们那里进口了许多他们自己并不生产的原材料，我们还从荷兰进口了数额巨大的当地产品以及进口到荷兰的商品。即使我们可以从离我们更近的（商品）产地直接进口，实际上我们还是通过荷兰人之手才获得这些商品。这类情形的一个例子是骆驼毛。最难以置信和荒谬至极的是我们在进口我们自己的产品，就是说，（我们在进口那些）我们自己生产的原材料，只是这些原材料经过了荷兰人之手进行加工和改良而已：（我们进口的）布匹是由我们自己生产的羊毛和纱线制成的，（我们进口的）风帆是由我们自己生产的亚麻纱线、带子和亚麻等制成的。”（Zincke，1750：306）人们经常提到荷兰制成品的多样性的重要作用。（例如：McCullgh，1846，卷Ⅱ，267～269）。

于埃开列出由荷兰共和国的各个城市专业化生产的、冗长的产品清单，却似乎难以给出一个完整的统计：

> “我并不试图给出一个关于荷兰联省所有制成品的准确条目（统计），那样会使文章过于冗长，从而影响这篇论文的简洁性。我只能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王国或者国家会像荷兰那样繁荣昌盛，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我只关注（生产）最引人注目的、在其他国家的销售记录最好的商品。”（Huet，

① （1252年发行于佛罗伦斯的）一种金币。——译者注

1767，卷5：125）

如果要开列（荷兰的）城镇和其制造业的清单，那将是长篇累牍的。于埃和乌茨塔瑞斯（Huet and Uztáriz，1751，卷1：168 ff）都强调了在解释荷兰成功的原因时渔业的重要性。休谟记述了在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统治时期，英国人发现格陵兰的情况，“虽然（英国的）捕鲸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尽管存在种种阻碍因素，荷兰的制造业还是很快使英国丧失了这项财富来源。”（Hume，1767，卷5：125）

这一资源加强了荷兰自十字军（the Crusades）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长期的传统产业：造船业。1217年，威廉伯爵从马斯河（the Meuse）起航时，“法国和德国的军队搭乘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船舶前往巴勒斯坦（Palestine）；荷兰人却是乘他们自己的船抵达那里的”（McCullagh，1846，卷2：79）。

博塔罗在1590年就已经谈到，在阿姆斯特丹的城墙外面可以看到800多艘大船（Botero，1590/1622：57）。对于这个工业部门，于埃（Huet，1722）说道：

> “离阿姆斯特丹不远的萨丹（Sardam）必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区，在这里为荷兰联省和其他国家建造的所有船舶都是商用的。（造船业）对于木材、索具、桅杆、船帆和其他航海必需品消耗巨大，每天卖给国外客户的、已经造好的和准备下水的船只数量都十分庞大。”

5.4　技术、创新、模仿和竞争

与于埃相同，我引用了尤利乌斯·恺撒对于荷兰人在发明和模仿方面技能的评论。荷兰人具有很长的制造业历史。于埃叙述了荷兰从1000年起的历史，而麦克莱则研究了更早期的荷兰历史。毕竟，他研究荷兰的文集是以《自由国家的制造业历史》（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Free Nations）为题的著作的第二卷，而第一卷则叙述了古希腊时期的制造业历史。麦克莱注意到，在750年左右，荷兰的制成品就在其他国家的人民中“有着很高的声誉，而在那些国家中，和平用途的技术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他还注意到（荷兰人）对于英国羊毛的依赖性，这种情况使查里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即使在与英格兰作战期间，也要谨慎地保护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商人的利益。

在荷兰经济历史中，显然存在着许多有关创新和模仿的要素。

我已经提到了在渔业成功发展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熊彼特主义要素，以及在渔业、制造业和贸易之间所产生的协同效应：

> “大约在1400年，一个在皮尔鲁勒（Pierulem）的佛兰德人发明了腌制和卤制鲱鱼的技术，这一技术使荷兰人占据了很强的优势地位，极大地促进了鲱鱼捕捞业的发展。再加上其制造业（的优势），使得航海在联省中得以蓬勃发展，结果又有力地推进了其贸易和商业的进步。”（Huet，1722：9）

柯尔贝尔时期的法国人强调，荷兰人在模仿方面的技能要远远优于他们在发明方面的能力。然而，岑克的《莱比锡汇编》（Leipziger Sammlungen，1761：561～563）的索引中的内容表明，即使是在荷兰共和国的后期，依旧有许多发明和商品是从荷兰输往德国的：Holländerey 是 Viehzucht 和“节俭”的同义词；Holländische Alleen 是一种种植果树的方法；Holländische Erbsen 是“大田豌豆”。多年来，在岑克的日记中提到和赞扬的众多事物包括：荷兰的制成品（Holländisches Manufakturwesen）、荷兰的制造业体系、荷兰的财务原则、荷兰的印刷所和它们（印刷）的书籍、荷兰的渔业、荷兰的酒店、荷兰的造纸厂、荷兰的马匹、荷兰的政策制度、荷兰的宪法、荷兰的造船方法、荷兰的丝织品、荷兰的布匹、荷兰的亚麻种植业、荷兰的鲱鱼捕捞业、荷兰的苜蓿、荷兰的深红色（染料）、荷兰的毛绒束、荷兰的纸张、荷兰的火药以及荷兰的海军。同样，《牛津英语字典》提供了一份关于英语中以“荷兰的”为前缀的事物和制度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清单。单词“荷兰化（dutchify）”的一个意思，曾经与今天的“美国化（americanise）”一词具有类似的内涵。

岑克（Zincke，1750：338）为德国人不具备发明方面的能力而忧虑，并且被迫承认“几乎没有德国人由于某种全新的发明而获得声望”。他把这种情况归结于“德国人的迟钝（Phlegma）”和对旧习俗的偏爱。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德国人高估了进口商品的价值，因此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经常把产自德国的商品当作进口品卖（给德国人）（Zincke，1750：339）。

乌茨塔瑞斯强调，荷兰海运的成本有效性是（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Uztáriz，卷1：170），他向西班牙推荐了这种类似的高产出/低边际成本的策略。根据亚当·斯密（的陈述），荷兰人“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利润进行贸易”（1776/1976：102）。（形

成）荷兰“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荷兰共和国国内的低利率，以及资本积累的宽松环境。约翰·劳（John Law，1760）是对于重商主义理解得最为透彻的作者（Child 1668：13，15，Law，1769：26～30，Smith，1776/1976：102）。柴尔德将低利率提升到实现国家富裕的主要原因的地位，而许多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们却把低廉的融资成本看作制造业和贸易繁荣的结果；这些要素彼此加强，并且创造出具有累积性因果联系的“良性循环”。

成本，包括间接决定普通劳动力价格的那些商品的成本的高低是早期经济学家们经常关注的一项内容，并且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与国外制成品进行竞争的能力。基于这一原因，约翰·海因里希·高特劳布·冯·尤斯蒂对于德国木柴的高价格表示忧虑。在英格兰，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为实现谷物的自由贸易而积极努力的重要动机就是，谷物的价格对于英国制造业劳动力的成本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Rienert，1998）。在法国，柯尔贝尔发现，为使法国能够进行国际竞争，“必须保证工人能得到生活费”（Kaplan，1976：卷1，2）。荷兰禁止出口淡水鱼，这与昂贵的鲱鱼制品是“少数人的食品”的观点是相反的（de Vries & van der Woude，1997：237），这也是通过降低维持大众生存所需的成本来实现降低（商品）成本的目的。

我不同意拉斯佩勒斯的观点，我认为荷兰人对于垄断的批判态度应该这样理解：（垄断）提高了成本，导致荷兰的竞争力降低（Laspreyers，93）。另外，如果荷兰将垄断的权力交给数量众多的独立的商人，那么毫无疑问，来自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将会降低。越接近“完全竞争”的状态，利润和价格大幅度下降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因此，荷兰共和国面临着这样一种权衡：非垄断性贸易会以贸易公司的利润为代价来增加本地产品的竞争力。对奢侈品实行的垄断价格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它们对于普通人的工资水平没有影响，而通过涓滴效应，荷兰的再出口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最终会使（整个）共和国获益。另一方面，对于普通人所消费的商品而言就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垄断的负面效应（Laspreyers，94～95）。

在贝克曼的《发明史》一书中，有关“庭院花卉”的小节也许体现了荷兰人作为创新者和商人的典型作用。首先，贝克曼告诉我们，“花卉的球根是由西班牙人首先带到欧洲的，后来却是一个在

莱顿的拉考尔人（le Cour）用种子培育出第一个完整的块茎[①]，他通过去除其根部的方法使它们多年中一直处于营养不足的状态，这样做可能会使（这些植物）变得与众不同。”（Beckmann，1798，卷3：3）

对于荷兰共和国的讨论也导致在欧洲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有关奢侈问题的大辩论又重新展开。像博特罗（Botero，1590）和拉菲马斯（Laffemas，1597）这样的早期经济学家们对奢侈（行为）持批评态度；而众所周知的是，伯恩哈德·曼德维尔（Bernhard Mandeville，1714）持另一种观点：奢侈（行为）是一种保证商业机构不断增长的需求。最后，18世纪时达成了这样一种广泛的共识：如果奢侈行为可以创造国内的就业机会，那么就可以容忍它们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当时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中，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盈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还很远，同时，西班牙的工业化退化及伴随而来的资本短缺、失业和贫困为不应该做什么树立了榜样。

伯恩哈德·曼德维尔出生于荷兰，在荷兰受教育，但他在1714年撰写《蜜蜂的寓言》（Fables of Bees）（在1707年有一个早期的未完稿）时，似乎是一个英国人。在许多作者都在对荷兰人的节俭进行评述时，曼德维尔考察了荷兰共和国中节俭和奢侈的矛盾冲突：“在荷兰，人们只是在每天都需要的、迅速被消费掉的（日用品上）显得节俭；而在耐用品方面却表现得完全相反：在绘画和大理石塑像上，他们十分奢靡；而在其住宅和花园上，他们奢侈得近乎愚蠢。”

曼德维尔还发现，将鼓励奢侈品消费和征收高额的消费税结合起来，是有意实行的荷兰式“策略”（Strategem）。当水手们结束东印度群岛（the East India）的航行后回到家乡，他们“就像那些嗜好和教育都足以负担（奢侈行为）的人们一样，在葡萄酒、女人和音乐上大肆挥霍”，他们成了“六周贵族”。曼德维尔说道，“通过这样的策略，出现了一种双重政策”：首先，他们的挥霍行为迫使他们必须回到海上，这就解决了船上的人力问题；“其次，水手们经常分得大额的财富；通过这种方式，这两者就使得整个国家迅速

① 原文此处为tuberoles，根据上下文疑为tuberose“块茎”的笔误。——译者注

运转起来，并且通过高额的消费税和其他税收，使该国的大部分财富又很快流回到公共财政中去”（Mandeville，1714/1806，112）。

6. 荷兰共和国的衰落

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荷兰的外交官和学者就开始提出，其他国家表现出在促进和保护本国的航海和制造业方面不断增长的愿望（Laspeyres，1863：125）。英国1665年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 of 1655）以及柯尔贝尔为保护法国制造业所制定的法律，都使得生产和贸易活动从荷兰人那里转移到英国人和法国人手中。这些措施显然损害了荷兰的利益。而在荷兰，当时的讨论焦点则在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政策中哪一个对荷兰损害最大（Laspeyres，1863：127）。

然而，18世纪初在像于埃这样的外国经济学家们对荷兰所进行的评述中，几乎没有提到（荷兰）衰落的迹象。于埃生于1630年，他的参考资料自然是有关17世纪的。但是在18世纪前期，我们在经济文献中开始发现对于荷兰衰落的评述了。造成荷兰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他国家试图接管那些给荷兰创造出最多利润的活动，即在航海和制造业方面成功的“进口替代”政策（Mandeville，1614/1806：109& Steuart，1767）。

回到上面的讨论，亚当·斯密认为荷兰的工业化退化是荷兰对普通人的面包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征收高额税赋的结果。[10]他认为，“通过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这些税赋以及其他同类的税收摧毁了荷兰制造业的主要部分”（Smith，1776/1976：Ⅰ：405）。从亚当·斯密开始，产生了经典意义上的经济学，对他而言，荷兰的衰落是：a）由于内部（决策）失误而自己造成的（规模过于庞大的政府也间接地导致了这种状况）；b）似乎可以归结为以单一因素来进行解释，这种因素来自价格层面而非生产领域；c）排除了任何对于重商主义者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有关军事关系分析的内容。在亚当·斯密的分析中，英格兰在“将荷兰人从海洋中清除出去”方面的胜利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见下文中莱恩（Lane，1979）对于军事力量的论述）。

正如前面提到的，现在荷兰共和国所面临的工业化退化和丧失政治权力等问题在过去也曾经同样困扰着意大利的城邦国家[11]。重商主义者们十分明白，贸易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对于意大利半岛

和荷兰共和国得出的分析（结论）是类似的：外国人正在我们自己（占优）的博弈中打败我们。

在假设的历史中，一个富有吸引力的问题是：荷兰共和国的衰落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会问，如果荷兰更早地取消自由贸易和低关税的政策，而不是在18世纪20年代才这样做，是否会有一个不同的结果？和奥布莱恩（O'Brien）一样，格利菲斯（Griffiths）和于埃（1991：418）认为，“除瑞士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荷兰那样允许（经济成为）商业贸易的附属品、并听任自由贸易来损害自己的制造业。”在1786年，一个不知名的意大利游客发现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些在商业贸易上如此精明的荷兰人，对其制造业的衰败为什么不采取任何简单的补救措施呢？他们仍然拥有一些依靠其他省份的施舍来维持生活的贫困省份。英国人在贫穷的、（结果是）食品价格低廉的地区建立起其制造业的核心部分，为什么荷兰人不仿效他们的做法在这些（贫穷的荷兰）省份建立制造业呢？”（Anonymous，1786：110～111）[12]。

在此，关键性的因素也许是，当时英格兰的工业发展与那些在荷兰共和国正在消亡的制造业相比存在本质的差别。在18世纪晚期的英格兰，诞生了一种新型的技术—经济范式（Perez，2002 & 2004）：在这一时期，棉纺织业——英国的主导工业——的技术进步使英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25%。由于荷兰共和国已经脱离了与技术前沿的联系，所以要想与那些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生产力爆炸”的地区进行竞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任何试图接受已经在专业知识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棉纺织业挑战（的国家），都必须具备有力的政策和很高的关税壁垒。100年之后，在接近100%的关税壁垒保护下美国建立起能与英国进行竞争的钢铁工业。这种政策与荷兰共和国从“黄金时代”所继承的原则是截然相反的，在那个“黄金时代”，荷兰共和国自身处于英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是驾驭新技术浪潮并从中获利的主要受益人。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这位不知名的意大利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这种情况是由于居住在“欧洲咖啡馆”里的荷兰人的“懒散”造成的。他很羡慕荷兰人的取得的成就，并且赞赏古典重商主义者关于商业“可以归化和塑造人，使其融入社会之中”的观点。但是，他认为荷兰共和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而遭受损失，在荷兰，商业活动支配着其他的全部事物，将社会（资源）消

耗一空而没有对社会进行深层次的改良（同上，117）。通过一句令人回忆起对于西班牙200年前衰落过程的分析的名言，我们的意大利旅行者提醒那些富足的人们，如果（名言所警示的问题）发生了，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财富方面的）荣耀。在整个共和国范围内，制造业都在衰落，但是作为各国贵族们避难所的乌特勒支（Utrecht）的情况比其他地方都要糟糕：制造业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同上，110）。

有关荷兰共和国衰落时期的（经济）数据是有争议的，但是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以及荷兰共和国的相继衰落表明，小型城邦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结合起来，不可逆转地扩大了资本主义的最小有效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ize）：像法国和英格兰这样规模更大的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制造业并从事海外贸易，而且这些国家有意识地力图将城邦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拓展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地理疆域内[13]。在那个时代，反映系统性报酬递增现象的经济系统的最小有效规模并不是一个新思想。我已经提到，在色诺芬的著作中，通过扩大城市规模实现的这种“系统性报酬递增现象”已经被看作是治理城市问题的良方。人们可以认为，今天全球化的趋势只是在相同的方向上更进一步而已[14]。在考察荷兰共和国衰落（的原因）时，我们发现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肯定了这一分析（结论）。

在《国家的本质和特征》（*Nature and Character of States*, (Natur und Wesen der Staaten) Justi, 1760）中，约翰·海因里希·高特劳布·冯·尤斯蒂（1717—1771）对于荷兰的衰落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尤斯蒂运用荷兰凭借海洋起家的事实，提出了一个包含如下思想的比喻：凭借某种单一性方法创造财富的特定时代已经结束了。荷兰就像一栋以海洋为支柱的房子，而这些支柱正在朽坏：

> “……可以用荷兰的事例来反对我（的观点）：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自然禀赋，即使仅是一个小角落，他们也必须要建筑最为昂贵的堤坝以防止被海水淹没，尽管如此，由于人民的勤奋，（荷兰）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度。就此问题，我要重申，我承认人民的勤奋可以补偿土地的贫瘠，但这种情形仅仅会在（荷兰那样的）人造土地上存在。这种（人造土地）是建筑在钉入海床的支柱上的，人们可以在上面舒适地生活一段时间。然而这些支柱最终都将腐烂，而整个（人造土地的）建筑也会

> 崩塌。这种人造土地在所有那些没有任何自然财富、却能依靠乐于航海（的精神）和勤奋工作而繁荣起来的国家中都存在。只有在其他国家都是如此无知，对于这种情况视而不见的条件下，这种（人造土地）才能存在；而（其他国家）也能够通过自己人民的勤劳，从事那些（以前）由勤奋工作的人进行的生产活动。一旦其他国家变得明智，人造土地将会朽坏，继而除了大自然给予的贫瘠的土地之外，（原来生活在人造土地上的）人们将一无所有。在我看来，在本世纪里荷兰的人造土地已经开始大量地朽坏，而当其他的欧洲人民、特别是北部地区（the North（nordisch））的人民变得更加聪明和勤奋之时，也许会有更多的人造土地朽坏掉……当一个国家把她繁荣的（经济）组织建筑在自己的天然土地上时，这个国家就会非常富有。"（Justi，1760：35～36，着重号是赖纳特后加的）

换言之，当其他国家都学着追随荷兰战略的时候，荷兰就会"落在后面"了。我们可以想见，在贸易和制造业方面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在此尤斯蒂指出了下列问题：a）存在一种追赶现象，其他国家认识到，如果它们提升自己的制造业和航运业，它们就会富裕起来；b）博弈的规则正在发生变化，当需要有更加广阔的、依赖港口供应的内地贸易区（Hinterland）时，城市重商主义就不能满足（要求）了。有趣的是，当荷兰共和国衰落过程的加速成为事实的时候，重商主义者们开始强调在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协同效应的重要性。虽然在前面我们已经对16世纪成功的荷兰农业进行过评述，但是在荷兰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期间，人们似乎并不把农业当作是财富的来源。现在，只是在制造业出现的时候，人们才逐渐开始把农业当作一种财富来源。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农业在城市国家（经济）中仅占据很小的比重，这一情况在民族国家逐渐兴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薄弱环节。对这一问题的部分解释是，当工业化日益满足一般民众的需要而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逐渐消亡的时候，代表着大多数欧洲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口的农业人口作为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尤蒂斯改变了舍拉模型（Serra，1613）中的规则：自然禀赋比较优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已经消失，而人为的比较优势变得愈发重要。在城市重商主义让位于国家重商主义的过程中，原有的城市优势的再造和扩展是一个关键性挑战。这里提到的加蒂斯的观点

与后来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伊曼努尔·华勒斯坦（Emmanuel Wallerstein）所观察到的现象是吻合的，这两人都指出了英格兰通过全国的联合而实现了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展，而汉萨同盟、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以及荷兰，由于不向它们的城市国家集团之外发展，因此走向了失败，这是他们丧失领导地位的主要原因（List，1841，第1～3章；Wallerstein，1978，卷2：90～93）。

雅各布·弗莱德里希·冯·比勒费尔德（Jakob Friedrich von Bielfeld，1717—1770）的著作包含了针对国家衰落原因的广泛的类型学（分析）。比勒费尔德的著作是最为畅销的经济学书籍之一，一共出版了12版，其中的一章（第2卷，第15章）论述了国家衰落的问题。比勒费尔德认为，国家衰落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国外的和国内的。其中国家外部的原因有12个：大规模移民（野蛮人的入侵）、战争、与邻国的过多冲突和战争（“它可以使两个国家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来获得完全可以由一系列书面条约实现的结果”）、帝国地理疆域过于辽阔（罗马帝国是一个例子）、独立权的丧失（葡萄牙依附于英格兰是一个例子）、过于野心勃勃和空洞的国家计划（就像卡尔七世（Carl Ⅻ）为瑞典制定的计划）、瓜分帝国的内战、两个统治者的权力分割、统治能力的减弱以及丧失对领地的统治权（比勒费尔德举出的例子是葡萄牙丧失了对巴西的统治权和热那亚丧失对科西嘉（Corsica）的统治权）等。

一个国家衰落的内部原因有20个：“邪恶的宪法”、缺乏能力的国王（un Souverain incensé）、削弱统治者（权力）的少数派、背叛统治者的大臣们、低下的执法能力、蔑视宗教、（宗教）狂热（fanatisme）、“过度的专制”、过多的自由、对于获利微薄但有益的产品的忽视（一个可怕的例子是，葡萄牙人从英格兰进口自己的制成品，而只会弹吉他或者涌入教堂、在圣像前祈祷）、无用的过于骄纵而不工作的贵族阶层（也参见Justi，1756）、不恰当的法律体系、国家人口减少（禁欲是原因之一）、殖民地变得过于强大（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就是这样的例子）、流行性疾病、酗酒、松懈的军队纪律、过高的债务、国家行政机关的内部斗争以及改变宪法的基本原则等。

按照比勒费尔德的观点，荷兰被这20条不同的衰落原因中的哪几条损害了呢？比勒费尔德在两个例子中提到了荷兰：他把过多的

自由（Liberté dégénere en libertinage）看作是导致1760年①“荷兰嗜眠症”的原因。比勒费尔德用“嗜眠症”一词来描述荷兰，这与170年之前博特罗用“凶暴和勇猛、对于外来权威和势力毫无敬意”来描述荷兰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陈述支持了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Kindleberger，1996）。同时，它与很早以前12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卡尔东（Ibn Kaldoun）的历史理论相类似在卡尔东的理论中，流动的沙漠部落入侵并占领一座城市，只会使之缓慢地走向衰落，接下来再被一个新的“勇敢的部落”所接管。在这些理论中加入18世纪对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看法——狩猎和采集、畜牧、农业和工业（Reinert，2000），我们可以将关于技术变迁和进步在世界范围的循环应用到关于一个特定地理区域的增长与衰落的循环理论上。

虽然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但伯恩哈德·曼德维尔（Bernhard Mandeville，1714/1806：109）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67）都预见到了亚当·斯密的“过高的税收水平是导致荷兰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观点。后来，麦克莱也预见到了同样的事情（McCullagh，1846，卷2：358）。研究西班牙的衰落的学者们指出，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对那些从事生产的人征收高额税赋，而那些消极的食利者们（rentiers）却可以免税。对于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67）而言，最糟糕的税收是对那些用于私人用途的个人产品征税（即，没有进入市场的产品），他举例说，“在荷兰，如果没有缴税，人们就不能宰杀自己养的猪或小牛”。

导致荷兰共和国衰落的因素很多，它们像候选人那样表现自己（发生作用），正如（它们）在荷兰共和国更加缓慢的崛起过程中所表现的那样，我们认为经济、政治和制度因素是共同发生作用并且相互加强的。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列出了一个导致荷兰共和国衰落的原因的长长的清单：“战争、外国的重商主义、外国人模仿荷兰人的技术、阿姆斯特丹失去欧洲贸易中心（而后是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法国大革命而无法回收在法国的贷款所造成的资本损失、法国索取的战争赔款”，这是所有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

① 原文如此，1760，疑为18世纪60年代（1760s）的笔误。——译者注

的清单上有："资金从贸易和制造业领域流入金融领域、高昂的消费税（即曼德维尔的论点）、（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各省对中央（政府）命令的抵制、行会的顽固、熟练工人的流失、（曼德维尔视为经济增长而非衰落原因的）过度消费、有缺陷的收入分配，还有很多"（Kindleberger，1996：103～104）。

像佛罗伦萨以及其他许多意大利城邦国家那样，荷兰共和国似乎没有能够成功地由"城市重商主义"转变为"国家重商主义"。在国家重商主义体系中，一个中央政府使服从它的城市受益，中央集权体系把重商主义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疆域。在长期中，同盟未能通过贸易和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建立起协同效应，但其对于后来却做到了，这似乎是业已发生的联盟（汉萨同盟）衰落的原因，（汉萨同盟衰落的程度）要比荷兰的情况严重得多（对比 Kindleberger，1996：83～84）。

正如英国都铎王朝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对羊毛征收高额出口关税而打击佛罗伦萨的制造业那样，荷兰共和国在应对那些由法国和英国、而后是德国所发起的经济挑战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我认为，由远程贸易、渔业和制造业三重因素累积产生的良性循环似乎也同样遭到了削弱。通过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这三种经济活动中那些产生高额利润的、相互增强的因素共同退化了，这些因素是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生成的，但（它们）以（与衰落相比）慢得多的速度，花费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建成了黄金时代。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同时丧失，整个历史似乎是依威尼斯伟大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Lane，1979：45～48）所称的"运用军事力量为经济（目的）服务所产生的报酬递增"而转移的。

注释

1　“从意大利至北海地区的航运使佛兰德斯（Flanders）地区成为商人们寄存货物的方便地点。（来自意大利的）榜样唤醒了佛兰德斯人（Flemish），使他们成为欧洲第二个制造业者。由佛兰德斯法庭授予其商人的特权激励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特权的取消也打击了他们的进取精神。其他国家从这一轻率行为中获益，通过 Anseatic（原文如此）同盟，英格兰、法国、荷兰和德国因此开始在以前仅为意大利人所拥有的制造业和财富中占据一席之地。”（Beccaria，1769/1970：32～33）。也参见 S. 赖纳特（Reinert，Sophus，2005）

2　有关对拉斯佩勒斯著作的讨论，请参见德雷克斯勒（Drechsler，2000）。

3　也参见孟德斯鸠（Montesquieu，1748）和赫希曼（Hirschman，1977）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4　在凡勃伦看来，“好的”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于生产；反之，“坏的”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于交易（vendibility）。有人认为这一观点证明了凡勃伦没有注意到金融对于创新的重要意义。

5　在荷兰共和国，对于渔业至关重要的食盐精炼也是重要的加工工业（或称 trafieken）之一（de Vries & van der Woude，1997），但是没有达到在早些时候的威尼斯那样的战略重要程度。

6　波托西（Potosi），位于现在的玻利维亚（Bolivia），海拔约 4 000 米，曾是世界上最富的银矿，是当时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7　这一分析结论来自于赖纳特和赖纳特的有关研究（2005 年即将出版）。

8　列文虎克是他邻居维梅尔的财产遗嘱执行人。

9　随着地图绘制技术从木刻变为铜版，（海军）装备的制造者也同样使用铜，荷兰人取代意大利人成为此类产品最大的制造商。

10　“在荷兰，征收这种税赋的代价是城镇消费的面包的货币价格增加了一倍”（Smith，1776/1976，Ⅰ：405）。

11　见 S. 赖纳特（2005 年即将出版）。范德尔维（Van der Wee，1988）对于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工业衰落的论述。

12　人们试图阻止制造业迁入荷兰共和国的贫困地区（de Vries & van der Woude，293，337）。然而，由于“较低的成本不能扩大市场（容量）”，所以有人认为这样做并不会使情况有很大的改善，因而这项政策只能够延缓工业化退化的进程（同上，337）。

13　埃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1931）和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1944）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陈述。

14　在赖纳特（Reinert，2000）的著作中讨论了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比切尔（Karl Bücher）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见本书最后一章——译者注）。

参考文献

Anonymous (1786). Relazione di una scorsa per varie provincie d'Europa del M. M.... a Madama G.. in Parigi. Pavia: Nella Stamperia del Monastero di S. Salvatore.

Ashley, William (1920).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Putnam, New York.

Bergius, Johann Heinrich Ludwig, editor (1767—1780), Policey-und Cameral-Magazin (1767—1774) & Neues Policey-und Cameral-Magazin (1775—1780), Leipzig, bey M. G. Weidmanns Erben und Reich.

Beckmannn, Johann, editor (1770—1806), Physikalisch-ökonomische Bibliothek worinn von den neusten Büchern, welche die Naturgeschichte, Naturlehre und die Land-und Stadtwirtschaft betreffen, zuverlässige und vollständige Nachrichten ertheilet werden, Göttingen, im Verlag der Wittwe Vandenhoeck und im Vandenhoek und Ruprechtschen Verlage, 23 volumes.

Berch, Anders (1747), Inledning til Almänna Hushålningen, innefattande Grunden til Politie, Oeconomie och Cameralwetenskaperna, Stockholm, Lars Salvius.

Bielfeld, Jakob Friedrich (1760),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The Hague, Pierre Gosse Junior. 2 volumes.

Botero, Giovanni (1590), Della Ragione di Stato. Libri Dieci, this work also contains Delle Cause della Grandezza delle Cittá, libri tre, Rome, Vicenzio Pellagalo. English translation 1706.

Botero, Giovanni (1596/1622), Relazioni Universali, Venice, Alessandro Vecchi.

Child, Josuah (1668). Brief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rade and Inter-

est of Money. London: Elizabeth Calvert and Henry Mortlock.

Child, Josuah (1681). 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East-India Trade.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onourable the East India Company.

Clément, Pierre (Editor), Lettres, Instructiones et Mémoires de Colbert,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Imprimerie Nationale, 1861—1872, 7 Vols. in 10 + 1 Volume 'Errata Général et Table Analytique.'

Drechsler, W. (2000) 'Etienne Laspeyres'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Netherlanders: A Law & Economics Classic?', in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0, no. 3 (November), pp. 235 ~ 242.

Dutot, Charles, Political Reflections upon the Finances and Commerce of France, London, A. Millar, 1739.

Ekelund, Robert B. and Robert D. Tollison (1981). Mercantilism as a rent-seeking society: economic 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College Station.

Fanfani, Amintore (1955), Storia delle dottrine economiche dall' antichità al XIX secolo. Milan, Giuseppe Principato.

Fernández Duran, Reyes (1999), Jerónimo de Uztáriz (1670—1732). Una Política Económica para Felipe V, Madrid, Minerva.

France, Edict (1581), Edict du Roi, contenant establissemét d' un Bureau de Douane en chascune ville de ce Royaume à la semblance de celuy qui est long temps y a estably à Paris, Paris, Federic Morel.

Gee, Joshua (1729),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Great Britain Consid-

ered, London, Bettesworth & Hitch. Goyeneche, Pedro Francisco (1717), Comercio de Holanda, o el gran thesoro historial y político del floreciente comercio, que los holandeses tienen en todos sus estados y señoríos del mundo. Qual es el modo de hazerle, su origen, sus grandes progresos, sus posesiones y gobierno en la Indias. Como se han hecho dueños absolutos de todo el Comercio de Europa, y cuales son las mercaderías convenientes para el trato Marítimo. De donde las sacan, y las considerables ganancias que en él hacen, 'traducido del francés', Madrid, Imprenta Real, por J. Rodríguez Escobar. Comments by Uztáriz.

Guicciardini, Ludovico (1567), Descrittione di tutti i Paesi Bassi, altrimenti detti Germania Inferiore, Antwerp, Silvio.

Hamilton, Earl (1932), 'Spanish Mercantilism before 1700', in Facts and Factors in Economic History, Articles by former Students of Edwin Francis Ga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4 ~ 239.

Hamilton, Earl (1935), 'The Mercantilism of Gerónimo de Uztáriz: A reexamination', in Himes, Norman (editor),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the Modern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T. N. Carv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 129.

Heckscher, Eli (1931), Merkantilismen. Ett led i den ekonomiska politikens historia, Stockholm, Norstedt.

Hirschmann, Albert O (197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cquet, Jean-Claude (1990), Il Sale e la Fortuna di Venezia, Rome, Jouvence.

Hörnigk, Philipp Wilhelm von (1684), Oesterreich über alles wann es nur will. Das ist: wohlmeinender Fürschlag Wie mittelt einer wohlbestellten Lands-Oeconomie die Kayserl. Erbland in kurzem über alle andere Staat von Europa zu erheben. Durch einen Liebhaber der Kayserl. Erbland Wolfahrt, no place, no publisher.

Huerta, Robert D (2003), Giants of Delft. Johannes Vermeer and the Natural Philosophers: The Parallel Search for Knowledge during the Age of Discovery,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Huet, Pierre Daniel (1722), A View of the Durch Trade in all the States, Empires, and Kingdoms of the World, London, C. King and J. Stagg. Second edtion, first edition 1717.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1712.

Hume, David (1767).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London, A. Millar, 1767. 6 volumes.

Justi,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1760), Die Natur und das Wesen der Staaten, als die Grundwissenschaft der Staatskunst, der Policey, und aller Regierungswissenschaften, desgleichen als die Quelle aller Gesetze, abgehandelt, Berlin, Johann Heinrich Rüdigers.

Kaplan, Steven L. (1976),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The Hague, Nijhoff.

Kindleberger, Charles (1996), World Economic Primacy 1500—19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indleberger, Charles (1999), Essays in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affemas, Barthélemy (1597), Reiglement (sic) general pour dresser

les manufactures en ce rayaume, et couper le cours des draps de soye, & autres merchandises qui perdent & ruynent l'Estat: qui est le vray moyen de remettre la France en sa splendeur, & de faire gaigner les pauvres..., Paris, Claude de Monstr'oil and Jean Richter.

Lane, Frederick (1973),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Lane, Frederick (1979), Profits from Power. Readings in protection-rent and violence-controlling enterpris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aspeyres, Etienne (1863/1961), Geschichte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Anschauungen der Niederländer und Ihrer Literatur zur Zeit der Republik, Nieuwkoop, de Graaf. (reprint)

Law, John (1705/1750),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Glasgow, R & A. Foulis (French, German and Dutch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s).

List, Friedrich (1841),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Stuttgart, Cotta.

Lowe, Adolph (1988), Has Freedom a Future?, New York, Praeger.

McCullagh, W. Torrens (1846),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Free Nations, Considered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ir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External Policy, Volume I, The Greeks, Volume II, The Dutch, London Chapman & Hall.

Magnusson, Lars ed. (1993), Mercantilist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1993.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1748), De l'esprit des loix, ou, du rapport que les loix doivent avoir avec la constitution de

chaque gouvernement, les moeurs, le climat, la religion, le commerce, & c. Genève: Chez Barrillot & fils.

Mun, Thomas (1664),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J. G. for T. Clark, London.

O'Brien, Patrick, Trevor Griffiths and Philip Hunt (1991), 'Political Componen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rliament and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1660—1774',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4, No. 3, pp. 359 ~ 423.

Perez, Carlota (2002),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erez, Carlota (2004),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Paradigm Shifts and Socio-institutional Change', in Reinert, Erik S. 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errotta, Cosimo (1994), 'Early Spanish Mercantilism: The First Analysis of Underdevelopment', in Magnusson (1993), 17 ~ 58.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inehart.

Reinert, Erik S. (1980),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conomic Mechanisms of Underdevelopment,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Reinert, Erik S. (1994), 'Catching-up from way behind-A Third World Perspective on First World History'. In Fagerberg, Jan et. al. (eds.)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Trade, and Growth, Aldershot, Edward Elgar.

Reinert, Erik S. (1996),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the creation of rich and poor nations: Underdevelopment in a Schumpeterian system',

in Aldcroft, Derek H. and Ross Catterall (editors), Rich Nations-Poor Nations. The long run perspective, Aldershot, Edward Elgar.

Reinert, Erik S. (1998), 'Raw Material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or, Why List (the Protectionist) and Cobden (the Free Trader) Both Agreed on Free Trade in Corn.', in Parry, G. (editor), Freedom and Trade. 1846—1996. London, Routledge.

Reinert, Erik S. (1999),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I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6, No. 4/5, 1999.

Reinert, Erik S. (2000), 'Karl Bücher and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Techno-Economic Change', in Backhaus, Jürgen, (Editor) Karl Bücher: Theory-History-Anthropology-Non-Market Economies, Marburg, Metropolis Verlag.

Reinert, Erik S. ed. (2004),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series 'New Horizons i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Reinert, Erik & Arno Daastøl (1997), '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Economic Innovations: The Religious Gestalt-switch and the Duty to Invent as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pp. 233 ~ 283.

Reinert, Erik S. & Sophus Reinert (2003), 'An Early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Case of Antonio Serra's 1613 Breve Trattato', i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stituzioni e Sviluppo Economico, Vol. 1, No. 3, 2003.

Reinert, Sophus (2005), 'The Italian Trad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Polici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Semi-Periphery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Jomo, K. S., Pionee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sterdam, SEPHIS.

Ruestow, Edward G. (1996), The Microscope in the Dutch Republic: The Shaping of Discov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lerni, Carlo (1782/1996). Riflessioni sull'economia della provincia d'Otranto. Lecce: Centro di Studi Salentini.

Seckendorff, Veit Ludwig von (1665), Additiones oder Zugaben und Erleuterungen zu dem Tractat des Teutschen Fürstenstaats, Frankfurt: Gotzen.

Seligman, E. R. A. (1920), Curiosities of Early Economic Literature. San Francisco: Privately Printed by John Henry Nash.

Schmoller, Gustav (1897/1967),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New York, Macmillan, Kelley (translated from articles in Schmoller's Jahrbuch).

Serra, Antonio (1613),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Oro e l'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 Naples, Lazzaro Scorriggio.

Smith, Adam (1776/19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ombart, Werner (1913a), Krieg und Kapitalismus, Munich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Sombart, Werner (1913b), Luxus und Kapitalismus. Munich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Sombart, Werner (1928),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Munich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6 volumes.

Steadman, Philip (2001), Vermeer's Camera, Oxford,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Steuart, James (1767),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which are particularly considered population, agriculture, trade, industry, money, coin, interest, circulation, banks, exchange, public credit, and taxes. London, A. Millar & T. Cadell. 2 Volumes.

Stolleis, Michael ed. (1995), Staatsdenker in der Frühen Neuzeit. Munich: Beck.

Uztáriz, Gerónimo de (1751),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erce and Maritime Affairs, London, Rivington & Croft.

Van der Wee, Herman, editor (1988),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rban Industries in Italy and in the Low Countrie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Vries, Jan de & Ad van der Woude (1997).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8), Det Moderne Verdenssystem, 2 vols., Oslo: Gyldendal.

Westbeck, Gustaf (1743), Tankeförsök om Särskilda Näringars Särskilda Idkande, Uppsala, n. p.

Zincke, Georg Heinrich, editor (1746—1767), Leipziger Sammlungen von Wirthschafftlichen Policey-, Cammer-und Finantz-Sachen, Erster (bis) Sechzehender Band (und) General-Register, Leipzig, 192 numbers in 17 volumes.

第十三章　竞争力及其思想先驱：五百年跨国比较的视角[1]

埃里克·S. 赖纳特

1. 竞争力——“公司行话”侵入经济理论

即使只是对管理科学和实务稍加浏览，你也会注意到大量新名词由产生、风行直至最终从管理行话中消失的一系列过程。《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参考文献 1，p. 10）建议使用“公司行话（corporate grafitti）”或“管理行话”来描述这些未加思考就被使用的新名词。这篇文章声称管理语言“不仅含糊、令人厌烦，而且充满了陈词滥调”。作为一个时髦的词，“管理行话”被用来概括一切时髦的词语。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使用者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公司行话”不仅对商业界很重要，而且对社会其他领域也很重要。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虽然其本人就是公司行话的一个创造者，但却警告经理人员不要在时髦的东西上分散太多的注意力，他反对纯粹话题式的管理（single-issue management）。幸运的是，大多数管理行话历经产生到消亡，也并没有在管理界留下多少痕迹。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竞争力”一词竟从管理理论跳到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来了。这难道意味着公共政策理论开始受管理理论中这些时髦词汇的支配么？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明显地持有这种看法。然而，尽管大多时候这些词汇存在着定义上的问题，但竞争力这个

---

① 原载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l. 6，1995，pp. 23～42. ——译者注

概念却似乎迎合了公众谈资的需要。对这一概念的需求是否反映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形势呢？我们是否需要竞争力这个词以适应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趋势（另一个行话）？或者，这一新词是否反映了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呢？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指出，尽管常被误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存在着定义上的问题，但使用正确的竞争力概念的确概括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该词反映了对于理解国家和全球财富分配很基础的重要议题的表面现象。虽然竞争力这一概念最近才开始出现，但在我看来它所反映的问题一直以来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在最近500年以来是这样，尽管它是在不同的标题之下出现的。我还要说明，竞争力——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根本性缺陷。这也可以解释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什么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如果说竞争力通常被认为是反映增长方面的惯用语的话，那么与其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挑选优胜者（picking winners）——则从根本上带有反面的含义。我将试图说明尽管以上两个词语可能都是新的概念，但是其内在含义和所基于的实践活动要比经济理论产生的时间还要古老——估计与国际贸易形成的时间长短差不多。我还将说明过时的挑选优胜者与当红的竞争力概念关系很密切。

在现在的经济政策制定的说法中，竞争力似乎是十全十美的——有理性的人很少会反对它。竞争力这一概念的反对力量看起来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群体对竞争力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石作用提出质疑。第二类群体对竞争力之类概念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第一类群体以“里斯本集团”为代表——19名科学家编辑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文献《竞争的极限》（参考文献2）。里斯本集团就一个行星长期由“竞争力主义”之类力量所控制的可信度提出了一些问题（参考文献3）。第二类群体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主，他们认为这一概念毫无意义。

竞争力一词在大西洋两岸都很火。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该词也开始出现。欧盟的整体战略似乎围绕着三个时髦的词：竞争力——表达不断创造财富的含义，和谐（cohesion）——被欧盟用来形容收入分配，以及基层化（subsidiarity）——民主维度，意味着决策尽可能地由等级体系的最低层次作出。竞争力一词在美国也很“时髦”。然而在美国，反对该词的使

用竟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盟。在局外人看来，克林顿政府似乎实现了几十年来非新古典经济学家首次加盟总统顾问行列。可以预见，新古典阵营与“后来者”之间将出现一定的摩擦。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的“高质量工作”与“低质量工作”概念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在其为美国经济学会1993年年会提交的一篇论文中，曾两次把罗伯特·里奇称为“流行的国际主义者”，并有点非学术性地谴责他的这位哈佛同事的“高价值部门”的概念是很愚蠢的（参考文献4）。在目睹两人之间如此严重的学术分歧的情况下，我们竟然发现克鲁格曼和里奇对“竞争力”的使用均持否定的态度——别人却似乎都很喜欢这个词。在对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参考文献5）一书的评论中，罗伯特·里奇提出了广泛的批评意见：“国家竞争力是少数几个极其含糊而且毫无意义的公众词汇之一。”（参考文献6）在上面提到的克鲁格曼的论文中，他断定在国际经济学中“学生们仍然应该主要学习休谟和李嘉图的有关思想”，并且“我们应该教育学生们在听到有人谈论‘竞争力’时学会回避，这将对我们的国家很有帮助”。“流行的国际主义者”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辩护者在反对竞争力这一概念的使用上前所未有地达成了共识。

1.1　作为国际经济学名词的竞争力

宏观经济意义上的竞争力在使用中常存在着被错误定义的问题。在微观领域中，该词的含义相当明确。一个标准的定义是：竞争力指一个企业参与竞争、成长以及在市场上获利的能力。然而在宏观层面上，这一概念却令人比较难以理解。波特（参考文献5，p. vii）指出，竞争力不存在一个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唯一有意义的概念是指国家生产率”（参考文献5，p. 6）。这不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因为——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绝对意义上的生产力水平与国家财富之间几乎不存在直接联系。一本名为《欧洲竞争力》（参考文献7，p. 1）的新书区分了该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一方面，竞争力是指相对效率（动态的或者静态的）；另一方面，它又指国际贸易相对绩效（市场份额、显示性比较优势）。这些定义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在1985年的《美国竞争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书中，布鲁斯·斯科特（Bruce Scott）提供了下面的定义：“国家竞争力指一个

国家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生产、分配产品和劳务的能力，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参考文献 8，p. 1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技术与经济”项目提供的定义如下：“（竞争力）可以定义为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一国为了在维持和增加国内实际收入的同时应对国外竞争的考验而提供产品和劳务能力的不同程度。”（参考文献 9，p. 237）

在本文中，我将采用斯科特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竞争力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国家竞争力仅存在于那些在微观意义上具有竞争力并且同时能够提高国家生活水平的活动中。在我看来，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只有在新古典要素价格均等化“法则”（参考文献 10，11）失效的条件下“竞争力”才能取得。在我看来，竞争力与生产率和效率之类的议题存在区别。尽管在缺乏效率的情况下很难具有竞争力，但这决不意味着一种国际贸易产品的最有效率的生产者能使该国具有竞争力——也即能够提高该国的生活水平。一些效率水平非常高的生产者和国家仍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也就是说，他们在某些产品的生产上颇具效率，但这些产品却不能在提高收入的意义上为他们带来竞争力的提高。举一个例子，海地在棒球制造上的生产效率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但他们平均每小时挣 30 美分。尽管海地的棒球生产在微观经济意义上颇具竞争力，然而棒球生产并没有使海地经济在宏观经济意义上的竞争力得到提高。尽管海地目前在棒球生产上的工艺水平（手工技艺）拥有绝对的效率水平和巨大的市场份额，但该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

我们可以观察到，较高的相对或绝对生产率水平并不会必然导致竞争力的提高。然而，生产率水平的快速变化却会导致竞争力的提高。竞争力背后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不完全竞争，也正是不完全竞争避免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出现。即使一个企业在微观经济意义上具有竞争力，这也并不意味着它所有的活动会为其所属的国家在收入提高的宏观经济意义上带来竞争力的提高。在“错误的”活动中具有最高效率水平——国家竞争力的反义词——会导致“发展的倒退”。

1.2　“竞争力”与新古典理论之间的冲突——或世界是如何以“错误的”方式变富的

为什么保罗·克鲁格曼这样一位著名的主流国际经济学家会要

求美国本科生避免提起竞争力一词呢？这个词似乎激发起了他内心某些异样的东西。为什么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心理反应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竞争力在未加批判而且存在定义问题的情况下频繁出现于公众言谈之中。然而，在我看来，还存在着更复杂的原因，即通过竞争力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这种思想——从事那些可以提高国家生活水平的活动而不是其他活动——直接违反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大厦的基石的一系列假设和信念，它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方式的模型相冲突。克鲁格曼对该词的强烈反应可能是由于竞争力的潜在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正好冲突的缘故。在完全信息、存在"代表性企业"①、不具有规模效应的世界中，也即满足新古典理论的经典假设条件下，竞争力一词肯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在克鲁格曼看来，"高价值部门"是一个愚蠢的概念，因为竞争力是由那些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所排除掉的因素所导致的，所以，该词看起来必定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在不完全信息和巨大的规模经济创造了累积因果、路径依赖的发展和锁定效应的世界中，高价值部门和竞争力却是鲜活地存在的。全球竞争的核心就在于规模经济。实际上，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标准假设条件下，你很难弄清企业究竟为什么会存在，而跨国企业就更不用提了。因此，尽管竞争力这个术语存在着含义模糊而且有点陈词滥调等问题，但就其核心思想而言，人们在直觉上的理解就对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秩序基础的经济学范式构成了挑战。

当今的标准经济理论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按照这种理论，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过去都是以错误的方式走上富裕之路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中，新创造出来的财富都是以价格降低的方式扩散的。在完全信息和不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任何其他的财富获取方式都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表现为工人人均资本增加的新技术使经济产出得到提高，并且——在标准假设条件下——这会以价格降低的方式在世界经济中扩散。亚当·斯密（Adam Smith）（参考文献 12，p. 269）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参考文献 13，pp. 46～47）都明确地指出：技术进步效应会导致价格降低。

然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一国可以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① "代表性企业"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为了便于均衡处理和数学形式化所作出的一个基本假设，它假定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译者注

致富。一种是由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机制：技术进步仅仅导致价格降低。而另一种方式则是绝大部分技术变迁的收益在总体上是以更高的利润、工资和纳税收入等方式在生产国内部进行分配的，但有关这种观点的讨论只局限于劳动经济学领域。我把第一种机制称为经济增长的古典分配模式，而第二种则称为共谋型分配模式。当第一种机制发挥作用时，技术变迁的全部收益都由商品的消费者所占有。而当第二种机制发挥作用时，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相当大部分收益则是由商品的生产者所占有。（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请见参考文献14）。只有当第二种体制发挥作用时，也就是存在着经济增长的共谋型扩散方式时，有关竞争力的讨论才有存在的空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竞争力可以被看作是由劳动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工业租金”在国家层面上所导致的结果。竞争战略的核心就在于选择那些高工业租金的产业，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要选择那些存在着经济增长共谋型扩散效应的产业。竞争力或收入提高效应在根本上就是通过占有工业租金的方式而获得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体系中，寻租活动被认为是一个贬义词。在一个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信息和巨大进入壁垒对所有重要产业起主导作用的世界中，动态寻租活动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一个完全信息、生产要素具有完全可分性以及不存在规模效应的产业中，微观经济意义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会导致国家贫穷而不论生产率水平的高低——正如海地的例子所表明的。高技术产业的保护主义是寻租活动的一部分，这种租金的存在以及国家对它的占有是竞争力的核心。“工业租金”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阻止要素价格均等化发生的那种机制的主要特点，而且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似乎总是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一趋势在欧盟内部被证实，当今超过60%的欧盟地区由于“欠发达”原因需要接受补贴。这种补贴数额的产生也伴随着国家经济财政巨大的再分配效应。对竞争力的寻求也使得因社会和谐而支付的基金必须日益增加。欧洲内部市场最初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不出意料的话，这将导致生产的集中——在数量上创造出更少的中心地区和更多的边缘地区，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对再分配的需求。

如果伴随着新技术的使用，新增财富，即使只是少部分，以较高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归生产国占有的话，那么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

逻辑基石似乎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任何时候技术进步在不同经济活动之间的分布都是很不平衡的，那么我们在实际中所看到的高技术保护主义这一逻辑结果就会产生。各个国家都会争先挑选优胜者，即那些在生产率和销售额方面有较大提高潜能的经济活动[1]，因为报酬递增和信息不充分会使“工业租金”变得突出。报酬递增等因素带来的动态“工业租金”收益也许会超过静态李嘉图式的贸易收益。另一方面，如果贸易双方同处于报酬递增状态的话，这又将为自由贸易提供更强有力的理由。然而我们很容易想象到，自由贸易通常并不是较好的选择。

作为主流经济理论的新发展，“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正朝着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方向努力，只不过是角度不同而已。身为“新贸易理论”之父，克鲁格曼本人使19世纪国家经济政策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即规模经济重获新生[2]（参考文献15）。在我看来，这些“新”学派的发现与“高价值部门”和“竞争力”概念是绝对一致的。假如克鲁格曼能够明白，正是规模经济、内生性技术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正的滞后效应在产业间分布不平衡导致了对竞争力和高价值部门的寻求的话，那么我想他会发现其实罗伯特·里奇的合理（reasoned）竞争力学派与“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所讨论的是同一问题。阻碍这两种理论趋同和互相理解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尽管规模经济作为决定世界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已经重获新生，但是迄今为止克鲁格曼和其他“新贸易理论家们”似乎仍在回避他们的理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他们的这种不情愿其实是容易理解的。“新贸易理论”结论的具体实现要求对世界贸易体系作一个全面的检查，以及痛苦地剖析一位美国作家所称的关贸总协定主义（GATTism）所存在的缺陷（参考文献16）。从第三世界以及目前的第二世界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等现状来看，进行这样的彻底检查还很紧迫。

2. 来自过去的行话——竞争力的历史对应名词

2.1　熊彼特分析框架中的竞争力

在当前统治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理论与其之前的理论——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依次构建工业强国所基于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一区别体现在青睐完全竞争还是不完全竞争。

在盎格鲁—撒克逊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完全竞争同时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假设和必要条件，这样就可以确保其承诺的实现，即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条件下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活动都是“类同”的，即从国家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同样出色地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这是由完全信息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关键假设条件以及一般均衡条件所得出的逻辑结果。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既定目标与完全竞争的目标完全一致。盎格鲁—撒克逊范式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而与此相对应的熊彼特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却是基于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为德国历史学派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理论之间提供了沟通的桥梁。对于不了解德国历史学派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世界来说，熊彼特被看作是极其具有原创性的。今天，作为经济政策制定基础的熊彼特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正日益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为了更好地理解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所实施的“技术与经济项目”（TEP）是熊彼特经济学在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个突破。在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创新浪潮在不同时间段中冲击不同的产业，这就造成了产业之间差异巨大的企业家利润。具有较高企业家利润的产业也将是那些可以提供竞争力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企业家利润通过共谋模式和涓滴效应在生产国内部得以扩散。照此方式，合理运用的竞争力概念就与熊彼特的理论体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过去，对于致力于建设帝国的经济范式来说，经济发展被看作是“活动特定的”，即一些经济活动会带来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则不会。（参考文献 14）在这一体系中，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济发展就是由那些提供动态不完全竞争的经济活动来推动的。推动经济增长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在历史上某一时期一般主要围绕着极少数特定的活动而展开，例如石器时代的石头器具制造活动以及青铜器时代的青铜器生产活动等。自 16 世纪以来，经济理论的潜在或明显的假设是，如果一个国家从事那些正经历技术变迁的活动的话，那么技术进步的收益就不会全部地由国外的购买者所占有，而是大部分以利润或较高真实工资的形式归生产国国内的生产者占有，这也将导致该国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逻辑在下面这些理论中表现得很明显，它们分别是英国和法国的非货币导向的重商主义、德国官房主义的潜在思想体系和始于 19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体系”以及德国

历史学派。在卡尔多意义（Kaldorian sense）上，目前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在其增长阶段中的发展经济学都是“非均衡经济学”，即一个由不断变动的非均衡创造的技术变迁集群所推动的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大多是以潜在的形式，经济政策的目的——大多是潜在的——是为了寻求动态不完全竞争。在这一点上，竞争力之类的各种不同的概念或新名词也就应运而生。我们将在本节的后半部分分别讨论英国、美国、德国以及日本的经历。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史几乎都不是自由贸易或完全竞争市场的历史。尽管以较高运输成本表现出来的自然保护因素一直以来都在贸易中起着天然屏障的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关税和进出口限制在历史上曾是最常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关税显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它们同时还是更为广泛的经济政策工具。

对于过去几个世纪的经济政策来说，“战略”一词可能是一个过于夸张的概念，但是几百年以来这些国家正是靠着这些信念和思想使他们的国民福利得到了改善。正是基于这些信念，对市场运行进行严厉干预的经济政策得到了实施。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贸易的思想体系被视作全球经济福利的重要促进机制，在此之前其他概念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尽管与现在的竞争力概念类似，这些政策经常存在着表达上含糊不清的问题，然而它们的目标往往是比较明确的。我们对这些过去的政策的理解往往基于一些条条框框，几百年来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通常被归结为“重商主义”一词，而且大多带有贬义的意味。不幸的是，像亚当·斯密一样，我们往往只讨论重商主义和其他前古典（pre-classical）经济学流派经济思想的货币方面。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在西方国家似乎已经失去了市场，保留下来的课程内容往往是新古典经济思想的历史，但在日本却不是这样。那些对过去政策的制定其实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往往不为我们这些仅探寻新古典思想脉络的现代人所知。下面我们将讨论在几个最成功的大国中前古典以及后来的“反古典（anti-classical）”经济思想的非货币方面曾发挥的重要作用。

2.2　英国与“好的”和“坏的”贸易理论

在将近15世纪末期的时候，英国还是一个身负意大利银行家的巨额债务的穷国。英国的主要产品是羊毛。在相当短的时期内，英国从一个欧洲边缘穷国一跃成为100年前的我们今天所称的超级大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变成一个日不落帝国。英国的竞争力得到

大幅提升——生产和出口得到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尽管发展并不平衡。

这种发展并不是宏观经济上“自由放任”所导致的结果。它似乎是基于与今天的政策非常不同的一种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洞察力，我大胆地把它称作一个战略。经济增长被视为具有“活动特定性”，即经济增长只发生在一些特定的活动中。这是一个由“好的”活动所推动的国民财富提高的世界，而不是经济增长体现在百分点提高方面的抽象的“经济”世界。在一个不那么复杂的环境中——没有今天这样迎面而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我发现这种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与其他活动相比，一些活动中的商人和工人要更富有，并且前李嘉图式的常识似乎已经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即如果律师比莴苣采摘者挣的钱更多的话，那么律师的国家将会比莴苣采摘者的国家更富裕。国民财富增加意义上的竞争力与积极从事“好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出口某些商品的活动是“好的贸易”，这个词使我们联想起罗伯特·里奇的“高质量工作”概念。经济中包含了各种潜在不同的活动——好的活动和糟糕的活动等，而实际经济也远不是以“代表性企业”为主体的黑匣子。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已经很好地观察到了英国战略的核心，他指出：“几个世纪以来，‘购买原材料，售出制成品’的原则一直就是对全部理论的替代。”（参考文献17）制造业被认为能够带来竞争力的提高，而原材料则相反。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你却很难否认这一战略的实施结果——工业革命。在借鉴现代创新理论的情况下，我们来看看英国人对制造业与“好的”和“坏的”贸易的概念是多么崇拜，你也许就能理解这一战略了。工业革命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紧随羊毛纺织业之后，越来越多的生产过程依次实现了机械化，日益增多的差异产品就出现了。从手工业向制造业的转变过程中，英国似乎不断地发展着许多新工业。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实现了比晚起步的竞争者更快地沿着学习曲线下降，同时获取了重要的规模经济和干中学效应所带来的好处，并在其国外竞争者面前构筑起了很高的进入壁垒。通过在工业时代早期集中发展工业，英国构建起一个无与伦比的国家创新体系（参考文献18，19）。因此，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系列活动组合在英国不同地区的集聚就形成了“增长极”或者马歇尔的工业区。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通常被视为权威的英国史学者，他在1728年的《英国商业的计划》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英国起飞起源的描述。根据他的描述，都铎王朝（the Tudors）——尤其是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一世——被认为是对英国的崛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笛福描述了1485年上台的亨利七世是如何在（法国）勃艮第（Burgundy）度过其童年时代的。在那里，亨利七世观察到的富裕状况与后来他在英国所看到的贫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位王子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勃艮第的财富整体上依靠从英国进口的原材料：羊毛和漂白土（Fuller's earth）[3]。在他登上英国的王位后，亨利采用了前李嘉图式的逻辑，这一思想似乎在后来几个世纪中不仅主导着英国的发展而且也主导着欧洲大陆的发展——羊毛制品制造者都很富裕而原材料生产者却很贫穷。因此，为了使国家富裕并且得到发展，我们必须促进羊毛制品的生产。出售制成品是“好的”贸易，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就是：这将使我们更具竞争力。在始于1489年的英国的羊毛纺织品生产推动过程中运用的方法后来成为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这一方法主要包括：国王暗地里招来大批极其熟练的外国制造业技师，让他们在发展初期指导自己的国民进行生产；对企业家进行奖励，提高纺织品的进口关税并大幅度提高羊毛原材料的出口关税；最终在英国的生产能力达到相当充足的水平之后，羊毛原材料的出口则被禁止。

“好的”和“坏的”贸易理论在18世纪很可能就已经发展成熟了。查尔斯·金（Charles King）1721年的三卷本著作《英国商人或受保护的商业》（参考文献21）在18世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金分别就那些可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好的”和“坏的”贸易列出了详尽的条目。该条目很长而且很详尽，但其中的一个基本信息就是：出售制成品属于“好的”贸易而进口制成品则是“坏的”贸易。出售原材料即大宗货物而进口制成品是“坏的”贸易。（参考文献21，第一卷，pp. 1～14）“坏的”贸易类似于今天波士顿咨询集团和迈克尔·波特所谓的“零散型产业”（“dog” industries），即以分散的市场份额和增长停滞为特征的处于完全竞争行业的活动。在这方面，马克思、熊彼特和波特达成了“完全竞争不会带来财富增加”的共识。

有意思的是，在查尔斯·金的方案中，制成品之间的交换被认为是对贸易国双方都有好处的一种特殊情况。查尔斯·金的建议广

泛地适用于报酬递减条件下生产大批量商品和报酬递增条件下生产制成品的世界中。最近10年以来，“新贸易理论”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在没有提及该政策的情况下，重新确认了这种旧的“非科学的”而且是“依靠直觉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名叫安东尼奥·舍拉（Antonio Serra）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已经在1613年发现了作为威尼斯财富的重要源泉的报酬递增的存在。（参考文献22，14）

英国对制造业的强调不仅仅包括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其他国家的制造业的发展也很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战略涉及阻止殖民地工业的萌芽，这只能是在不会导致比较严重的政治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为促进英国的重大利益而积极地毁灭外国制造业的发展也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始于1699年的对爱尔兰兴盛的羊毛纺织业的遏止以及19世纪初期孟加拉纺织业的毁灭都是这个战略在这一方面尤其典型的例子，这两个例子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爱尔兰羊毛纺织业和印度棉纺织业铲除掉会使英国工业更具竞争力。另外，曾由威尼斯人借助死刑的威胁实施过的禁止技术工人外流的措施以及直到19世纪30年代为止的禁止机器从英国向外国出口等手段，也都是该目的得以实现的方式。

可以说英国促进经济增长的这些政策确实为其创造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在创新得以实现、制造活动先后机械化的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就是对那些处于机械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者给予补贴，并且提高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我们在关税清单中还发现了对高技术的“偏重”（bias）现象，甚至在今天还是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传统玩具相比，由现代合成材料制成的德国玩具要被征收更高的关税。类似的情况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也很常见，不过这种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今天欧盟的对外关税政策依然保持着英国重商主义的基本特点，即原材料的进口免关税而制成品则常常不是如此。作为原料的鱼类可以不缴关税而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然而一旦经过腌制或熏烤等加工过程后这些商品就要被征收关税。

2.3　“美国体系”——生产能力与竞争力

在美国早期经济政策仍处于形成阶段的时候，英国政策就已经从以前的战略开始发生转变。根据其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来

判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显然已经读过亚当·斯密的作品并且熟悉自由贸易思想，但是他最终反而支持采用英国以前的战略，即应该鼓励制造业的发展。与其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相比，汉密尔顿明显地受英国重商主义者马拉奇·波斯托思韦斯（Malachy Postlethwaith）的影响更大些。尽管汉密尔顿比较倾向于对制造业实施保护，但是作为一个持续的“美国体系”的关税保护直到1819年才开始启动。看起来，美国在1812年战争的封锁期间与欧洲断绝贸易往来而受到的“非自愿保护”鼓励制造业活动积聚了足够的政治压力，启动了关税保护。这种“非自愿保护”与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相类似。

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美国制造业体系”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参考文献23）关税不是对幼稚产业的偶然性的临时援助手段，而是这一体系中持久的一部分。雷蒙德对“生产能力（productive capacity）”概念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生产能力似乎曾经是当时的一个流行的名词，与同期在德国使用的“国家生产力（national productive power）”概念相类似。一些活动比其他活动能够带来更多的“生产能力”或“生产力”——与竞争力相类似，“生产能力”并非在所有活动中都是同等程度地存在的。雷蒙德尤其抱怨道，“在《国富论》中，农业、商业和制造业被全部混杂在一起”（参考文献23，p. 132）。与舍拉1613年的著作一样，雷蒙德的意思是说，不同的自然规则适于不同的活动。

雷蒙德指出，英国并不是靠亚当·斯密的方案致富的，而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别的国家来遵循这一方案。“正是亚当·斯密所摒弃但却为英国所采用的那些政策才是导致英国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强大的原因”（参考文献23，p. 136）。“这就很好地揭示了他们的目的，即鼓吹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作用，好让别的国家上当，而他们自己是绝不会被自己所欺骗的。”（参考文献23，p. 134）

作为对关税会提高价格这一论点的回应，雷蒙德指出，对于一个作为整体的国家来说这算不了什么。高价格和可观的利润会刺激投资并且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些远超过价格差异带来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作为18世纪推理方式的组成部分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实施保护的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利润和工资的方式抵消制成品关税所导致的价格上升。在循环流转的推理中，人的两种经

济角色即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不同作用被互相比较。如果作为征收关税的结果，挣工资的一方所得到的好处远超过消费者一方因商品保护导致支出增加所带来的损失，那么对他来说关税的净效应就是正的。如果不完全竞争、外部性或规模效应等所导致的技术变迁以共谋模式扩散的话，这一论断就是正确的。一般说来，融入了新古典理论标准假设的当代经济理论只关注个人作为消费者一方的利益，然而，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消费者的身份才能等同于工资获取者。

在美国，有关制造业保护的文献浩如烟海。马修（Matthew）和亨利·凯里（Henry Carey）等许多经济学家都值得被提起。其中，约翰·雷（John Rae）是最早强调创新与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曾经作为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后来把“美国体系”成功地介绍到德国。争论的结果导致了19世纪美国和欧洲关税水平的大幅波动。关税水平的这种缺乏连贯性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缺陷，然而李斯特却反而推崇这项战略。关税水平的调整将使本国制造业生产者有足够的动力和持续的压力去改进其产品和生产方式。可以说，这一个体系确保了过程和产品创新的持续性。李斯特的这一看法使我们联想到波特对竞争和顾客需求的强调。

关税和保护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临时手段——包括李斯特在身居美国期间以及后来——他们认为，实施这一手段的目的就在于追赶并最终超过英国。多夫曼（Joseph Dorfman）部分地引用了李斯特的原话并运用自己的语言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看法：

> “……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美国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公开宣扬真正的世界主义原则。这将是当美国人口上亿[4]而且海上到处都有美国船只的时候；此时美国的工业已经臻于完善，纽约和费城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和制造业城市；此时地球上再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美国这颗巨星抗衡，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在包括陆地和海洋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公开地宣扬自由贸易。”（参考文献24，p.581）

在这段预言式的陈述中，英国式的发展战略得以重现。如果美国有足够的勇气去实施英国原来采用的、而不是其当时宣扬的战略的话，那么美国最终当然会超过旧的霸主——英国。

2.4　德国：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与“国家生产力”

在英国，较早地以经济学为职业的是商人，但在德国，经济学

家队伍却来自于公共部门。德国官房主义者——重商主义者的对应词——通常被雇佣来管理国家财政，这也是官房主义者这个名称的由来。

德国官房主义的文献虽然很多，但却大多不为德国以外的人们所熟悉。与英国重商主义类似，官房主义者对保护制造业很推崇。与孟（Mun）和柴尔德（Child）的著作同期，费利普·霍尼克初版于1684年的著作《奥地利高于个人，只要她有此意》（"Österreich über alles wann es nur will"）是一本主张对制造业实施保护的早期著作。这本书共有16个版本，比孟和柴尔德的著作的版本更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英国不同，德国由许多州组成而其中一些州的规模很小。截至19世纪初期，德国包括约32个州，各州之间都实施针对对方的高度保护。

我们发现，17世纪以来大量英文经济学著作被翻译成包括德语在内的许多种其他语言，而德文著作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却很少。这就意味着德国经济学家有机会广泛地接触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且对其作出评论，但是反过来却不是这样。1850年以前，《国富论》共有7个德文版本；然而，尽管该书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但斯密对德国贸易和制造业政策的影响却和在美国一样也非常有限。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德国经济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在普鲁士官僚阶层的领导下德国最终实现了统一。李斯特原来是亚当·斯密、萨伊（J. B. Say）等人的学说的鼓吹者，他不仅见证了令其羡慕的拿破仑"大陆体系"和"美国制造业体系"，还亲眼目睹了拿破仑倒台后自由贸易对法国的毁灭效应。（关于自由贸易的"除草剂效应"，请见参考文献14）对李斯特来说，斯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他看来主要是英国经济学家未能正确地区分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的经济学，而一国需要建立一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与英国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照，宏观经济学在当今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仍然被称为国民经济学。

李斯特用"国家生产力"的概念来概括竞争力，这一概念起源于德国经济学家亚当·缪勒（Adam Müller）的著作（参考文献25）。李斯特认为国家必须构建生产力，并且举例说明了制造业是如何创造出这种力量而农业却未能如此，但是他却没有从根本上解

释其原因。用今天的流行语言来说就是，李斯特清楚地说明了制造业很重要却未能解释其原因。根据李斯特的观点，为了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德国必须废除内部关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关税体系。李斯特在德国因此被认为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他却被视作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李斯特主张在较大的地理范围内部实施自由贸易，这也反映了其本人对制造业规模重要性的认识。为了创建国家生产力，李斯特强调修筑铁路的重要性，其中他所运用的逻辑与现在美国支持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观点相当一致。因此，李斯特在德国被视为“国家铁路体系之父”。

事实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一直维持着一种“对立的关系”。然而其中也有一些例外，如李斯特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和一批美国经济学教师赴德留学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5　日本：德国经济学两次击败英国经济学

日本经济政策史上有两个转折点，它们分别发生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时期和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这两个时期的经济战略选择对日本后来的命运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日本都面临着在经济思想的两个学派——英国学派和德国学派——的建议中间作出战略选择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种情况下德国学派的思想都取得了胜利。在第一个时期中，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影响力最大，而在第二个时期中则要数奥地利人约瑟夫·熊彼特。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主义主张在日本同样也遭到了批评。英国的经济学家们试图探寻与物理科学中类似的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经济法则，而德国历史学派却承认社会经济科学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定性。李斯特的著作的日文版翻译者大岛贞益（Oshima Sadamasu）当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 “如果所有的苹果可以掉到英国的土地上，那么我们能够想象这些苹果同样也可以落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就政治、法律和经济情况而言，适于英国的情况未必对法国就适合，因为国家有发展时间长短以及强弱之分，而且它们的位置、气候、风俗习惯和商业规矩等特点也都密切地与之相关……”（引自参考文献26）

在1890年日本国家经济学会的成立宣言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

有关构建“国家生产力”的重要性的阐述，这再次使我们联想起德国和美国的战略。大岛贞益明白李嘉图贸易理论的引申含义，即“农业国必须坚持从事农业生产而工业国则应该进行工业制造活动”（参考文献26，p. 61）。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没有哪个农业国不在竭尽全力地构建起其国家“生产力”，而国家的生产力归根结底被认为与民族独立是密不可分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鼓励制造业的发展。

55年之后，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再次进入一个围绕未来经济战略的制定而激烈争论的时期。日本银行的官员们也都主张要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建议，他们认为日本应该发展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业以发挥其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竞争优势。相反，深谙熊彼特理论的通产省官员们则主张日本应该发展高技术工业。然而，凭借其以不完全竞争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核心模型，最终还是德国经济理论取得了胜利。熊彼特经济学和竞争力均围绕着不完全竞争这一中心。在由竞争力所推动的增长过程中不完全竞争要素具有潜在性的特点，而在熊彼特经济学中这一要素的作用则是很明显的。

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对熊彼特的思想如此信奉。熊彼特的第一部著作——1908年的《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参考文献27）——共出现了3个日文版本，其中第一版出现于1936年。除了日文版之外，另外一个外文版本是新近的意大利版，而该书迄今为止还没有英文版的出现。当20世纪30年代初熊彼特在欧洲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时，他就接到了来自日本的工作邀请。正当熊彼特准备起身远赴日本之时，他却接到并最终接受了波恩大学的另一份工作邀请。但熊彼特一直以来就对来自于日本的工作邀请念念不忘。目前熊彼特的个人图书馆就设在位于东京的一桥大学即前东京商业学校校内，而前东京商业学校则是上世纪末（即19世纪末）仿照维也纳世界贸易高等学院（Hochschule für Welthandel）建成的。因而，今天德国经济理论对日本的两次影响都会合于了熊彼特图书馆。

2.6　竞争力潜力的衡量——经济活动质量指数

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以制造业为首要基础构筑它们的竞争力。在过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制造业所实施的各种形式的保护和援助活动，一个能够确保本国占有工业租金的“国家创新体系”最终得以确立。当然，根本不存在可以使制造业本身具

有较高价值的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支撑作用的动态不完全竞争因素在历史上更多地出现于制造业而不是其他经济活动之中。今天，许多制造业部门未能构建起竞争力，而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如工程和银行部门等却能够带来竞争力的提高，一些农产品亦是如此，美国的大米看起来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历史上，那些具有优势的经济活动，即能够带来“国家生产力”、“生产能力”或竞争力提高的经济活动绝大多数都源于制造业。

基于其核心假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类似”的，而且“代表性企业”主导着这个世界。在单个企业家看来，他自己的企业都是独一无二的，至少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就是如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努力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即经济活动要么“都一样”，要么“都独具特色”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的抽象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根据经济活动的特点对其进行分组。本套书上卷第一章第六节中的“经济活动的‘质量指数’”（图 1 - 3）是为了达到此目的而进行的一项探索。“质量指数”根据提供竞争力的能力对经济活动进行排序，其中竞争力是指在开放经济中保持微观经济竞争力的同时这些活动提高一国生活水平的能力。经济活动的质量指数得分越高，这项活动提高国家生活水平的能力也就越强。用罗伯特·里奇的话来说就是，质量指数把各种工作从底端的“低质量”到顶端的“高质量”进行了排序。

当今的经济理论对完全竞争条件下经济系统的运行作了很好的描述，当然关于完全垄断行为也有相当不错的理论。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情况几乎都不存在。尽管不同程度的寡占行为明显地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经济理论对它的讨论几乎没有多少意义。在我看来，这就类似于我们已经很好地定义了两种极端的颜色即黑色和白色，但却没有办法定义中间颜色——不同程度的灰色。大多数经济活动均处于各种不同程度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用我的类比就是灰色的不同程度。质量指数试图定义灰色的不同色调，即提高国家生活水平能力的不同程度。罗伯特·里奇的高质量工作聚集在表的顶端部分。迈克尔·波特的分散产业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组合（portofolio）概念则出现在底端。低质量区域以汤姆·麦克劳（Tom McCraw）所称的外围企业（peripheral firms）为主，其特点是“劳动密集、管理薄弱和缺乏规模经济效应等”（参考文献 28，p. 73）。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分值较低的产业往往是重要的就

业创造型产业，而分值高的产业则属财富创造型产业。关于质量指数更深入的讨论，请见参考文献 14。

我们应该把这一体系想象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其中新活动通过新技术或其他创新方式进入表的顶端部分。然后由于各种引力的作用，这些创新活动以各种不同速度向完全竞争状态下滑。引力也取决于纯粹的静态效应，诸如静态规模经济；即使是在新技术未出现的情况下，这种静态效应也可能使一种活动“维持在”一个较高的质量水平。例如，美国制鞋业从 1850 年至 1900 年经历了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升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每双中号贴边的牛津鞋所耗费的人均时间从 1850 年的 15.5 小时降至 1900 年的 1.7 小时（参考文献 29，p. 271）。这一时期，制鞋业的质量指数得分相当高。由于陡峭的学习曲线的作用，制鞋业为美国经济带来了竞争力，即真实工资大幅提高而国家依然富于竞争能力。以劳动时间衡量的国家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这体现在相同时间的较少的本土劳动可以换取更多的海外劳动这一方面。后来，制鞋业的质量指数分值大幅度降低。从 1900 年至 1923 年，平均每双鞋需要耗费的劳动时间仅从 1.7 小时减少到 1.1 小时，而 1923 年到 1936 年则是从 1.1 小时降至 0.9 小时。与 1850 年至 1900 年间相比，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显然很缓慢。即使在 1900 年以后作为大路货的鞋（the commodity shoes）的生产逐渐不再是高质量活动，今天的制鞋业中仍然存在着高质量的缝隙（niches）市场。制鞋业中的高质量缝隙活动是以风格、款式、品牌、设计或一些类似于高尔夫鞋和滑雪靴的创新为基础的。然而，“作为大路货的鞋”的生产作为低质量活动目前已经转移到相对贫穷的国家。当然这一分析与弗农（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存在许多共同之处。

质量指数代表了衡量经济活动的不完全竞争差异程度以及概括这些差异的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一种尝试。同时质量指数侧重于反映那些导致竞争力存在的因素和机制，这些因素使得一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国家的生活水平，而这与主流经济理论的预见则恰恰相反。简单说来，质量指数衡量不完全竞争的程度，即一国创造并短期占有“工业租金”的不同程度。

3. 结论——竞争力代表着对动态不完全竞争的追求

竞争力争论的根源出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一方面，斯密的完美典范是农业，因为只有在农业中他才看到了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状态。但在另一方面，他注意到当时制造业中较快的技术进步，并且他估计这一现象产生的可能原因在于“农业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中的分散性特点使其不可能实现如此完整庞大的分工”（参考文献 12，p. 10）。不幸的是，斯密未能认识到分工潜力的不同所具有的组织和分配的意义。劳动分工是导致规模经济、进入壁垒、不完全竞争以及作为结果的经济活动“质量”差异的关键因素。高水平的“劳动分工”导致不完全竞争的产生，而不完全竞争正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竞争力这个术语的基础。

与盎格鲁—撒克逊主流经济学不同，德国经济学通常承认经济活动的不同。因为与其他活动相比，一些活动可以带来更高的“国家生产力”或“竞争力”，所以 19 世纪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们都发现需要用“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来替代冠以“世界主义经济理论”名号的英国体系。这一区别的潜在逻辑与现在流行的竞争力的潜在逻辑相同，即对不完全竞争活动的追求——这种活动只存在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中，以共谋的方式（不仅是以价格降低的方式）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在一个经济活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世界中，对竞争力的追求是一个优化选择过程。

自英国以来，所有目前的工业化国家在它们的增长过程中均曾伴随着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战略，而不完全竞争活动被挑选出来加以保护正是其主要的特征。这些能够导致“国家生产力”、“生产能力”或我们今天所谓能够提高“竞争力”的“好的”活动所带来的财富能够通过涓滴效应扩散到国家的其余部分。成功的殖民地也实施了相同的战略，这也常常与母国的官方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了保持宗主国在贸易关系中较强的竞争力，所有这些国家都力图阻止殖民地制造业的发展。19 世纪，在所有“高质量活动”中均居于主导地位的英国逐渐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一位新西兰殖民地的居民在其 1897 年的著作中曾提到：“如果不抛弃一切主张与外部世界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并对任何殖民地有能力提供足够产量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话，那么英国殖民者就很少能够真正地控制住局面。它甚至要对那些运往宗主国的产品都要征税。英

国殖民者相信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的新土地才能获得……繁荣……正如其目的所意味的，在不受限制地面对巨额资本（great capital）竞争的情况下，殖民地的繁荣是不可能实现的……”（参考文献 30，pp. 41～42）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许多国家往往都是通过采取对制造业实施保护的办法来获取竞争力，即从事那些高质量的活动。到那时为止自由贸易理论在经济学圈中的成功仍然与其在商业界和政界的状况不相符。在实施有管理的自由贸易的当今世界中，其目的仍然相同，只不过是手段更加微妙而已，至少在欧洲、日本和美国这三者中间情况是如此。然而工业化国家通常存在既能保护高质量活动又能保护低质量活动尤其是农业和渔业的机制，不过两者所基于的原因恰恰相反。以竞争力即通过不完全竞争提高国民收入为名义，欧盟实施了对空中客车项目的支持计划。由于农民从事着接近于完全竞争的活动，而不像他们的制造业同胞那样受到“工业租金”的保护，因而欧盟又打着团结（收入分配）的旗号支持农民。我以前曾把这一行为称为“积极”的又带有“防御性”的保护主义，其特点在于表面上属同一类型的经济政策而实际实施原因却是由于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政治压力的结果。（参考文献 31）

尽管竞争力是一个相当新的词汇，但是对于长久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挑选优胜者”活动来说，它根本不过是一个新的表达方式而已，而“挑选优胜者”是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的英国对不完全竞争的寻求活动。甚至在更早的世纪，威尼斯共和国也曾实施过具有相同特点的关税政策和其他经济措施。迄今为止，常用的提高经济活动质量指数的基本方法还是关税手段。然而，一旦这些国家通过高质量经济活动取得竞争力之后，他们就会明智地转向自由贸易。正如查尔斯·金在 1721 年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当高质量活动的产品与其他相同质量指数活动的产品相交换时，自由贸易明显地对双方都会有利。

质量指数试图阐明为什么制造业会如此地重要。经济发展的整体过程可以概括为一个经济活动的质量指数逐步提高的过程，其间伴随着对动态不完全竞争和“租金”的寻求活动。类似的看法散见于迈克尔·波特、卡尔·马克思和约瑟夫·熊彼特等人的各种理论中。近年来，我们目睹了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导向型生产活动使它们的经济活动质量指数得到快速提高并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的这一过程——韩国和中国台湾就是其中的例子。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电子工业，这些亚洲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地位得到了提升。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东欧集团（Eastern block）目前严峻的工业化退化形势以及相当数量的第三世界国家贫困问题日益加剧的问题的话，那么竞争力这一历史战略的潜在政策含义又究竟是什么呢？东南亚地区成功的出口导向型高增长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仅占第三世界国家总人口的约2%。亿万的其余98%的第三世界人口是否也可以通过向工业化国家出口电子类产品或其他高科技产品的方式来使他们的经济活动质量指数得到提升，这似乎是令人怀疑的。目前工业化国家历史上的发展战略，即它们提升质量指数和获取国家生产力或竞争力的方式，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战略显然同样也值得研究。

注释

1 假定凡登定律（Verdorn's law）通常都发挥作用。

2 尽管克鲁格曼似乎没有认识到其更早时候的重要性。关于该词的渊源他仅追溯到1924年的一篇论文。

3 一种用于布料清洗的硅酸盐。

4 美国人口在1915年前后突破一亿大关。

参考文献

'Time to walk the Talk',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4, 1994, p. 10.

The Group of Lisbon, Limits to Competition, Lisbon, Gulbenkian Foundation, 1993.

Petrella, Riccardo, 'L'evangile de la competitivite', Le Monde Diplomatique, Paris, September, 1991.

Krugman, Paul, 'What do Undergrads need to know about Tra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93, pp. 23 ~ 26.

Porter, Michael,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0.

Reich, Robert, 'But Now we're Global',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ugust 31—September 6, 1990.

Hughes, Kirsty S. (editor),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Scott, Bruce and George Lodge (editors), US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World Econom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5.

OECD, TEP - The Technology/Economy Programme,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The Key Relationships, Paris, OECD, 1992.

Samuelson, Paul 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Economic Journal, Vol. 58, June 1948.

Samuelson, Paul A., 'International Factor - 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 Economic Journal, Vol. 59, June 1949.

Smith, Adam, Wealth of Nations (177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Ricardo, David, Principles (1817), London, Dent, 1973.

Reinert, Erik, 'Catching - up from way behind - A Third World Perspective on First World History', in Fagerberg, Jan et. al. (editors) Catching -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On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Trade, and Growth, London, Edward Elgar, forthcoming 1994.

Krugman, Paul,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Prestowitz, Clyde V., Jr., et. al. 'The last Gasp of GATTis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1991.

List, Friedrich,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41), Basel, Kyklos, 1959.

Lundvall, Bengt - Åke (editor),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London, Pinter, 1992.

Nelson, Richard (edito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Defoe, Daniel, A Plan of English Commerce, London, C. Rivington, 1728.

King, Charles, The British Merchant; or, Commerce Preserved, London, John Darby, 1721. 3 Volumes.

Serra, Antonio,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i Regni d'Oro e 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 Con Appliczione al Regno

di Napoli, Naples, Lazzaro Scorriggio, 1613.

Raymond, Daniel, Thoughts on Political Economy, Baltimore, Fielding Lucas Jr., 1820.

Dorfman, Joseph,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sation, Vol. 1, London, Harrap & Co., 1947.

Müller, Adam,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Vol. 5, Berlin, J. D. Sander, 1809.

Morris - Suzuki, Tessa, A History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89.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Wesen und Haupte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Leipzig, Dunckert & Humblot, 1908.

McCraw, Thomas K., Prophets of Regu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ern, Boris,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Boot and Shoe Industry', Monthly Labor Review, February 1939.

(Moss, F. J.), Not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y a New Zealand Colonist, London, Macmillan, 1897.

Reinert, Erik 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conomic Mechanisms of Underdevelop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 1980.

第十四章　大陆、国家和次国家的创新体系：互补性与经济增长[1]

克里斯托弗·弗里曼

本文的目的是讨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经济增长与创新体系的相关性。本文的焦点集中在社会亚系统与追赶型经济中经济学习模式之间的互补性（或者缺乏互补性）上。本文讨论了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差异是由“创新体系”引起的。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和20世纪追赶型经济的创新体系。

关键词：创新体系；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经济史

1. 引言

本文所讨论的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差异是由“创新体系”引起的。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迅速增加了（例如，请参看 Lundvall，1992；Nelson，1993；Mjøset，1992；Villaschi，1993；Humbert，1993；Freeman，1995；Reinert，1997）。

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坚持国家体系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参看 Hu，1992；Porter，1990；Patel，1995），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降低或者甚至排除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有关这方面著名的著作请见 Ohmae，1990）。其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批评强调了替代性的或另外的观点：次国家的实体，诸如省、

① 原载 Research Policy，2002，31，pp. 191～211. ——译者注

工业区、城市或“硅谷”正在变得或者已经变得比民族国家更重要（例如，参看 DeBresson，1989；DeBresson and Amesse，1991）。

不幸的是，至少在英语中，区域（Regional）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也就是：1）它是指包括几个民族国家的地理区域，或者甚至包括了诸如“太平洋地区”、东亚、东欧和中美洲等此类的次大陆地理区域。2）它是指民族国家内部的较小的分区，例如，“州”、城市地区、县和农村地区等。

这可能是产生混乱的原因，所以在本文中，区域指的是诸如大陆或“次大陆”这些更大的地区，而较小的地区称为“次国家”。大陆之间在增长率上的差异非常大，正如表 14－1 所显示的，当然，在国家之间的增长率差异甚至更大。特别是，在今天被称作“发达”或“工业化”的一组国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远远地超过了世界的其他地方（见表 14－2，第五和第六列）。

表 14－1　次大陆区域增长率的比较：1965—1999 年[a]

	1965—1980	1980—1989	1990—1999（估计）
每年 GDP（%）			
东亚	7.5	7.9	7.2
南亚	3.9	5.1	5.5
非洲（撒哈拉以南）	4.0	2.1	2.7
拉丁美洲	5.8	1.6	3.1
每年人均 GDP（%）			
东亚	5.0	6.3	5.7
南亚	1.5	2.9	3.4
非洲（撒哈拉以南）	1.1	－1.2	0.2
拉丁美洲	3.5	－0.5	1.2

a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1）；90 年代的数据由自己估计。

表 14－2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趋势估计（1960 年美元和价格，1750—1977 年）[a]

年份	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		差距	
	（1）总额（10 亿美元）	（2）人均（美元）	（3）总额（10 亿美元）	（4）人均（美元）	（5）=（2）/（4）	（6）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之比
1750	35	182	112	188	1.0	1.8
1800	47	198	137	188	1.1	1.8
1830	67	237	150	183	1.3	2.8
1860	118	324	159	174	1.9	4.5
1913	430	662	217	192	3.4	10.4
1950	889	1 054	335	203	5.2	17.9
1960	1 394	1 453	514	250	5.8	20.0
1970	2 386	2 229	800	380	7.2	25.7
1977	2 108	2 737	1 082	355	7.7	29.1

a 资料来源：Bairoch and Levy－Leboyer（1981），pp. 7～8.

为了描述使这种增长率趋异的制度变迁的能力，阿布拉莫维茨（Abramowitz，1986）发明了“社会能力”这个术语。他自己就是“增长核算”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但是，就像他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这种增长率的差异。作为过去两个世纪长期经济增长的特征，这种增长率上的巨大差异的原因大部分必定是制度变迁的社会能力存在与否，特别是推动和刺激高速率技术变迁即创新体系的制度变迁的能力存在与否。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克鲁格曼（Krugman，1994）和其他人试图把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积累作为“东亚奇迹”的主要解释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制度变迁对资本积累本身就是必要的。

当然，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已强调了技术和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例如兰德斯（Landes，1970）和萨普利（Supple，1963）的著作。确实，在经济理论的早期发展中，李斯特（List，1841）强有力地批判了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因为他感觉到他们忽视了技术和技能。事实上，亚当·斯密确实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重要性，但是，他并没有一贯地给予其应得的、像李斯特所认为的那样突出的地位。

李斯特所关心的焦点是德国对英国进行追赶以及（就像德国那时相对于英国的）欠发达国家的问题，他不只是提出了对幼稚工业进行保护，而且也提出了旨在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广泛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大部分涉及对新技术进行学习和应用的问题，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些政策措施中的许多在追赶型国家中得到了应用（请看第五节）。

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家们有关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思想进行评论后，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1）得出结论说，正是对知识积累的无形投资，而不是一度被相信的物质资本是决定性的（pp. 33 ~ 35）。世界银行的报告引用了“新增长理论”（Romer，1986；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所谓的“新增长理论”事实上只不过是姗姗来迟地把在经济史学家和新熊彼特经济学家们中间早已经变成常识的现实性的假定纳入到他们的模型之中而已。实际上，这里恰好可以引用李斯特的话（List，1841），他在对亚当·斯密进行批判时说：

> “……亚当·斯密……忘记了他自己也曾（在他关于资本的定义中）把生产者的智力和身体的能力包括在这个术语的含义之中了。他错误地认为，决定国家收入的只是物质资本的总量。”（p. 183）

李斯特进一步指出：

> “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扬光大；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就决定于对这些方面领会的深切程度（p. 113）。”①

李斯特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内技术与进口技术、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之间相互依赖对现代的重要性。他也看到了工业应该与科学和教育的正式制度联系的重要性：

> “几乎不存在与物理学、力学、化学、数学或图样设计等无关的工业。这类科学方面的任何发展或新发现、新发明，必然会使许许多多的工业操作获得改进或革新。因此，在工业国

① 此处译文引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熙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一版，第 124 页。——译者注

家，科学与技术必然会普遍流行。”①

最近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文献可以被描述为试图更系统地处理技术变迁的社会能力问题。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这本著作被取名为“创新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即国家创新体系）也是恰当的，因为他预见到了现代文献的许多主题。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讨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经济增长率与创新体系的相关性。由于技术和制度变迁的性质，长期的历史方法对本文来说是必要的。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所产生的巨大差距花了几十年或者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形成，缩小这些差距也需要花许多个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的分析开始于18世纪英国的情况，因为英国是第一个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和城市国家在生产率、技术和人均收入上拉开巨大差距的国家。对英国的情况进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且也是为了引出创新体系理论的某些基本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说明在社会的各种亚体系——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互补性的存在或缺乏，说明国家体系与次国家体系之间的互补性。英国在20世纪的发展缓慢和“落后”也表明，与其正式制度相比，它在某些组织结构上存在着某些相对的僵化，这是埃奎斯特（Edqvist，1997a，b）在其对国家体系理论的全面评价中所强调的一点。

在进行上述讨论后，第四节开始论述跨越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之前的第二个例子——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紧接着，论文其余部分则讨论追赶型国家的创新体系，在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中，维奥蒂（Viotti，1997）把这种体系描述为学习体系。他对积极的和消极的学习体系作出了有趣的区分，并把这种区分应用到了我们第五节将要加以评论的韩国和巴西的例子中。

最后，本文的第六节讨论了21世纪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进程，讨论了全球化和趋同的问题，并就创新体系在未来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得出了一些结论。

---

① 此处译文参考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熙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一版，第174页，略有修改。——译者注

2. 国家体系的概念

在民族国家成为支配性的政治组织形式之前，技术和社会的创新能力对经济生活一直就具有强大的影响，这是肯定的。虽然亚当·斯密的著作名为《国富论》，他主要关心的是对“不同国家富裕的不同演进”进行解释，但他仍对“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城镇的兴起和进步”进行了长篇讨论。因此，现代的讨论确实不是全新的：政治组织和国土边界变化的形式必然要改变争论的性质。对亚当·斯密来说，使他很感兴趣的是，在英国与欧洲其他政治单位之间，其生活标准和制造业水平的差距正在不断地被扩大。这些政治单位中的某些是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其他的仍是城市国家或小的公国，或者帝国。

亚当·斯密的讨论标志着从主要关注推进和保护贸易的政策，航运、贸易和货运融资的政策，以及造船业和海军力量的政策，到主要关注制造业的政策的转变。

文艺复兴的城邦创新体系在手工业、金融体系、航运、艺术、医学和科学方面有许多明显的成就。但我们仍然要从18世纪的英国开始我们的解释，因为这是英国走上与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这些强大的贸易竞争对手相当不同的道路的时候，就是在这时，在文艺复兴时期成长起来的作为胚胎的创新体系发展成了某种新的、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支配地位相联系的东西。

伦德瓦尔（Lundvall，1992）对“狭义的”（表14-3）和“广义的”（表14-4）国家创新体系作出了区分。狭义的思路集中在那些审慎地推动知识的获取和吸收以及作为创新主要源泉的制度上。“广义的”思路认识到，这些“狭义的”制度镶嵌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中，政治和文化影响以及经济政策有助于决定所有创新活动的规模、方向和成功的程度。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决定性的变化是科学在国家（或民族）文化中地位的提高、科学和技术与新工场和新工厂多方面的联系，以及科学和技术在新工场和新工厂的工业过程中系统地和广泛地具体体现。

表 14－3　国家体系："狭义的"制度（创新的源泉）

17 世纪	科学研究院、皇家协会 1662、"学报"和期刊、科学国际主义、科学教育
18 世纪	"产业革命"（工厂）、技术教育、技术国家主义、咨询工程师
19 世纪	大学的成长、博士和科学教授、理工学院、技术学院、政府实验室、产业内部研发、标准协会
20 世纪	所有产业的产业内部研发、"大型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等、科技部、服务业研发、网络

表 14－4　英国在 18 和 19 世纪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某些特征（广义定义）

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于受到国家鼓励和各地方俱乐部的宣传，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制度；
地主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方面大量的地方性投资（运河、公路及随后的铁路）；
组织的合伙形式使发明者能够筹集资本并与企业家合作（例如阿克莱特/斯特拉特或是瓦特/博尔顿）；
为了从贸易和服务中获利，利用国家和地方资本市场在工厂生产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经济政策受到古典经济学家和产业化利益的强烈影响；
竭尽所能保护国家技术，延迟竞争者的追赶；
到 1850 年，英国的人均生产率大约是欧洲平均水平的 2 倍；
咨询工程师在水车、运河、机器制造和铁路方面进行开发并传播了最佳实用性技术；
兼职培训、夜校、面向新工厂技术员和技师的学徒培训；
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缓慢扩张

3. 英国国家体系

中世纪的城邦创新体系与英国国家体系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在于科学的作用和工业的作用。历史学家们对科学的作用仍是有争议的。某些人认为，18 世纪的英国科学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落后于法国，因此，科学对工业革命的成功并不是特别重要。这些解释往往使人误认为某种科学发现的地点是不重要的。在英国之外可能更常常是这样。对于工业革命来说，重要的是科学文化的流行。把牛顿在英国所受到的待遇与伽利略在意大利的遭遇进行对比，可以

作为例证说明这一点。牛顿在英国受到了国家和教会的双重尊重，而伽利略的命运则是完全不同的。在17世纪初，培根（Bacon，1605）已经提出了一种把科学、探索、发明和技术结合为一体的政策。在英国，由于在科学、文化和技术方面存在着非常幸运的协调一致（congruence），这就使得它能够明显地在很大范围的新工具、新机械、工程、运河、桥梁和水轮等方面的发明和设计上使用包括牛顿力学在内的科学。例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工业革命依赖于水力（而不是蒸汽动力）。斯米顿（Joseph Smeaton）在18世纪70年代把他的论文和绘图提交给了皇家学会，正是他的实验工作使关于水轮设计的科学和技术发生了突破，这使得水力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还多。斯米顿在卡隆铁厂（the Carron Iron Works）担任顾问工程师期间，铁首先被使用于齿轮，而不是木材，然后铁就被用于整个水轮。那时，卡隆铁厂已经是欧洲最大的铸铁工厂。

这只是作为英国国家创新体系之特征的科学、技术、文化和企业家之间积极的交互作用的一个例子，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在社会的这四个亚系统之间的协调一致也扩展到了政治亚系统，后者又推动了所有这些系统要素的发展。按照许多研究的解释（例如，Needham，1954），中华帝国因为没有保持这些亚系统之间的协调一致，因此丧失了其在世界上的技术领先地位。教会、国家和科学之间的矛盾（例如在伽利略的情况下）阻碍了科学和技术在意大利城邦和欧洲其他地方更富有成果的发展。雅各布对科学在英国和意大利的不同作用提供了特别好的说明（Jacob，1988）。

这并不是导致城邦创新体系衰落的唯一因素。由工厂生产、资本积累和专业化分工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是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安东尼奥·舍拉（Antonio Serra）是一位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他首先认识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极端重要性，但是他死在监狱中。而亚当·斯密却被英国首相给予了荣誉（“我们现在都是您的学生”）。企业和车间在18世纪仍是非常小的，但是，从家庭手工业到工厂生产的转变和机械的持续改进使英国的制造企业仍足以获得巨大的优势。在那时，没有任何产业能比棉纺织工业（表14－5）更明显地把技术发明、机械投资、工厂组织和企业家在空前广大的市场上结合起来（这仍是借助海军力量推动的结果），其结果是导致了英国与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在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异。到1800年，英国在这

两个主导产业部门①的某些企业已经能雇佣上百名的工人了。

表 14－5　棉纺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加工 100 蒲式耳棉花所需要的操作时间[a]

	加工操作时间（小时）
印度手摇纺纱机（18 世纪）	50 000
克朗普顿走锭纺纱机（1780 年）	2 000
100 锭走锭纺纱机（1790 年）	1 000
助力走锭纺纱机（1795 年）	300
罗伯茨自动走锭纺纱机（1825 年）	135
现在最高效的机器（1990 年）	40

a 资料来源：Jenkins（1994），p. xix.

工业投资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来自于贸易，但是，如果没有地主和中产阶级的文化和态度的变化，没有资本市场的变化，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英国地主阶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欧洲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以至于马克思评论说，英国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贵族。自英国议会在 17 世纪中叶的国内战争中取得对君主政体和贵族的胜利之后，英国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确实就与地主不一样了。尽管在 1660 年发生了君主政体的复辟，但是，议会的胜利造成了不可逆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在贸易、交通和工业方面的投资甚至变得比土地所有权更重要了。在 18 世纪末，地主通过地方性的政治力量推动了新一轮的运河投资，这种投资在几个关键性的工业区的早期起飞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性，而这些工业区原先在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曾受到落后的通信和运输条件的阻碍。

熊彼特一直就认为，创新的扩散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必然是不均等的，工业革命中所发生的创新的扩散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它们并没有均匀地扩散到该国的所有地方，最初它们只是影响到了一些工业，并相对缓慢地扩散到了其他的欧洲国家。创新、城市化和新工业快速增长的中心并不是在伦敦地区，而是在英格兰北部（特别是在兰开斯特郡和约克郡）、英国中部和苏格兰。最初，新的“次国家”的工业区域或工业区与区域层次上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关系。北部的优势可能就在于奔宁山脉更湍急

① 按照上下文关系，这里的“两个主导产业部门”似乎是指棉纺织工业和铸铁工业。——译者注

的河流可以为斯米顿水轮的转动提供持久的和强有力的动力。铁制品工业也明显地受到了可以烧制木炭的木材产区以及后来的煤炭和铁矿石藏区的影响，但是，大量的铁矿石在18世纪仍是进口的。

然而，虽然在英国各种工业的早期增长中，诸如有航运之便和水力来源的河流以及矿藏存在与否等地缘因素确实曾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自然的优势很快就被“创造的”优势所超过了，如交通基础设施、港口的区位和技能与市场的易得性等。兰开斯特郡享有利物浦港口的优势，而利物浦则是北大西洋与北美贸易的中心。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马歇尔指出了来自于坐落在同一工业区中的同一工业的许多企业的外部经济，在这些工业区中，“工业的秘密就在其气氛之中”（Foray，1991）。直到今天，这些由聚集所产生的外部经济仍继续在半导体、玩具和机器工具等工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构成了皮奥雷（Piore）和萨贝尔（Sabel）认为小企业网络比大量生产企业具有优势这种观点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也是某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次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现在已经变得比国家体系本身更重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之一。

乍一看，英国工业革命的许多经验似乎支持这种观点。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兰开斯特郡，专业技能的积累是其棉纺织工业特别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毋庸置疑的是，在1850年，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部门的出口占英国所有出口的40%；到1900年，在总出口量有更大增加的情况下，这些部门的比例仍占到四分之一以上。

马斯和拉让尼克（Mass and Lazonick，1990）在他们对英国棉纺织工业占支配地位的原因进行解释时，把这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归结为在几种关键的生产要素之间的累积过程。这种累积过程影响到劳动力成本、营销成本和管理成本。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工业规模经济是重要的，就劳动力的情况而言：

> “在19世纪，劳动力资源的发展和使用为英国棉纺织工业提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主要的机械技术……为了保持其运转，需要有经验的劳动力的互补性应用。经验给予工人的不只是特定的认识技能（走锭精纺机的纺织过程更需要如此……），而且（在长期更重要的是）在不损害产品、原材料和机器的质量的情况下，经验给工人提供了以稳定的步伐长时间工作的能力（Mass and Lazonick，1990，p. 4）。”

马斯和拉让尼克特别强调了工厂劳动习惯和劳动力技能的积累，但是，他们也强调了在那个时代的那个部门中，行业组织与企业在如何维持和提高生产率的刺激措施上保持着特别的一致性（令人惊奇的是，这成了后来棉纺织业中以及其他工业中英国产业关系的基本思想）。拥有更多技能的熟练工人（他们常常具有从前在家庭手工业工作的经验）在招募、训练和管理非熟练工人上负有更大的责任。

> “除了由于成长于工厂社区和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入工厂而养成的对工厂工作的习惯性以外，棉纺织工人也发展了纺特种纱和织特种布的特殊技能（Mass and Lazonick，1990，p. 4）。”

与其他历史学家一样，马斯和拉让尼克也谈到了与专业化技能的集中有关的在兰开斯特郡许多城镇的聚合经济：玻尔顿的精纺、奥海姆的粗纺、布莱克本和伯恩利的粗布，等等。类似地，这种聚合经济也使这些地区容易得到维护和改进机器的熟练技工。总的来说，熟练工人分享了生产率提高的收益，而工会的权力则为之提供了保证。

到19世纪70年代，世界各地的棉纺织工业可以很容易地购买英国的工厂设备，甚至可以容易地雇佣工程专家。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棉纺织工业可以容易地获得英国高生产率的劳动力；也没有一个其他的工业可以经过长达百年的发展过程从而产生英国所拥有的有经验的、专业化的和合作的工人（Mass and Lazonick，1990，p. 8）。

类似的论点可以应用于机械制造业，应用于面粉厂和机器设计。早期的面粉厂工人具有使用谷物磨和风磨等的经验，而由于机械的日益专业化和精密化，专业化的和累积的技能也就变得日益重要了。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高水平的机器使用和更低的机器初装成本。

高度集中的利物浦棉纺织交易给兰开斯特郡提供了特殊的优势，这同样与原料成本有关。外国购买者发现，在利物浦购买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购买更便宜，就像今天阿姆斯特丹的花卉市场对全世界的再出口一样。曼彻斯特的运河运输和1830年建成的铁路使兰开斯特的运输成本极其低廉。兰开斯特的纺织业者可以避免更远距离的竞争者所负担的沉重的仓储成本。这不是“及时生产”（just-in-time），但它确实与其类似。利物浦的市场使兰开斯特在挑选棉花

级别和种类上获得了巨大优势，纺织业者具有在以周为单位的时间上利用价格变化的优势。而且，兰开斯特也具有使用质量较次的棉花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市场进行生产的独特能力，它甚至具有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部分地转向使用印度原棉的独特能力。

世界范围的营销结构是兰开斯特的另一种积累的优势，就像上面提到的所有其他因素一样，它为这种工业中的企业提供了外部经济。具有消息非常灵通的商人、转运者和生产者的兰开斯特的工业结构意味着它有能力快速地把顾客所需要的产品运达世界上任何地方。此外，由于这种产业范围的优势，其存货、运输和通信的成本可以保持在低水平上。

类似的聚合经济在其他工业中也存在，如斯塔福德郡的制陶业、谢菲尔德郡的刀剑制造业、诺丁汉郡的针织品业和约克郡的羊毛业。无疑，这些次国家的创新体系或马歇尔所说的工业区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主要的贡献。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国家体系不重要，或者它只是次国家创新体系的简单加总。每一个工业区的繁荣不只是因为它具有特定的当地优势和制度（熟练工人的集中、经验的交流和行业协会等），而且也是由英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制度所孕育的国家优势的结果。这种国家优势使得工业区易于进入大而快速增长的国内和国外市场，易于进入资本市场，易于进入工程和科学知识的“国家蓄水池”（national pool），创造出对财产及其积累进行保护的法律体系，等等。事实上，国家体系与次国家体系之间是互补的。

我们很难相信，在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如果它像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分裂成 20 到 30 个独立的州、城市和公国，工业革命会更成功。事实上，19 世纪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那时关心追赶英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提倡关税同盟（*Zollverein*）形式的德国各邦的联合，提倡通过国家铁路网和其他的国家制度使其统一，因为他们感觉到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许多优势。

与专业化的次国家工业区互补的英国国家优势被萨普利（Supple，1963）恰当地总结如下：

> “18 世纪末之前的英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经验毫无困难地解释了为什么它应该成为一个工业开拓者。作为榜样，英国把潜在的具有增长诱导性的各种特征结合起来了，在这个方面，它比同时代的任何国家做得都要好。企业的发展、在支配性的

贸易框架下获得丰富的供给来源和进入更大的海外市场的能力、资本的积累、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地理位置、具有众多河流的海岛经济的相对便利的运输条件、科学和实用主义的遗产、稳定的政治和相对灵活的社会体制、有利于商业和创新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这个国家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趋势，并且使得英国比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更容易发生经济变化。”（Supple，1963，p. 14）

4.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

由于内部贸易壁垒的拆除以及贸易和运河运输的优越性，由英国企业和工业区所取得的规模经济在美国经济的兴起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增长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快（参看表14－6）。

表14－6　相对生产率水平（美国每小时国内生产总值＝100）[a]

	1870年	1913年	1950年
英国	104	78	57
法国	56	48	40
德国	50	50	30
15个国家	51	33	36

a 资料来源：Abramovitz and David（1994）.

毫不奇怪，在18世纪，作为英国从前的殖民地，美国的国家体系最类似于英国体系。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禀赋和许多有利的制度，但由于没有必要的交通基础设施，无法利用自然禀赋、国家规模和市场规模，其经济增长仍然受到阻碍。正是由于铁路和19世纪下半叶新技术的进步，美国的企业才能走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企业的前面。最初，美国从欧洲进口了大量的这类技术。英国工匠把棉纺织工业的许多关键性发明私带出英国并带过大西洋，因为在那时这种技术的出口是非法的。阿克赖特的水力织布机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细心地凭记忆记住并在美国重装的机器。但是，从一开始，美国的发明者就根据美国的情况改进了这些技术。到19世纪末，美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在大多数工业中开发了新的工艺和产品，这些新工艺和新产品比英国的工艺和产品生产率更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民族文化中盛行的科学精神和对技术发明的支持是英国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这些特征很容易地就被转移到了美国，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对科学和技术的尊崇就成了美国文明的一个持久的特征。正如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1836）在他的经典著作《美国的民主》中所描述的：

> “在美国，科学中纯粹实践的部分被理解得十分透彻，那些在应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论部分被细心地加以注意。在这方面，美国总是展现出一种自由的、原创的和富于发明的心智力量（de Tocqueville，1836，p. 315）。”

作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早期美国大陆的移民被迫对农业技术边干边学，农业研究作为一种突出的特征早就在美国出现了，而且得到了强有力的公共支持。除了英国这个局部的例外，欧洲的封建制度常常阻碍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而美国在农业或经济的其他部分从没有任何封建制度。而且，土地的相对丰裕、西部不断拓展的边疆、土著文明的毁灭或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国土范围内，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并使得早期白人移民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对平均。

这种普遍现象最大的例外当然是南方的奴隶制经济。评价南方和联邦的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奴隶制经济的阻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在南北战争中北方胜利后，美国出现了一个增长率超过英国任何时期的时期。在联邦胜利和主要的制度变迁特别是奴隶制废除之前，南方的次国家体系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甚至在奴隶制废除后，仍遗留下了持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它们中的一些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联邦的保持则意味着在北方和西部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全国的流行。在这种环境下，一种企业家文化在世界上别的地方无可比拟的情况下兴盛起来。

阿布拉莫维茨和大卫（Abramowitz and David，1994）等历史学家研究了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经济史，他们指出了对高速经济增长非常有利的美国经济的几个特征：（1）土地、矿产和森林等资源丰富；（2）巨大的和同质的国内市场，它有利于生产、营销和融资的规模经济，特别有利于采掘、加工和制造业的发展。

阿布拉莫维茨和大卫认为，北美劳动力较高的相对价格与上述优势交互作用诱导了资本和自然资源对熟练劳动力的替代。在

19 世纪上半叶，这已经刺激了美国特定的劳动节约和资本密集的机械化和标准化生产的技术轨道的发展，到 1850 年，在质量范围的较低端，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已经超过了英国。到了 19 世纪，“大规模生产和高通过能力的工程技术得到了更完全的开发和更广泛的扩散。美国的管理者在对适合于创造和开发大量市场的大企业的组织、融资和运营上变得有经验了（Abramowitz and David，1994，p. 10）。”

从表 14 - 7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这种使用有形资本的特定技术轨道与欧洲（和日本）的技术轨道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差异。直到 1880 年，英国的总资本/劳动比例仍高于美国，但到 1938 年，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这个比例下降到了不到美国的一半。与北美技术轨道相关的大幅度的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收益通过许多工业部门表现出来。在农业的生产率收益经常被其他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同时，阿布拉莫维茨和大卫特别强调了在采矿和矿产品加工方面极其巨大的生产率收益。钢铁和石油的例子是特别显著的，因为这些商品在所有种类的使用有形资本的投资项目中、在资本品本身、在交通和能源的生产和分配中都是关键性的。在早先的英国工业革命中，棉花、铁、运河和水力是主导部门；而在从 1880 年到 1913 年的美国经济大冲刺中，石油、钢铁和电力则是其主导部门。

表 14 - 7　资本/劳动比率的比较：1870—1950（以美国为 100）[a]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13 个欧洲国家的平均值	日本
1870 年	73	—	117	—	—
1880 年	73	26	106	68	12
1913 年	60	24	59	48	10
1938 年	42	32	43	39	13
1950 年	46	31	46	39	13

a 资料来源：Abramowitz and David（1994，p. 8）.

维奥蒂（Viotti，1997）指出，这些差别以及德国化学工业的情况意味着，20 世纪末的追赶环境已经变得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相当不同了。他说，美国和德国的追赶是通过新产业的激进创新而不是棉纺织工业的渐进创新来实现的。今天，后进国家（the latecomer countries）除了模仿和学习外，可能在新产业中已经没有激进

创新的选择了。然而，他对积极的学习体系和消极的学习体系作出了区分，并用韩国和巴西作为例子说明了他的观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个例子。

5. 20 世纪后进国家的追赶

巨大的规模经济是美国追赶过程的特征，特别是在钢铁、化学、石油、矿产和电力方面。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前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和欧洲复兴计划（ERP））组织了许多欧洲代表团对欧洲与美国的企业之间的差距进行研究时，他们常常强调工厂规模和国内市场的规模是美国企业两个最大的比较优势。这种思考为许多政治动议奠定了基础：首先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再后来是欧洲共同市场（关税同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像追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们相信德国关税同盟将极大地有利于对英国的追赶那样，欧洲联邦主义者们也相信，欧洲共同市场将加速欧洲对美国的追赶。现在，这种哲学仍影响着对经济和货币联盟（EMU）的争论。

在 1950 年到 1975 年，西欧的追赶确实发生了，虽然这不能确定地单独归因于规模经济和市场的扩大。因为自第一次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制度和技术变迁的普遍能力是最基本的，而不是只有规模经济才重要。欧洲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技术转移、教育与培训和管理技术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美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和欧洲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也推动了技术和管理技术的转移。甚至对于取得规模经济本身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必需的。

然而，毫不奇怪，对“后进国家”的追赶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对北美和欧洲企业的规模经济有着特殊的印象，在他们研究追赶现象时，他们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格什克隆（Gerschenkron，1962，1963）研究了 19 世纪的德国和后来的俄罗斯的企业在钢铁工业上的追赶，他认为，后发（the late-comer）企业可以用比先驱国更低的成本，通过转让协定、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人员的招募来获得和使用最新的技术。按照他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先驱企业和国家已经建立起了成长中的世界市场，追赶企业不需要面对开发全新的市场所面临的所有不确定性、成本和困难。格什克隆的后发（late-comer）优势理论强调了，先驱者不可能从大工厂开始，而后来者却可以在其成熟的竞争对手背上小规模工厂使用过时技术的沉重负担

的情况下，非常快地进入大规模生产。

申璋燮（Jang-Sup-Shin，1995）对韩国钢铁工业的研究支持了格什克隆的上述观点，他指出，浦项制铁是韩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它在工厂规模和技术方面超越了欧洲和美国企业，因此，作为低成本的生产者进入了世界市场。他把这种分析扩展到了半导体工业，并论证了韩国记忆芯片生产商的大规模优势也使得它们跨到了欧洲半导体工业的前面，并与最成功的日本和美国企业竞争。然而，他承认，格什克隆的后发规模经济优势必须由成功追赶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解释来补充，因为如果没有许多制度的变迁，特别是在教育、培训和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制度变迁，无论是在钢铁还是在半导体工业上的追赶都不可能发生。

贝尔和帕维特（Bell and Pavitt，1993）指出了格什克隆追赶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一个只是简单地使用外国技术和外国援助安装大工厂的国家在几十年内不可能构建起技术能力，而这种能力却是领先国家的特征。其结果是，在发展中国家经常存在着低能力运转和低水平的产出资本比例。由贝尔和帕维特、维奥蒂以及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所描述的积极学习政策在克服后发劣势上是必要的。

佩蕾斯和苏蒂（Perez and Soete，1988）就有效的追赶所需要的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问题提出了一种更一般的理论。他们说明了在缺乏基础设施的情况下，甚至连模仿成本也是相当高的，而在成熟的工业化国家中，低模仿成本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指出，这些成本在产品或技术演化的不同阶段会系统性地发生变化。因此，格什克隆可以被看作是后发优势理论的主要理论家，而佩蕾斯和苏蒂则思考了在对技术领先者的追赶中，无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后发劣势和困难。不过，他们也指出假如追赶型国家实行适宜的社会、工业和技术政策，那么获取和吸收技术的“机会的窗口”是存在的。

格什克隆自己认为，如果一些国家能够在其金融系统方面作出创新，为大型工厂提供所需要的大规模投资，那么，这些国家就享有后发优势。然而，就后发优势来说，存在着格什克隆没有进行充分探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某个历史时期的工厂的规模经济不一定是所有工业或其他时期的特征。正如佩蕾斯和苏蒂所说明的，规模经济是产业特定的和技术特定的。在一些产业中，如

飞机或制药，设计和开发成本的规模经济比生产中的工厂的规模经济更重要。而在其他产业中，营销方面的规模经济可能是决定性的。在钢铁工业以及半导体工业，工厂的规模经济随技术而改变。

无论如何，格什克隆的后发优势理论是对幼稚工业观点的重要补充。在某些追赶型国家，更高的增长率明显地部分归因于以下事实：在追赶状态中，技术获取和提高的成本更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小；模仿常常比创新更容易和成本更低；巨大的技术差距给快速的追赶提供了潜力。

最后，正如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强调的，后发国家常常具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非常大，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很大的人均收入差距。这些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可能由某种原料和能源的较低成本以及气候优势等所加强。所有这些因素以及狭义和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都影响到追赶的潜力及其实现。

看来也存在这种情况：追赶与被追赶的国家之间的地理和文化上的接近程度力对追赶速度有相当大的影响。否则，就难以解释各大陆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鲜明差别。英国是第一个被欧洲邻国和那些部分地由英国和其他欧洲移民所组成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所赶上的国家。在 20 世纪末，最成功的追赶型国家是那些在地理上（以及在某些文化方面）与 20 世纪领先的追赶型国家——日本相接近的国家。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东亚国家和某些东南亚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比拉丁美洲国家增长得更快，尽管亚洲国家是在比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更低的工业化和生产率水平上开始其追赶过程的（见表 14 - 8）。乍一看，这似乎支持一种简单的趋同定理——越落后增长的就越快。但是，在匆忙得出任何诸如此类的结论之前，必须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在追赶；某些国家远远地被抛在了后面；而某些国家则停滞不前。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取得最快进步的国家和次大陆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不平等发展而非趋同是增长更加准确的特征。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德朗（De Long，1988）证明鲍莫尔（Baumol，1986）试图使用麦迪逊的数据建立趋同假设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

表 14－8 工业化开始时的水平：拉丁美洲与亚洲，1955 年[a]

	制造业与农业净产品之比	以美元计算的制造业单位资本净值
阿根廷	1.32	145
巴西	0.72	50
墨西哥	1.00	60
委内瑞拉	1.43	95
哥伦比亚	0.42	45
韩国	0.20	8
泰国	0.28	10
印度	0.30	7
印度尼西亚	0.20	10

a 资料来源：Maizels（1963）.

“……在被弄清楚以后，鲍莫尔的发现就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信息丰富了。因为鲍莫尔的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是已经成功地得到发展的富裕国家的事后样本。就麦迪逊（Maddison）的选择而言，那些没有趋同的国家由于其持久的相对贫困从他的样本中被排除了。因此，在鲍莫尔的回归分析中，趋同是被保证的，它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力量促成了在 1870 年属于鲍莫尔所谓‘趋同俱乐部’的国家之间的趋同……因为（麦迪逊）集中在了这样一些国家：（1）有丰富的资料可以建立国民经济的历史核算；（2）已经成功地得到了发展，麦迪逊所谈论的十六个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De Long，1988，p. 1138～1139，强调之处是引用者所加）。”

德朗证明，对于另一组事后的样本来说，在初始的生产率水平与随后的增长绩效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在德朗对趋同理论提出批评后，蔡博特（Chabot，1995）证明了在 1820 年到 1870 年之间，收入增长能力的变化并不是与 182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反向直接相关的：“其结果与趋同理论所预测的正好相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美国和英国得到很好的说明。这两个国家都属于 1820 年最有前途的三到四个国家那一组，都在随后年份中

经历了非凡的增长。明显地，有某些比趋同和追赶的逻辑更多的东西在发挥着作用。”（Chabot，1995，p. 60）本文的第三和第四节试图说明，“某些更多的东西”就是特定的国家创新体系。

蔡博特进一步证明了在1870年到1950年期间，美国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跃进**是相对于除北欧国家以外的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而言的（见表14－9）。只是在1950年到1992年期间，他才发现了对趋同的有限支持，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在整个现代经济史中，只存在一个时期为国际趋同提供了些微的实质性支持，即使这种支持也要受到严重的限制（Chabot，1995，p. 62）。”

表14－9　与美国劳动生产率趋同和趋异的落后水平：1870年到1950年[a]

国家	比率
澳大利亚	－0.95
奥地利	－0.81
比利时	－0.84
加拿大	0.10
丹麦	－0.46
芬兰	－0.20
法国	－0.37
德国	－0.88
意大利	－0.37
日本	－0.30
荷兰	－0.87
挪威	－0.15
瑞典	0.04
瑞士	－0.14
英国	－0.77

a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引自 Chabot（1995）.

格什克隆发现后进国家具有某些较重要的优势，这无疑是正确的，他还说明了在某些条件下，后来者从非常低的生产率水平开始，会拥有比领先国家更高的增长率，但是，我们却不能得出结论说后来者总是趋同于领先国家。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指出的，它们是否能够趋同于领先国家取决于技术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能力，也就是取决于国家创新体系和新技术浪潮的性质。此外，还取决于国际关系的有利配合。

大多数亚洲国家在工业化时的确是比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更落后的后来者，但是亚洲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快速增长不能单独由此解释，而且，也不能像克鲁格曼（Krugman，1994）那样解释为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所产生的，而技术变迁在其中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报告（1993）中对“奇迹”的解释也无法令人信服。克鲁格曼和世界银行报告都极大地低估了技术变迁的作用，特别是没有认识到亚洲“四小龙”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把它们的投资、研究与开发活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培训和技术投入集中在电子和通信产业上的程度。“追赶”不是一种与落后相联系的自发过程，也不是自由经济中市场力量必然的结果。好运气加上正确的判断，再加上与日本邻近，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某些其他亚洲国家）增加了对电子产品的制造和出口，成为世界上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明显地，亚洲“四小龙”在出口绩效上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其进出口商品结构，它们进出口的商品与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门高度相关（见表14－10）。新加坡在这方面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其电子和通信产品占到了工业产出的三分之一强，几乎达到了出口的三分之二。然而，中国香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把其电子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内地。由电子产品的零部件、亚系统和最终产品之间相互依赖所构成的供应商网络是快速成长的亚洲制造业部门的典型特征。这些产品的进出口增长都非常快。世界银行报告不仅忽视了东亚经济的结构变迁形态，而且也忽视了研发活动和技术转移的不断变化。世界银行报告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这与阿姆斯登（Amsden，1989）和沃德（Wade，1990）等制度经济学家的早期著作不同，世界银行报告忽视了政府政策在许多领域中的作用，比如对某些产业的保护、出口推动、对特定企

业的补贴以及对研发活动的推动等。总的来说，它忽视了产业政策，也没有谈及培训或技术转移。在所有这些方面，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政策类似于很久以前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描述的政策。在指出这一点之后，弗里曼（Freeman，1993）对巴西和韩国作了一些比较和对比。

表 14－10　下列国家或地区对主要 OECD 国家的全部制造业出口中信息通信技术设备[a]出口所占比例

	1970 年	1980 年	1992 年
日本	21	17	29
德国	7	5	6
美国	14	15	22
法国	6	5	6
荷兰	6	7	8
英国	6	7	13
中国台湾	17	16	28
韩国	7	13	26
新加坡	20	36	65

a 计算机，办公机器，电信设备和其他电子设备。

资料来源：OECD 交易数据库。

自弗里曼以后，巴西学者在这个方面作出了更全面的比较（Villaschi，1993；Albuquerque，1997b；Viotti，1997）。阿尔布奎尔魁（Albuquerque）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几种不同范畴进行了区分；维奥蒂在维拉斯奇（Villaschi，1993）与贝尔和卡西欧莱特（Bell and Cassiolato，1993）论“学着生产与学着创新”的论著基础上，对“积极的”和“消极的”学习体系作出了有趣的区分。所有这些解释都强调了在技术的进口、改进和适应以及在国家和企业层面上所实施的积极政策是成功的追赶的特征。

维奥蒂（Viotti，1997）在对巴西和韩国的教育、研发活动进行比较时，提供了发人深省的证据（见表 14－11）。在提出这些证据的同时，他指出，巴西每 10 万居民的大学生数量（1 079 人）大致上只是韩国（4 253 人）的四分之一，在韩国，与科学和人文专业相比，高等教育体系更多的是集中在工程方面。阿姆斯登在他论述

韩国经济追赶的经典著作（Amsden，1989）中，对追赶早期的钢铁和水泥工业中的培训的作用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在电子工业中，培训甚至更为重要。例如，三星（Samsung）不只是在各种层次上为自己培训了数千名员工，而且还定期地为其分包商提供了大量培训。对于持续改进技术的积极的政策来说，与简单的模仿相比，这种密集的培训更为重要。正如贝尔和卡西欧莱特（Bell and Cassiolato，1993）与贝尔和帕维特（Bell and Pavitt，1993）阐明的，静态规模经济可以简单地通过建立大工厂达到，而动态规模经济基本上取决于这种积极的学习政策，而且越来越取决于工程活动和工厂内部的研发活动。产品设计的快速变化以及电子工业零部件特征的相关变化进一步增加了积极的学习和培训政策的重要性。

表 14－11 国家在科学与技术上努力的表现：巴西、韩国、日本和美国[a]

	巴西	韩国	日本	美国
参与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每百万人）	235[b]（1993）	1 990（1992）	5 677（1992）	3 873（1988）
研发费用占 GNP 的百分比	0.4[c]（1994）	2.1（1992）	3.0（1991）	2.9（1988）
研发费用的资金来源（%）	1994[c]	1992	1992	1992
政府	81.9	17.2	19.4[f]	43.3[f]
生产性企业	18.1	82.4	71.0[f]	51.6[f]
其他	—	0.4	9.6[f]	5.1[f]
1991 年批准的全部专利	2 479[d]	3 741[e]	36 100[f]	96 514[f]
授予常住人口的专利（%）	14[d]	69[e]	84[f]	53[f]
每 10 万居民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数量（1992）	1 079	4 253	2 340	5 652

a 资料来源：Viotti（1997），括号内的数字对应该数据的年份。

b 根据 MCT（1995）计算。

c CNPq（1995，p. 23）.

d MCT（1996，p. 37）.

e Lall（1992a，p. 197），韩国的专利数字为 1986 年统计数据。

f STA/NISTEP（1995）.

维奥蒂进一步证明了韩国工业对外国投资的依赖性远小于巴西，韩国工业更多地依靠进口资本品，然后通过韩国企业自身内部的研发活动，对进口技术进行改进的积极努力。霍布德（Hobday，

1995）谈到了东亚国家的各种不同战略，这些战略都是为了稳步提升当地的技术能力而以不同方式设计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内研发绩效快速增加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低水平的、停滞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研发活动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表 14－11 列出了它们与巴西的对比。

20 世纪 70 年代，企业内部研发活动的上升导致了专利数量的迅速增加（见表 14－12），这也许是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积极学习体系最有力的证明。在 1977 年到 1982 年与 1990 年到 1996 年之间，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所取得的专利数几乎翻了一番，从 570 件增加到 1 106 件，但是在同一时期，由亚洲“四小龙”所取得的专利数几乎增加了 30 倍，从 671 件增加到 18 763 件。

表 14－12　用美国专利所有权来衡量的技术的形成来源[a]

	授予专利的时间段					
年份	1977—1992	比例	1983—1989	比例	1990—1996	比例
中国台湾	382	0.10	2 292	0.41	11 040	1.43
韩国	70	0.02	580	0.10	5 970	0.77
以色列	641	0.16	1 507	0.27	2 685	0.35
中国香港	272	0.07	633	0.11	1 416	0.18
南非	491	0.12	699	0.12	787	0.10
墨西哥	245	0.06	289	0.05	314	0.04
巴西	144	0.04	212	0.04	413	0.05
中国	7	0.00	142	0.03	353	0.05
阿根廷	130	0.03	135	0.02	187	0.02
新加坡	17	0.00	65	0.01	337	0.04
委内瑞拉	51	0.01	122	0.02	192	0.02
印度	56	0.01	96	0.02	204	0.03
东欧和中欧	3 444	0.87	2 417	0.43	1 317	0.17
小计	5 950	1.51	9 189	1.62	25 215	3.26
其他	731	0.19	902	0.16	1 494	0.19
合计	393 629	100.00	565 739	100.00	772 927	100.00

a 资料来源：Kumar（1997）基于美国专利与商标局（1997）技术评估与预测（TAF）特别报告提供的数据；各种类型的专利——1977 年 1 月至 1996 年 12 月，华盛顿特区。

韩国在1969年到1992年期间所取得的专利几乎一半集中在电子行业的六个技术领域（半导体、计算机、视听、乐器、电子设备和照相复制）。中国台湾专利总数的增加甚至更显著，但是，这些专利却分布在更广泛的技术领域中，尤其包括了金属制品、机械、电机设备和电子设备（Choung，1995）。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在其追赶中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它们开始向老牌工业化国家和东南亚等较不发达的国家出口自己的技术并进行海外投资。

上述讨论用于国际比较是很适当的，但是，美国的专利统计当然不是唯一有意义的指标。自从欧洲专利机构建立以来，欧洲专利局（EPO）的统计也日益变得有价值。对于追赶型国家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每个国家国内的专利政策。在一篇开拓性的论文中，阿尔布奎尔魁（Albuquerque，1997a）分析了这些统计数据，这篇论文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说明了在过去的15年中，巴西国内专利数量在1981年到1982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再也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增加趋势。

东亚地区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数量的惊人增长当然不是积极的技术改进的唯一表现，它也受到了企业的商业和出口战略的影响。霍布德（Hobday，1995）特别强调了通过出口进行学习（learning by exporting）在东亚追赶中的关键性作用。东亚企业出口的成功与它们在美国取得专利的成功是互补的。但是，在它们继续向世界技术前沿前进的时候，它们遭遇了技术领先者日益激烈的竞争，受到了这些技术领先者要求它们在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所有方面自由化的压力。

对于那些正在积极地缩小制造业差距的追赶型国家来说，美国企业在世界软件产业、与因特网相关的所有支持性服务和世界金融服务上的支配性地位产生了某些严重问题。

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所有国家都极易受到世界体系中任何地方的不稳定性和震荡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件表明，这些震荡可以在整个体系中自我繁殖，狭义的创新体系无论多么良好，毕竟它是更宽广的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和经济亚系统的发展趋势非常强烈地受到了与科学和技术存在微妙关系的制度的影响，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七节进一步讨论。

6. 结论

本文第三节提出，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

命时代出现的。贝罗奇（Bairoch，1993）对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的估算表明，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这种差距非常迅速地扩大了。本文的第三和第四节试图证明，这种在“跃进”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与世界其余地方之间的巨大差距可以很好地使用“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加以解释。第五节进一步说明在解释某些条件下后进国家不同的追赶速率以及追赶失败时，这种概念也是必需的。

经济史学家们毫不困难地接受了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技术和制度变迁的重要性的观点，而经济增长的建模者们却发现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某些早期的增长模型主要强调了通过投资所形成的（有形）资本的积累，强调了劳动力的增长，但把所有其他的影响因素都归为“剩余因素”。虽然所谓的“新增长理论”突破了这种传统，把教育、研究与开发的“无形投资”置于核心地位，但是仍然沿用了陈旧的思路，这可以在克鲁格曼（Krugman，1994）试图揭穿“东亚奇迹”的例子中看到，他主要是用资本和劳动的积累来解释东亚的经济增长。

早期增长模型对技术和制度变迁复杂性的处理在当时就遭到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严厉批评，特别是这些模型中的“第三种因素”明显地解释了大部分的增长。巴拉夫（Balogh，1963）把“第三种因素”命名为“无知系数”，萨普利得出结论说，“很明显，对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包含对一系列其他因素的评价。相应地，就可以得出资本积累就其本身来说决不处于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的结论。”（Supple，1963，p. 22）

针对这种批评，人们试图把剩余因素分解到总生产函数中去。丹尼森（Denison，1962，1967）的工作是最著名的，他使用了多西（Dosi，1988）所谓的“完整的卡马—萨特拉（Kama-Sutra）变量”来对增长率进行系统的比较。但这些努力仍经受不住纳尔逊（Nelson，1981）和其他许多人的有力批评，他们指出，在所有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只是取决于它的数量，也取决于它的质量，取决于投资的方向，取决于开发新的投资机会时的企业家和劳动力的技能，取决于社会先行资本的存在与否，等等。

在增长建模的争论中，一个大胆的、富于原创性的贡献来自于艾德曼（Adelman，1963）。她早就认识到许多模型中的规模报酬固

定不变的假定是核心问题所在，在所谓的“新增长理论”中，这个假定被放弃了，采用了杨格的（Young，1928）规模报酬递增（Romer，1986；Grossman and Helpman，1991）。

这些模型沿用了艾德曼的思路，试图赋予技术变迁一种特定的角色（或者如艾德曼所称的“来自应用科技的知识存量”）。在艾德曼的模型中，她采用了与古典经济学家们把资本与土地分离开来的同样方式，也把“自然资源”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分离开了。随着人们对生态因素和资源保护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认识的增加，这种区分日益变得重要。她还把技术变迁与其他形式的制度变迁区分开来。这样，她构造的生产函数如下：

$$Y_t = f(K_t\ N_t\ L_t\ S_t U_t)$$

在这里，K_t 表示在时间 t 资本存量的数量；N_t 代表自然资源使用率；L_t 代表劳动力就业；S_t 代表“来自于应用知识的存量”；U_t 代表“经济运转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氛围”（Adelman，1963，p. 9）。

与别人不同，艾德曼坦承她认识到了这种构建生产函数的方法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并承认在她的公式中各种变量之间相互依赖。例如：

> ……劳动力的质量和构成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它并不是独立于系统中其他变量变化的速率的。尤其是，劳动力的技能和健康直接依赖于技术知识的社会应用 S_t 的变化。

像其他建模者一样，她认为，“如果我们把每一种投入看作是多种组分构成的矢量，而不是看作是单一的数字，那么由于生产函数的异质性和非通约性所引起的”概念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减少”。

然而，这仍不是生产函数思路所存在的最大的困难。正如艾德曼再次明确指出的：

> “比这些生产要素的测量问题更困难的是试图把最后两个变量加以量化。S_t 和 U_t 主要是为了概念的目的所引入的启发式工具……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对 S_t 和 U_t 进行序数估价的方法有可能会出现，但是，现在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方法，因此，这两个变量都无法作为分析工具加以使用（pp. 11～12）。”

自1963年以来，尽管在研发（R & D）和教育的测量上取得了某些进步，尽管最近的“新”增长模型中对于技术和制度变迁的处理更加现实，但是，上述状况基本上仍没有改变（Verspagen，

1992）。

所有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有关增长理论的建模及其发展完全是徒劳的。艾德曼关于增长建模的探索性价值的论点仍是成立的，她试图使用她的生产函数来说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熊彼特、哈罗德、卡尔多和新凯恩斯主义在增长理论上的异同就是这些探索性的优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无论如何，整个争论的主要结论证明了许多经济史学家和新熊彼特经济学家的观点：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在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是关键的变量。

赞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哥穆尔卡（Gomulka，1990）得出了如下结论："理论和经验著作的累积效应比从前更突出和广泛地强调了导致经济的质变的活动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就其典型地作为原始推动力并引发了其他质变而言，技术变迁起着主要作用。因此，这些著作表明（标准）增长理论的用处非常有限，这种理论假定质变是没有成本的和外生给定的（p. 19）。"

本文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试图证明，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和制度变迁在超越过程和追赶过程中都处于核心地位。然而，这也不否认构成"广义"国家创新体系的其他影响的作用，这些影响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对于"把历史带回经济学"这种非常复杂的工作来说，虽然有关国家体系的研究是一种有前途的开端，但是，它在解决许多批评提出的问题上做得确实不够，这些批评是因为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不信服而产生的，然而，这些批评意见对于替代性的演化经济增长的研究也缺乏信心。

国家体系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道路之一可能是对追赶失败和经济增长落后的研究。比如英国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增长缓慢并落后了，许多解释都把焦点指向了各种社会亚体系之间缺乏协调一致，指向了在技术发展的某种时期对经济增长有利但在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后就可能变得不利的社会制度。

休斯（Hughes，1982）已经说明，柏林和芝加哥在电力的应用上走在了伦敦的前面，这部分地是因为英国技术标准的混乱以及新的基础设施的管理不当。所有这些论点都说明，各种各样的"不协调"现象在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技术和文化之间的不协调、技术和政治之间的不协调、技术和经济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出现了技术和科学之间的不协调。在19世纪中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英国的

相对衰落。甚至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也没有预见到，因为作为欧洲大陆追赶理论的杰出支持者，李斯特到死都相信，德国不可能超过英国。在此之后很久，到了20世纪60年代，“依附论”的理论家们对美国和西欧的优势印象太深了，以至于他们相信，对于亚洲、拉丁美洲或者非洲的国家来说，甚至连追赶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后来者来说，先行者的优势最初确实是压倒性的。先行者不只是明显地在技术上具有无懈可击的领先地位，而且它们也享有许多静态的和动态的规模经济，在世界市场上享有具有威望的特权地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成功的追赶常常被看作是“奇迹”（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奇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奇迹”）。但是，如果任何过程被看作是一种“奇迹”，那么，它应该是“超越”而非追赶。

现在，美国与其主要的竞争者相比似乎具有巨大的优势。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成功追赶是基于他们在硬件设计、开发和制造上积极的学习。然而，现在对于商业成功来说，软件设计①、开发、生产和营销日益成为关键性的因素。美国在这些方面具有某种相当大的优势。目前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软件产业，具有在商业应用上的较大范围的规模经济，由此导致了英语在软件产业上普遍性的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因特网——一种全球性的基础设施上，美国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都占有支配性的地位。最后，美国企业也在许多其他服务产业上具有领先地位，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也使其在军事领域建立起了一种唯一的“超级霸权”的地位。这种实力可以被用来保护美国企业在世界上的利益，包括他们的知识产权。

然而，我们不可能预测到美国的这些优势可以保持多长时间，尽管知识产权的限制不断在加强。许多国家，包括东欧、东亚、拉丁美洲和具有强大英语能力的国家如印度，都拥有快速发展的年轻的软件企业。而且，政治和社会环境也比更狭义的技术和经济因素更重要。

社会科学家比生物学家面临着更复杂的问题，因为创新者面对的“选择环境”不只是自然环境，而且是人类社会中几种不同的亚系统——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这些亚系统

① 本文中所谈到的软件似乎不能只理解为计算机软件，可能范围要宽。——译者注

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技术的成功扩散取决于它们之间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的建立。

21 世纪，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使经济和政治发展形态与 20 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形态相当不同。环境友好的技术的发展和它们普遍的扩散将对一种更强调合作性的文明产生强烈的需求，将需要一种全新的制度变迁和知识积累的形态。在科学、技术、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上大量新的可能性意味着，尽管美国目前仍居支配地位，但基于美国霸权的持久趋同是相当不可能的。维奥蒂可能低估了在追赶型国家中激进创新的新集群的可行性。

自然环境是所有生物都必须面对的环境，但是，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人类所创造的产物是独一无二的人工过程，虽然人类也像其他动物一样，需要食物、居住和交流。虽然有一些鸟类和哺乳动物也使用细枝、粗枝和石头等“工具”，但是，对于工具和其他人类制造物的系统设计和改进却是独一无二的有目的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有相对自主的选择环境。经济学家们常常使用生物学类比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性的企业行为进行分析，假定“最适企业”的生存。这是一种把类比再借回的情况，因为达尔文理论最初就是从经济学中借用了这种类比。但是，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在它们的竞争斗争中所面临的选择环境实际上与动植物的环境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种经济环境本身也在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快速地变化着。最后，政治体系和文化氛围是人类独有的，它们对经济演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正如它们也交互性对科学和技术的演化产生影响一样。只是与企业生存打交道的演化理论（Alchian，1951），或者只是研究人类制造物或国家生存的演化理论，对研究经济增长是不适用的（Freeman，1994）。

虽然我们可以相当合理地探求重复发生的形态，对重复发生和非重复发生的形态进行解释，但是，除了与具有唯一性的人类历史的特征打交道以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最明显的唯一特征之一就是人类社会中知识积累的速度和在个人与团体之间相当不同的吸收知识的模式。这些特征是普遍存在的，这说明经济增长史学家们对此持久关注是有道理的，也说明探求有规律的形态和新特征是必要的。

7. 对未来的推测

在未来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层次的创新体系的变化上，包括全球、大陆、次大陆、国家和次国家的各种层次。本文集中论述了国家层次的发展，并相信，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超越、追赶和落后这些重要的现象最有可能地用国家体系来加以解释。尽管我们研究的是国际层次上的不均等发展，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不均等发展在次国家层次上也是存在的。

上面所讨论的所有情况在21世纪都有可能发生改变。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能力可能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这反过来将导致有能力提供服务的企业和网络占据支配性地位。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模型主要是以制造活动为基础的，当然，虽然农业和服务业也总是被看作是重要的。现在，制造活动越来越转移到欧洲、日本和美国之外。主要的制造企业，如通用电气或爱立信公司在一段时间内已经把在其总营业额中增加服务活动的份额作为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制造活动类的岗位在这类企业中实质上已经减少，现在远不到一半的比例，即使这些企业仍常常被看作是主要的制造业组织。融资、营销、软件、设计和研发服务目前在大型跨国公司的多样化组合中常常居于支配地位。

这并不意味着制造活动将不再重要。它将一直是重要的，就像农业一直是重要的一样，即使农业在劳动力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大型跨国公司的活动）经常是分包性的，竞争力日益取决于对生产和营销的国际网络的管理能力，只要母国的基地能够对科学、技术、教育、金融和通信基础设施提供必须的支持，软件和硬件的研究、设计和开发这些核心活动就主要是在“母国”的基地进行。

在这些网络中的实力将取决于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和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但是，并不只是取决于这些。这些网络嵌入于社会系统之中，而在目前的社会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常见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平等被这些网络的发展加重了。在这些背景之下，环境和社会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尖锐。因此，在全球体系的所有层次上，在各种社会亚系统的复杂互动中，政治和文化变迁要先行。最终，对于任何创新体系而言，宽容、开明和社会团结是必要的。否则，就像哥穆尔卡所指出的，人们将拒绝现代竞争性的创新体系的持续不断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坚持生活质量目标的首要性。

参考文献

Abramovitz, M. A., 1986.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385 ~ 406.

Abramovitz, M. A., David, P. A., 1994. Convergence and Deferred Catch-up: Productivity Leadership and the Waning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CEPR Publication No. 401.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Adelman, I., 1963.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Albuquerque, E., 1997a. Domestic Paten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PRU (Brighton) and UFRJ (Rio de Janeiro), Mimeo.

Albuquerque, E., 1997b.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nd Non-OECD Countries: Notes About A Tentative Taxonomy, SPRU (Brighton) and UERJ (Rio de Janeiro), Mimeo.

Alchian, A., 1951.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211 ~ 222.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s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nd New York.

Bacon, F., 1605.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Bairoch, P., 1993.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Myths and Paradoxe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hicago.

Bairoch, P., Levy-Leboyer, 1981. Dispar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Balogh, T., 1963. Comments on the paper by Tinbergen and Bos. In: OECD, The Residual Factor in Economic Growth. OECD, Paris, pp. 180 ~ 187.

Baumol, W. J., 1986.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 run data sh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1072 ~ 1085.

Bell, M., Cassiolato, J., 1993. The Acces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New Technology. Mimeo, FECAMP/UNICAMP, Campinas.

Bell, M., Pavitt, K. L. R., 1993.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contrast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 157 ~ 210.

Cassiolato, J., Lastres, H. (1999) (Eds.), Globalização e Inovação Localizada: Experiências de Sistemas Locais no Mercosul, Ibict, Bras' Ilia.

Chabot, C. N., 1995. Long-run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M. Sc. Dissertation. SPRU, University of Sussex.

Choung, Jae-Yong, 1995.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of Korea and Taiwan: An Analysis Using Patent Statistics. SPRU, University of Sussex, STEEP Discussion Paper, No. 26.

DeBresson, C., 1989. Breeding innovation clusters: a source of dynamic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7, 1 ~ 6.

DeBresson, C., Amesse, F., 1991. Networks of innovators: a review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 Research Policy 205, 363 ~ 379.

De Long, B., 1988.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5.

Denison, E. F., 1962.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Denison, E. F., 1967. Why Growth Rates Differ: Post-War Experience 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De Tocqueville, A., 1836. Democracy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Dosi, G., 1988. Sources, procedures and microeconomic effects of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 1126 ~ 1171.

Edqvist, C., 1997a.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s in the system of innovation: the state of the art. TEMA-T, Working Paper ISSN 1101 - 1289. University of Linkøping.

Edqvist, C., 1997b. Systems of innovation approaches—their emerg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Chapter 10. In: Edqvist, C. (Ed.), System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s. Pinter, London.

Foray, D., 1991. The secrets of industry are in the air: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the organisational dynamics of the innovative firm. Research Policy 20, 393 ~ 405.

Freeman, C., 1993.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catching-up: ICT and the NICs, chapter. In: Fagerberg, J., Verspagen, B., von Tunzelmann, N. (Eds.),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Trade and Growth.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Aldershot, pp. 198 ~ 221.

Freeman, C., 1994. The economics of technical change: a critical survey articl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8 (5), 463 ~ 514.

Freeman, C., 1995. History, Co-Evo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95-76. IIASA, Austria.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

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Gerschenkron, A., 1963. The early phases of industrialisation in Russia. In: Rostow, W. W. (Ed.),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 Macmillan, London.

Gomulka, S., 1990. 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Routledge, London.

Grossman, G. M., Helpman, E., 1991.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IT Press, Cambridge, MA.

Hobday, M., 1995. Innovation in East Asia: the Challenge to Japan. Elgar, Aldershot.

Hu, Y. S., 1992. Global 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national firms with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Californian Management Review 34, 107 ~ 126.

Hughes, T. P., 1982.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00 ~ 1930.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Humbert, M. (Ed.), 1993. Th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on Europe's Firms and Industries. Pinter, London.

Jacob, M., 1988.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McGraw-Hill, New York.

Jang-Sup Shin, 1995. Catching up,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s: a Gerschenkronian study of late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h. 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Darwin College.

1374

Jenkins, D. T. (Ed.), 1994. The Textile Industries, Vol. 9. In: Church, R. A., Wrigley, E. A. (Ed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Blackwell, Oxford.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1, 62 ~ 78.

Kumar, N., 1997. Technology Gener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World Economy: Recent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9702. INTECH, UNU, MA.

Landes, M., 1970.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ist, F., 1841.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English Edition. Longman, London, 1904.

Lundvall, B.-Å. (Ed.), 1992.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Pinter, London.

Maddison, A.,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Development Centre, OECD, Paris.

Maizels, A., 1963. Industrial Growth and World Tra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NIESR.

Mass, W., Lazonick, W., 1990. 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state of the debates. Working Paper 90-06.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Mjøset, L., 1992. The Irish Economy in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Dublin.

Needham, J., 1954.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Nelson, R. R., 1981.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s: dead ends and new depar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 1029 ~ 1064.

Nelson, R. R. (Ed.), 1993.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Ohmae, K.,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Harper, New York. Patel, P., 1995. Localised production of technology for global market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 141 ~ 153.

Perez, C., Soete, L., 1988.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entry barriers and windows of opportunity. In: Dosi, G., et al. (Eds.),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Pinter, New York, pp. 458 ~ 479.

Porter, M.,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Free Press, Macmillan, New York.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1997-5. S. U. M. University of Oslo.

Romer, P.,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 ~ 1037.

Supple, B. (Ed.), 1963. The Experience of Economic Growth. Random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Verspagen, B., 1992. Uneven Growth between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An Evolutionary View on Technology Gaps, Trade and Growth. University of Limburg, Maastricht.

Viotti, E. B., 1997. Passive and Active National Learning Systems. PhD. Dissertation.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Villaschi, A. F., 1993. The Brazilian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Transforming Technological Dependency. D. 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World Bank, 199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World Bank, 1993. East Asian Miracle. World Bank, Washington.

Young, A. A., 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38, 527 ~ 542.

第十五章　技术变迁与作为移动目标的发展机会[1]

卡洛塔·佩雷斯

本文对发展提出一种解释，即把发展看作技术和社会能力的累积过程，而这取决于对相继（successive）的不同“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进行充分利用。机会窗口是由核心国家（core countries）每半个世纪就发生一次的技术革命所决定的，目前，这些技术革命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每次机会窗口出现时，产生进步的可能性取决于前一阶段的成就，取决于对下一阶段的性质的识别，取决于对技术经济革命范式的理解，取决于能否在每种情况下设计和达成正和博弈战略以及是否考虑了势力最强的企业的利益。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被采用的一系列发展战略进行概括性评论。然后，本文描述了下一阶段可能具有的性质，并运用当前的技术—经济范式原则对将要发生的制度变迁的部分内容进行探究。

1. 技术变迁和发展

通常，技术被看作是由专门机构所负责的发展政策的专业领域。然而，本研究认为，技术不仅仅是发展战略的一种构成要素，而且也是发展战略能否实现的一个条件。发展机会是一个移动的目标。任何对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发展进程作过

① 原载 CEPAL Review, No. 75 (LC/G. 2150 - P/I),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December 2001. ——译者注

严肃考察的人都必定承认，各国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是逐渐形成的，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方集团国家进行了产业重组（redeployment），而南方集团国家则推动出口，这表明并让人们看到了获得新的和更广泛的进步的希望，我们有希望不断获得进步。随着基于保护和补贴的模式在那些试图坚持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中出现失灵甚至不断恶化，钟摆已经摆向了另一个极端，以前通过这种模式所获得的所有成就现在都被人们否定了。这为那些倡导将自由市场当作获取满意结果的唯一途径的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即使我们仍然没有证实这种政策的效果。

本文认为，发展机会是随着发达国家相继的技术革命而产生并发生变化的。只有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展现出互惠的前景时，技术和生产设备才能被人们自愿转移。进口替代战略是成功的，因为它代表了发达国家的成熟产业所进行的正和博弈，这些成熟产业当时正面临着技术衰竭和市场饱和的困境。然而，随着信息革命的爆发，这些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出现了另外一些可行的选择。

本文以这些解释为基础，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发展战略，就全球化进程和信息时代的挑战而言，这种考察是相当有用的。首先，为了理解发展机会得以产生的条件，并决定这些发展机会的性质，本文分析了技术的演化。其次，文章着重讨论了如何把发展当作学会充分利用这种变化着的机会的一种途径。通过考察最近50年来各国所采用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以及世界经济力量集中化（concentration）给下一阶段带来的挑战，本文阐述了这种途径。最后，本文研究了应对新的“灵活网络范式”（flexible networks paradigm）所需要的某些制度条件。

2. 产品周期、发展和进入障碍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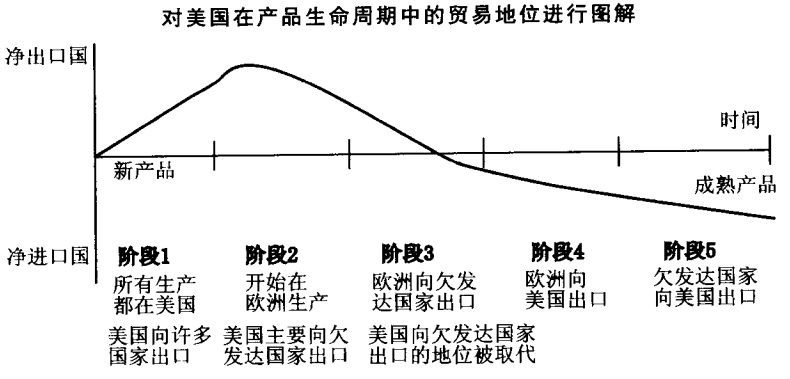
在工业化道路上，将进口技术当作工业化过程的必然阶段，这种思想来自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即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经验。直到最近，技术进口的作用仍然得到了证实——日本迅速转变成一流国家，四个“四小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成功都归功于从最发达的国家引进技术，然后尽其所能地采纳、适应、调整和掌握相应的技术诀窍（Freeman，1987；Amsden，1989）。然而，越来越多的例子也表明，在同

一时期，许多国家在推动发展上却收效甚微，即便它们为利用进口技术而明显地采用了相似的程序。此外，许多国家甚至整个地区——比如非洲和南亚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似乎都丧失了从前所取得的成就（Mytelka，1989；Katz（ed.）1996）。

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原因，可以部分地通过每一阶段所采纳的专门政策得到说明，也可以部分地通过每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得到解释。在更深层次上，这些原因与领先国家的技术演化所产生的机会窗口的性质有关，也与有意识地或从直觉上利用这些机会窗口的能力相关。因此，有必要考察对技术发展和扩散方式进行专门研究的大量文献。

2.1　产品生命周期与技术在地理上的传播

最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可能性进行分析的研究是由赫希作出的（Hirsch，1965）。赫希按照产品周期对传统电力产业的行为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揭示了技术趋于成熟后优势是如何转向欠发达国家的。在对产品周期文献进行研究时，威尔斯（Wells，1972）描述性地总结了美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进程（见图 15－1）。



资料来源：Wells（1972），p. 15.

图 15－1　技术成熟过程中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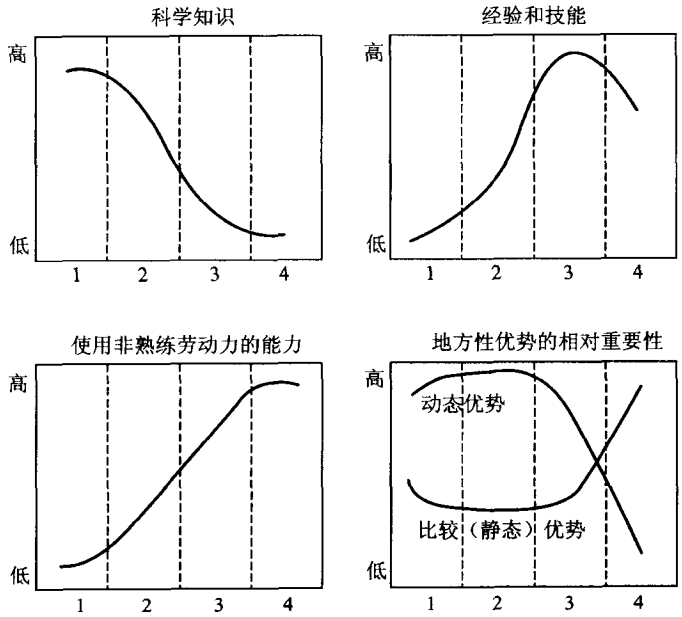
生产首先是从发源国家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然后再转移到欠发达国家，这种转移过程揭示了列昂惕夫悖论所蕴含的过程，即美国的出口比进口含有更高的劳动力成分（Leontief，1954）。这种情形是技术领先国家未曾预料到的，它与技术演化不断变化的特征有关。技术往往在初期会更密集地使用劳动力，以及使用成本相对较高但具有高水平知识和资格的人力资源。[1]然而，当技

术趋于成熟后，技术的使用就会是一个高度标准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过程。

假定在外围地区有补充力量在吸引技术转移，从而启动发展进程，那么，在技术成熟后，就会有力量推动技术从中心向外围扩散。虽然这种现象最适用于消费品和一些基本的资本品，但是，它们所覆盖的产品范围较广，足以作为我们的分析起点。

2.2　在成熟的技术上不可能存在追赶的机会[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生产过程开始明显以资本的密集使用为特征时，优势恰好转向了资本缺乏的国家。当达到这个阶段时，任务就变成常规性的了——见图 15－2[3] 中的第四阶段——以至于生产已经不需要许多先进的技能或者富有经验的管理者了，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使用非熟练劳动力。随着技术和市场趋于成熟，决定性的优势是比较成本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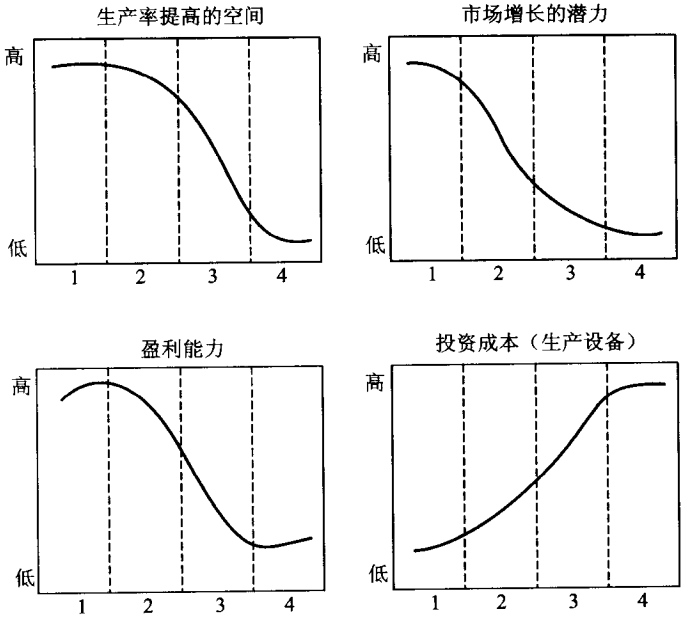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基于佩雷斯和苏蒂（Perez and Soete，1988）以及赫希（Hirsch，1967）的论著。

图 15－2　进入要求随着技术趋于成熟而发生变化

以成熟技术为基础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追赶的过程吗？由于种种原因，这是极其不可能的。正如图 15－3 所示，成熟技术已经

达到了一个点，在这点上，它们只有最小的生产盈利潜力，面临着停滞的市场，并且几乎没有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因此，一般而言，把成熟阶段当作起点成本是很高的，它既不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也不是非常有前途。即使如此，就创建基本的工业化平台、形成学习能力、建立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对发展的努力给予支持的其他外部因素而言，它仍然可能是最好的起点。



资料来源：基于 Gerschenkron（1952），Cundiff and others（1973），Kotler（1980）and Dosi（1982）.

图 15－3　技术潜力随着技术趋于成熟而变化

然而，追赶意味着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是由当地创新和市场的不断扩大所推动的。这就要求尽早地进入市场。令人十分吃惊的是，除了技术成熟阶段外，较弱的竞争者面临可以打破的障碍的其他时刻并不是在第二阶段或者第三阶段，而是在第一阶段。这碰巧是最有希望的进入点，因为，正如图 15－3 所示，这时，潜在的利润是高的，市场和生产率提高的空间也是充足的，而投资成本却相对较低。即便是研发投资的成本也往往比原始创新者的成本要低。

人们可能认为，只有发达国家的企业才能获得这个阶段所要求

的高水平知识（参见图 15－2）。但是，如果新产品出现于技术革命的早期阶段，那么所需的技能就往往来自公共领域（比如，可以在大学里获得）。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来自硅谷最近的实践，以及全世界上成千上万成功的模仿者。在这些例子中，所要求的先行的（prior）经验并不是很多，实际上，拥有先行经验甚至可能是一种劣势，因为技术革命需要新的管理模式，而这种新模式则使以前的模式过时了。

其他的约束因素与周围环境相关。能否成功地使用新技术取决于一些重要的互补性因素，比如动态优势和不同类型的外部性，尤其是物质的、社会的和技术性的基础设施；或者是否存在有能力而且有需求的本地顾客。这些要素可能和成熟的技术一起在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或者它们可以通过密集的学习过程以及为改善社会和经济环境而进行的投资来获得。

因此，看来通过使用成熟技术，然后充分利用技术基础来取得新的和动态的技术，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积累技术和社会能力的战略。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相继的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特定机遇。对于那些想要设计可行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面地理解技术在发达国家是如何演化的将是有用的。这正是我们在下一节将讨论的主题。

3. 技术、体系、革命和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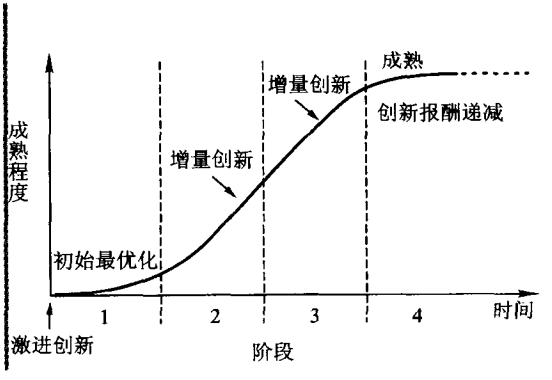
技术的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技术在体系内相互联系，从而相互纠缠、相互依赖，而且与物质、社会和制度环境相关。

大多数技术学习是逐步的和渐进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不可避免的亦步亦趋的向更先进但总是不可抵达的前沿爬行的过程。一些重要的间断存在着，可以成为后来者跨越式发展的机会窗口。这些机会以技术革命的形式发生，并与技术进步的方向的激烈变化有关；它们以放弃先前积累起来的许多管理诀窍、部分先前的设备和相关的专门化知识为代价，为绝大多数活动的现代化提供了手段。带有革命性质的新技术为学习和追赶开启了新的机会。连续和不连续的技术变迁相互作用，这解释了发展的机会窗口为什么以及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

3.1 技术轨道和经验积累

尽管绝大多数技术有一些特定的差异，但是，往往从初始的技

术创新到技术成熟的过程中，它们在变化和改进的速度与方向上都遵循着类似的轨道。这种演化或多或少是与技术市场的演化相一致的：从技术引进到技术饱和都是如此（见图 15－4）[4]。



资料来源：基于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77）、多西（Dosi，1982）、弗里曼和佩雷斯（Freeman and Perez，1988）、沃尔夫（Wolf，1912）、艾伯内西和厄特巴克（Abernathy and Utterbak，1975）及其他作者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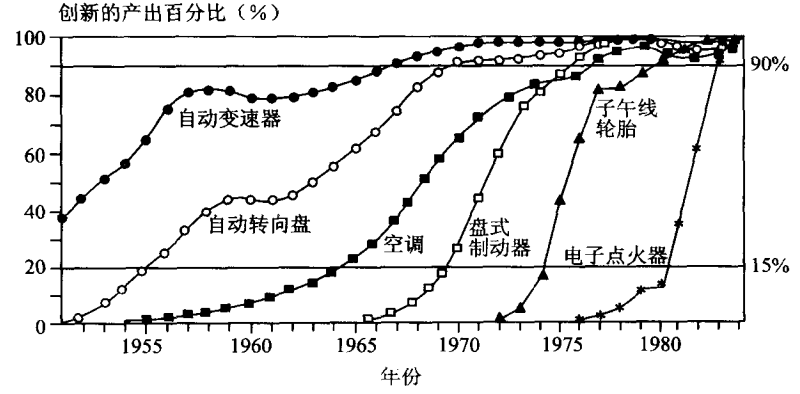
图 15－4 技术的演化：技术轨道

在一种激进创新导致新产品出现、从而产生一个新产业后，就会有一个密集创新和最优化的初始时期，一直到这种产品在相应的市场上获得认可为止。技术创新与市场的交互作用很快就决定了技术改进的方向，从而往往决定了一个主导设计（Arthur，1989；David，1985）。从那时起，随着市场的成长，连续不断的渐进创新将提高产品质量、生产过程的生产率和生产者的市场地位。这个过程最终在技术成熟时达到高潮，然后，对创新的新投资就开始呈现出报酬递减的趋势。整个过程到底是持续几年还是几十年取决于产品重要性的不同。在后一种情况下①，“改进”总是要采取连续不断的模式。

在第一轮创新后，正在开发这种技术的企业就赢得了优势，它们不仅获得了专利，而且——或者更重要的——还积累了与产品、生产过程和市场相关的经验。这往往使相应的一般化和专门化技能都掌握在生产商及其供应商手中，从而使新的进入者越来越不可能进入。这种经验也加速了对创新的采纳，以至于（产品生命周期

① 后一种情况下是指主导设计出现后的情况。——译者注

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创新也被纳入于其中了，这使得后来者对领先者的追赶更加困难了（参见图 15－5，该图阐明了这种现象，图中所用的例子来自汽车工业的连续创新）。



资料来源：Jutila and Jutila，1986，引自 Grubler（1990），p155.

图 15－5　后续创新周期的缩短：美国汽车工业相继的技术扩散

3.2　技术体系和社会能力的创造

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体系内的其他技术相互联系的，这使得各种技术之间相互支持，从而可以充分地利用经验、供应商的发展、消费者教育以及其他由该体系内的先行者们所创造的外部性（Freeman，Clark and Soete，1982）。

技术体系沿着与单个产品相类似的路线演化（参见图15－4）。新产品代表了体系内的增量性改进（incremental improvements）。在最初的两个阶段，有许多非常重要和拥有长生命周期的产品；后来，这些产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减退，直到最后一个阶段，这些产品的重要性降低，而且生命周期也变短了（如图15－5 中的盘式制动器（disk brakes）和子午线轮胎）。

图 15－6 提供了来自家用电器的技术体系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体系从冰箱开始，到洗衣机、吸尘器，直至后来扩展到一系列新的产品以及早期产品的改进型号。它们往往先后达到成熟状态，同时伴随着最新的微小创新被引入到体系中，比如电子开瓶器和雕刻刀。这张图也表明了体系是如何在特定地区形成的，它归功于零部件供应商和服务网络的扩张，以及普遍框架和其他制度性机构的逐步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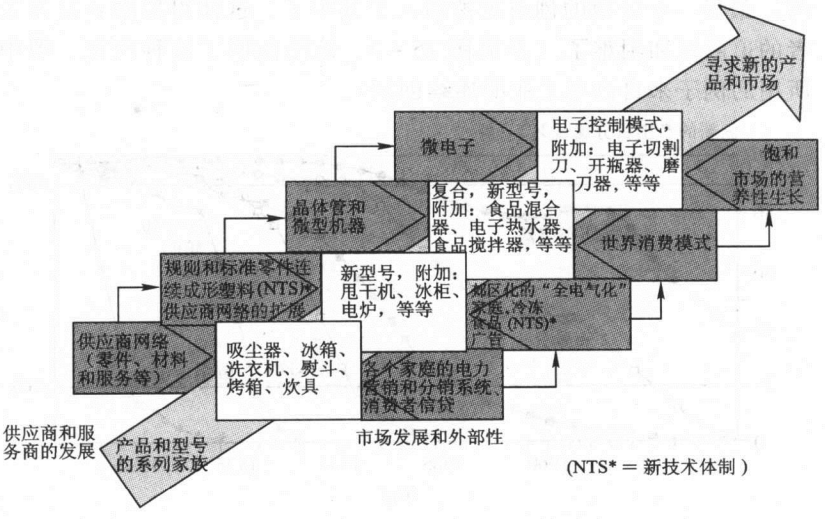


图 15－6　技术体系及其环境的共同演化：家用电器的例证

“硬”要素和“软”要素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加，这是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1986）在 1986 年讨论的部分内容，当时，阿布拉莫维茨批评把发展概念当作简单的资本和劳动积累，他强调了获得社会能力的必要性。这也与相互作用的行为者所形成的国家或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有关（Freeman，1993；Lundvall，1988 and 1992）。

由于复杂的、相互支持的活动和制度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通过成熟技术的转移推动发展过程就会遇到某些限制。它也支持了一些人的观点，即建议把希望寄托在传统、地方能力和特定的地方知识上的一些观点（Porter，1991）。最后，它也表明，需要用这种行动来有效地支持发展中国家里领先企业的生存。

3.3　技术革命和相互联系的体系[5]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一系列技术体系，这些体系逐步为新体系的出现创造必要的条件，而新体系则遵循类似的原理，并从同样的外部性中受益。图 15－7 和图 15－8 展示了这种新技术爆发的两个例证：一个是大量生产革命，它具有一系列相继的体系，最早形成于 1910 年左右，到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趋于成熟；另一个是信息革命，它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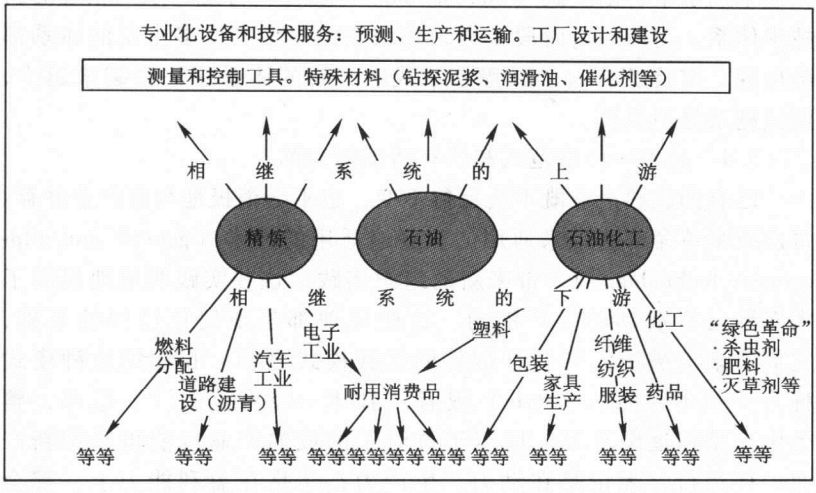


图 15－7　大量生产革命：1910 年产生的技术体系及其随后不断扩展的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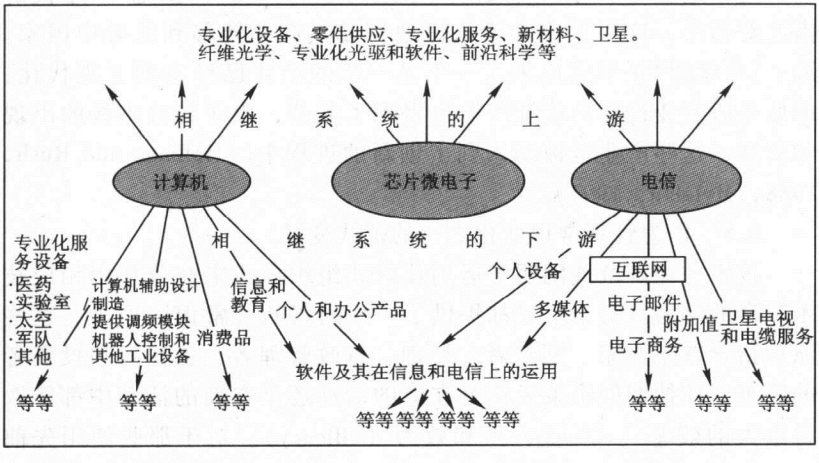


图 15－8　信息革命：1970 年产生的技术体系及其随后不断扩展的网络

从每次技术革命的核心产业的上游到下游，创新和技术体系都成倍增加，从而解释了每一个这样的新技术集群为什么有可能大量增长。这个过程为创新、扩张和增长开拓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初始创新与这个领域的“发现”相对应，而技术成熟和耗竭阶段则与完全“占领”（occupation）这个领域相对应。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图 15－4 和图 15－5 可以被解释为技术革命的一个生命轨道。

在这个例子中，渐进式（incremental）“改进”将是一系列相继的新技术体系。与前面的阶段一样，在增长的早期，许多主要的体系都会出现，但是随着这个过程趋于成熟，新的体系往往会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不重要。

3.4 技术—经济范式和所有活动的复苏

已有的成熟产业既不会保持不变，也不会消极地与新产业并存。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通用的和普遍适用的技术（generic and allpervasive technologies），带来新的组织实践，这些实践明显地提高了大多数已有活动的生产潜力。这些原理都是现代化过程的基础，它们逐渐地被纳入到一种最佳的实践模式之中，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技术类型”（style）或者“技术—经济范式”[6]。结果，整个生产结构逐渐复苏，以至于过时了的成熟产业也能再次像新产业一样运行，无论是在动力、生产力，还是在盈利能力上，都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这个过程可以对一些人的失望进行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的南北对话中，这些人曾希望永恒地将成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又一个的产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即使是服装业这样的传统产业也得到了复苏，由于细分市场的出现和发展，这些产业也被纳入到了创新的进程中（Hoffman and Rush，1988；Mytelka，1991）。

3.5 作为管理常识变化之一的范式变迁

技术—经济范式阐明了运用技术和组织模式来充分利用相应技术革命的潜力。每个范式都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常识”原理，这些原理指导着企业家、创新者、经理、行政管理者、工程师和投资者的决策，使他们的决策无论是在老的活动还是在新的活动中都能取得最大的效率（efficiency）和效力（efficacy）。对于那些使用先前的范式获得满意结果的人来说，采用新范式的过程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这同时也要求他们放弃通过很大努力才取得的大量经验，从而让他们感到整个世界似乎被颠倒过来了（Peters，1989；Coriat，1991）。

图15-9表明，随着从大量生产模式向灵活网络模式转变，管理标准在从产品选择和组织结构设计到运行方式、人员等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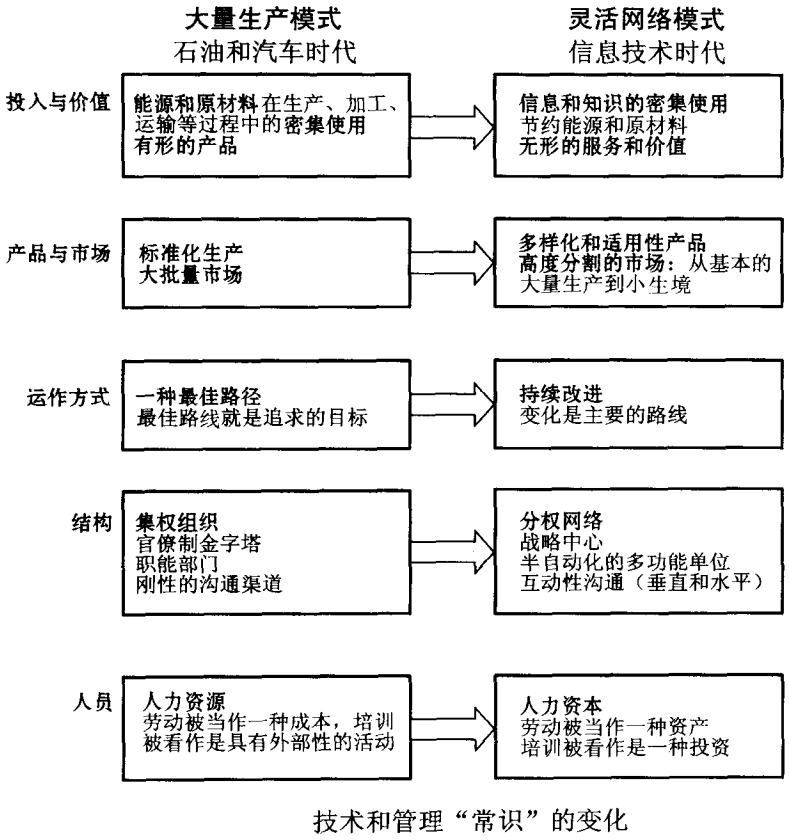


图 15－9　范式的变迁

全球化和政治分权化趋势等现象也与范式的转变有很大关系，正是随着范式的转变，才产生了新的可能，从而能够提供充分利用这些可能的最有效的方式。可以认为，熊彼特把技术革命描述为“创造性破坏”过程的观点，不仅适用于经济，而且也适用于政策和制度。[7]变迁的过程是不容易的，向新的实践转变可能需要 20 年或者 30 年的时间。然而，这些新范式最终都会成为普遍的常识，并被认为是自然的和正常的方式。

新的后来者（newcomers）或者那些在先前范式中一直没有获得成功的行动者，只需要简单地转向学习新的实践，而已有的领先者则不得不“忘却”（unlearn）老范式的大部分内容，采纳新的范式。在以前的情境下获得的经验以及进行的大部分投资，都会变得过时，

不得不被新范式所取代。这个更新过程是长期的，而且是困难的，以至于后来者可以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通过对新的基础设施进行早期投资、创造合适的促进制度等而被强化（Pérez，1983 and 1986）。

4. 学会利用变动机会的发展

粗线之间描绘的图形说明（见图 15－10——译者注），技术演化是一个过程，它涵盖了从资本主义体系的竞争本质中衍生出来的持续和间断的时期。在微观经济层面上，每个激进的创新都会有一个间断，接下来则会有一个持续的演化，直到提高生产力和利润的可能性下降、开始寻找其他激进的创新为止。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相继的技术革命在经济体系中产生，带来了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产业的群星会聚（constellations）。这些重要的间断最初发生在已经工业化的核心国家集团中，引起了快速的增长。在这些国家中，除了新产业的激烈扩张以外，技术间断还推动并逐渐恢复了绝大多数已有的产业。在这个演化过程的末尾，整个产业都趋于成熟，开始向外围地区扩展，而核心国家则开始进入下一个大的发展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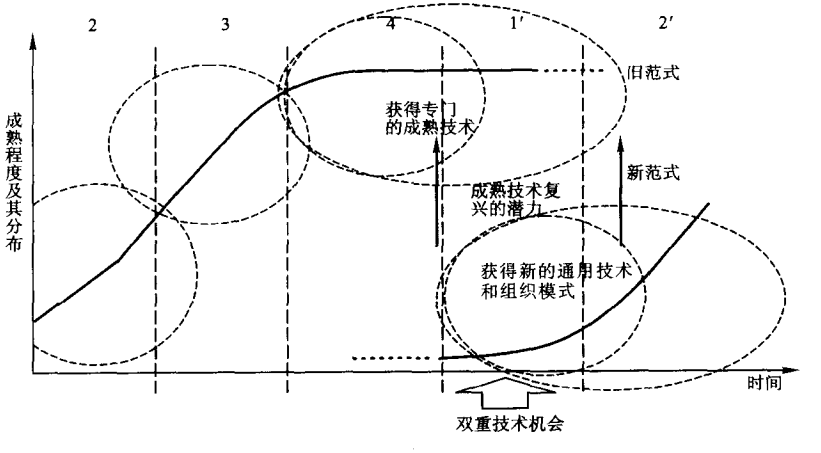


图 15－10　跨越式发展的最好时机是在转变时期

因此，发展中国家是在追求一个移动的目标，这个目标不仅一直都在前进，而且差不多每半个世纪就会改变一次方向。如果不把自给自足当作一种选择，那么，发展就是学会玩这个经常移动和变

化的游戏，而这个游戏是一个权力游戏。这会成为另一种版本的依附论吗？毫无疑问，这牵涉到北—南和核心—外围的概念，但是，通过采用适当的政策，它同时也提供了打破欠发达的恶性循环的可能。那些理解这个游戏，而且把这个游戏玩得不错的人能够找到一条大步伐追赶和跨越的道路。“四小龙”提供给我们的真正启示并不在于可复制的处方，而是对如何使发展成为可能的特定动态的理解。为了获得这种理解，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最有利于发展的条件会发生在范式转变的时期。

4.1 范式转变时期是出现双重技术机会的时期

在大约 20 年左右的时期内，当一个范式向另一个范式转变时，老的技术与新的技术是并存的。前一范式中的大多数成熟技术正在扩展，它们试图克服在生产和市场增长上的局限，为了生存而需要在地理上进行扩张。与此同时，新技术得到开发、繁荣和迅速的增长，出现了较大的利润空间。这是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典型情况，它引发了一个离心趋势，在这种趋势中，富人、现代化人士和成功人士变得更加富裕，而穷人和弱势群体则变得更加贫穷。不过，矛盾的是，在这些时期内，当社会和经济条件最为恶化的时候，却会出现最好的机会。在范式的转变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机会窗口同时被打开了：在阶段一，出现了新技术的机会窗口；在阶段四，出现了成熟技术的机会窗口（图 15 - 10）。

虽然成熟产品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提供增长，但是，它们不能推动追赶的进程，因为它们的创新潜力大部分被耗尽了。然而，在范式转换过程中，有一个实现跨越发展的极佳时机。新的通用技术和组织原理能够被人们运用，使得成熟技术（甚至包括传统技术）实现现代化和更新，比如，这种情形发生在日本的汽车产业和其他部门中，发生在韩国的造船和钢铁工业中，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外科手术设备上（Nadvi，1999），发生在哥伦比亚的鲜花出口业以及智利的鲜鲑出口上。[8]在这个转变时期，也可以直接进入新产业，比如，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企业进入微电子产品和软件产业。那么，问题是如何成功地通过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在这个努力过程中，许多明亮的早期新星逐渐消失了。要想继续参与这种竞赛，就必须得到来自以下多方面的支持：经济环境、持续创新、资本密集型投资，可能还需要能够操纵市场和联盟。韩国的存储

芯片就是这类成功的例子，虽然每一个例子都会有非常特殊的条件。

在这种特定的范式转变中，一个非常强大的第三种可能性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出现了。与大量生产范式中的工业在走向国际化之前首先要在国内成长的方式形成对照，在这个特定范式中，许多产业从第一阶段开始就已经在全球层面上运作。这也为从多方面通过各种安排来参与全球网络提供了可能（Hobday，1995；Radosevic，1999）。这种范式也允许在当地从事生产，而后通过全球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这可能是通过单一的企业进行的，也可能是通过组织合作性的簇群（cooperating clusters）来进行的[9]。

4.2　“与狼共舞”[10]或力量结构问题

为了全面理解获取技术的条件，我们有必要考虑力量结构。进入障碍的性质变化与我们讨论的产业竞争与集中的水平和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一阶段的性质都对参与其中的企业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并且逐渐调整它们的主要注意力和兴趣。

表15－1以特定的形式对竞争模式和力量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概述，它将演化中的产业、技术和市场作为典型，指出了每一阶段的机会窗口的“大小”（size），以及每一个期望进入者所必须履行的条件，不管这些期望进入者是依赖性的（比如参与现有企业所实施的战略），还是作为市场的直接挑战者而自主地采取行动的。

表15－1　竞争模式和力量结构的变化是影响进入可能性的因素
（根据技术演化的阶段作出区分）

	产品及其技术的生命周期阶段			
	1. 引入	2. 早期增长	3. 后期增长	4. 成熟
焦点：竞争要素	产品质量；市场检验	生产效率；市场进入	市场规模和力量	较低的成本
竞争和力量	许多新的竞争者不可预期的结果	产业成形；企业成长并为市场份额竞争 领导厂商出现	集中趋势；巨大而复杂的结构；垄断、卡特尔等	金融力量。寻找扩展已有产品生命周期的新的盈利机会和方式

续表

	产品及其技术的生命周期阶段			
	1. 引入	2. 早期增长	3. 后期增长	4. 成熟
自主进入的情况				
窗口规模	**宽**	**窄**	**非常窄**	**扩大**
试图自主进入的基础	**知识**：（在不违反专利法的情况下）为创造特定地位（niche）而在当地技术诀窍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和创新的能力	**知识加经验**：在加工和营销技术方面（品牌的重要性或者市场准入的特权）	**经验、金融力量和对市场的控制**	**比较优势**： 成本 学习能力 复制能力
（由挑战者引起的）自主进入的性质	**获取市场认同的自由竞争**，也许要建立主导设计；在这里，专利可能是重要的	**为了获取成长着的和高盈利性的市场**，采取进攻性竞争 可能要建立联盟	**吸纳或排斥最弱的参与者** **可能要建立卡特尔**	**与其他低成本的生产商进行竞争**；购买（或者复制）成熟的技术和技能或者进行恢复活力的创新
依赖性进入的情况				
窗口规模	**窄**	**非常窄**	**扩大**	**非常宽**
对依赖性进入进行谈判的基础	**比较优势或动态优势** **互补性资产**	有吸引力的市场；作为一个供给者或者为获取资源或市场的有利渠道的竞争	**大市场** 已有的或者可能产生的**外部性**提高收益的其他方式	**比较优势**： 在成本、获取融资、**学习能力上**的比较优势

续表

	产品及其技术的生命周期阶段			
	1. 引入	2. 早期增长	3. 后期增长	4. 成熟
窗口规模	窄	非常窄	扩大	非常宽
依赖性进入的性质或者与其他企业建立联盟的性质（通常是由后者的所有者推动的）	**联盟**；（为了增强竞争潜力）对分享互补性能力和/或资产的**相互利益进行谈判**	**作为一个供应商或者贸易代表**	**作为结构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供应商、生产者、分配者或者服务于任何其他更有势力的企业的力量战略和扩展计划的能力）	**生产合约或者建立互有收益的合资企业**（获取成熟技术和市场准入）

这个典型化的大纲不可能概括所有的情况，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这篇简短的论文中对所有的变量和细微之处进行考察。然而，表15－1能够为我们进行一些重要的观察提供一个参考框架：

（1）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产品和产业处于不同的阶段，所以，为了能够识别可能的联盟或者竞争者的利益，并对其力量进行评估，有必要对特定技术的演化阶段和不同分割市场中流行的竞争模式保持敏感并获取充分的信息。为了改善决策过程，并设计谈判的战略，对资产价值和自有企业的能力进行评估是有用的。

（2）识别技术革命目前所处的阶段也是重要的。因为这种革命涉及许多不同体系的协同演化（co-evolution），在它们开始的前几十年里，也就是在阶段一和阶段二，会流行一些重要的新技术，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技术会趋于成熟（阶段三和四），直到它们与新的范式转变阶段重叠。因此，每一种技术的新机会窗口都非常明显地伴随着范式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这影响到了企业和国家的战略。

（3）最后，在是依赖性进入还是自主进入的选择上，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特定企业的条件。为了清楚地识别可能的合作者或竞争者目前的和未来的利益，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力量结构的演化。企业越弱，学会与有势力的“狼”共舞（甚至要区别不同的“狼”并且

要发现如何吸引这些“狼”）也就越重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能通过谈判加以利用。在一个零和博弈的竞争中，发生冲突是必然的。必须避免的是在对相互有益的协议进行协商时将协议双方看作是对立的。应该明智地认识到，政府通过进口替代或者出口推动政策对跨国企业施加了条件和约束，或者强迫它们在其国家建立机构（operations）。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实践中要谈判的是规则和激励框架，这个框架能同时解决双方的问题。这意味着，如果每一次都能够清晰地识别可能的联盟的利益和需求，那么，追求错误目标的危险就会得到避免，同时，也可以在完全了解自己所具有的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

从历史来看，怎样才能产生一种快速增长和发展的过程？是否可以从后面进行追赶或者跨越到领先者的行列？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对技术发展过程进行精心的管理，才能做到（参看 Lall，1992；Bell and Pavitt，1993a；Reinert，1994；Freeman，1994；Von Tunzelmann，1995）。总的来说，这些都基于后来者与最发达者进行正和博弈，并准备随着环境和结构的演化而改变博弈。

5. 经验积累和未来的机会窗口

回顾一下发展中世界近来的历史和所采用的各种战略，我们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之间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正和博弈，无论它们是有意识的还是直觉上的。对这种经验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用更健全的标准来展望未来。然而，正如已有的历史教训所表明的，我们必须对重复发生和独特性进行区分。在每一个范式的变迁中都存在着重复发生的变化模式，但是，每一个模式实质上都是独特的，因而需要从它们自有的独特特征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

5.1 创造和再造发展战略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审慎的国家干预的时代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则是在第三阶段大量出现的，在这个阶段，企业试图扩大市场、寻求规模经济、形成垄断、开拓国际市场。在那时，通过补贴和关税壁垒的保护，国家推进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这是一种正和博弈。通过将更多的“中间产品”（unassembled）出口给有更大盈利空间的海外分支机构，跨国企业使其最终产品的市场得到了成倍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虽然

这些工厂仅仅从事“用螺丝刀进行装配”（screw-driver assembly）的活动，但是它们及受到其需求所刺激的企业和组织为管理层和工人创造了一个学习的环境。它们对建筑服务、高速公路、港口、交通、电力、水资源和通信的需求，推动了周围地区的现代化以及许多互补能力的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国家开始面临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局限，而在发达国家，许多产品和产业正在进入第四阶段：成熟和饱和。这时，技术转移和出口推动的政策作为互利关系的新形式开始出现了。这个过程包括将成熟技术转移给公共和私人企业，也包括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地区为生产转口（re-export）产品而建立分支机构。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跨国企业已经进入了产业重组（redeployment）的过程，因而它们把大部分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了向发达国家的大量出口。巴西和韩国的“奇迹”以及许多国家的“出口加工区”使我们产生了这种印象：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出现。建立南北对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些希望而进行谈判。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再次被改变了。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微电子革命的许多产品正抵达第二阶段。此外，日本已经重新恢复了汽车产业的活力，而且它们的新的组织范式使美国和欧洲的竞争者发生了剧烈的改变（Altshuler and others，1984）。发达国家的大多数老产业在滞胀中抵达了成熟阶段；出口市场开始萎缩，债务危机在第三世界爆发。它们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战略。

然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并没有这么做，它们度过了可以贴切地称之为“失落的十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通过占领增长速度最快的革命性产业的前沿和尾部的一个又一个地位，“亚洲四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它们也通过现代化实践，参与全球企业网络，比如成为原始设备制造（OEM）供应商的组成部分，使其成熟技术重现活力。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存在着对密集型学习和人力资本的强调，存在着对技术的积极消化的强调，因此，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因素（Amsden，1989；Ch. 9；Bell and Pavitt，1993b）。这与同一时期内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仍然普遍流行的、更多是被动的“技术转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图15-11表明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发展战略是如何适

应由一个范式趋于成熟而下一个范式开始出现所带来的机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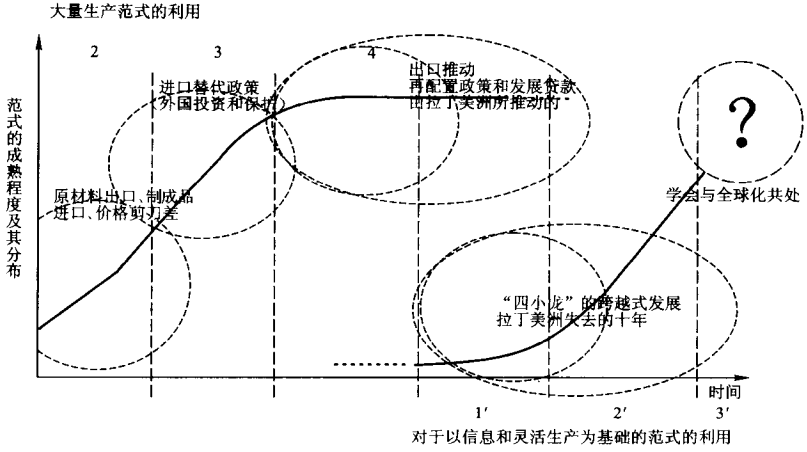


图 15－11　作为移动的目标的机会：
发展战略因范式演化的不同阶段而改变

20 世纪 90 年代的特征是：新的电信基础设施得到迅猛的发展，新兴产业被结构化，以及已有产业的现代化。随着一个又一个新兴产业抵达第二阶段，对市场地位的激烈竞争就开始了。自此之后，因为以下一系列新现象，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面临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全球企业和市场的出现，为获取主导设计和其他标准的支配地位而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复杂的合作网络，在各种活动的地理区位上追求动态和静态优势，市场细分，进行外包的趋势以及其他相关的行为。从所有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机会的性质及其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经济行为者及其运作的国家的条件与倾向。

发展中国家的试验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其结果上来看都是非常多样化的，这包括从现代化的“低技术密集出口加工区”（maquiladoras）和原始设备制造（OEM）合约到独立的和高度竞争的亚洲企业以及各种类型的合资和联盟（Hobday，1994）。在特定产业（比如印度的软件产业发展）中，相互联系的地方产业集群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些地方的产业集群在出口市场上已经获得了成功。在这一时期，“四小龙”继续取得进步，刺激了其他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生产。总而言之，采取了成功战略的国家和企业已经具备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学会生存的能力。

在系列战略中，每一种战略都有其优势和劣势，有自己的收益和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而其他国家只取得了微小的进步或者停滞不前；一些国家保持了已获得的地位，而其他国家则远远地落后了。导致这些后退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一些国家仍坚持那些已经不再有效的政策。必须承认，总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但这也有可能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缩小差距上存在着巨大困难，人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问题和机会的性质。

5.2　面对下一阶段

在新的世纪，为了充分地释放信息时代创造财富的潜力，新的条件迟早要被创造出来。20 世纪 90 年代是在各个领域进行各种试验的十年：在全球企业内部和外部；在国家、地区、城市和不同地点上；在经济中；在政府和其他机构中，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上。其结果是，有关灵活网络范式的“常识”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正在成为观察问题和做事情的常规方法。

21 世纪的来临，标志着向第三阶段的转型或者进入当前范式的后期增长时期①。许多产业的发展轨道已经抵达第三阶段，为了减少自由竞争的压力，它们正在寻求规模经济、向垄断阶段发展。各种各样的协议（agreements）、合并、收购和其他安排都使全球许多重要产业趋于集中，从而形成许多巨型企业或者大规模的全球联盟[11]。的确，这些企业控制了客户来源，它们的调停力量不断增加，有可能在现代信息和通信力量的基础上成为老的“贸易公司”的现代化翻版[12]。这些巨型企业是否有可能成为极大的全球化之“伞”，在其领域内囊括全世界的多样性并覆盖所有的细分市场吗？这种细分市场包括了从最专业化的或者奢侈品的市场到最便宜的和最为标准化的产品或服务，巨型企业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购销活动，并按照最大的优势在地理区位上配置每一种活动。

对于发展中世界而言，下一个发展阶段可能是一个接纳新兴力量结构的非常复杂的时期。对于企业、地点（locality）、区域和国家来说，找到一种如何与这些巨型集团进行正和博弈的途径是它们要面对的问题，这可能决定着它们下一个机会窗口的性质。当存在着非常特定的地方优势时，无论是建立独立的还是与全球网络联系

① 对范式演化中的阶段和金融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的完整分析，请参见 Perez，2002。该书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校订者注

在一起的地区网络或区域网络都是可能的。已经形成技术、组织、营销和谈判能力的国家和企业当然会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而不论它们是在全球化之“伞”下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安排，还是大胆地在其外部自主地壮大发展。无论企业、区域或者国家的力量是弱还是强，它们之间的合作都可能提高其领先者和代理人（agents）的谈判力量。

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新的机会窗口（而不是正在关闭的窗口），并同时认识、采纳和适应相关范式的潜力和特征，我们必须对国家、区域、企业或者网络的条件和所积累的能力进行认真的评估，从而制定出成功的战略。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相关范式的某些特征的含义。

6. 当前范式中的发展问题

企业、地点（localities）或国家的快速增长取决于丰富的技术潜力，以及为了充分利用这种潜力所采用的适当的组织形式。无论起点如何，也无论追求什么样的目标，现时代的成功可能都取决于人们对新范式的逻辑理解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各个方面创造性地采纳和适应这种逻辑的程度。

在大量生产的时代，旧的集权化金字塔模式对企业、政府、大学、医院和所有类型的私人组织以及公共组织都是有效的。然而，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现代企业——无论是全球性的企业还是地方性的企业——都已经完全重组了它们的活动，并且已经很快地理解了网络和学习型组织的优势[13]。现在，该是政府按照同样方向开始进行试验的时候了。

6.1 在发展战略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技术

人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日本迅速向前发展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出现了危机，但是日本仍然维持住了这个位置）归功于以下因素：日本在集体决定走什么道路时具有的对技术发展的远见以及为了进行密集性的学习、培训和创新所付出的努力（Peck and Goto, 1981; Irvine and Martin, 1985）。东亚“四小龙”从最初处在末尾的位置向前发展，同样也是与大规模的教育和学习努力分不开的（Ernst, Ganiatsos and Mytelka (eds.), 1998）。此外，成功的全球企业为了推动持续的学习和改进过程，已经对其结构进行改组并重塑了其行为。知识管理（Nonaka, 1995; Burton-Jones,

1999；Lamoreaux and others（eds.），1999）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企业不但要在所有层面上组织经常性的培训，而且一些企业甚至还创建了自己的“大学”（Wiggenhorn，1990）。

在发展中国家，认为重要的进步可以在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的情况下就获得是荒谬的。如果人们没有在社会、技术和经济诀窍这种简单的含义上掌握技术，那么，要想取得发展，这就像召唤魔法一样荒谬。过去，人们曾经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但在进口替代政策这种非常特殊的条件下，人们丧失了这种洞察力。在进口替代条件下，通过对成熟设备和技术进行投资，而无需进行密集性的学习和培训，许多国家曾一度取得了非凡的增长成就。

在目前的新范式中，特别地，发展能够充分利用信息和诀窍进行创新的能力，已经比过去更加重要。或许“知识社会”（Castells，1997；Mansell and When（eds.），1998）这个表达最贴切的含义就在于这种社会能为全体社会成员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创造条件。因此，增强个人和社会在创造财富上的学习能力就成了提升发展潜力的一种基本途径。

要想做到这一点，技术就必须在发展政策中占据一种核心的而非边缘化的地位。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采纳不同的方式来构思发展战略，并对教育和培训体系、科学和技术政策进行彻底的重塑（reformulation）。

在教育改革上，关键性的问题是要更新和提升教育的技术内容。或许甚至更重要的是，为了面向未来，并使教育与新的组织形式保持融洽，就必须对培训的方法、目标和手段进行彻底的改革（Perez，1992 and 2000；ECLAC，1992）。这种改革必须引导学生为自己的培训过程负责；必须强调“学会学习（learning to learn）”和“学会改变”（learning to change）；必须培育创造性的团队，教会学生设计问题和评估可能的解决方法；必须寻找到能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的方法；必须创造出必要的条件以使学生形成提出问题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而不只是提供答案的能力。

这些技能和态度正成为参与现代生产的基本条件。在现代生产中，企业面临着持续变化的环境，这个环境要求持续的改进。它们也使雇员或者企业家等个人与团体能够为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负责，为团体成员或领袖人物提供了改进共同体和组织都必须具有的组织能力。

另外一个重要的改革与“科学和技术体系”相关。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科学和技术体系是由一系列负责技术发展的政府机构所组成的。经验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能力把创新运用到生产之中。因为大多数产业都正在使用成熟的技术，因此，它们几乎没有能力吸收实验室技术人员的科研成果。人们曾试图在大学和产业之间“搭桥”，但这种尝试的失败导致大多数技术研究者成了科学界的附庸，这些研究者不仅采纳了科学界的方法，而且还采纳了它们的时间刻度（time-scales）、价值观和态度。

因此，在新的情境下，有必要在两个方面采取行动：一方面，对针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重新将技术发展的努力与生产网络和生活质量的立竿见影的改进联系起来。

从“供给推动型”（supply-push）的科学技术体系向生产者互动网络的转变导致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术语的出现（Freeman，1987；Lundvall，1988）。弗里德曼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制度网络，正是这些部门之间的活动与互动产生、引进、修改和传播了新技术”（Freeman，1995）。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来自于一种观念，它是一种社会性建设而非政府构建的结果，它包括如下要素：刺激创新并支持创新的环境；供应商、生产商和用户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质量；教育和培训体系；各种推动技术变迁的公共和私人组织；法律、规章、甚至对技术和变革所持有的观念与态度（Arocena，1997）。

6.2　再造“强有力”的国家[14]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有关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争论对于解决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是不适当的。市场和国家都是需要的，即使用一种新的方式对其重新定义并对两者进行组合，情况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按照当前范式的逻辑（尤其是在全球化大型企业出现的情况下），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需要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之间在各个层面上进行高水平的合作。

虽然这项任务的繁重和复杂都呼唤强有力的国家的诞生，但是，我们必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全能”（full-powerful）国家重新进行定义和再造，这种再造可以按照现代全球企业所采用的类似方式来进行。

没有人会认为，对巨型企业进行的集权管理会因为分权以及给

予这些企业在全世界的各生产商、工厂或者市场经理以高度自主权和生产的决策权而遭到弱化。计算机和通信使得企业能够轻松地对构成半自主权（semi-autonomous）单位（遵循战略指导）的众多结构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因为信息渠道是互动性的，所以，我们能够监督和控制相当复杂的网络，尽管这些网络有着灵活的构成并且是高度分化的。

我们可以按照所需要的强有力的公共部门的新结构来建构这类网络。正如先前技术革命中所发生的一样，一旦技术有助于确定组织的最优化结构，那么，这些网络甚至能够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也有效地运转。反过来，这也就为我们在需要现代技术的时候采用现代技术而准备了条件。

通过使各社会部门的行动朝着普遍认同的总的变化方向前进，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可以行使其领导权。在对不断扩张的全球网络或超国家网络以及自主性不断增强的区域、地方、甚至教区（parish）或者社区层级之间的协调上，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可以起到协调者的作用。

“力量分散”（diffuse of power）的过程也在发生（Strange，1996）。私人利益网络、市民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全球企业、媒体、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其他实体都使得发展主体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多样性不断增加，无论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全球层面上都是如此。国家必须能够在一国之内以及在超国家（supra-national）与次国家层级之间充当经纪人（broker），从而为所有参与者提供平等的机会。作为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意见一致的建设者（builder），国家可以更有效地行使权威，因为真实权力的基础将影响到事件的进程。

6.3　从全球角度着眼，但在地方层次上采取行动

在我们看来，积极的发展型国家的新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老的“中央计划”观念认为，要鼓励一系列民族工业去创造财富，为社会的进步提供资金，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这种观念。很显然，在每一个国家，必须发展一系列重要而具有竞争力的活动，这些活动与世界市场是高度相连的，而且紧跟技术前沿，它们推动增长，产生了必需的外汇。但是，这还不够。现在，摒弃“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的时间和条件都已经成熟，应该追求全体人民都直接参与财富创造活动的趋势。

当前范式的特征表明，我们将有一个更加一体化的发展形式，而在这个形式中，除了大型的、竞争性的产业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贸易往来以外，本区域的每个部分的发展都将各不相同。如果想不断提高所有人的能力、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环境，那么就必须通过利用产品的多样性和生产的竞争性规模，提高所有部门和活动的质量与效率——最为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持续的学习过程——来充分利用新的灵活性，才可能实现我们的目的。

为了推动发展项目，地方政府要识别其社区的生产潜力，促进共识，并保障地方企业和外国企业、银行、教育体系、其他地方和外部机构的广泛参与。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人们已经引用了很多（Tendler，1997；Gabor，1991；The Illinois Coalition，1999）。中小规模企业通过经济和技术发展合作从事出口活动（Navdi and Schmitz（eds.），1999），从而形成了地方网络。有人对这些集群或企业在同一地点的相关活动上发生聚集时所产生的互动进行了研究，他们建议使用“地方创新体系”（local systems of innovation，LSI）一词（Cassiolato and Lastres（eds.），1999），但是按照我们的观点，把它称作“区域性创新网络”（territorial networks of innovativeness）可能更为合适一些。

专门的银行为城市和农村人口提供“小额贷款”（micro-credits），帮助他们开展创收活动，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Otero and Rhyne（eds.），1994；Chaves and Gonzalez，1996）。这正逐渐打破一种说法，即认为只有就业才是改善所有人口生活质量的唯一方法，并鼓励多种形式的个体或集体的企业家活动。为了解决农村社区的困境，也要求人们放弃亲城市（pro-urban）和亲制造业（pro-manufacturing）这样一些老的偏见（Fieldhouse，1986，p. 152；Mytelka，1989），并对地方政府直接改善当地生活质量提供资源和技术支持。这些“地方化”（localized）的活动往往可能与全球企业网络中的供应商联系在一起，或者成为一个国家大的出口活动的支持网络的组成部分。

6.4　现代性和价值

自然，决策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但是真正的选择并不总是清楚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从一个范式向另一个范式转变的每一个过程中，关于“左”和“右”的界定变得模糊起来。每一种社会集团都经历着内部的分化，有些人坚持使用老的办法实现其目标，

而另一些人则接受了新范式的潜力并利用这种新范式达到其目标（图 1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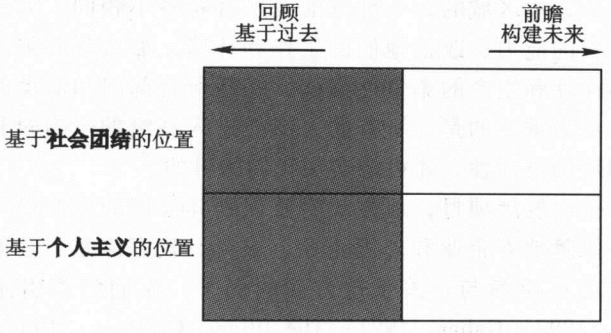


图 15－12　范式转变中的政治地位：位置矩阵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上一次范式转变中，新的大规模生产范式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和同质化的性质是非常突出的，以至于纳粹主义都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同样，集权化国家所起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便最自由化的国家也采纳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模式。这种模式沿袭了凯恩斯的思想。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凯恩斯思想曾经遭到非常大的抵制。然而，不幸的是，对于那些坚信需要社会团结的人来说，新自由主义是唯一的一种采用目前范式并具有一致性的纲领。虽然在有远见的实践中存在着成千上万孤立的试验，比如民主参与和地方共识建设，但是，人们至今仍然没能提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能够取代纯粹市场的经验或者建议。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这种经验或建议，经济增长也可能会存在，但是要想实现范围广大的快速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注释

1　参看赫希（Hirsch，1965 and 1967），维纳（Vernon，1966）以及最近腾泽曼和安德森的论著（Von Tunzelmann and Anderson，1999）。

2　本节以佩雷斯和苏蒂的论文（Perez and Soete，1988）为基础。

3　可以认为，阶段四近似于涵盖了威尔斯给出的图中的阶段四和阶段五（参见图15－1）。

4　参看艾伯纳西和厄特巴克（Abernathy and Utterback，1975），多西（Dosi，1982）以及萨哈（Sahal，1985）的著作。在众多的企业管理教材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有康迪夫等人（Cundiff et al，1973）以及科特勒（Kolter，1980）的著作。康巴斯和其他研究者以及多西（Dosi，1988）给出了一个更广泛的总结。要想了解对技术、经济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完整解释，请参见弗里曼的经典著作（Freeman，1974），该书是关于创新经济学的，还可以参见弗里曼和苏蒂对该书最新的修订版（Freeman and Soete，1997）。

5　参看弗里曼和佩雷斯的论著（Freeman and Perez，1988）。弗里曼和洛卡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每一次技术革命进行了拓展性的分析，参见弗里曼和洛卡（Freeman and Louca，2001）的研究。

6　佩雷斯（Perez，1983 and 1986）。这个解释采用多西提出的技术范式概念（Dosi，1982）描绘单个技术的轨道，从而构建一个界定普遍轨道或“元范式”的宽泛概念。

7　发展中世界的企业不得不经历双重转型，因为它们也不得不放弃保护主义模式（Pérez，1996）。

8　拉丁美洲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描述了这些以及其他例子（ECLAC，1990）。

9　施米茨和锐仁嘎（Schmitz and Knorringa，1999），施米茨和纳德维（Schmitz and Nadvi，1999）。参见 IDS Collec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Project（2001）。

10　在类似的含义上，迈特尔卡（Mytelka，1994）也使用了这个术语。

11　参见薛内斯（Chesnais，1988 and 1992）、布雷善德（Bressand，1990），克莱珀和肯尼斯（Klepper and Kenneth 1994）以及卡斯泰尔（Castells，1997）。

12　参见布雷善德和卡吕普索（Bressand and Kalypso，1989）以及卡内娄（Kanellou，2000）。

13　野中郁次郎（Nonaka，1994），圣吉（1990）和伦德瓦尔（Lundvall，1997）；也可参看 DRUID 项目的网址（DRUID，2001）。

14　见赖纳特（Reinert，1999）、韦德（Wade，1990）以及奥斯本和盖布勒（Osborne and Gaebler，1994）。

参考文献

Abernathy, W. and J. Utterback (1975): A dynamic model of proc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Omega, vol. 3, No. 6.

Abramovitz, M. (1986):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46.

Altshuler, A. and others (1984): The Future of the Automobile: The Report of MIT's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 Progr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ocena, R. (1997): Qué piensa la gente de la *innovación*, la competitividad, la ciencia y el futuro, Montevideo, Trilce.

Arthur, W. B.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94, Oxford, U. K., Basil Blackwell. Also published in Freeman (ed.),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0.

Bell, M. and K. Pavitt (1993a):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contrast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2, No. 2,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b): Accumulat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Bressand, A. (1990): Electronics cartels in the making?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No. 21.

Bressand, A. and N. Kalypso (eds.) (1989): Strategic Trends in Services: An Inquiry into the Global Service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Burton-Jones, A. (1999): Knowledge Capitalism: Business, Work and Learning in the New Economy,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ssiolato, J. and H. Lastres (eds.) (1999): Globalização & inovação localizada. Experiencias de sistemas locais no Mercosul, Brasilia, Brazili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IBICT).

Castells, M. (1996):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U. K., Basil Blackwell.

Chaves, R. and C. González (1996): The design of successful rural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World Development, vol. 24, No. 1, Oxford, U. K., Pergamon Press Ltd.

Chesnais, F. (1988):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in G. Dosi and others (eds.),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 (1992):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operation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B. Lundvall,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Coombs, R., P. Saviotti and V. Walsh (1987): Economic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al Ltd.

Coriat, B. (1991): Penser à l'envers, Paris, Christian Bourgeois Editeur.

Cundiff, E. and others (1973): Fundamentals of Modern Marketing,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David, P.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lso published in Freeman (ed.),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0.

Dosi, G. (1982):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determinants and direc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 Research Policy, vol. II, No. 3,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Dosi, G. (1988): Sources, procedures, and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VI, No. 3, Nashville, Tenness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lso published in Freeman (ed.),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0.

Dosi, G. (ed.) (1988):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DRUID (Danish Research Unit on Industrial Dynamics) (2001): A-The Firm as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http://www.business.auc.dk/druid).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90): 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 LC/G. 1601-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 90. Ⅱ. G. 6.

—— (1992):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Basic Pillars of 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 LC/G. 1702/ Rev. 2-P, San-

tiago, Chile, August.

Ernst, D., T. Ganiatsos and L. Mytelka (eds.) (1998):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Export Success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Fagerberg, J. and others (eds.) (1994):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Trade and Growth,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Fieldhouse, D. (1986): Economic Decolonisation and Arrested Develop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Freeman, C. (1974):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U. K., Penguin Books Ltd.

—— (1987):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 (1994):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catching up: ICT and the NICs, in J. Fagerberg and others (eds.),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Trade and Growth,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1995):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9, No. 1, Cambridge, U. K., Academic Press Limited.

Freeman, C. (ed.) (1990):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Freeman, C., J. Clark and L. Soete (1982):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 Study of Long Wav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s.

Freeman, C. and F. Louçã (2001):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eeman, C. and C. Pérez (1988): Structural crises of adjustment: Business cycles and investment behaviour, in G. Dosi and others (ed.),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3rd edi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Freeman, C. and L. Soete (1997):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Gabor, A. (1991): Rochester focuses: A community's core compete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oulder, Colorado, Harvard University, July-August.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übler, A.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rastructures. Dynamics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ransport, Heidelberg, Physica-Verlag.

Hirsch, S. (1965): The United States electronic industry in intenational trade,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No. 34. (1967): Location of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xford, U. K., Clarendon Press.

Hobday, M. (1994): Export-l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Four Dragons: The case of electronic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25, No. 2,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 (1995): Innovation in East Asia: The Challenge to Japan,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Hoffman, K. and H. Rush (1988): Microelectronics and the Clothing

Industry, New York, Praeger. IDS Collective Efficiency Research Project (2001): (http://www.ids.ac.uk/ids/global/coleff.html)

Irvine, J. and B. Martin (1985): Foresight in Science Policy: Picking the Winner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Jang-Sup, S. (1992): Catching up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late-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Kanellou, D. (2000): The new role of intermediaries in travel and tourism distribution channels, IPTS (Institute for Prospective Technology Studies), No. 48, pp. 12~22, Seville, Spain.

Katz, J. (ed.) (1996): Estabilización macroeconómica, reforma estructural y comportamiento industrial; estructura y funcionamiento del sector manufacturero latinoamericano en los años 90, Buenos Aires, Alianza Editorial.

Klepper, S. and S. Kenneth (1994):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y shakeou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Joseph A. Schumpeter Society, Münster, August.

Kotler, P. (1980):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Lall, S. (1992):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0, No. 2, Oxford, U. K., Pergamon Press.

Lamoreaux, N. and others (eds.) (1999): Learning by Doing in Markets, Firms and Count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Leontief, W. (1954):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foreign trade: The

American capital position re-examined,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ol. 7, No. 1, Genoa, Italy, Istituto di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Lundvall, B. (1988): Innovation a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From user-producer interaction to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G. Dosi and others (ed.),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 (1992):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 (1997):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learning econom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mmunications & Strategies, No. 28.

Mansell, R. and U. Wehn (eds.) (1998): Knowledge Societ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xford,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ytelka, L. (1989):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African industrialization,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32, No. 3.

—— (1991): New models of competition in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Some consequences for third world exporters, in J. Niosi (ed.),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Montreal, Canad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1994): Dancing with wolves: Global oligopolie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J. Hagedoorn (ed.),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World Economy.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echnology Strategies,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Nadvi, K. (1999): The cutting edge: collective efficienc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Pakistan,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7, No. 1.

Nadvi, K. and H. Schmitz (eds.) (1999): Industrial clus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special issue, Oxford, U. K., Pergamon Press Ltd.

Nonaka, I. (1994):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creation,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vol. 5, No. 1, February.

——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oulder, Colorado,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December.

Osborne, D. and T. Gaebler (1993):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New York, Plume Penguin.

Otero, M. and E. Rhyne (eds.) (1994): The New World of Microenterprise Finance. Building Health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 the Poor, West Hartford, Connecticut, Kumarian Press.

Peck, J. and A. Goto (1981):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Japan, Research Policy, vol. 10,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Pérez, C. (1983):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Futures, vol. 15, No. 5, Surrey, U. K., IP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UK.

—— (1985): Microelectronics, long waves and world structural change: New perspectiv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3, No. 3, Oxford, U. K., Pergamon Press Ltd.

—— (1986):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una visión de conjunto, in C. Ominami (ed.), El sistema internacional y América Latina. La tercera revolución industrial: impactos internacionales del actual viraje

tecnológico,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 (1992): New technological model and higher education: a view from the changing world of work, in G. López Ospina (ed.), Challenges and Options: Specific Proposals, Caraca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 (1996): La modernización industrial en América Latina y la herencia de la sustitución de importaciones, Comercio exterior, vol. 46, No. 5, Mexico City, Banco Nacional de Comercio Exterior, S. N. C.

—— (2000): La reforma educativa ante el cambio de paradigma, Caracas, UCAB - Eureka.

—— (2002):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Cheltenham,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érez, C. and L. Soete (1988):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Entry barriers and windows of opportunity, in G. Dosi and others (ed.),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Peters, T. (1989): Thriving on Chaos: Handbook for a Management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Porter, M. 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adosevic, S. (1999):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atchu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Reinert, E. (1994): Catching-up from way behind. A third world perspective on first world history, in J. Fagerberg and others (eds.),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Trade and Growth,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1999):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6, Nos. 4-5, West Yorkshire, U. K., MCB University Press Ltd.

Sahal, D. (1985): Technological guideposts and innovation avenues. Research Policy, vol. 14, No. 2,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Schmitz, H. and P. Knorringa (1999): Learning from Global Buyers, IDS working paper, No. 100, Sussex, U. K.,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chmitz, H. and K. Nadvi (1999): Cluster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troduc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9, Oxford, U. K., Pergamon Press Ltd.

Senge, P. (1990): The Fifth Discipline, New York, Doubleday.

Strange, S. (1996):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ndler, J. (1997): Good Government in the Tropics,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he Illinois Coalition (1999): Technology and Jobs Agenda. A Vision and Plan for Technology-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llinois. (www. ilcoalition. org/tja. htm)

Vernon, R.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0, Cambridge, Massachus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May.

Von Tunzelmann, G. (1995):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Progress.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Aldershot, U. 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Von Tunzelmann, N. and E. Anderson (1999): Technologies and skills in long-run perspective, Sussex, U. K., University of Sussex, mimeo.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ells, L. (1972):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pproach, in L. Wells (ed.),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Research.

Wiggenhorn, W. (1990): Motorola U: When training becomes an educ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68, No. 4, Boulder, Colorado, Harvard University, July-August.

Wolf, J. (1912): Die Volkswirtschaft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A. Deichertsche Verlags-Buchandlung.

第四编　欠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思想史

第十六章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德国经济学：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 218
第十七章　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启蒙运动时期半边缘化地区的发展理论与政策 …… 246
第十八章　早期的国家创新体系：以舍拉1613年的《简论》为例 …… 283
第十九章　经济学中的创造性毁灭：尼采、桑巴特和熊彼特 …… 318
第二十章　卡尔·比切尔与技术经济变迁的地理学维度：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 …… 355

第十六章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德国经济学：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

埃里克·S. 赖纳特[1]

由于存在如下三个主要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们可以从对德国经济学传统[2]的研究中获益良多。首先，德国经济学产生较晚，当时德国极度贫困落后，饱受“三十年战争”的蹂躏，这场战争使某些地区失去了高达70%的人口。因此，德国经济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富有邻国的特点。英美经济学的基础在英国和美国获得了世界经济强权之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英美经济学相反，德国经济学的某些基本要素并没有因德国的强大而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分析。其次，历经数百年时间，德国经济学坚持运用各种不同的隐喻来观察经济：基本上从生产而非交易的视角入手，并且采用了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及其先辈相比更低层次的抽象。最后，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Anglo-Saxon tradition）的主流经济学相比，德国经济学涵盖的范围更加宽广，诸如地理与历史、技术及其变迁、政府与管制、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都是德国经济学与生俱来的核心主题。

在德国的历史文献中，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就是德国与其他欧洲诸国相比是一个落后的国家（verspätete Nation）。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相当不同的角色。[3]

---

① 原载 Jomo K. S. and Erik S. Reinert (eds.)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How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Have Addressed Development, Tulika Books, Zed Books, 2005, pp. 48~68. ——译者注

正如凯恩斯所说，“局势越是混乱，自由放任就越是无能。”因此，后进国家（later comers）——特别是美国与日本——很自然地就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来发展它们自己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了。[4]19 世纪，德国经济学与美国经济学为反对英国经济学而结成同盟，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援。为了与英国抗衡，这些追赶型国家在理论战线上并肩作战，当时的英国不仅在政治上明确地将阻止其他国家也走上工业化道路确定为主要目标，而且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拥有了使这一目标合法化的经济理论。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斯密和李嘉图经济理论的主要新颖之处，是在道义上为殖民主义提供了辩护的武器。[5]

19 世纪产生了重要的德—美经济学交流和为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而结成的同盟。身在美国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深受美国经济学家的视野和观点的启发：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与马修·凯里（Mathew Carey）分别于 1820 和 1821 年出版的著作为李斯特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和启发。在 19 世纪后期，德国经济学家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和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利（Henry Carey）相互支持并为对方辩护。19 世纪，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受到的是德国经济学的教育：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德国大学里完成研究生学习，日本的经济学家不仅接受在日本任教的德国经济学教授的教育，而且也由众多接受德国教育后又在日本任教的美国教授所培养。[6]19 世纪，美国没有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院，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都在德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其中包括了美国经济学会的全部创始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掌握德语是对美国经济学博士的硬性要求。

然而，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德国经济学传统与欧洲大陆其余地方经济学传统之间的区别。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分界线位于英国经济学传统与整个欧洲大陆经济学传统之间。在英语世界里谈及德国经济学传统的著作，都倾向于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视角来审视德国经济学，那样，就不仅认为德国经济学传统与英国经济学传统对立，而且还忽视了德国经济学与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经济学传统的相似之处。在大多数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看来，官房学派——经济学特有的德语名称——被视为德国特有的现象。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官房学派”一词本身以及官房学派的著作都是从瑞典和俄

罗斯传播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7] 德国之外第一位经济学教授乌普萨拉的安德斯·伯赫（Anders Berch）编写的教科书（Berch，1747）的书名中就含有官房学派一词。北意大利18世纪70年代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就是官房学派（cameral sciences）的一员。

从德国经济学传统发展的脉络来看，在非德语世界里硕果仅存的两位被广为研究的德语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和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并不具有那么多原创性，这与标准的经济思想史的看法不同。马克思和熊彼特确实分享了典型的“德国式”的生产力推动社会变迁的观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日文版[8]的前言中，强调了他与马克思研究方法上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的方法不同于瓦尔拉主义和马歇尔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在以生产为基础的德国经济学传统里，资本实质上（per se）是没有价值的，这也反映在熊彼特与马克思的作品中。正因为如此，在熊彼特的体系里，完全均衡条件下利率将会是零。这也可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对应，即不变资本不创造价值。然而在熊彼特看来，这些共同点“湮没于整体见解的巨大差异中”。[9]

从德国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接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背离了德国经济学传统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们，从第一个评论他的研究的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开始，都倾向于认同他的经济分析，但是并不赞成他提出的以推翻社会金字塔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不仅如此，马克思对后来德国经济学家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众所周知，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中资格最老的古施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在对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代表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 Kapitalismus）一书的书评中就批评他年轻的同事受马克思的影响过深。

1. 德国经济学传统历久不变的特征

从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开始，可以划分出德国经济学传统。在此之前的是为经营大小庄园提供建议的色诺芬传统，即通常称之为“家长文献”（Hausvaterliteratur）的学科传统。“国王之镜”（Fürstenspiegel）是专门收录德国各邦的法律和习俗的丛书，其中最著名的是自12世纪开始的“撒克逊之镜”（Sachsenspiegel）。在1648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学传统瓦解的300

年时间里，德国经济学原理与方法之间呈现出传承性，明显地不同于1776年之后的英国经济学和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在本文中关于重商主义的部分，我们指出了1776年前的早期英国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共同点。

经济学家们曾经从事过的职业对经济学的不同类型有极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的经济学家是带有职业视角的商人。亚当·斯密曾担任多年的海关关税委员，在英国经济理论中加入了对商业的偏好。德国经济学家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一致性批评是：它把经济学简化成了“一门关于交易的学问”（catalectics），简化成了一门仅仅研究易货、贸易和交换的学科。相反地，德国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参与德国众多邦的管理事务。官房学派一词本身就源自 camera principis，或者 Kammer，即财政的意思。官房主义者关注的是公共管理、税收、制度、法律和规范。因此，他们非常务实地看待经济的发展，这引导他们考察生产而不是交易，以及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例如，对创建更完善的（healthy）税基的需要促使他们热衷于机械化生产的推广，因为机械化生产条件下的雇员所得的是含税收入，工厂主也是比农民或小手工业者更好的征税对象。因此德国经济学家几乎众口一词地[10]强烈反对法国重农学派，因为该学派认为农业部门是唯一提供“净财富”的部门。

德国经济学传统将国家看成是重要的经济推进器，并且在困难时期使出“杀手锏”（Reinert，1999）。或许是作为“三十年战争”的混乱——类似于当今的海地或者其他“沉沦的国家”（falling state）那样的混乱——的遗产，实用主义为了创造个人自由与幸福而呼吁一种有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政府（state）是一个必要的推进器。在这一传统里，必须借助政府而不是抵制政府，才能在共同福利（common weal）的框架内实现个人自由和进步。[11]以这种传统为基础，德国经济学对当时的经济提供了关键性的见解：“自然秩序”是建立在原材料和（或）廉价劳动力基础之上的非生产性寻租，这样的“自然秩序”有时混乱不堪。

德国经济学首先是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科学（Erfahrungswissenchaft）。德国经济学中没有太多形而上学的推测和高度的抽象，而许多人则认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形而上学推测”的典型例子。[12]各种经济因素之间，以及经济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结构性的连续和一致（Strukturzusammenhänge）不仅是明显

的，而且理解这些联系对于经济理论与政策同样是最为重要的。协同效应就是其中一例。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相比，德国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始终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经济学应该成为学科社会科学的统帅。判断哪些学问可以囊括在“经济学”这一标题之下，只有一个标准，即相关性（relevance）。按照这种标准，在某一时点上，假如营养问题对经济而言是重要的，那么营养问题就构成了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密切联系实际（pranisenähe）和相关性是这一传统判断学术质量的核心标准。重要的经济因素不可简化为单纯的数字和符号也是这一传统的基本共识。标准的经济学常常遭受批评，是因为标准经济学通常得出**数量原理**（qualitätslose Grössen），而量却阻碍了对质的理解。即使对人类所有可计量方面的最精确、最全面的描述，例如身高、体重、水和微量矿物质的含量等，也会遗漏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即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人类的智慧（geist）和意志（willenskapital）。

在发展过程中，德国经济学牢固地建立在葛特菲·威廉·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和克里斯坦·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哲学基础之上，[①] 建立在“自然法”（naturrecht）的法律传统之上。“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浩劫创造了对法律的不分教派的共同基础的需要。在原始“未开化国家”，“自然法”传统仍然认为人负有各项道德义务，而道德义务的本原就在自然当中。现代国家理论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大约从1750年左右开始成为德国经济学基础的沃尔夫体系的核心就是假设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和平的以及理性的动物。与之相关的是对人类常识（der gusunden Menschenverstand）的基本信念。

熊彼特主义被深深地打上了德国经济学传统的烙印。注重学习和进步，很明显地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有关，是基于人与神有相似之处（Gottensähnhichkeit）：人具有上帝般创造新事物的能力。生而似神意味着发明是人类愉悦的职责。在这一最基本的层面上，英国与德国的经济学在对人类心智（mind）的看法上存在着对立：约翰·洛克认为，人出生时，心智就像一块白板（a tabula rasa），只是

① 参见 Reinert 和 Daastøl（1997）的讨论，即《穷国的国富论》（上卷）第三章。——译者注

在生活中被动地接受印象（impression）；而莱布尼茨则认为我们拥有积极的心智，不断地对比经验和事先形成的概念（schemata），人类的心智既高贵又富有创造力。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是会交换的动物的思想是德国经济学家们批评的重点。在斯密以后的传统里，思想（ideas）和创新都被排除在经济系统之外。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反对斯密的这种观点。在德国经济学传统里，包括马克思和熊彼特，都认为人类是已经习得了发明的动物。后来尼采又补充了人类是唯一信守承诺的动物，所以能够创造法律和制度。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幅德国经济学不同于英国经济学之各个要素的印象画（impressionistic painting）——一边是实物交换和“形而上学的推测”，而另一边则是生产和制度。

总起来看，德国经济学传统发轫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经由尤斯蒂（Justi）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发展到“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和历史学派。德国经济学传统的基本特点如下：

- 理论核心：人类及其需要（Der Mensch und seine Bedürfnisse）。
- 非机械的世界观，质的“理解”（verstehen），而非单纯的可量化的“了解”（begreifen）。
- 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积极—理想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思路，反对“消极—物质主义”经济政策的态度（威纳尔·桑巴特的用语）。
- “历史重要”：理论与政策必须基于所处的环境（context），还应该认识到经济学的累积机制（cumulative mechanisms）。
- 关注生产，而非交易。
- 经济活动作为经济增长的载体被视为具有本质的差异。
- 经济和谐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结果，自由放任更易于导致“自发无序”，而不是“自发秩序”。

2. 官房学派经济政策：从泽肯道夫（1626—1692）到霍尼克（1640—1714）

法伊特·路德维希·冯·泽肯道夫（Veit Ludwig von Seckendor-

ff，1626—1692）被称为“官房学派的亚当·斯密”，这是经得起推敲的。他生活的时代充斥着暴力，德国国难当头。“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一场宗教战争，起源于德国内战，后来西班牙、法国、丹麦和瑞典等当时欧洲的几大强国相继卷入战火。这场战争在军事上没有胜负之分，但是战后一代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都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所谓的文明社会。泽肯道夫16岁时，他在瑞典军队中服役的父亲因被怀疑是间谍而被斩首。泽肯道夫66岁辞世那年，法王路易十四的军队刚刚洗劫了德国的帕拉廷纳邦（Palatinate）。在这两次战争期间，还爆发了和土耳其的几次武装冲突，以及与法国的两次战争，对法战争使得德国失去了泽肯道夫曾经求学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我们认为，如果不把文明社会的建设与我们今天所称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同时加以考察，我们就无法理解官房学派。对于“失败的国家”来说，经济生活和基本制度必须从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形下遵循“自然秩序”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泽肯道夫在萨克逊—哥达公国的恩斯特公爵（人称“虔诚的恩斯特”（Ernst der Fromme））的瑞典军队中获得了一个正式的职务。泽肯道夫全身心地奉献于他所效力的邦的公共福利，但他同样热爱大德意志。泽肯道夫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学识的人；他与莱布尼茨保持书信往来，他高尚的道德操守使他成为后世德国官员的楷模。

1656年，30岁的泽肯道夫完成了最重要的作品《德意志公国》（Der Teutsche Fürstenstaat），这也是官房学派文献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后来成为德国经济政策的标准手册，在接下来的98年里出现了多个版本。这本书是献给小邦的一种“领主手册”。书中包括准确描述的历史、人口、经济条件、行政部门、学校系统、法律与司法。理论都是来自于“三十年战争”之后撒克逊—哥达公国的重建以及各项制度的成功重构。泽肯道夫的方法明显是整体主义和有机主义的方法，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一国的共同福利只有在将国家看成一个整体（Ganzheit）的基础上才能被理解。泽肯道夫的观点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观点相似。在此后的300年内，对整体性的强调成为德国经济学和德国哲学共同的标志。[13]

泽肯道夫曾随同恩斯特伯爵游历荷兰。荷兰财富与宗教的相互包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tolleis，1995：158）。欧洲早期的经济政策通常按如下标准制定：以荷兰（见本书第十二章）和威尼斯

这样的成功国家为基准，防止像西班牙那样在大量黄金流入的同时伴随着工业化退化和不断加剧的贫困。泽肯道夫认为，荷兰人是“最具智慧并且在生产和贸易（in Gewerb）中最富有经验的代表”（Seckendorff，1665）。泽肯道夫从荷兰人那里认识到了对制造业的迫切需要，以及对经济活动集群的需要，安东尼奥·舍拉在1613年就在理论层次上提到了这两点。泽肯道夫的经济措施包括发展制造业，以及将手工业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城里他们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推动了农业的扩张以及增加农产品价值的活动。不仅如此，泽肯道夫还通过废除迁居以及重新定居的费用，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他身上，我们也发现了福利国家的起源，如关心穷人以及政府负有照顾老人的义务等思想的起源。在他限制行会权力的愿望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倾向远远地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

泽肯道夫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反映在18年后冯·霍尼克（Philipp Wilhelm von Hörnigk）公开的原理中，下文将详细讨论。泽肯道夫致力于实现18世纪艾尔伯特·赫施曼（Albert Hirschman）所说的“多级共谋发展”并成为可能。泽肯道夫是一批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主宰欧洲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先驱，这些学者让他们的国王和统治者明白，统治者不仅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利（right），同样也负有发展国家的义务（duty）。13世纪起源于意大利人文主义（humanism）的“公善”（common good）思想逐渐转变为公共福祉（public happiness）的思想，而统治者就是这一工程的负责人。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用“开明的专政”（enlightened despotism）来形容这类统治者（Roscher，1868：77）。

被克里斯坦·沃尔夫称之为“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的开明的统治者担负着“发展的独裁者”（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的任务，泽肯道夫之后的官房主义者的工作就是谏言、辅佐、引导、奉承以及“蒙骗”统治者做恰当的事情。结果体现的逻辑就是：统治者越是贤明，其子民就越是富足。评价一个统治者功绩的标准不再是他本人的财富，而是他子民的财富及幸福。[14]

第一位真正的官房学派经济学家是约翰·约钦姆·贝歇尔（Johann Joachim Becher）（1635—1682），他曾从事过各式各样的职业，很像18世纪的“经济学家冒险者”（economist adventurers）。本文关注的是他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妹夫菲利普·威廉·冯·霍尼克（1640—1714），霍尼克以简洁的方式表述了经济政策措施。像

18 世纪的约翰·海因里希·戈特利普·冯·尤斯蒂（Johann Heirich Gottlob von Justi）一样，霍尼克是在奥地利工作的德国经济学家。霍尼克的著作《奥地利高于个人，只要她有此意》①（Austria above everyone else, if only she had the will to），（Österreich über alles, wanna es nur will）匿名出版于 1684 年，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德语经济学著作。像泽肯道夫一样，霍尼克与当时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保持书信往来。霍尼克的经济学是“真实经济学”（reality economics），建立在对国情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Capenter, 1790：10）。霍尼克 1684 年的著作出版了 16 版，并且在随后的一百年内不断翻印。1784 年的百年纪念版以《奥地利经济评论》为名出版（Remarks on the economy of the State of Austria, Bemerkungen über die österreichische Staatsökonomie）。此版本中称奥地利应该将其大部分财富归功于此书。

就像泽肯道夫的情况一样，要认识霍尼克就要先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在这两人所处的时代，文明都面临着威胁。就在霍尼克 1684 年的著作出版的前两年，土耳其结束了一次对维也纳的不成功的围攻。奥地利先后经历了多次大饥荒，分别发生于 1648—1650 年，1692—1694 年，1698—1703 年和 1712—1713 年，并且在 17 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和 80 年代遭受过破坏性的虫灾。北部曾经称雄一时的“汉萨同盟”早已衰落，南部相邻的威尼斯和意大利也开始走上了衰落之路。实乃奥地利的患难之秋！

霍尼克不信任商人，还对有资本投资却又不投资的富人颇有微词。他提出的“休克疗法”不同于今天的经济学家和“华盛顿共识”：即完全禁止奢侈品的进口将会促使富人投资于民族制造业。与同时代英国的威廉·配第一样，霍尼克是“政治算术”的先驱。他计算了荷兰某个成功的城市里的手工业者的收入等。

下文归纳了霍尼克在 1684 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九点经济政策”，并附带评述了这些政策适用以及有效的场合，特别是在当今时代。霍尼克的建议非常典型，不仅体现了德国当时及后来的经济政策，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欧洲走向发达所选择的典型道路

① 霍尼克的著作，在我国有影响的是《奥地利富强论》。霍尼克的这本书英文名又译成，“Austria will prevail if it wants to”，一直没有我国译成《奥地利富强论》的原始证据。——译者注

的原理。[15]

霍尼克的第一点建议是：“仔仔细细地检查国家的土地，切勿遗漏每一寸可供耕作的角落和泥块。普天之下每一种有用的植物都应该加之实验，以观其是否适合于本国。”这一类型的经济理论因其偏好制造业而闻名，但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首先依靠的是农业。农业生产率在几百年内提高得异常缓慢，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提高产量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排干沼泽等手段，扩大可供耕作土地的面积。最吸引人的方法则是“熊彼特式”的引入新作物。

第二，“一国之内的所有农产品（commodities），如果它们的初始形态不能直接利用，就应该在国内加工；因为支付给制造业的钱通常会超过原材料价值的两倍、三倍、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倍。”失业和低就业是当时突出的问题，制造业的这种“乘数效应”显著地体现在价值增值和就业两方面。费尔南多·奥蒂斯（Fernando Ortiz）1558 年献给西班牙国王的备忘录或许就是第一个例子。（进一步讨论参见本书 Reinert & Reinert）①

第三，“为了实施以上的两条原则（rules），既需要种植和培育原材料的人员，也需要加工原材料的人手（例如生产出最后的成品）（producing finished products）。因此，必须关注人口，并且应该尽量使之达到一国所能承受的限度，这是一个秩序井然的（well-ordered）国家最应该关注的，但是不幸的是，这一点也经常被忽视。应该运用各种手段将游手好闲的人转移到领取报酬的工作岗位上；引导并鼓励各种形式的发明、工艺和贸易；如有必要，还要从外国引入教导人员。”

第四，一国已有之金银，“要么出自本国矿藏，要么凭借制造业得自于外国，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出于何种目的，都绝不允许金银流出本国，要绝对禁止将金银装入箱子或者匣子后窖藏于地下，而应该让金银始终保持在流通中；禁止将金银用于会被损坏而无法再使用的用途。在这些情形下，一国才能获得可观的通货供给，因此，占有金矿或银矿的国家，就不可能陷入贫困；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该国财富和资财必定会不断地增加。”对金银的强调是使我们

① 即本书第十一章。——译者注

已经预料到的，主流思想史这种强调被认为暴露了这些理论的“原始性”（primitiveness），但是佩罗塔（Perrotta，1991）提出了另一种观点。

因此，第五，“一国国民应该优先使用国内产品，即使消费奢侈品也应该限定在国内产品之内，尽可能地不要和国外产品打交道。”正如佩罗塔（Perrota，1993）论道，进口替代是重商主义的一个关键性组成部分。这种进口替代策略的首次使用是英国1485—1603年的“都铎计划”（Tudor Plan），而且这也是极为成功的一次计划（Reinert，1995）。

第六，“如果因为必要或者不能挽回的（irremediable）挥霍而不得不购买某些东西时，应该从第一手外国商人那里获得，并尽可能不要用金银，而要用国内产品交换。”这也是第二世界大战后欧洲实行的清偿体系（cleaning systems），用来防止收支赤字。

第七，“像这种情形下的这类外国商品应该进口半成品，然后在国内进一步加工，以节省因在外国加工而多付给外国的工钱”。制造业的乘数机制体现在价值增值和就业两方面，也附带解决了收支平衡的问题。

第八，“只要是必要的，一国应该时时刻刻寻找以制成品的形式将本国产量丰富的产品出售给外国人的机会，这同样是为了获得金银；为了达到此目的，可谓要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搜寻消费，并且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开发。”“出口至上”并不是“华盛顿共识”的发明。这也是改善穷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另一种方法，而凯恩斯主义的方法仅仅吸引（suck in）进口。

第九，除非出于某些重要的考虑，在国内能够保证适当质量且有充足供应的情况下，不允许进口任何外国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外国人既不能表现出同情，也不能表露出怜悯，不能与他们结交和结亲，结盟或结仇。只要邦交中包括了本国的弱点和颓势，那么就断绝这样的邦交。即使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相比质量偏低，或者价格偏高，也要这样做。在国内花两元买一件商品也比在外国购买只需花一元强，不管在无知之徒看来，这是何等的奇怪。”① 这一点政策总结了关于附加价值、就业和收支平衡的讨论。在新古典主

① 原文的引号只有半边。——译者注

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分析中也出现了这类讨论。

3. 18 世纪：学院型经济学与经济学专业分工的出现

18 世纪是启蒙时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大量文字作品，其中包括官房学。《官房学文献》（Bibliographic der kameralwissenschaften）是一类主要的文献资源，总共包括 14 040 个项目以及一些副本（duplication），多达 1 184 页（Humpert 1937），大部分都出版于 18 世纪。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拉普·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1717—1771）是 18 世纪最具影响力、成果最丰硕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一生共出版了 67 部著作（Reinert，2004a）。其中 8 部被译成 5 种语言，有 13 个不同的现代译本。

最早的经济学期刊也是出现于 18 世纪，这些期刊的内容包括了实践建议、理论和经济学家的动向，是典型的官房学派的风格。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乔治·海因里希·金克·尤斯蒂（Georg Heinrich Zincke Justi）（1692—1769）和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都出版了自己的期刊。像关于农业、工艺、发明和制造业的应用性作品也风靡全欧洲。18 世纪不仅是一个发现的百年，也是科学与科学学会的世纪，还创立了欧洲几所最大的博物馆。

世界上最早的两个经济学（以及官房学）教授职位于 1727 年出现在德国，这比英国早了大约一个世纪。德国之外最早的经济学教职出现于瑞典的乌普萨拉（Uppsala），大约在 19 世纪 30 年代。接下来是芬兰的土尔库（后来属于瑞典）的“奥勃学会”（Åbo Academy）；然后是在奥地利，1752 年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拉普·尤斯蒂被任命为维也纳的官房学教授；再后来是在意大利，1754 年安东尼诺·吉诺维西（Antonio Genovesi）被任命为那不勒斯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肯尼斯·卡朋特（Kennith Carpenter）收集了丰富的材料，记录了 1850 年前欧洲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史。卡朋特描述了这样一种模式，即欧洲大陆语言之间的互译频繁，而鲜有大陆语言与英语之间的互译。[16]虽然材料还没有完全系统化，但是关于瑞典的部分（已经完成，但是还没有出版）表明了 1850 年前译成瑞典语的 207 种经济学著作中，有 84 本是德语，55 本是法语，51 本是英语，其他的是丹麦语和多语言的作

品。那个起源于英国的流传甚广的传说，即德国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早已是孤立的“异类”（odd man out），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回事。[17]

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拉普·尤斯蒂或许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德国经济学家。他既是德国传统①的集大成者，又是使之现代化的人。他在17世纪晚期已有的常识中加入了18世纪重要的新事物（novetlties）。火灾保险就是一个新制度的例子。或许18世纪最重要的新事物就是发现了制造业与农业之间的重要的协同效应。发展制造业不仅不会损害农业，反而会带动农业。官房学又进一步细分出子学科（subfields），各自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和教材，这正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尤斯蒂本人写过一本财政理论的著作，1754年他在维也纳官房学教授的就职典礼上发表的演说的主题是科学与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大约二十年后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74—1803）的一本书的主题。

从焦万尼·博特罗（Giovanni Botero）（1588）和安东尼奥·舍拉（1619）的著作之后，地理学成了欧洲大陆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8世纪开始，用阶段理论阐述经济学也流行起来，从狩猎和采集，到畜牧业、农业，最后到农业和制造业（Reinert，2000）。尤斯蒂运用同心圆将这些历史阶段置于地理的平面上，并将城市报酬递增部门置于地理的中心。这通常被认为是约翰·海因里希·冯·屠能（Johan 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所用的工具。尤斯蒂和冯·屠能都充分认识到了培育和保护制造业区域的重要性，这是任何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地理和经济的核心（Reinert，2004a）。一位德国经济学家说道：“众所周知，原始民族并不是通过改进他们的文化与制度来发现有用的产业，而是发现有用的产业之后再改进他们的文化与制度。”（Meyen，1770：11）他所表达的是当时通常的认识。

技术也一直是官房学派的研究对象，18世纪70年代哥廷根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贝克曼编写了世界上第一本关注技术的经济学教科书。贝克曼同样是以尤斯蒂为基础的，出版了尤斯蒂二卷本的

① 即德国经济学传统。——译者注

著作的第三版——《论工厂与厂商》。

约翰·弗里德里希·普法伊费尔（Johann Friedrich Pfeiffer）（1718—1787）编写了一本成功的官房学教科书（Pfeiffer，1764—1765&1777—1778），以及一本早期的六卷本经济思想史教材，包括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大约30位作者的著作。正如前文所言，所有的德国经济学家都反对重农学派，普法伊费尔写了一本名为《反重农学派》（Pfeiffer，1780）的书，用系统化的理论反对重农学派的学说。

约瑟夫·熊彼特简要地比较了德国官房学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

> “他（尤斯蒂，引者注）与A. 斯密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实行自由放任的实际理由，而且他所说的官僚机构虽然在需要时可以提供指导与帮助，但在不需指导和帮助时，随时都准备让位。（熊彼特此处的脚注是：“这不仅仅是个梦想。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典型的德意志公国的官僚机构就是力图这样行事。”）不过，他要比斯密清楚得多地看到了阻碍自由放任顺利发挥作用的各种障碍。此外，他远比A. 斯密更加关心政府为阻止当时德国经济的短期波动而采取行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更加关心在当时德国的那种工业条件下发挥个人主动性所遇到的特殊困难。他的自由放任是政府监护下的自由放任，他的私人企业经济是这样的一部机器，这部机器虽然从逻辑上来说是自动的，但却经常出毛病，需要政府随时加以修理。举例来说，他实际上承认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会带来失业，但这没有构成反对生产机械化的理由，因为他的政府实际上会为失业者找到和以前一样好的就业机会。这并不自相矛盾，而是表现出了作者所具有的理智。而且，对于我们这些观点更接近于尤斯蒂而不是接近A. 斯密的人来说，尤斯蒂的经济政策主张看起来像是去除了糟粕的自由放任主义。”（Schumpeter，1954：172）①

4. 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派”

经过了反对大卫·李嘉图经济学说和英国经济学的一个初始阶

① 转引自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9～270页。——译者注

段之后，19 世纪 30 年代，特别是 40 年代出现了信仰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优点的汹涌思潮。这一时期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标志——“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凯旋时期”相比，具有许多的相同之处。自由思潮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 1846 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之时，英国以不再保护本国的农业为手段，在极短时间内巧妙地说服全世界放弃对制造业的保护。19 世纪 40 年代与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从那时起直至今日，对自由市场优点的盲信主宰了学术界的政策设计。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从势不可挡的社会问题转变到几十年后民族福利国家的转变轨迹，包含了如何解决当今多种问题（而今是全球性的而非区域性的问题）的思路。

官房学派经济政策最精要的部分或许是将经济从单一耕作的农业（monoculture）细分成各式各样的制造业。保护农业意味着保护原本打算清除的旧式封建秩序。18 世纪欧洲大陆伟大的经济学家，诸如法国的孟德斯鸠，意大利的加利安尼（Galiani）、吉诺维西，德国的尤斯蒂，或许会很自然地称英国放弃保护本国农业以说服全世界其他国家放弃保护自己的制造业为“英国式吹牛”。或许以前 17 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会这样称呼，英国的做法在他们看来甚至荒谬至极。但是自 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抵制李嘉图经济学的力量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美国，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和马修·凯利（Mathew Carey）在同年出版了以政策为导向的重要著作，1834 年约翰·雷（John Rae）还出版了反斯密学派的重要理论作品。这时的欧洲几乎只有一个声音在孤独地呼吁反对自由主义和外围脱工业化（peripheral de-industrialisation）的经济政策，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李斯特曾一度成为美国公民，明显受到了巴尔的摩的丹尼尔·雷蒙德律师的观点的启发。

当李斯特看到拿破仑倒台后法国工业化退化带来的灾难性结局时，他从一名自由贸易者转变成了农业保护主义者。李斯特的著作中至今仍有九成没有从德语翻译成其他语言，所以主流经济学家对李斯特的“强有力的”评价是建立在狭隘的基础之上的。李斯特告诉我们事物运行的方式，但却没有告诉我们事物为什么那样运行。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扶持和保护农业与保护制造业的结果是不同的（Reinert，1998）。他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制造业，橄榄油的生产者将会贫穷下去，但他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贫穷下去。或许有理由可以质疑李斯特是一位理论家，但是他的政策建议相当出色，他对

实施政策措施应该遵循的恰当的历史先后顺序的感觉非常独特，但是与安东尼奥·舍拉相比，他没有成功地解释这些政策措施的内在机制。李斯特的理论概念很模糊，正如威纳尔·桑巴特评论他时说道：“他的概念犹如冥界未被超度的（undelivered）幽灵一般。”（Sombart，Vol. 2，1929：929）但是他将经济发展与国民财富创造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报酬递增活动和基础设施巨大投资的产出看成是国民财富背后的驱动力量的整体视角却是史无前例的。

从德国经济的视角来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一位伟大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他创立了德国关税同盟（Zollverein）。然而在德国之外看来，他又是重要的保护主义者。李斯特也是第一个预见欧洲共同市场的人。今天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在一种情境下是一个保护主义者，在另一种情境下又是一位自由贸易主义者。只有每一个国家的报酬递增活动获得了比较优势之后，李斯特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构想才是令人满意的。只有当殖民和新殖民贸易的不对称性被消除之后，贸易的所有参与方才能都从自由贸易中获利。李斯特的见解与300年前欧洲主流的重商主义以及舍拉的理论解释相一致。

自1850年左右的开始基于历史与情境特定（context-specific）的经济理论主宰了德国经济理论长达百年之久。这段历史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时期：“旧”（older）历史学派、“新”（younger）历史学派和“新新”（youngest）历史学派。也有一些人提议，为了方便考虑，把李斯特看成“原始历史学派”（proto-historical school）的代表。李斯特重新提出的从博特罗和舍拉到加利安尼等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观点：城市及其制造业活动不仅是个人自由、文艺（arts）、分工的原因，事实上也是对文明本身的解答。这一观点可以往前追溯到莱布尼茨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那里，由加利安尼巧妙地复述，又由李斯特重新提出，他坚信制造业同样是创造农业财富的关键，是“农业自我解放的必由之路”。

打响德国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这一旷日持久战斗的第一枪的是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rbrand）（1812—1878）1848年的著作。几年后，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1821—1898）（或许是这些经济学家当中最被忽略的一位）发表了经济学历史方法的理论作品。克尼斯指导过19世纪末美国最杰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理查德·艾利（Richard Ely）（1854—1943），

后者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并于1899—1902年担任该学会主席，曾被认为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1886年，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1861—1939）受德国经济学的启发，列出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纲领。在塞利格曼看来，德国历史学派：

（1）抛弃了仅仅使用演绎法，强调了历史和统计处理的必要性。

（2）否认经济学中存在着永恒的自然法则，同时强调了理论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指明了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国家需要不同的体制（systems）。

（3）拒绝信仰绝对的自由放任会带来福音。

（4）保持了法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密切关系；拒绝承认仅有自利假设便足以调节经济活动。

“旧”历史学派的主要成员有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和威廉·罗雪尔（1817—1894）。“新”历史学派的主要成员是古施塔夫·冯·施穆勒（1838—1917）、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1835—1917）、鲁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新新”历史学派基本上由沃勒尔·桑巴特（1863—1941）和马克斯·韦伯（1864—1920）为代表。下面讨论这一学派首创的政策。[18]

历史学派同样奠定了熊彼特经济学的基础。熊彼特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创造性毁灭”是由威纳尔·桑巴特最先使用的，而桑巴特深受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影响。[19]

5.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协会

> “或许一直可以将李嘉图及其传播者视为极端危险的情况，因为其在社会思考（social speculations）中不科学地运用假设，而且将高度虚构和武断的分析运用到现实中，并对其可行性作出了错误评价。如果不假思索地将李嘉图的推理运用于决定重大现实问题，同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推理是建立在纯粹抽象和不现实的假设之上，尽管他的创见经过了极其细致的推理，也肯定会是具有破坏性和误导性的。”（H. S. Foxell，剑桥大学教授，1899）

1848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出版的那一年，出现了反对李嘉图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一股“反冲力”（backlash）。“拿破仑战

争”之后遍及全欧洲的“社会问题”早已潜伏于社会深层，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推动了遍及欧洲的革命以及革命著作的出现。但是正如加利安尼在此70年前雄辩地指出，人类长于鉴赏结果而短于判断原因。在我们看来，福克斯韦尔（Foxwell）教授对李嘉图的评论隐含了后来熊彼特所称的“李嘉图恶习”（The Ricardian Vice）。

由于德国历史学派、讲坛社会主义（The Kathedersozialisten）、“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这三个经常提及的经济学家类别和团体是重叠的，使得德国经济学家面对社会问题的挑战作出的回应有点模糊不清，因此，首先应该澄清这一模糊性。

“德国历史学派”是后来引入以指代各代德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用语。“讲坛社会主义”是当时一位记者强加于一些经济学家身上的词语，同年，这些经济学家中的大部分人创立了“社会政策协会”。那位记者首先使用的是“内河海员”（freshwater sailors），这是欧洲水手形容他们自以为是水手但却从来没有见过“世面”（the real thing）的同行的带贬低口气的用词（Oppenheim，1872）。但是词意是一样的，这些经济学家因试图改良世界，但却因没有足够的切身体验而遭受指责。然而，较之于李嘉图学派经济学，这些经济学家更接近于分析经济学的“真正的事情”（the real thing）、脉络与现实。较之于英国古典经济学（李嘉图是武断假设海洋的“内河海员”），“讲坛社会主义”努力直面现实世界，而且从长期来看是成功的。

或许引用施穆勒于1872年10月6日星期天在爱森纳赫（Eisenach）自己家中举办的“社会政策协会”成立会上开幕词中的一段话，能够最为恰当地解释“协会”创立的背景：

> “我们的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严重的分化，预兆了社会革命的威胁。威胁已经迫近。在很广的范围内，民众深深地怀疑在‘经济大会’（Economic Congress）上体现出来的、主导今日市场的经济学说是否能够永远占据支配地位。难道引入经营商业（Gewerbefreiheit）的自由权利和废除所有中世纪建立的行业立法，就能够创造出这一传统里那些狂热之徒所预言的完美经济环境吗?”

这就是最初的“社会政策协会”，“协会”活动于1872年到1932年，奠定了20世纪欧洲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后来，最主要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不仅借用了许多德国的制度，而且

在语言转换时大都保留了这些制度的德文名字。值得注意的是，到希特勒上台、“协会”退出历史舞台时，它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福利国家的创立者是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李嘉图体系，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就像他们讨厌自由主义一样。但是仔细研究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政治观点后，我们发现他们是一个分歧严重的团体。所以问题在于，存在如此多的差异的团体如何能够做到如此高产，创立了如此多的新制度以及推动了社会改良。“协会”继承了发轫于泽肯道夫和莱布尼茨的传统，进行了现代经济学家看来类似于经济与经济史的微观分析。通过微观数据的积累，再经过较高层次的抽象后，得出情境相关的政策结论。历史学派的方法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研究法类似，只不过是在国家层次而不是在公司层次的研究。案例研究法的创立者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首任院长埃德温·盖伊（Edwin Gay）（1867—1946），他是施穆勒的一个热情的学生，本人曾在德语欧洲（German-speaking Europe）研究经济学和经济史超过 12 年。

共同的研究议程是将“协会”维系起来的重要因素，围绕着研究议程，经济学家们在德语欧洲各地搜集实际情况（facts），撰写论文并提交至每年的年会。某一年可能讨论缺乏健康保险带来的问题，另一年又商议如何建立一个保护失业工人的制度，下一年又讨论“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结果。某些地区的经济活动仍未机械化，还有一些地区仍然保持着低技能劳动力高度密集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些地区的贫困是当时的热点问题。绝大部分“家庭工人”（home workers，Heimarbeiter）收入微薄。这种“未能机械化的”专业生产无法获得规模效应，处于技术—经济范式框架之外，明显地与今天的“低技术密集加工厂”（maquilas）相对应。但是这又不同于今天墨西哥“低技术密集加工厂”的工人，因为从理论上讲，当时那些工人可以自由地流动到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区域去。

有论者认为“社会政策协会”极少与俾斯麦的帝国经济政策存在分歧，暗示着他们对统治者并无影响力或者是统治者的“玩偶”。但是在我们看来，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俾斯麦与“协会”在经济政策上极少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俾斯麦懂得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也知道自由派束手无策，因此严重依赖于“协会”的建议，正如前文所言，这些建议包含了极为广大的政治范围。

我们已经知道，官房学派的成就是丰硕的。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特别是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德国经济学的学术成就同样是丰硕的。“社会政策协会”的会议论文和报告足足有188卷，排在架子上长达5米；历史学派最具影响力的期刊《施穆勒年鉴》（Schmoller's Jahrbuch）在创立后的一百年内（1871—1971）的样刊（就是每一期拿出一本放在一起），摆在架子上将近7米长。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几十种期刊以及大量的书籍与专著。我们大可不必接受新自由主义宣称的“唯我独尊”，此处就有一个成熟的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幸的是，这一理论被限制于一种曾是经济学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e）、而今却相对难以掌握的语言之中。[20]

德国经济学家与奥地利经济学家之间著名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是一场德语经济学的内战，19世纪80年代爆发于古施塔夫·施穆勒和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之间。[21]在今天看来，这场近乎苛刻的学术争论本质上是在细枝末节上的吹毛求疵。卡尔·门格尔被视为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历史，但他却论道：“任何经济现象的发达的理论，如果没有经济史的研究，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理论经济学离不开历史”。施穆勒和门格尔都认为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必要的，“方法论之争”是关于这两种方法中哪一种应该处于主导地位，即两种方法中哪种方法应该成为“主要科学”，哪种方法应该成为“辅助科学”。

尽管爆发了“方法论之争”这场内战，德国经济学的影响力仍然于1900年左右达到顶峰。美国与日本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深受德国经济学的影响。令德国经济学家感到欣慰的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放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中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两个关键部分：工资基金理论（限制了工资与薪金的可用资源）和自由贸易理论（穆勒承认了产业关税（industrial tariffs）的有效性）。大家普遍认为，李嘉图的抽象体系造成了社会灾难。李嘉图体系影响力丧失的标志是剑桥经济学家W. 卡宁汉姆（W. Cunningham）的著作《自由贸易运动的兴衰》（伦敦，克莱/剑桥大学出版社，1904）。故而可以肯定，施穆勒1897年赴任柏林大学校长（Rektor）的就职演说（施穆勒，1897）会上庆祝经验导向的经济学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战胜了教条主义的经济学。

6. 德国 1945—1947：摩根索计划验证德国经济学传统

从 1650 年到 1950 年的完整的德国经济学传统，作为替代今天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成熟的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个传统是反对机械的和简化的、无视各种政治差异的经济政策最为坚实的堡垒。我们打算在这一理论传统基础之上，构建“其他教规”经济学（www. othercanon. org）。创造、刺激、引导和控制市场力量以提高人类福利，是产生于“三十年战争”结束之时的德国经济理论的主题（Leitmotiv）。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式经济学继续支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

至少到 2004 年的东扩之前，欧洲经济一体化遵循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方案，即对称一体化（symmetrical integration）。德国实用主义已经占据了全欧洲，最近还新增了对创新的特别关注，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一种出口条款（export article），主导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作为一种理论传统，如果德国经济学传统连同纳粹的洗澡水被泼了出去，在我们看来，这根本是没有道理的。建立在这一传统上的政策不仅使欧洲得到了发展，也使美国与日本得到了发展；事实上，这些政策是任何国家成功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a mandatory passage point）。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官房学派的核心思想，即国家需要发展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被“摩根索计划”（The Morgenthau Plan）这一项规模巨大的实验证实。此计划以 1934 年到 1945 年担任美国财长的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名字命名，旨在防止德国再次发动战争（Morgenthau，1945）。为了达到此目的，采用的手段就是瓦解德国的工业，通过关闭工厂、将工业机器拖出德国、往矿山注水等方式使德国经济成为一种“哑巴”（pastoral）经济。这一计划于 1943 年在盟国会议上通过，并且在 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后实施。

1947 年，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参与了一项调研任务，他从德国发回报告：“要将被占领之后的新德国（New Germany）变成一个‘哑巴之国’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消灭或者迁走 25 000 000 德国人民。”“摩根索计划”至此搁浅。胡佛已经重新认识到了官房主义与重商主义人口学家的智慧：相对于农业国，工业国具有更强的养育人口的能力。脱工业化的过程也导致了农业产出的剧烈减少和制度性崩溃（collapse），表明了工农业部门

之间协调的重要性，这都是官房学派经济学的观点。就在胡佛发自德国的警示性报告之后不到四个月时间，美国政府出台了“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其目的恰恰与“摩根索计划”相反：不惜一切代价使德国工业能力恢复到1938年的水平。“马歇尔计划”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援助计划，而且更是一项再工业化计划（reindustrialisation plan）再怎么强调这一点也不为过。

经过多年沉寂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摩根索计划”实际上（de facto）又被“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复活了，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更为明显。这一全新的、实际的（de facto）“摩根索计划”打着“结构性调整”的旗号，给第三世界国家带去了破坏工业化的后果（Reinert，2004b）。经济政策的两种理想类型——“马歇尔计划”和“摩根索计划”——体现了时兴的“善”与“恶”的循环，但是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全盛时期也没有很好地给予解释。

1947年，美国认识到了已经付诸实施的“摩根索计划”带来的破坏性。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这次演说中公布了后来的“马歇尔计划”中强调了“农民通常都制作食品，以便和城市居民交换生活必需品”，而这种分工，即城乡之间的报酬递增活动，“正面临着被瓦解的威胁”。乔治·马歇尔非常赞同官房学派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劳动分工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文明不能缺少报酬递增部门（areas），这是自安东尼奥·舍拉，到亚巴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一直都在强调的。然而以交易为基础的英国经济学及其后辈——今天的主流经济学，都没有明白这个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经济理论的内核。英国经济学理论工具和应用工具都没有抓住这一要点，这也是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的一个盲点，结果导致了今天人类无以名状的（untold）痛苦。这也解释了“华盛顿共识”所到之处，“失败的国家”不断增加的原因。而乔治·马歇尔于1953年荣膺“诺贝尔和平奖”。

注释

1　我要感谢德雷克斯勒（Wolfgang Drechsler），凯特尔（Rainer Kattel）以及编辑对本章提供的有用意见，文责自负。

2　在本章中，“德国经济学”一词将用于指代所有以德语为原文的经济学。

3　有关国家在德国经济学传统中的作用，参见赖纳特（Reinert，1999）。

4　有关美国、日本明治维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对德国模式的选择问题，参见赖纳特（Reinert，1995）的讨论。

5　备有证明的文件见赖纳特（2004）。

6　参见杉山、忠平、水田（Sugiyama，Chuhei and Hiroshi Mizuta，1988）。

7　赖布（Tribe，1988&1995）也用了相同的例子。

8　克莱曼斯（1951：158～163）。

9　克莱曼斯（1951：161）。

10　除了奥古斯特·施特勒万（August Schlettwein，1731—1802）和西奥多·施马尔茨（Theodor Schmalz，1760—1831），这两位都是德国经济思想史上被边缘化了的人物。

11　感谢德雷克斯勒（Wolfgang Drechsler）对本段表述提供的帮助。

12　有关德国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不同的理解方式的有用讨论，可以参见德雷克斯勒（Wolfgang Drechsler，2004）。

13　鄂斯曼·斯班（Othmar Spann，1878—1950）是极端“整体经济学”的代表。

14　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个例子是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德文著作的英文版（Christian Wolff，1750）。

15　霍尼克著作的这一部分由蒙罗（Arthur Monroe，1930）翻译。

16　初步结果可见于卡特（Carpenter，1977）。

17　这一点也可参见西班牙经济思想史学家郎赫（Ernest Lunch，1996：163－175）。

18　对历史学派的讨论参见盐野谷佑一（Shionoya，2001）和杰罗姆—索利姆（Grimmer－Solem，2003）。

19　参见埃里克·赖纳特和雨果·赖纳特，即将出版（Reinert，Erik S，Hugo Reinert，forthcoming，2004）。

20　巴克豪斯（Jürgen Backhaus）教授（埃尔福特大学）在过去的近20年里组织了“海尔布隆座谈会”，其目的就是要将重要的德国经济分析介绍给英语世界。

21　对“方法论之争”的讨论参见赖纳特（Reinert，2003a）。

参考文献

Berch, Anders (1747). Inledning til Almänna Hushålningen, innefattande Grunden til Politie, Oeconomie och Cameralwetenskaperna. Stockholm: Lars Salvius.

Carpenter, Kenneth (1977). Dialogue in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ions from and into German in the 18th Century. Boston: Kress Library Publications No. 23,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lemence, Richard V. (1951). Essays of J. A. Schumpeter. Cambridge, MA: Addison - Wesley, pp. 158 ~ 163.

Drechsler, Wolfgang (2004). “Natural versus Social Sciences: On Understanding in Economics”. In Erik Reinert (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Grimmer-Solem, Erik (2003), The Rise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and Social Reform in Germany 1864—18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mpert, Magdalene (1937), Bibliografie der Kameralwissenschaften, Cologne, Schroeder.

Lluch, Ernest (1996). “El Cameralismo mas allá del mundo germánico”. Revista de Economía Aplicada, 4 (10): 163 ~ 175.

Meyen, Johan Jacob (1770). Wie kommt es, dass die Oekonomie bisher so wenig Vortheile von der Physik und Mathematik gewonnen hat; und wie kann man diese Wissenschaften zum gemeinen Nutzen in die Oekonomie einführen, und von dieser Verbindung auf Grundsätze kommen, die in die Ausübung brauchbar sind? Berlin: Haude & Spener.

Monroe, Arthur (1930). Early Economic Thought. Selections from Economic Literature prior to Adam Smi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rgenthau, Henry, Jr. (1945). Germany is Our Problem. A Plan for Germany. New York: Harper.

Oppenheim, H. B. (1872). Der Katheder-Sozialismus. Berlin: Oppenheim.

Perrotta, Cosimo (1991). 'Is Mercantilist Theory of the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Really Erroneou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3 (2): 301 ~ 336.

Perrotta, Cosimo (1993), 'Early Spanish Mercantilism: The First Analysis of Underdevelopment', In Lars Magnusson, Mercantilist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1993: 17 ~ 58.

Pfeiffer, Johann Friedrich von (1764—1765 & 1777—1778). Lehrbegriff sämtlicher oeconomischer und Cameral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und Mannheim, Johann Christoph Erhard und C. F. Schwan. 6 volumes.

Pfeiffer, Johann Friedrich von (1781—1784). Berichtigungen berühmter Staats-Finanz-Policei-Cameral-Commerz-und ökonomischer Schriften dieses Jahrehunderts, von dem Verfasser des Lehrbegriffs sämtlicher Ökonomischen und Camer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Esslingersche Buchhandlung. 6 volumes.

Pfeiffer, Johann Friedrich von (1780). Der Antiphysiocrat, oder umständliche Untersuchung des sogenannten Physiocratischen Systems, Frankfurt: Esslingersche Buchhandlung.

Reinert, Erik S. (1995).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predecessors - a 500 year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6: 23 ~ 42.

Reinert, Erik S. (1998). Raw Material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or, Why List (the Protectionist) and Cobden (the Free Trader) Both Agreed on Free Trade in Corn. In Parry, G. (ed.). Freedom and Trade. 1846—1996. London: Routledge.

Reinert, Erik S. (1999).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6 (4/5).

Reinert, Erik S. (2000), "Karl Bücher and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Techno-Economic Change", in Backhaus, Jürgen (ed.) Karl Bücher: Theory, History, Anthropology, Non-Market Economies, Marburg: Metropolis Verlag.

Reinert Erik S. (2003a). "The Austrians and the Other Canon". In Backhaus, Jürgen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 Thought. European Contributions and Concept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Reinert, Erik S. (2003b). "Increasing Poverty in a Globalised World: Marshall Plans and Morgenthau Plans as Mechanisms of Polarisation of World Incomes". In Chang, Ha-Joon (ed.). Rethin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Anthem.

Reinert, Erik S. (2004a).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 (1717—1771): The Life andTimes of an Economist Adventurer". In Backhaus, Jürgen (ed.).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Kluwer.

Reinert, Erik S. (ed.) (2004b).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Reinert, Erik S. and Arno Daastøl (1997). "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Economic Innovations: The religious gestalt-switch and the duty to invent as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 (2/3): 233 ~ 283.

Reinert, Erik S. and Hugo Reinert (forthcoming 2004).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Economics: Nietzsche, Sombart, Schumpeter". In Backhaus, Jürgen and Wolfgang Drechsler (eds.).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2000: Economy and Society, Series The European Heritage in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Kluwer.

Roscher, Wilhelm (1868). "Der sächsische Nationalökonom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 In Archiv für die Sächsische Geschichte, 76 ~ 106.

Schmoller, Gustav (1897). Wechselnde Theorien und feststehende Wahrheiten im Gebiete der Staats-und Socialwissenschaftlichen und die heutig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slehre, Rede bei Antritt des Rectorats, Berlin: W. Büxenstein.

Schumpeter, Joseph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kendorff, Veit Ludwig von (1665) Additiones oder Zugaben und Erleuterungen zu dem Tractat des Teutschen Fürstenstaats, Frankfurt: Gotzen.

Shionoya, Yuichi (ed.) (2001).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he Historical and Eth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Small, Albion W. (1909). The Cameralists: The Pioneers of German Social Polity, New York: Burt Franklin.

Sombart, Werner (1928).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München u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Sombart, Werner. 2 volume edition 1902, 4 volume edition 1919, 6 volume edition 1928. (French, Spanish and Italian translations of the two last volumes have been published.)

Stolleis, Michael ed. (1995), Staatsdenker in der Frühen Neuzeit. Munich: Beck.

Tribe, Keith (1988). Governing Economy. The Reformation of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ibe, Keith (1995). Strategies of Economic Order. German Economic Discourse (1750—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giyama, Chuhei and Hiroshi Mizuta (1988). Enlightenment and Beyond. Political Economy comes to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Wolff, Christian (1750). The Real Happiness of a People under a Philosophical King Demonstrated; Not only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but from the undoubted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under their first Founder Fohi, and his Illustrious Successors, Hoam Ti, and Xin Num. London: M. Cooper.

第十七章　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传统[1]：启蒙运动时期半边缘化地区的发展理论与政策

索菲斯·A. 赖纳特[1]

摘要：虽然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市国家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地位，但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它们却滑落到了欧洲欠发达的半边缘化地位。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地位下降的问题，18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比如加利亚尼、吉诺维西、韦里、贝卡利亚、特罗恩和萨勒尼等人）对经济发展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整理。在本文中，本人根据历史对现代社会早期意大利的经济思想传统进行了考察，这种传统既涉及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意大利的经济欠发达问题），也涉及世界体系中经济核心地区的理论和实践对外传播的问题。我认为，这些经济学家们是从下列立场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国家应该对报酬递增制造业中的个体竞争性活动提供支持。同时，我还认为，这种方法以舍拉和伯特罗等早期思想家的理论以及意大利独特的哲学遗产为基础——这种遗产融合了中世纪的集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改革精神。

1. 引言

大约在13世纪，佛罗伦萨人、比萨人、亚马非人、威尼斯

① 原载 Jomo K. S. and Erik S. Reinert (eds.)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How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Have Addressed Development, Tulika Books, Zed Books, 2005, pp. 24~47. ——译者注

> 人和热那亚人开始接纳一种不同的促进财富和实力的政策。因为，他们注意到，在没有更多土地的情况下，科学、土地耕种、技术和工业的应用以及广泛的贸易等可以养育大量的人口，满足人们无尽的需求，维持生活的奢华并获得巨大财富。

欧洲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改革家弗兰西（Sebastiano Franci）在1764年为米兰的新闻信札《咖啡馆》（Il Caffe）写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叙述了意大利人如何通过培育规模报酬递增活动，在欧洲率先突破了马尔萨斯的贫穷陷阱。意大利的这些城市国家发现，与纯粹的农业相比，制造业和贸易可以使一定的土地上供养更多的人。然而，制造业不仅仅只带来财富，它还在引发文化和政治革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弗兰西的朋友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在米兰大学经济学的第一堂课中教导学生："自由和工业"这两者共同"来自于亚得里亚海的沼泽地区"，正是在这片不毛之地上，威尼斯共和国扩展了她的地中海帝国（1769/1970：31）。1500年，在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中，只有巴黎不属于意大利（J. de Vries 1984：35）。事实上，弗兰西继续写到："它们的成功如此令人高兴，因此世界的目光第二次集中到了意大利……而且他们的做法迅速被别人所模仿。"（1764/1998：144）[2]。但是，当欧洲的其他国家开始学习意大利城市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做法时，意大利本身却陷入了落后，并慢慢地变成了世界体系中的半边缘化国家（Cipolla，1970；Wallerstein，1974；1980）。因此，18世纪的意大利作者是欧洲经济发展方面最敏锐的分析家。意大利人身边辉煌的艺术遗产、各种建筑奇观以及经济实力的急剧下降等，这一切不断地在向人们提示世界经济的波动性。

弗兰西和贝卡利亚都是笔友会（L'Accademia dei Pugni）最忠实的成员。笔友会由米兰上层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改革家组成。这一部分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理想，他们用于交流思想的手段——《咖啡馆》——被公认为是意大利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他们共同谋求解决当时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意大利这个曾经两次在历史上处于世界注意力中心（指罗马帝国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同时可参见Ruffolo，2004））的国家却会落后于英国、法国和荷兰？针对这一问题，人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按照阿布拉莫维茨的说法（Abramowitz，1986），面对如何重新"赶上"这一同样的问题时，整个半岛所有

的作者都给出了大致相同的答案。在18世纪末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包括那不勒斯的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和吉诺维西（Antonio Genovesi）、米兰的彼得罗·韦里（Pietro Verri）和贝卡利亚、威尼斯的特罗恩（Andrea Tron）以及奥特兰托的萨勒尼（Carlo Salerni）等）对经济发展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和解读。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面对的挑战就是欠发达，即要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积极的经济政策面前扭转“落后”的局面。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则。正如萨勒尼在1782年写到的，“对于那些向往改进自己的制造业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人来说，英国的模式提供了一个范例。”（1782/1996：83）。问题在于，如何使英国和荷兰成功使用过的基本模式适应意大利这个城市国家的特点。作为经济欠发达方面最早的分析家，这些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在揭示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占有优势地位。

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都被熊彼特提到过，而且翻开熊彼特开创性著作《经济分析史》中“意大利人的巨大贡献”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斯密的理论体系诞生之前，这一领域的荣誉应该归功于18世纪的意大利人。”（1954：176）。然而，英国史学著作中对这些贡献的记录非常之少，由这些意大利人所代表的前古典传统理论仍然被笼罩在重农主义的阴影之中。虽然熊彼特根据“意大利生活的地区性”（1954：177）将这一时期意大利人的理论贡献分为两个学派，即米兰学派和那不勒斯学派，但就本章的意图而言，这并不是考察意大利传统理论的最有成效的方法。意大利尚未统一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没有共同的制度。正如德国统一之前，许多小国的经济学家能敏锐意识到自己的“德意志民族特性”一样，意大利城市国家的这些经济学家显然也都具有“意大利民族特性”（Carli 1765/1998）。因此，依据文献记录和实际证据，我们仍然可以谈论整个意大利半岛经济这个针对欧洲经济演化过程而产生的话题。事实上，纵观这一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多次出现同样的话题，有的是欧洲更大范围内思想交汇的共同结果，而其他的则只反映了意大利的特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最贴切的话题包括：市场的正常运行需要适当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制造业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道德影响；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济核心地带和经济边缘地带的作者们对经济增长机制理解的不同（有时存在明显的不同）。

以启蒙运动时期对政治经济问题更广泛的讨论为基础，本文将探讨现代社会早期意大利人传统的经济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仅与经济发展（或者说与意大利的经济不发达）的问题相关，而且还涉及世界经济体系中核心地区的理论和实践向外传播的问题。换句话讲，一个以前富有但现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经济实力的丧失的？他们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机制是什么？他们是如何看待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的？我们希望，本文的考察不仅要揭示经济发展领域（这一领域刚开始形成时）的某些观点，而且还要处理目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些历史进程问题。

2. 现代社会早期意大利从核心地位转向半边缘化地位：以美第奇大公和都铎计划为例

在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和威尼斯等城市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幸运地处于东西方贸易和旅行的交通要隘处，而且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使得这一地区作为欧洲商业重心的地位得到强化。14 世纪后期美第奇（Medici）家族显赫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巴底（Bardi）这样的佛罗伦萨银行家族一直在向外国的君主们提供贷款。威尼斯神奇的辉煌仍然见证着它对东方香料贸易的近乎完全垄断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复式记账、专利和培育幼稚产业的关税等，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制度性发明。事实上，伟大的历史学家鲁弗（Raymond de Roover）曾经论述说：

> “现代资本主义……根植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从十字军东征到发现美洲大陆，意大利一直在西方世界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而且意大利商人是最优秀的……意大利人的统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优越的企业组织。事实上，这些企业组织为当今大多数的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Roover，1963）。

然而，当几种因素共同使得欧洲经济舞台出现重组时，这一基础便无力使这种增长维持到 16 和 17 世纪了。当大西洋和波罗的海的航线被利用时，新旧大陆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成熟。环非洲航线为荷兰和葡萄牙在东方市场的影响打开了方便之门，国际经济体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外国入侵者使得各自为政的意大利城市国家遭到蹂躏，此外，诞生于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慢慢

地传播到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欧洲的新兴国家。前两国还一直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优势。这三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一致反映了下列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强有力的制造品出口基地以及在国际贸易网络中拥有优势地位（这种地位最早由意大利城市国家所享有）（比如可参见 van Zanden，2001：76，85）。正如荷兰后来发生的情况一样，意大利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国家重商主义的逐步消亡——后来的经济成功是在民族国家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List 1841/1959；Schmoller 1897/1967：50～51；Ruffolo 2004），其结果是意大利经济实力的相对（和某些地区绝对）下降。与其他人一样，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一直在广泛研究以下问题：当世界经济的核心向西北移到荷兰和英国时，意大利是如何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半边缘化国家的。然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忽视对这一动态过程原因的研究。整个现代社会早期，他们都在从如何赶上、如何恢复丧失的经济领地的角度从事写作。因此，他们的理论对理解现代世界体系刚建立之时的经济发展机制是十分具有价值的。

弗兰西认为外国人学到了意大利人的做法。18 世纪持这种观点的意大利人并非弗兰西一人，因为整个意大利半岛的人几乎一致认为：某些国家从 15 世纪末期开始“模仿”意大利的风俗习惯、实际经验和产品生产方法，并最终在意大利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了他们（Beccaria，1769/1970：31～40；P. Verri，1771/1986：2～3；Salerni，1782/1996：80～89；Tron，1784/1994：106）。意大利的第一位大学经济学教授吉诺维西尤其意识到了一个已有的经济体系中他所称的“后来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在自己 1773 年的讲课笔记中痛心地概括了眼前的这一问题：“那些从意大利输入技术和工业品的国家的确把我们甩在了后面。”（参见 Venturi，1969：574～575）。为了更好地说明欧洲经济格局中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对个别国家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的经济赶超和模仿所造成的结果，可以参考大公托斯卡纳地区（Grand Ducal Tuscany）的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

给意大利北部（尤其是对佛罗伦萨）的制造业带来严重后果的其中一次最臭名昭著的“模仿”就是本书第 3 章[①]中讨论的英国的所谓“都铎计划”。根据这项政策，都铎王朝开始对羊毛出口和羊

① 指原书第三章。——译者注

毛纺织品的进口征收关税（该措施始于1485年亨利七世统治时期，到1587年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达到极致）（Defoe，1730/1969：131；Salerni，1782/1996：85；Reinert，1995）。当英国逐步积累起足够的加工能力时，所有羊毛的出口都被禁止了。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是欧洲市场最大的羊毛供给地，因此，这种剧烈的政策转变对整个欧洲经济有着广泛的影响。16世纪末期，佛罗伦萨的羊毛贸易不仅逐步与其主要的羊毛供给者失去了联系，而且还失去了一些最重要的客户[3]。极为成功的都铎计划（它为英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佛罗伦萨的羊毛贸易者发现自己无力与英国低价的制成品进行竞争，同时他们还发现自己城市的技术工人也被英国乡村地区的低收入劳动者打败了。随后，托斯卡纳地区丧失了主要的经济活动而不得不对其经济结构进行重新调整。我们可以通过所列出的数据来考察该地区的衰落：1561年，这里的羊毛加工厂达到最多的152家，1596年持续下降到100家，而1626年只剩下49家。同样，羊毛制品的年均产量也从1560年—1572年间较高的30 000件降到了1620年—1629年间的仅有9 000件（Malanima，1982：292～295）。

从1537年开始，美第奇大公就已经实施了后来人们所称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比人们公认的重商主义理论产生的时间要早）（Brown，1983；Litchfield，1986：203），其基本做法就是沿用13世纪人们开始采用的许多方法。为限制原材料出口制定关税和禁令，同时公爵发布的一些命令促进了原材料的进口及工业化。纺织业受到了最好的保护，而且这一行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最大，因为它具有机械化、高需求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同时还在生产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劳动分工水平（Rolova，1983：310；Goldthwaite，1993：19，44）。然而，包括从玻璃生产到食品生产的其他制造活动也得到了鼓励，国内原材料的供给通过采掘活动和桑树种植（为了养蚕）而得到了发展（Morelli，1976：135；Malanima，1982：104，111～112；Malanima，1988：67；Ilardi，1993：534）。此外，通过亲自安排为彼得拉桑塔（Pietrasanta）地区新开采的银矿输入德国工程师，科西莫一世（Cosimo，Ⅰ，1519—1574年）本人也积极参与了经济活动。同样，佛兰德的织锦工被雇佣来教佛罗伦萨人手艺，来自美仑奴（Murano）的玻璃制造者（他们的高工资违反了威尼斯的法律）在佛罗伦萨建立了工厂，而且还从附近的鲁卡（Lucca）地区引进了蚕丝纺织工人（Morelli，1976：123；Adelson，1983：904；

Ilardi，1993：535；McCray，1999：127～128）。蚕丝行业尤其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公爵最后以企业家的身份进入了经济领域中这个具有很高准入门槛的行业（Malanima，1983：299；Parigino，1999：84～85；Reinert，1999；Molá et al，2000：415）。国家鼓励的经济多样化主要集中在工资较高的奢侈品行业。这种做法的确阻止了经济衰退的浪潮，但最终却无力阻止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然而，在从核心地位转向边缘化地位的过程中，其他一些对“重商主义”不够重视的国家日子过得更艰难（Albertini，1970：286；Malanima，1983：296～299；Malanima，1988：70）。这就是意大利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实际环境。

3. 后经院哲学的先驱：伯特罗和舍拉

虽然与我们的讨论最相关的经济发展理论只是盛行于18世纪的意大利，但有几项早期的贡献值得在此提起，一是因为它们是意大利经济衰退前夕人们所作的自我分析，二是因为它们对后来的作者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经院作家们声名远扬，但由于他们经常强调的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时间前移到16世纪初期，以找到第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实际上，意大利人后来的贡献主要以伯特罗（Giovanni Botero，1544—1617年）和舍拉（Antonio Serra，fl. 1613）的著作为基础——他们的著作对整个现代社会早期都具有影响。伯特罗是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在许多方面都影响了后来的作品，但是，舍拉并不引人注目的论述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事实上几乎遗失了。可是，舍拉的论述在18世纪又重新显露出来，而且按照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① 的话来说，它就像“家喻户晓的生活明灯”，在当时意大利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中传播（Croce，1925：160；Reinert & Reinert，2003）。

熊彼特称伯特罗为政治哲学史上介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年）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之间的“知识基石”，而且，这位作为耶稣会会员的哲学家事实上最著名的地方在于将自己的《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纳入到了向

① 克罗齐（1866—1952年）：20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政治家，也是享誉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译者注

统治者提建议这一令人尊敬的文学传统中（Schumpeter，1954：164；Gilbert，1968）。伯特罗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四海为家的人，出生于意大利的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但他最早的著作是分别在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和德国的维尔茨堡（Würzburg）出版的。他的著作涉及很多主题，但除了《国家理性》之外，另外一些比较著名的著作是《论城市的伟大》（On the Greatness of Cities）以及《普遍联系》（Universal Relations）——一本描述全世界风俗和居民状况的地理手册（Botero，1599）。通过对基督教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考察，他发现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工业而不是采掘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的意大利作者以及包括从西班牙到瑞典的重商主义论述确定了一条基准线：

> 工业的力量如此强大，新西班牙即秘鲁的金矿或银矿都比不上它。来自米兰商品的关税给这位天主教国王带来的财富要大大多于波托西（Potosi）① 的矿产和哈利斯科（Jalisco）② 的矿产。意大利是一个没有重要金矿或银矿……的国家，法国也是一样，但这两个国家都因为工业而拥有大量的金钱和财富。（Botero，1589/1956：152）[4]。

伯特罗发现，经济增长来自于鼓励制造业扩张的法律。他最早发现工业可以比农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但他似乎未能更深入地揭示经济发展的机制（Botero，1589/1956：155～156）[5]。人们几乎可以认为，舍拉1613年的文章《简论》（Breve trattoto）（《对没有金银矿藏的地区为什么会拥有大量金银的简要论述》）就是为了阐明上述这段话的含义。

舍拉在西班牙的殖民地那不勒斯进行写作时观察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如那不勒斯）很穷，它们向威尼斯这样的国家提供原材料。出人意料的是，威尼斯这样的国家却很富有，原因在于自然资源的缺乏迫使它们依赖制造业[6]。然而，在17世纪初，舍拉所在的城市是欧洲第四大城市，仅次于伦敦、伊斯坦布尔和巴黎。自从1442年从安茹省人（Angevines）手中夺得那不勒斯这块土地之后，西班牙的阿拉贡（Aragon）王朝就将它纳入了自己的殖民地体系，这样意大利南部的经济与西班牙的经济一样遭受了管理不善的

① 玻利维亚西南部省份。——译者注

② 墨西哥的一个州。——译者注

结果（Calabria，1991：131）。与自己的宗主国首府一样，那不勒斯也到处充斥着不公平——在所属范围内，奢侈和财富与痛苦和饥饿并存（Porter，2000）。与西班牙国王不愿听从西班牙人的建议一样，殖民地总督也不愿接纳舍拉的建议。

尽管如今人们指责重商主义只看重黄金，但在论述威尼斯富有而那不勒斯贫穷的原因时，舍拉是以经济中不同行业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他认为，不同经济活动受到不同经济规律的制约。更具体地讲，制造业的报酬会随生产的扩大而递增，而农业却并非如此。所以，舍拉试图揭示真实经济（Realökonomie）中决定黄金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的根本原因。在舍拉看来，黄金赤字只不过是其他问题带来的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只能在生产领域得到解释。在以整体观来理解经济发展问题时，舍拉认为仅仅拥有工业是不够的，因为还必须有恰当的制度来培育和支持它。要通过法律来鼓励勤奋和反对懒惰，且要倡导有益的发明和创新；要将制成品的进口限制在最低的幅度，同时要鼓励原材料的进口（Reinert & Reinert，2003）。

用更现代一点的话来讲，舍拉明确支持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策略像一条主线贯穿着经济发展的历史——从公元前梭伦时代的雅典一直到20世纪（Sombart，1902：Book Ⅱ，55－56；Reinert，1999）。进口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后再出口，这样，原材料增值的过程就可以通过国内而不是国外的劳动来完成。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外国支付收益理论”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者共同讨论的话题（Johnson，1937：301～315）；Perrotta，1991：318；Magnusson，1994：167）。这种良性循环的累积从城市开始：产品制造活动之间大范围的劳动分工都遵守报酬递增规律。这样，报酬递增活动尽量在国内展开，而报酬递减活动都集中在国外——就像当代殖民地体系一样。

这种政策会同时创造就业和财富，而外国人力资本的进口只是这一理念的自然发展。所以，与以前的科西莫一世一样，舍拉也主张学习威尼斯的策略，通过法令来吸引国际技术的流入。整个现代社会早期，欧洲的君主们向外国专家支付了大量的报酬，使技术创新在各国之间转移。而且，国家时常试图通过严厉的法律来防止这种技术的外流。威尼斯（它从各方面带头摸索了这一做法）也经历了技术的外流，因为事实证明，即使对难以控制的技术工人执行死刑，也不能阻止英国、法国、荷兰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在物质和

制度方面的大规模剽窃活动（McCray，1999：164）。

然而，舍拉的独特见解在于把经济看成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共同形成的有机体，并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各部分之间的累积因果：

> “但是，制造业的数量也对城市有利。在城市里，不同原因使得人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存在各种制造业（否则制造业就是导致人们聚集的整个原因），而且还因为两种原因相互强化：也就是说，制造业的数量会增加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以及城市贸易的数量；但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数量反过来又是前面所说的贸易和人们聚集的产物。”（1613：18）

尽管舍拉的论述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它却在18世纪被人们重新发现，并对此后的意大利人产生了影响。它还通过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对德国历史学派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们两人都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之前引述过舍拉的论述——缪尔达尔在不经意中使得舍拉的理论复活了（Myrdal，1956；Myrdal，1957）。在确认报酬递增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舍拉使用的整体方法以直接和间接形式反映在整个现代社会早期意大利主要经济学家的作品中。

4. 那不勒斯和米兰的政治经济学流派——加利亚尼、吉诺维西、韦里和贝卡利亚

正如曾经提到过的，熊彼特发现18世纪意大利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经济“学派”，而且北方和南方作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尽管他们的世界观和理论细节有时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事实上，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在这一时期的整个意大利，他们的政策建议是十分的一致。就本章而言，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一时期的四位主要作者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即生活在那不勒斯的加利亚尼（1728—1787年）和吉诺维西（1712—1769年），以及生活在米兰的贝卡利亚（1738—1794年）和彼得罗·韦里（1728—1797年）。从时间上看，那不勒斯学派产生得较早。加利亚尼长老1750年出版的《货币论》（Della moneta/On Money）既是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第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第一部明确使得舍拉的经济发展理论复活的著作（两者并非巧合）（Galiani，1752/1977：315）。

无论从学识上看还是从职业上看，加利亚尼都是欧洲启蒙运动

的典型代表。作为那不勒斯派驻巴黎的一名外交官，他还是以文学著称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位活跃分子，是巴黎文艺沙龙里一位颇受欢迎的人物，是一位改革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趣的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认为，加利亚尼是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纪中“最深刻、最敏锐而且或许也是最粗俗的一个人”。加利亚尼因为他敏捷的机智和粗俗的举止而闻名（Nietzsche，1886/2002：28）[7]。他在教会接受教育，他亲身经历的严重饥荒（1764 年那不勒斯饥荒和 1768 年法国饥荒）更进一步地促成了他的性格的形成。1759 年，他被任命为那不勒斯驻巴黎的大使，在这里，他一直工作到 1769 年。因此，加利亚尼亲眼目睹了 18 世纪 60 年代宫廷重农学派势力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很有可能，他（与狄德罗（Denis Diderot）[①] 甚至贝卡利亚一样）在自己事业的初期也是同情法国自由主义的，但是，他所经历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别，使得他成为了对魁奈重农学派最犀利的反对者之一（Kaplan，1976：590～611）。实际上，这位善良的长老被经济分析史书记载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边际效用理论的贡献，以及与重农学派的激烈论战（Kauder，1953a：644～645；Kauder，1953b：565；Spooner，1956）。作为加利亚尼终生的朋友，吉诺维西也是一位长老、一位哲学家和一位改革家，但他比加利亚尼有更强烈的学术爱好。实际上，他在 1754 年被授予那不勒斯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席（这是意大利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教席）。他在那不勒斯启蒙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而且，他的学生（比如佩尔米尔瑞（Giuseppe Palmieri）和费兰杰瑞（Gaetano Filangieri））在整个意大利继续着他的事业。

米兰的韦里伯爵和贝卡利亚侯爵都出生于贵族家庭，因此，他们都能从身边优越的社会和教育环境中获益。他们都是笔友会的核心成员，而韦里还是《咖啡馆》杂志的编辑和重要力量。尽管后来他们的友情消失了，但这两位米兰贵族改革家都对对方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他们的杂志模仿英国《观察家》（Spectator）的做法登载了一系列的文章（有些是直接从法国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e）中翻译过来的，其他一些则是自己的创作），讨论社会与改革的问题，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问题（Capra，2002）。事实证明，

① 德尼·狄德罗（1713—1784 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他的最大成就是著作《百科全书》（1751—1772 年）。——译者注

这一群体成为了意大利复兴（Risorgimento）（19 世纪意大利半岛的统一）的重要先驱之一（Noether，1951：89～107）。虽然贝卡利亚侯爵因为他的《论犯罪与刑法》而闻名，但由于他终生从事米兰的管理，因此接触到了社会改革中的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写于 1769 年—1770 年，但只在卡斯特底（Baron Custodi）1803 年出版的《意大利早期经济学家文选》中登载过）最初只是在米兰大学进行一系列讲座的内容，因此，从未像亚当·斯密当时的《国富论》那样修订之后出版（Groenewegen，2002：2～47）。然而，他却被熊彼特尊称为“意大利的亚当·斯密”，“只会高于而不会低于”亚当·斯密（1954：176）。韦里也是当了一辈子的公务员，他直接经历的一些实际经济问题使得他慢慢形成了具有欧洲大陆重商主义特征的现实主义思想。

贝卡利亚、韦里和加利亚尼都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进行过范围广大的旅行，与同时代的名人们交谈（比如可参见 Venturi，1972）。吉诺维西虽然很少离开那不勒斯，但他的工作以及他所教过的学生使其思想传遍了整个意大利。事实上，韦里曾给吉诺维西去过一封信，感谢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坚持认为“所有意大利人都应该向你致敬”（P. Verri，no date）。然而，如果不了解意大利经济学家与法国经济学家即重农学派之间的对话，就不能正确理解这一时期意大利经济学的发展。在各种语言中，有众多介绍重农学派及其学说的知识。考虑到本文的论点，我们认为有必要阐明重农学派所发现的经济发展基本机制以及他们根据这些机制所推测出的政策建议。

5. 重农学派以及意大利人对这一理论的反应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魁奈创立的重农学派起始于 18 世纪 50 年代中期，而失宠于 18 世纪 60 年代末期，但是，从魁奈 1756 年—1757 年发表在《百科全书》中的关于“农民”和“谷物”的论文、1759 年发表的更加系统化的《经济表》以及他的追随者后来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重农学派最根本的“经济管理原理”大体上并没有发生改变。重农主义（严格地讲叫“自然法则”）的闻名在于它把经济看成是一个自我均衡的系统，并坚持认为非农业部门“不会产生价值”。这种学说来自于下列理论：制造业不会使“净产品”增加，因为它们只能使原材料加工后的价值中包含了所消费的生产

成本以及商人的利润（关于斯密是如何接纳这一思想的，请参见Reinert，1999：309～314）。因此，魁奈及其重农学派最终得出了此类政策建议："只进口奢侈品和出口原材料"，"通过制成品进口来支持那些直接来自于土地的新产品的出口"（Quesnay，1758/2003：471～477；Quesnay，1759/1968：173；Miller，2000：499～500；Groenewegen，2002：222～262）。

重农学派对18世纪60年代法国谷物贸易的开放有着重要作用，而这一措施造成的混乱与一系列的粮食歉收交织在一起导致了18世纪60年代末期的人道和政治危机（Kaplan，1982：52～57）。尽管重农学派在经济分析史中形象不佳，但当时的许多人却对他们的行为及其实际后果印象不太深。虽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高度赞扬了重农主义，但他最好的朋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则认为人们应该"砸碎它们，打倒它们，并使它们彻底消失"。莫西亚（Louis Sébastien Mercier）同样也希望"公正的历史"将对重农主义者"进行惩罚"（Kaplan，1976：591，603）。但事实并非如此。

意大利18世纪的主要经济学家似乎一致反对重农主义提出的最终政策建议。虽然魁奈的部分术语（比如与著名的谷物问题相关的术语）进入了米兰学派的经济学词汇中，但米兰学派一致坚决反对降低制造业作为发展动力的地位的做法（Will，1782：48；Capra，2002：292，356）。在参与魁奈倡导谷物自由贸易的同时，韦里激烈地抨击了重农学派在工业对经济发展作用方面持有的立场。与国内许多人一样，他认为，一国的制造业比农业本身能够带来更多的"净产品"，而且"将几块金属"转变成"用于再生产的机器"的行为所带来的净产品并不少于"利用土地、空气和水"来种植谷物的行为（P. Verri，1771/1986：10）。有人认为，意大利人对重农主义一致反对的原因在于重农主义理论传入意大利时遭到了加利亚尼的强烈批评（Ferrara，1889：179）。但是，这两种理论传统有很大的区别，它们甚至在分析问题之前的"情境"方面（从这种情境中激发了他们的经济分析方法）也有很大的区别。所有意大利人都很清楚使自己落后的历史机制是怎样的，但魁奈却并未从历史的垃圾箱中找到相关的一些教训。"我们不要去探究国家的历史或人类的错误"，魁奈说，"因为这只能使我们陷入混乱的深渊……（这些）并不能给我们带来能照亮黑暗的一丝光线。"（Olson，1993：132）。同样，从整体上看，意大利人并不倾向于立即接受一些抽象的理

论，尤其是当这些理论明显地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时（Ferrone，2003：326）。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并存的。总之，意大利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法以及有效的政策措施更感兴趣，而对于乌托邦理论的构建却不感兴趣。人们在颂扬“自然均衡”的同时，许多人却被饿死了，正是这种自相矛盾使得加利亚尼长老感到愤怒——他的实际来自于真实世界中的政策失误（Venturi，1960：48）。

然而，重农主义只是经济分析跨越国界的其中一个例子。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对待重农主义的态度通常与对待其他外国思想的一样：既谨慎又好奇。尽管英国和法国的理论既吸引人又有启发性，但它们并不能被直接采用，因为相关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别。比如，意大利面临的问题是战胜危机（它摧毁了17世纪意大利的工业），而法国仅仅只需要保护科尔贝尔（Colbert）和路易十四所创造出的东西（Beccaria，1769/1970：40－41；Venturi，1960：55）。经济发展的机制是明确的，但欧洲不同国家在政策侧重点上应有区别。在其私人信件中，吉诺维西非常动情地描述了把其他国外理论应用于意大利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苦难。他把国家之间经济理论的转移比作医生的工作：一个医生治疗某种疾病的固定方法必须根据一个一个的病例进行调整，以符合具体的情况（1977：265）。

6. 数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神秘化”

自从并不显眼的复式记账法首次在威尼斯诞生之后，以数字解读现实的做法（Djiksterhuis & Dikshoorn，1969；Crosby，1997）就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进步。启蒙运动时期，经济学中的数学思想不断增加，因此经济学家们经常把这一时期称作“科学的经济学诞生”的时期（Groenewegen，2002：48～96）。虽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引入了统计学，重农主义者以抽象术语来解读经济，但是，18世纪的意大利人却开拓性地将高等数学方法（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引入了经济学中（Tubaro，2000；Tubaro，2002）。他们的工作可能对保罗·克鲁格曼的权威断言来说是一个例外——他认为“经济学……倾向于选择数学阻力最小的研究途径。”（Krugman，1991：6）。

加利亚尼（在意大利当时主要的四位经济学家当中，或许他的理论是最不系统的）从未教过经济学，而且对他自己所称的“经济

学神秘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Kaplan，1976：601）[8]。由于他写作时大多直接面对的是饥荒和重农主义的环境，所以看到他对乌托邦的假设失去耐心时，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他反对在经济学中采用绝对原则，相反，他赞成“以经验为依据的、灵活的和随机的管理”。历史学家卡普兰（Steven L. Kaplan）认为加利亚尼“就像厌恶绝对自由一样厌恶绝对禁令”。（1976：601，594～596）[9]。然而，加利亚尼的这种情感甚至得到了意大利最理论化的经济学家的赞同。虽然吉诺维西的理论具有系统化的特征，但其基本信念与在他之前的加利亚尼和舍拉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吉诺维西1753年出版的《论科学和艺术的真实目的》对科学和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构想——在这一社会中，针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学科相对于理论学科而言，具有“绝对卓越的地位”。他一贯主张向大众宣传科学知识，但却反对为理论而从事理论研究的做法（Genovesi，1753/1977；Genovesi，1772；Mazzotti，1998：684）。

米兰学派建立在更实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然法传统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一学派起初比那不勒斯学派更有逻辑性，但最终也采用了非常相似的方法。1764年，贝卡利亚在试图计算出最优关税水平以降低走私时写到：“代数适用于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加或减少的事物，适用于相互之间具有典型联系的事物……因此，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用于政治学中。”这种逻辑分析可以“启发人们创造出一种关税”，但这种“几何方法”的用途绝对不能夸大，因为“充满数字和计算的政治学更适合拉普塔（Laputa）① 的居民，而并不适合我们欧洲人”。（Beccaria，1764/1998a：173～174）[10]。韦里（他也为《咖啡馆》杂志写稿）同样认为，“几何学精神不仅融入了所有科学之中，而且还使得所有科学得到了完善”（P. Verri，1764/1998d：314）。此外，他在1772年《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第六版的附录中包括了自己笔友会的同事弗里西（Paolo Frisi）对其理论所进行的完整的数学表达。

可是，后来贝卡利亚和韦里都摒弃了这种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大量采用数学的做法，因为正如贝卡利亚所认为的，这“只会使得科学神秘化和高不可攀”（Beccaria，1769/1970：45～46）。正如弗

①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能飞行的浮岛。——译者注

里西同时代的一个人对他所说的，“你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就像以前经院学派对哲学的影响一样。当你使事物变得越来越微妙时，就不知道在哪里终止了。”（Tubaro，2000：215；同时还可参见 Reinert，2000）当时的英国经济学家主要是一些从事写作的商人，但许多意大利人是从哲学、法学和公务员等领域进入经济学领域的。总之，在哪些社会因素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方面，意大利人具有更加整体的视角，而且他们拒绝采纳限制这种视角的方法。总而言之，经济学必须具有相关性：阿利桑德·韦里（Alessandro Verri）（他是彼得罗·韦里的弟弟以及笔友会的创始人之一）在他哥哥面前说的一句话或许给出了结论：“在某些事物面前，我们最好是承认自己无知而不要去捏造幻想。”（A. Verri，1998：812）。

7. 人力资本、制度和文明社会

这样，米兰的经济学家们抛弃了过多采用严密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因为实践证明数学方法并不能对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复杂制度环境进行解读（Beccaria，1764/1998：173 ~ 174；Tubaro，2000：201）。与同时代的那不勒斯经济学家一样，米兰经济学家也力求使自己的理论被大众理解，并力求根据自己对共同利益的构想来改造社会。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包括舍拉和贝卡利亚在内的意大利作家都认为一国的真正财富是“人”而不是黄金。是人的勤劳创造了财富，而且这种理论传统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文明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促进的（Bruni & Zamagni，2004）。比如，韦里认为，“国家的教育水平越高，所产生的行业就越多”。（P. Verri，1764/1998a：27 ~ 29；P. Verri，1771/1986：4 ~ 5；Porta and Scazzieri，2002：84，96）。然而，教育本身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需要信任和合作的文明制度来使市场力量得到正常发挥。历史证明，“人的贪婪”很少能与共同利益协调一致，因此，立法者要不厌其烦地在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之间进行调和。韦里说：“因为只有当每个人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吻合时，才能始终保证公众的幸福。”（P. Verri，1771/1986：42）。与亚当·斯密的看法不同，这种联系并非是必然的。

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①]）传统力求将社会的文明和商业因素结合起来，而且，事实上它认为文明的社会制度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Porta & Scazzieri，2002：84）。自由和竞争带来了企业家才能和经济的发展，但这只能以有利的法律基础为背景（Beccaria，1769/1970：15～16；Porta & Scazzieri，2002：103～106）。实际上，韦里认为，“自由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特许”。（Capra，2002：283）。看到重农主义盛行时期巴黎的暴乱，尤其是看到民众动乱导致113人死亡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后，加利亚尼同样认为，自由被渲染到了使社会根基被破坏的程度：

> “女士们，我要责怪经济学家们。他们如此大肆地宣扬自由，他们如此大肆地批评警察，批评秩序，批评管理。他们如此不厌其烦地声称，不受干预的自然是如此美丽，如此运行良好，能够自我均衡等等，最终，他们确信他们就是道路的所有者，他们可以随意行走，每个人都想从（这些权利）中获得利益。”（Kaplan，1976：606）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的过分关注，都有可能使社会误入歧途。阿利桑德·韦里在《咖啡馆》上发表的《社会精神》这篇文章似乎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他再次强调了文明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重要事实，并认为人们应该“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公务”上（A. Verri，1764/1998：402）。如同改革者在讨论任何事物时的看法一样，这里的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也都存在着一条极佳的中间道路。

吉诺维西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锤炼，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相关的理性观念（它与英国和法国探索的观念完全不同）——即一种文明社会——其社会制度的存在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Genovesi，1765：27；Bruni & Sugden，2000；Bruni，2000：288～289）。因此，吉诺维西认为，不可指望经济增长能够通过与较发达国家的接触和贸易在一夜之间完成，因为不同国家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可能大不相同（Venturi，1969：575，590）。用现代经济学的话来讲，现代社会早期的这些意大利作者们也属于制度学派。

---

① “政治经济学”一词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8. 制造业、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发展

因此，主要的意大利学者与重农学派的观点不一样。前者不仅认为制造业比农业能够带来更多的“净产品”，而且强调制造业可以动员更大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制造业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制造业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Galiani，1751/1915：37～39；Beccaria，1769/1822：181～182）。那不勒斯人和米兰人都认为工业和农业是相互促进的，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而且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为国际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准备。The Chevalier de Zinobi（它是吉诺维西1770年出版的《谷物贸易对话》中的一种反重农主义的声音，被人们广泛看作是对18世纪重农主义最彻底的一次反驳）辩论说，“人们从未见到，而且也将永远不会见到一个制造业城市的周边地区没有被有效地耕种——甚至连贫瘠的土地都被耕种了。”（Galiani，1770：113）然而，除了促进经济增长之外，吉诺维西还认为工业会改变社会本身，因为他观察到，一个多样化的制造业经济总是比纯粹的农业经济拥有更加文明的道德文化和物质文化（Venturi，1960：54）。同样，韦里也看到了一国经济活动的特点与其道德状况之间有一种明确的联系：“工业”使人们脱离“残暴”和“极度懒惰”，因为它鼓励公民去“工作、发明并使得支撑本国的技术和生产活动得到改进”（P. Verri，1764/1998c：159）。

当时大多数主要的意大利经济学家都赞同“自由贸易”，但是，正如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早期这一术语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塞利格曼指出，“自由贸易”的含义是“自由竞争”，而不是“免除或不缴纳税收或关税”。同时，他进一步总结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自由贸易者’都应该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贸易保护主义者”。（Seligman，1920：ix）。当时的意大利经济学家都反对国内垄断、特权和税收，但是当涉及对外贸易时，他们都更为小心。从这一点来看，意大利的理论类似于弗伯雷斯（François Véron de Forbonnais）等作者所代表的前重农学派自由传统，即通过国家的力量来确保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由主义理论（Kaplan，1976：689；Minard，2000：496）。韦里和贝卡利亚就代表了这种观点，他们的国际贸易学说在其整个事业生涯中均未改变。他们最初对经济学的思考于1764年出现在前面提到的《咖啡馆》杂志上。在这本杂志上，彼得罗·韦里发表了他的早期作品《商业基本

原理》。他告诉我们，这篇文章“写于维也纳，是在阅读这一领域主要作者的作品之前完成的”（P. Verri，1763：187）。尽管如此，从韦里关于经济发展的四句座右铭中，我们可以听到流行的官房主义和重商主义声音——当然，这些声音由于该国的“特殊”环境而有所减弱（P. Verri，1764/1998b：37）[11]。

（1）征收制成品出口关税对贸易是有害的。

（2）对国内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征收进口关税的行为对贸易是有害的。

（3）对国内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征收出口关税的行为对贸易是有利的。

（4）征收制成品进口关税对贸易是有利的。

在后来的著作中，韦里保留了大多数这样的论断。他坚持认为，为了促进国内制造业，原材料（有趣的是他还认为书籍和科学仪器）的进口应该免缴关税，制成品的出口同样也应该免缴关税（P. Verri，1771/1986：104，113；Verri in Capra，2002：354）。后来，吉诺维西和贝卡利亚在大学里教给学生的正是这些原理。他们认为，从历史上看，最初的成功的经济发展（即人们所称的“经济起飞”）主要依赖于此类措施（Genovesi，1765；Beccaria，1769/1970）。

然而，《咖啡馆》杂志中一些早期文章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们强调经济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动态过程。韦里认为，国际贸易经常会使得国与国之间已有的差距被扩大。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生产和基础设施得到改进，富裕国家可以拥有“有利的贸易给国内所带来的全部利益”，而贫穷国家则会变得更加不幸。“不利的结果”变成了“不利的原因”，这种恶性循环使得一个国家“完全依赖于自己的邻国……只不过是一个殖民地而已”。陷入这种“平庸”状态的国家应该力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限定自己的贸易差额”，以摆脱这种情况（P. Verri，1764/1998b：31，33）。弗兰西在后一期《咖啡馆》杂志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改进：

> “一般而言，一个弱小贫穷的民族将自己的原材料输送给更强大更富有的民族之做法，是错误的。那些工业较多的国家，将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后使其价值提高一倍以上。它们通过这种高超的技巧来养活大部分本国人口。由于获得了巨大利益，因此，它们始终能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1764/1998：148）

9. 从理想家园（Ben Commune）到公共福利（Felicita Pubblica）：意大利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延续性（从经院哲学到启蒙运动）

马可·波罗对石头一块一块地进行描述。

"但支撑这座桥的是哪一块石头？"忽必烈可汗（Kublai Khan）问。

"支撑这座桥的不是某一块石头"，马可回答说，"而是由石头所形成的拱形。"

忽必烈可汗仍然在默默思考。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向我说起那些石头？只有拱形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马可·波罗回答："没有石头就不会有拱形。"

——选自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看不见的城市》

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这段话似乎描述了18世纪意大利政治经济学的决定性特征。与他们的学院式传统相反，意大利人（从伯特罗到贝卡利亚）主张以整体而不是以个体的眼光来理解经济生活（Langholm，1998：153 and in passim）。强调人在经济中的作用这种独特的做法以文艺复兴后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潜意识（undercurrents）为根基，而且这也是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对文艺复兴看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欢欣地赞扬文艺复兴使得个性被重新发现（Burckhardt，1869；Kristeller，1979）。然而，文艺复兴时期个性主义的古典传统从未从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社会中分离出来。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古典个性主义和基督教集体主义这两种原理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且，集体个性这种表面上矛盾的称呼从中世纪开始一直是意大利经济哲学传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2]。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促使这个城市国家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学说，它所带来的结果可以从意大利整个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从经院哲学家到意大利复兴运动）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伯特罗（1544—1617年）、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年）、舍拉（生卒不详）、吉诺维西（1712—1769年）、加利亚尼（1728—1787年）、彼得罗·韦里（1728—1797年）以及贝卡利亚（1738—1794年）等人都触及了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称的积极主义者加理想主义者的社会经济学传统这种共同的意识。

即使加利亚尼的作品中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但是也无法掩盖他对自己同胞的深切关注，同时也无法掩盖他想行动起来的愿望。他说："我希望有雄辩的口才来向每个人传达我对人类的感情，如果

人们开始相互热爱的话，我们就没有虚度这个世纪。”同样，我们可以看到韦里的抱怨：“真希望我能够说一些有用的话！真希望我能够做一些有用的事！”（Galiani，1750：154；P. Verri，1771/1986：2）。意大利18世纪的经济学诞生于中世纪的共同利益观念与启蒙运动的社会改革理想相交汇的环境之中（Marino，1986：126）。这份遗产是最重要的东西，它通过多种语言反映出来，它通过布道、书籍和艺术得到传播。舍拉的《简论》以文字表达出的思想与罗伦兹提（Ambrogio Lorenzetti，约1290—1348年）著名的壁画《坏政府和好政府的寓言》（位于锡耶纳的市政大厅）以视觉形式所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13]。扩大民众福利是国家理性学说的本质内容，而系统化的经济学则是处于这种更广泛的社会视野范围之内的。

人们一致认为，人类是经济系统中真正的财富，因此，改善人的智力和生理能力是问题的核心。这里讨论过的所有作者都把教育、科学和创新看作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他们在所有时期提出的政策建议都非常一致。由于观察到13—18世纪整个欧洲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即由国家来支持报酬递增活动）一直没有发生改变，他们未让新的理论模式遮蔽自己的常识。“英国人用来致富的理论体系”，萨勒尼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写到，“并非仅仅是一种假设，而是一项证据非常确凿的命题”（1782/1996：82）。因为明白经济发展的一般法则，所以这些经济学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使这些法则符合意大利的特点。正如经济史学家弗瑞斯（P. H. H. de Vries）所说的：“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弄明白为什么有些国家变得如此富裕，而其他国家则一直如此贫穷，最终人们必须把目光集中于工业化。因此，在分析西方国家实力上升过程中国家所起的作用时，最终还是要分析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P. H. H. de Vries，2002：126）。显然，这种认识从舍拉一直传给了萨勒尼。

这样，意大利的传统通常认为应该从国家支持个体竞争性活动着手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而不能采用单方面的国家干预或垄断优势的办法。除非行业规模本身使得该行业遭受损害（原因是经济系统中的个体参与者面对过高的准入壁垒——此时，它们就采取了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否则，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位激励者和促进者，而不应该是一位所有者（Reinert，1999）。根据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的观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现代公共经济只有在一个引导性的中央政权机构的有

利监管下，才能得到发展。正如卡尔维诺作品中的马可·波罗认为没有石头就没有拱形一样，社会的集体成就以单个企业家的共同荣耀为基础（Heckscher，1934/1994：273～285；Habermas，1965：34～35）。

与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魁奈和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和“看不见的手”不同（Mandeville，1714；Smith，1776：477），意大利的这种传统强调了国家积极参与计划和构建社会“拱形”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皇家特许经营（赋予某些行业的企业家一定的特权）这种细心的管理，英国根本就不可能在16世纪和17世纪进入世界市场。但是，由于曼德维尔和斯密的作品是在此事发生之后完成的，因此使得他们把某种有利的制度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东西。所以，当贝卡利亚和韦里在论述企业家的重要性时（Klang，1990），他们一致强调了有利的法律体系和国家干预的重要性。那不勒斯和米兰学派都认为某些自我监管的力量本身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观察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之后，他们并不相信那种脱离（他们所认为的）文明社会基本制度和共同利益框架的市场机制。熊彼特称，“吉诺维西学说中的‘重商主义’成分只不过证明了他的现实主义观点。”（Schumpeter，1954：177）。事实上，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所有主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关注实际经济问题以及欠发达现实的做法是正确的。

注释

1　本章的写作得到了艾尔福特（Erfurt）大学 Carl Schurz 奖学金的资助，而且我要感谢米兰 Mattioli 基金和都灵 Einaudi 基金的慷慨资助。我还要感谢 Jürgen Backhaus，Ionut Epurescu Pascovici，Robert Fredona，Rainer Kattel，Cosimo Perrotta，Francesca Lidia Viano 以及本书的编辑们所提供的有益的建议和修改意见。同样，文责自负。

2　这是同样的一种机制，即“尽管农业报酬递减的压力在加大，但在人口增加的同时，人均收入也在不断上升”。道格拉斯 C. 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认为，这种情况“或许首先”发生在 17 世纪的英国和荷兰。后来，他们又继续论证“荷兰……是西欧第一个突破马尔萨斯理论限制的地区”。然而，有趣的是，他们还告诉我们，“米兰和威尼斯这两个大城市各自拥有大约 20 万人，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中心（比如佛罗伦萨、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等）可能拥有 10 万人。作为当时的巨型城市，这些城市人口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其周边地区的竞争对手。”（North & Thomas，1973：117，131，47）。显然，意大利人偶然发现了某种特殊的东西。

3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是英国君主给佛罗伦萨经济第一次造成的损害。1343 年—1347 年间，当爱德华三世对自己的贷款违约时，欧洲最有实力的巴底和佩鲁齐两家银行均倒闭了（Hunt，2001；Sapori，1926）。另外要注意的是，局势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如今的大债权人就是先前的大违约人。

4　利用波托西矿区来突出制造业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整个欧洲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早期的一个主题。作为异教徒的康帕内拉（他因自己的乌托邦《太阳城》而闻名）主张鼓励民族工业发展，因为工业“比采矿业能带来更多的产出”（Campanella，1602/1653）。同样，我们发现 1751 年西班牙人尤兹塔瑞兹（Geronymo de Uztariz，他对 18 世纪末期的意大利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宣称，制造业是“能比波托西矿带来更多利益、更多财富和更大富足的一座矿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矿藏（Uztariz，1751：9）。正如第 3 章[①]所介绍的，实际上，16 世纪和 17 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虽然，这一时期上万吨的白银从新大陆运到了塞维尔[②]，但为什么西班牙的经济还如此不发达？

5　“除去一些非本质的东西之后”，熊彼特写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完全来自于伯特罗 1589 年的思想”（Botero，1589；Schumpeter，1954：254～255）。

6　这种思想在欧洲的知识传统中有较重要的地位，而且我们可以从现代社会早期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的著作中广泛地接触到这种思想。

7　尼采从 1884 年开始阅读加利亚尼的著作，而且每年都重新阅读其著作，一直到 1888 年为止（Brobjer，1997：679）。同样，熊彼特把加利亚尼称为“我们这一领域最有思想的人”。（1954：292）。

8　在论述政治算术问题时，加利亚尼称，这一新领域中“一个可悲的例子是英国人威廉·配第。通过计算，他在自己关于政治算术的巧妙论文中，轻易地证明了许多严重脱离实际的事物，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自己国家的荣耀。”（Galiani，1750：58）。

9　这也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标志，因为，正如熊彼特所说的，它“介于自由主义的礁

① 原书第三章。——译者注

② 西班牙南部之一省会城市。——译者注

石和集体主义的漩涡之间”。(Schumpeter, 1954：459)。

10　格里弗的拉普塔居民“始终对线条和图形非常在行。比如，如果想赞美妇女或其他动物，他们就会以菱形、圆形、平行四边形、椭圆和其他几何符号等来描述”。他们的房屋建得不好，而且没有直角，因为他们看不起数学在实际中的应用。但是，他们仍然“在不断地探究一些公共问题，对国事发表看法，而且还会热情地参与对集体意见的深入讨论”，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可想而知的（Swift, 1726/1994：176～177)。

11　这正是这种政策的本质内容，它反映了英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政策。该政策由查尔斯·金（Charles King）于1723年提出。彼得罗·韦里称，1760年他居住在维也纳时曾读过弗伯雷斯的著作，并高度评价了弗伯雷斯在1766年写给其兄弟阿利桑德的一封信中将金的作品进行了翻译的做法（Verri, 1771/1986：XVII)。

12　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拜纳姆（Caroline Walker Bynum）较早提出了这一理论，他指出，一些欧洲最早的自传从12世纪的集体环境中发明了“自我”。撒切尔夫人的名言——“根本不存在社会这样的事物”——是在9个世纪之后欧洲经济地位开始上升时才出现的。

13　斯金纳（Skinner）于1988年对锡耶纳市罗伦兹提著名的壁画《坏政府和好政府的寓言》（罗伦兹提作于1338年）进行了分析。壁画反映出的“理想家园”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拉提尼（Latini, 1254/1993)，而且关于两者关系的分析请参见亨德逊（Henderson, 1994：16～20)。关于罗伦兹提（Lorenzetti）对现代公共管理的讨论，请参见德雷克斯勒（Drechsler, 2001)。

参考文献

Abramowitz, Moses (1986).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2: 385 ~ 406.

Adelson, Candace (1983). 'Cosimo I de' Medici and the Foundation of Tapestry Production in Florence'. In Firenze e la Toscana dei Medici dell 'Europa del '500. Florence: Leo S. Olschki, pp. 899 ~ 924.

Albertini, Rudolph von (1970). Firenze dalla republica al principato. Turin: Einaudi.

Beccaria, Cesare, Marquis of (1764/1998). 'Tentativo analitico su i contrabandi'. In Francioni, Gianni and Sergio Romagnoli (eds). Il Caffe 1764 – 1766.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pp. 173 ~ 175.

Beccaria, Cesare, Marquis of (1769/1970). A Discourse on Public Economy and Commerce. New York: Burt Franklin.

Beccaria, Cesare. Elementi di economia pubblica in Opere. 2 vols. Vol. 2 (1769/1822). Milan.

Botero, Giovanni (1599). Le relationi universali. Venice: Appresso Giorgio Angelieri.

Botero, Giovanni (1589/1956). The Reason of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robjer, Thomas H. (1997). 'Nietzsche's Reading and Private Library, 1885—1889'.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8) 4: 663 ~ 680.

Brown, Judith (1983). 'Concept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simo I de' Medici in a Comparative European Context'. In Firenze e la Toscana dei Medici dell' Europa del '500. Florence: Leo S. Olschki.

Bruni, Luigino and Robert Sugden (2000). 'Moral Canals: Trust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work of Hume, Smith and Genovesi'.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6: 21 ~ 45.

Bruni, Luigino (2000). 'Ego Facing Alter: How Economists have Depicted Human Interactions'.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71) 2: 285 ~ 313.

Bruni, Luigino and Stefano Zamagni (2004). Economia civile: Efficienzá, equitá, felicità pubblica. Bologna: Il Mulino.

Burckhardt, Jacob (1869). 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Leipzig: E. A. Seemann.

Bynum, Caroline Walker (1980). 'Did the Twelfth Century Discover the Individual?'.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1) 1: 1 ~ 17.

Calabria, Antonio (1991). The Cost of Empire: The Finances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the Time of Spanish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panella, Tommaso (1653). A Discourse Touching the Spanish Monarchy. London: printed for Philemon Stephens 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 at the Gilded Lion in Paul's Church - Yard.

Capra, Carlo (2002). I progressi della ragione. Bologna: Il Mulino.

Carli, Gian Rinaldo (1765/1998). 'Della patria degli italiani'. In Francioni, Gianni and Sergio Romagnoli (eds.) Il Caffe 1764—1766.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pp. 421 ~ 427.

Cipolla, Carlo M. (1970).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Italy'. In Cipolla, Carlo M. (ed.)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London: Methuen & Co., pp. 196 ~ 214.

[Costantini, Giuseppe Antonio] Sappetti, Giovanni (1742). Elementi di commerzio. Genoa: Giambatista Novelli.

Croce, Benedetto (1925). Storia del regno di Napoli. Bari: Laterza.

Crosby, Alfred W. (1997).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 - 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stodi, Pietro (1803).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Milan: G. G. Destefanis.

Defoe, Daniel (1730/1969). A Plan for the English Commerc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Dijksterhuis, E. J. and C. Dikshoorn (1969).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echsler, Wolfgang (2001). Good and Bad Government: Ambrogio Lorenzetti's Frescoes in the Siena Town Hall as Mission Statement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day. Budapest: Open Society Institute.

Ferrara, Francesco (1889). Esame storico - critico di economisti e dottrine economiche del secolo XVIII e prima metá del xix (2 vols). Turin: n. p.

Ferrone, Vincenzo (2003). La società giusta ed equa: Republicanesimo e diritto dell' uomo in Gaetano Filangieri. Bari: Laterza.

Franci, Sebastiano (1764/1998). 'Alcuni pensieri politici'. In Francioni, Gianni and Sergio Romagnoli (eds.) Il Caffe 1764—1766.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pp. 143 ~ 150.

Galiani, Ferdinando (1750). Della moneta. Naples: Giuseppe

Raimondi.

Galiani, Ferdinando (1751/1915). Della moneta. Nicolini, Fausto (ed.). Bari: G. Laterza.

Galiani, Ferdinando (1752/1977). On Money. Ann Arbor: Published for Dep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by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Galiani, Ferdinando (1770). 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des bleds. London: n. p.

Galiani, Ferdinando (1979). La Bagarre: Galiani's 'Lost' Dialogue. ed. S. L. Kaplan. The Hague: M. Nijhoff.

Genovesi, Antonio (1753/1977). 'Discorso sopra il vero dine delle lettere e delle scienze' in ibid. Scritti. Ed. Franco Venturi. Turin: Einaudi, pp. 227 ~ 276.

Genovesi, Antonio (1757). Storia del commercio della Gran Bretagna scritta da John Cary... Tradotta in nostra volgar lingua da Pietro Genovesi... con un ragionamento... di Antonio Genovesi. Naples: Benedetto Casari.

Genovesi, Antonio (1765). Lezioni di commercio o sia d'economia civile. Naples: Remondini, Bassano.

Genovesi, Antonio (1772). Lettere accademiche su la questione se sieno più felici gl'ignoranti, che gli scienzati... Venice: Giambattista Paquali.

Genovesi, Antonio (1977). Scritti. Ed. Franco Venturi. Turin: Einaudi.

Gilbert, Allan H. (1968). Machiavelli's Prince and Its Forerunners: the Prince as a Typical Book De Regimine Principu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Goldthwaite, Richard A. (1993). Wealth and the Demand for Art in Italy, 1300 - 16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roenewegen, Peter (2002). Eighteenth - Century Economics: Turgot, Beccaria and Smith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London: Routledge.

Habermas, Jürgen (1965).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Neuwied am Rhe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Heckscher, Eli F (1934/1994). Mercantilism. London: Routledge.

Henderson, John (1994). Piety and Charity in Late Medieval Flor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unt, Edwin S. (2001). The Medieval Super - Compan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lardi, Vincent (1993).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Optical Capital of the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2) 3: 507 ~ 542.

Johnson, E. A. J. (1937). 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 The Growth of British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Prentice - Hall.

Kaplan, S. L. (1976).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uis XV. The Hague: M. Nijhoff.

Kaplan, S. L. (1982). The Famine Plot Persuas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Kauder, Emil (1953a). 'The Retarded Acceptance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7) 4: 564 ~ 575.

Kauder; Emil (1953b). 'Genesis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From Aristotle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Journal (63) 251: 638 ~ 650.

Klang, Daniel M. (1990). 'Cesare Beccaria, Pietro Verri e l'idea dell' imprenditore nell' illuminismo milanese'. ed. Sergio Romagnoli, Gian Domenico Pisapia. Cesare Beccaria tra Milano e l'Europa. Rome-Bari: Cariplo-Laterza, pp. 371 ~ 406.

Kristeller, Paul Oskar (1979).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Its Sources. ed. Michael Moon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rugman, Paul R.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Langholm, Odd Inge (1998). The Legacy of Scholasticism in Economic Thought: Antecedents of Choice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tini, Brunetto (1254/1993). The Book of the Treasure = Li livres dou tresor.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Litchfield, R. Burr (1986). Emergence of a Bureaucracy: The Florentine Patricians, 1530—17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st, Friedrich (1841/1959).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asel: Kyklos Verlag.

Lorenzetti, Ambrogio (1338—1340). 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 Frescoes in the Palazzo Pubblico, Siena, Italy.

Magnusson, Lars (1994).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Malanima, Paolo (1982). La decadenza di un' economia cittadina: l'industria di Firenze nei secoli xvi-xviii. Bologna: Il Mulino.

Malanima, Paolo (1983). 'L'industria fiorentina in declino fra '500e '600'. In Firenze e la Toscana dei Medici dell' Europa del '500. Firenze: Leo S. Olschki, pp. 295 ~ 308.

Malanima, Paolo (1988). 'An Example of Industrial Reconversion: Tuscan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d. Herman van der We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rban Industries in Italy and the Low Countrie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pp. 63 ~ 74.

Mandeville, Bernard de (1714).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London: J. Roberts.

Marino, John A. (1986). 'The State and the Shepherds in Pre-Enlightenment Napl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8) 1: 125 ~ 142.

Mazzotti, Massimo (1998). 'The Geometers of God: Mathematics and Reaction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Isis (89) 4: 674 ~ 701.

McCray, W. Patrick (1999). Glassmaking in Renaissance Venice - the Fragile Craft. Aldershot: Ashgate.

Miller, Judith A. (2000). 'Economic Ideologies, 1750—1800: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3) 3: 497 ~ 511.

Minard, Philippe (2000). 'Colbertism Continued? The Inspectorate of Manufa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Ex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3) 3: 477 ~ 496.

Molá, Luca, Reinhold C. Mueller, and Claudio Zanier (2000). La seta in Italia dal medioevo al seicento: Dal baco al drappo. Venice: Marsilio.

Morelli, Roberta (1976). 'The Medici Silver Mines (1542—1592)'.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1: 121 ~ 140.

Myrdal, Gunnar (1956).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a Note on the Mechanism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equality. Cairo: National Bank of Egypt.

Myrdal, Gunnar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G. Duckworth & Co.

Nietzsche, Friedrich (1886/2002). Beyond Good and Evi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ether, Emiliana P. (1951) Seeds of Italian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ouglass C. and Robert Paul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son, Richard (1993).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642—1792. New York: Twayne.

Parigino, Giuseppe Vittorio (1999). Il tesoro del principe: Funzione pubblica e privata del patrimonio della famiglia Medici nel cinquecento. Florence: Leo S. Olschki.

Perrotta, Cosimo (1991). 'Is the Mercantilist Theory of the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Really Erroneou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3) 2: 301 ~ 336.

Perrotta, Cosimo (1993). 'Early Spanish Mercantilism: The First Analysis of Underdevelopment'. In Magnusson, Lars (ed.) Mercantilist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17 ~ 58.

Porta, Pier Luigi and Roberto Scazzieri (2002). 'Pietro Verri's Political Economy: Commercial Society, Civil Society, and the 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4) 1: 83 ~ 110.

Porter, Jeanne Chenault (ed.) (2000). Baroque Naples: A Documentary History, 1600—1800. New York: Italica Press.

Quesnay, François (1758—2003). 'Grani'. *In Paolo Casini* (ed.) Enciclopedia odizionario ragionato delle scienze, delle arti e dei mestieri ordinate da Diderote d'Alembert. Bari: Laterza, pp. 470 ~ 477.

Quesnay, François (1759/1968). The Economical Table. New York: Bergman.

Reinert, Erik S. (1995).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Predecessors: A 500-year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6: 23 ~ 42.

Reinert, Erik S. (1999).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6) 4/5 : 268 ~ 326.

Reinert, Erik S. (2000). 'Full Circle: Economics from Scholasticism through Innovation and Back into Mathematical Scholasticism: Reflections on a 1769 Price Essay: 'Why Is It That Economics So Far Has Gained So Few Advantages from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7) 4: 364 ~ 376.

Reinert, Sophus A. and Erik S. Reinert (2003). 'An Early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Case of Antonio Serra's 1613 Breve Trattato'.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 3: 87 ~ 119.

Rolova, Alexandra (1983). 'La manifattura nell'industria tessile di Firenze del cinquecento'. In Firenze e la Toscana dei Medici dell'Europa del '500. Florence: Leo S. Olschki, pp. 309 ~ 326.

Roover, Raymond de (1963).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uffolo, Giorgio (2004). Quando l'Italia era una superpotenza: Il ferro di Roma e l'oro dei mercanti. Turin: Einaudi.

Salerni, Carlo (1782/1996). Riflessioni sull' economia della provincia d'Otranto. Lecce: Centro di studi salentini.

Sapori, Armando (1926). La crisi delle compagnie mercantili dei Bardi e dei Peruzzi. Florence.

Schmoller, Gustav(1897/1967).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54).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ligman, E. R. A. (1920). Curiosities of Early Economic Literature. San Francisco: Privately Printed by John Henry Nash.

Serra, Antonio (1613).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i regni d'oro & 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 Naples: Lazzaro Scorriggio.

Skinner, Quentin (1988). 'Ambrogio Lorenzetti: The Artist as Political

Philosopher'.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pp. 1 ~ 56.

Smith, Adam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Printed for W. Strahan and T. Cadell in the Strand.

Sombart, Werner (1902).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Spooner, F. C. (1956).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The Contribution of Ferdinando Galiani'.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2) 1: 81 ~ 82.

Swift, Jonathan (1726/1994). Gulliver's Travels. London: Penguin.

Tron, Andrea (1784/1994). 'Serenissimo Principe'. In Paolo Gaspari (ed.) Il testamento morale dell'aristocrazia veneziana. Udine: Istituto editoriale Veneto friulano, pp. 90 ~ 125.

Tubaro, Paola (2000). 'Un' esperienza peculiare del Settecento italiano: la 'scuola milanese' di economia matematica'. Studi settecenteschi 20: 193 ~ 223.

Tubaro, Paola (2002). 'A Case Study in Early Mathematics Economics: Pietro Verri and Paolo Frisi, 1772'.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4) 2: 195 ~ 214.

Uztariz, Geronymo de (1751).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erce and Maritime Affairs. (2 vols). Vol. 1. London: John and James Rivington.

Van Zanden, Jan Luiten (2001). 'Early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 survey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1500—1800'. In Maarten Prak (ed.) Early Modern Capitalism: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400—1800. London: Routledge, pp. 69 ~ 87.

Venturi, Franco (1960). 'Galiani tra enciclopedisti e fisiocrat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72) 1: 45 ~ 61.

Venturi, Franco (1969). Settecento riformatore. Turin: Einaudi.

Venturi, Franco (1972). Italy and the Enlightenment: Studies in a Cosmopolitan Century. Stuart Woold (ed). London: Longman.

Verri, Alessando (1998). 'Appendice V-Appunti di Alessando Verri: idée per articoli'. In Gianni Francioni and Sergio Romagnoli (eds.) Il Caffe 1764—1766.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pp. 811 ~ 813.

Verri, Alessandro (1764/1998). 'Lo spirito di societa'. In Gianni Francioni and Sergio Romagnoli (eds.) Il Caffe 1764—1766.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pp. 396 ~ 402.

Verri, Pietro (no date). Undated Letter to Antonio Genovesi in the archives of the Mattioli Foundation, Milan. Classification number: Cart. 276: Correspondenza di Pietro Verri a vari destinatori 1763—1795 (ex CAR 083. 01 - 11) Fasc. 7. Antonio Genovesi - Milano; 1 lett. s. d. (CAR 083. 07) cc. 2.

Verri, Pietro (1763). 'Elementi di commercio'. In "Cose varie buone, mediocri, cattive del conte Pietro Verri fatti ne' tempi di sua gioventu, le quail con eroica clemenza ha transcritte di sua mano nell' anno 1763 ad uso soltanto proprio o degl' intimi amici suoi". Manuscript in the archives of the Mattioli Foundation, Milan. Classification number: Cart. 373, Fasc. 1, carte: 187.

Verri, Pietro (1764/1998a). 'Il tempio dell' ignoranzia'. In Francioni, Gianni and Sergio Romagnoli (eds.) Il Caffe 1764—1766.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pp. 27 ~ 29.

Verri, Pietro (1764/1998b). 'Elementi del commercio'. In Francioni, Gianni and Sergio Romagnoli (eds.) Il Caffe 1764—1766.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pp. 30 ~ 38.

Verri, Pietro (1764/1998c). 'Considerazioni sul lusso'. In Francioni, Gianni and Sergio Romagnoli (eds.) Il Caffe 1764—1766.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pp. 155 ~ 162.

Verri, Pietro (1764/1998d). 'Gi studi utili'. In Francioni, Gianni and Sergio Romagnoli (eds.) Il Caffe 1764—1766.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pp. 311 ~ 318.

Verri, Pietro (1771/1986). 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 Ed. Peter Groenewegen. Fairfield: Augustus M. Kelley.

Vries, Jan de (1984).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ries, P. H. H. de (2002). 'Governing Grow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Rise of the West'.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 1: 67 ~ 138.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0).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1600—1750. Boston: Academic Press.

Will, Georg Andreas (1782). Versuch über die Physiokratie, deren Geschichte, Literatur, Inhalt und Wert. Nürnberg: n. p.

第十八章　早期的国家创新体系：以舍拉1613年的《简论》为例[1]

索菲斯·A. 赖纳特　埃里克·S. 赖纳特

摘要：在熊彼特经济学的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国家创新体系就成了一种整体的、以社会和文化为基础的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然而，认为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系统联系会影响生产和新知识的应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观点，比目前研究的结论得出的时间要早得多。我们将论证，那不勒斯的重商主义者舍拉在其1613年出版的《简论》（Breve Trattato）中就已经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思想，其中包括报酬递增和协同效应这两项重要的因素。与文艺复兴末期的重商主义者一样，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也面临着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的问题。因此，探索早期创新体系理论的做法将是有益的（即使不是必须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舍拉的作品已经几次被人们发掘出来，每一次都成了经济动荡时期指导方针的来源——第一次是在意大利统一的前夕，另一次是在德国工业化的前夕。在南北方国家之间2003年坎昆会议未能达成贸易协议之后，这种动荡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主流经济学教条并没有实现其政治承诺。我们认为，在经济学领域必然寻求新手段和新方法的过程中，舍拉的思想再一次成了一个有价值的话题。

---

① 原载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stituzioni e Sviluppo Economico, Vol. 1, No. 3, 2003, pp. 87 ~ 119. ——译者注

1. 引言——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商主义

人们经常发现，静态的、以交换为中心的主流经济学（即围绕新古典范式的一整套理论）目前正受到更广泛、更动态和以社会为基础的另一种理论（它关注的是作为经济增长机制的生产和创新）的攻击（Broda，1996：235；Magnusson and Ottosson，1997：1～9；North 2001：491）。作为新熊彼特理论的分支，创新体系理论（总体上可以被看成是激励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制度协同效应的存在）在过去的几年内，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目前，随着2003年"学习、创新与能力建设经济学全球网络"（Globelics）[①] 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这种理论又正式成为了讨论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内容。由于它强调知识经济的社会和制度环境（Lundvall，1992；Ernst and Lundvall，2004），因此，它似乎在吸引对正统理论不满者的同时，又不会疏远正统理论的代言人。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弗里曼（Freeman）以及后来的伦德瓦尔（Bengt-Åke Lundvall，1992）和纳尔逊（Nelson，1993）对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进行解读以来，这种方法逐步被纳入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政策之中（Lundvall et al.，2002：214）。然而，如今这种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对国家创新体系所做的许多研究都是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大多数研究针对的都是已经成熟、已经多样化和成功的体系（Lundvall et al.，2002：226）。如果不经过历史透镜的过滤，几个世纪以前在具有工业传统的国家产生过奇迹的理论和概念可能对发展中国家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即便不会带来直接损害）。确定在贫穷国家成功实施创新体系所必须的条件与理解如何刺激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经济，是两项不同的课题。

因此，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关注成熟国家创新体系的现在和未来，而且还要关注它们的过去，确定这种方法的必经之路（mandatory passage points）及其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起源。换句话讲，当国

① Globelics的全称为：Global Network for the Economics of Learning，Innovation and Competence Building System。它由世界著名技术创新研究学者伦德瓦尔（Bengt-Åke Lundvall）发起，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和发展问题。Globelics每年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第一届年会于2003年11月3日至6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包括巴西）的约10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译者注

家创新体系这种现象首次被人们观察到的时候，工业化世界的理论家们是如何对其进行描述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已经被追溯到了李斯特的著作（Lundvall，1992：16；Freeman and Soete，1997：295～299），但是，其知识根基却深藏于经济思想史之中。显然，李斯特（1789—1846年）和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年）（他使得报酬递增规律重新被经济学家所利用）两人在提出自己更具协同效应特征的许多理论时，都依赖的是更为古老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当他们认为德国应该仿效英国的工业化道路之时，李斯特和罗雪尔都引用和提到了舍拉（Antonio Serra）的观点（舍拉是那不勒斯的一位重商主义者，被熊彼特称为“第一位科学地论述……经济原理和政策的人”（Schumpeter，1954：195）），并认为他是一位权威人物（List，1841；Roscher，1881：191）。本文的目的是：以国家创新体系为背景，简要地描述舍拉的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以揭示发展中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政策问题。这也意味着，要将舍拉的理论放到其自身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舍拉的著作属于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传统。如今，“重商主义者”这一称呼通常被人们用来指从经院哲学到亚当·斯密（1723—1790年）之前的所有经济理论和实践，而且，如果人们把主流经济学的论断当真的话，那么，在现代教科书中，重商主义者必定是用来描述“坏经济学家”的一个贬义词——这些经济学家将黄金的储藏与国民财富的增长混为一谈，这也就是所谓的**迈达斯谬误**（Midas Fallacy）（Perrotta，1991）[1]。然而，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时候，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了大量的创新和发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而且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发展。这样，从现代教科书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被看成是“坏”经济学家——那些将黄金和实际财富混为一谈而被认为是犯了根本性错误的重金主义经济学家——追求“坏的政策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尽管在许多方面是一种理论祸害（Magnwsson，1999），实际上，重商主义为早期现代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上的动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与我们的现代创新体系一样，对经济进行了系统的解读。如今，工业化世界中的许多制度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16世纪至17世纪，它们必须从无到有。由于缺乏这些制度，因此发展中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与欧洲国家在现代社会早期必须面对的挑战是相同的。值得注意的

是，重要的理论一般都不是来自于地位领先的国家，比如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理论似乎来源于那些边缘化国家的人们的努力（比如舍拉的理论源于那不勒斯）——他们试图理解和模仿给某些城市带来财富的有利条件，以及这种财富积累对城市、海运和制造业的偏向。一种具有同样效果的更早的理论（但它更缺乏敏锐的分析）来自于16世纪后期的法国（Laffemas，1597）。

只有那些十分熟悉经济分析史的人，才知道舍拉被卷进了一场十分类似于导致如今的经济学家们分裂的争论之中。舍拉的对手桑蒂斯（Marc' Antonio de Santis）（舍拉的《简论》就是对桑蒂斯作品的回应）力求通过操纵货币和财政变量来改善那不勒斯的经济，但舍拉却坚持认为，那不勒斯不利的货币和财政状况只是反映了实际经济中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政府对实际经济（而不是货币政策）的干预而被影响和发展。构建经济领域的这两种对立的方法——一种关注的是货币变量，另一种关注的是知识和生产——于17世纪初期在整个欧洲发生了冲突，几年之内，最激烈的辩论先后发生在伦敦和那不勒斯。这两场辩论的相似之处，曾有人在20世纪简单地提到过几次，但是，那不勒斯冲突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太多的注意（Seligman，1920：ix；Schumpeter 1954：355；Rosselli，2000）。因此，这种泛欧洲现象在17世纪20年代早期英国重商主义者米森登（Edward Misselden，1608？—1654年）和马林斯（Gerard de Malynes，1586—1641年）的辩论中表现得最为显著（Misselden 1622 & 1623；Malynes，1622）——尽管更好的分析于10年前出现在那不勒斯。舍拉（fl. 1613）和桑蒂斯（fl. 1605）的理论贡献（分别代表了米森登和马林斯的立场）很少被人们深入分析，而舍拉的《简论》虽然经常被人们在经济思想史的分析中简单提起，但大体上仍然没有被经济学史所分析。

从历史上看，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意让舍拉理论复活的经济学家在方法论的讨论中选择了干预主义立场，认为经济增长必要的制度前提只能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来施行（Custodi，1803：xvii；List，1841）。如今创新体系理论家们经常要求许多相同的东西（Ernst and Lundvall，2004），但他们都没有以经济和国家的相互联系这种更广泛、更具细微差别的不同概念来重新评价重商主义以及舍拉的理论。我们认为，舍拉的理论仍然和创新体系理论相关，尤其是在那些导致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方面。具体而言，在

经济学家中，舍拉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处于经济发展过程核心的两种机制：报酬递增和累积因果。

2. 舍拉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

关于舍拉及其生活，我们了解到的事实非常少，但是，有足够的事实使得我们可以勾画出这位不幸而且有时会遭到诽谤的经济学家的生活轮廓和所处时代的情况。舍拉是一位法律博士，可能是被指控伪造，因此在17世纪初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时期，他被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的总督囚禁起来（Custodi，1803；Schefold，1994；Granata，1998）。这场经济危机并不是一种局部现象，而是对欧洲社会和经济领域多方面重组的一种深刻的反映（Gould，1955：121～133；Wallerstein，1979；Kindleberger，1991：149～175）。探险时代使得许多制度都过时了，而且，随着贸易商和探险者使得波罗的海和大西洋的海运具有商业价值，欧洲的商业引力中心慢慢地从南方移到了北方（Schmoller，1967；Hinton，1959：12～24；Finkelstein，2000）。反改革势力使得意大利半岛的经济开始衰落（Reinert & Daastøl，1997）。由于这种环境的变化，很自然地，各种科学同时经历了一场革命，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Ryan，1981：519～538；Bouwsma；2000：67～85）。

的确，我们认为，对于福柯（Foucault）所称的“经济学的认识论”，即经济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而言，其必要的前提条件是下列因素的形成：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知识和财富永无止境的增加。尽管经济学已经在实践中存在了上千年，但是，只是在经历了16世纪末期宇宙论革命所带来的“总体知识热潮”之后，它才系统地展现出来（Kuhn，1957：1～7）。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宇宙无限扩展的新概念（例如，Bruno的观点，1584）是重商主义重新解读经济领域的动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突然有能力提升财富的总体水平了。尽管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们反对使用经济手段（其理由是它们必然会通过收入的两极分化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Finkelstein，2000：89），但重商主义者却认识到，可以通过引导经济来增加所有人的物质福利：文明的治国方略可以使**公共产品**增加。因此，不涉及重商主义者的宇宙论环境，就无法正确理解他们的学说：对不断扩展的宇宙的理解，使得人们不再把经济看成是一种零和博弈。宇宙和经济都不再是静态的和不可增长的了。与此同时，

对宗教的重新解读，意味着**创新**不再被称为异端邪说了。1278 年，罗杰·培根因为“可疑创新”而在牛津遭到逮捕。1605 年前后，当弗朗西斯·培根撰写《论创新》（Essay on Innovation）时，创新成为了人们为改善人类命运而积极追求的事物（Reinert and Daastøl, 1997）。零和博弈**世界观**逐步消失，而学习型经济（the learning economy）开始诞生。

舍拉时代首要的经济问题是，从美洲大陆流入西班牙的金银，为什么会迅速从日益贫穷的西班牙流出，并最终给其他地方（尤其是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财富？在舍拉看来，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在于研究真实经济，而不在于研究货币现象。舍拉认为，理解这一谜团的关键是不同经济部门受不同经济规律的支配：随着生产的扩大，制造业遵循报酬递增规律，而农业却并非如此。舍拉对**真实经济**（Realökonomie）中决定一国黄金流入和流出的基本原因进行了解释。**在舍拉看来，黄金赤字只不过是其他问题的一种表象，它只能从生产领域得到解释**。正如熊彼特在谈论舍拉的作品时所说的：“本质上，这篇论文是对那些决定**商品**数量而不是决定货币数量的因素的分析——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以及政府效率等。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整体经济过程能够正常运行，那么，货币因素本身不需要关注，而且不需要任何具体的矫正措施。”龙卡格里亚（Alessandro Roncaglia）对经济思想史的精辟分析，使得这种理论最近得以复活（Schumpeter, 1954：p 195；Roncaglia, 2001：52）。

作为文艺复兴后期这种认识转变的一部分，舍拉的理论力求揭示经济增长机制，而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写出了人们已知的最早的系统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我们只能用前卫这个词来描述舍拉的理论。甚至在今天看来，他的深刻见解在许多方面也都是合理的，但是也被忽视了。实际上，他的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对经济不平等发展的机制作出解释：在全球化时代，为什么有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贫穷？舍拉是第一位探索和建立经济扩张**规律**和**原则**的经济学家。通过对周围物质环境的观察和分类，舍拉能够从不同经济部门的协同效应的角度来阐明国民财富创造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讲，他不仅创造出了经济思想史中的第一个经济学模型，而且还创造出了一种关于不平衡增长的经济理论，是我们如今所称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第一位倡导者。

3. 舍拉在经济分析史中的地位

尽管舍拉的《简论》无疑是经济思想史方面分析较为深刻的一部作品——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写作环境，这本书并没有受到同时代人的欢迎。舍拉在会见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的总督时呈献了他的作品之后，就受到了嘲笑，并被投进了牢狱，而且，据我们所知，他在牢中度过了余生（Anonymous，1846：520）。由于那不勒斯王国继续针对金银外流的表象而不是针对其原因采取措施，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不勒斯与意大利其他地区一样处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舍拉及其作品一直被笼罩在黑暗之中。似乎是一次纯粹的偶然，18世纪中期，在那不勒斯管理美第奇财产的托斯卡纳数学家英泰尔（Bartolomeo Intieri，1678—1757年）重新发现了《简论》。英泰尔由于在那不勒斯大学设立了政治经济学教席这一职位——德国和瑞典/芬兰之外的第一个此类职位——而名留史册。政治经济学教席这一职位于1754年被授予了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吉诺维西（Antonio Genovesi）[2]，而且就在吉诺维西的就职典礼上，英泰尔将人们首次发现的舍拉的一本《简论》作为礼物送给了吉诺维西。后来，吉诺维西将这本书赠给了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这位积极反对重农学派的人士——他是研究舍拉的第一位作家。加利亚尼将这本书转给了他的学生及经济学同事佩尔米尔瑞（Giuseppe Palmieri，1721—1793年），而后者又将这本书转给了那不勒斯民族主义者索尔菲（Francesco Salfi，他是卡斯特迪（Baron Pietro Custodi）的朋友（Custodi，1803：xxviii））。为了纪念舍拉，卡斯特迪把这本书作为第一册列入了反映19世纪前意大利经济思想的50册选集之中（Custodi，1803：xxviii；Ziersch，1905：29）。正是1803年的这个版本才使得李斯特和罗雪尔受到了舍拉著作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被人们发现的这唯一的一册《简论》，就像一盏“引导生活和学习的著名指路明灯”（lampada di vita），被当时最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们传了下来（Croce，1970：151）[3]。

最后，舍拉的这本被人们首次发现的书被捐赠给了米兰的安布罗斯图书馆（Biblioteca Ambrosiana），而且，后来似乎又发现了8册原始版本。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过几次，但是，除了门罗（Arthur Eli Monroe）在1930年的《早期经济思想》（Monroe，1930）中有几页翻译之外，国外的读者还无法接触到《简论》这本书。然而，

在首次出版过去了390年之后，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了变化。2002年，巴西的库里提巴（Curitiba）将舍拉1613年的著作完整地翻译成葡萄牙语之后出版了（Serra，2002）。书的前面登载了一本巴西学生刊物《艺文空间》（Oikos）上的一篇文章（Padula，2002），而且，考虑到其信息的相关性，人们可以期待对舍拉作品感兴趣的人将很快达到一定数量，并使得其英文译本得以出版。

除了翻译问题之外，舍拉作品的整个标题——《**简论无矿藏国使金银丰富的原因**》——也是他在经济学史中得不到认可的一个主要障碍（Perrotta，1988：12～13）。仅仅从标题来看，该论文就会被人们错误地看成是老一套的重商主义者在**迈达斯谬误**方面的一个例子，即上面提到过的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个观点：重商主义者把财富和黄金混为一谈。事实上，李斯特曾指责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年）和麦考洛克（McCulloch，1789—1864年）仅凭舍拉作品的题目来对他作出判断（List，1841：456，460），而20世纪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也是凭舍拉作品的题目来对其作出判断的（Robbins，1998：49）。尽管舍拉作品的题目的确反映出一种重金主义倾向，但我们认为，其原因不过是为了更加讨好西班牙总督。

然而，《简论》的确包含了许多信息，因此，该著作也有着类似的和复杂的经历。该著作写作时的殖民地背景，以及舍拉本人命运的不幸，使得他成为了意大利统一之前那不勒斯作家们心目中的爱国主义偶像。所以，必须从这个角度去阅读索尔菲1802年写给舍拉的颂文（该文出现在与舍拉相关的许多学术成果中）。这是一篇很长的、充满感情的颂歌，它歌颂了西班牙压迫下的意大利精神。与舍拉本人的作品一样，它深刻地反映了其写作的背景。索尔菲的作品对韦里（Pietro Verri）、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和**意大利复兴运动**前的整个经济民族主义运动持肯定的态度。作为知识界的先驱（他们对统一前夕的**意大利精神**（italianità）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索尔菲本人于1821年就提议建立意大利联邦（Salfi，1997：145；Arpaia，2002：192～214）。他对《简论》的利用显示出了一种民族主义者的方法（他强调了舍拉成就中的**意大利精神**），但很少有人从分析或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简论》。可是，我们要再次指出的是，舍拉的论文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第三世界的殖民地残余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最难克服的障

碍。舍拉的《简论》是在那不勒斯作为西班牙领地的时候写成的，因此，它面临着相同的障碍，而且指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从本质上看，舍拉的解决办法就是李斯特所建议的方法，以及美国和欧洲等国在19世纪成功采用的方法（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生在英国之后）。

我们必须记住，欧洲殖民政策的核心就是禁止殖民地建立制造业（即报酬递增的活动），而将这些活动只保留给宗主国。因此，舍拉坚持制造业在创造经济福利方面的作用就是对各个时代殖民地政策的一种谴责，包括对当今新殖民主义的谴责。与20世纪的经济学家以及卡多索（Cardoso）的依附论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一样，舍拉的理论也深切地关注国家之间生产发展的不平衡（Kay and Gwynne，2000）。卡斯特迪将舍拉描绘成“纯粹受爱国热情驱使的人”，而且，他特意将《简论》放在选集前面的目的，是为了向“公共利益的热情支持者”提供必要的分析手段，以便赶上英国和法国（Custodi，1803：xi-xvii）。

4. 对《简论》的剖析

《简论》是例行公事地写给那不勒斯总督——“著名而卓越”的莱莫斯（Lemos）伯爵卡斯特罗（Pietro Fernandez de Castro，1587—1622年）的，而且始终是歌颂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权威们的（Serra，1803：3；Sumberg，1991：370）。此外，与同时代的经济论著相比，舍拉的作品并非是“简要的”。题目中所说的金银，只能被看成是基本经济机制的结果。因此，题目的措词——《简论无矿藏国使金银丰富的原因》——似乎反映了一种巧妙的促销方法，而并没有反映《简论》的实际内容。实际上，当他著作的结尾赞扬教皇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 Ⅷ，1536—1605年）的明智政策时，我们发现舍拉的作品从总体上表达了对西班牙和天主教的崇敬（Serra 1803：173～176）。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舍拉恭敬地在其著作中包含了主张那不勒斯经济独立的反殖民地观点，表明了他所反对的东西。

舍拉用当时文学上的惯用语句在《简论》的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奇迹发生的原因是什么[4]？他迅速得出了结论：它们是严重的无知和非凡的才智。然后，他便致力于国家财政方面的知识宣传。舍拉不希望讨论政治，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比古人做得更

好。他同样也不希望讨论法律，在这一方面，他依赖的是罗马法。相反，他希望研究治国策略中的第三方面的内容——经济，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包括古代人和现代人”在以前提出过“教义上的方法”（Serra，15～16；Schefold，1994：14）。舍拉认为，“对事物的把握来自于经验，即使最强有力的推论也是如此。”[5]与德国后来的传统理论一样，舍拉把经济学明确地定义为**实验科学**（*Erfahrungswissenschaft*），即以经验而不是以事前假设为基础的科学。同时代的英国人及现代创新概念的提出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著作中也存在着相同的推论（Reinert & Daastøl，1997）。与培根的《新大西洋》（*New Atlantis*）所表达的思想非常相似，舍拉也想象“知识是无止境的”。他抱怨说：“还有人认为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都是不可能的，尽管此类事物中许多曾被每个人看成不可能的事（包括古代和现代的一些发现）正被人们讨论着。”（177）

《简论》本身由三大部分构成。从纯粹的推理角度看，第一部分是最吸引人的。它主要论述了经济总体增长的机制，并在最后对威尼斯和那不勒斯进行了广泛的比较，通过反映各自执行正确和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来证明自己观点的说服力。第二部分花很长的篇幅反驳了其对手桑蒂斯的论点。而第三部分则包含了舍拉针对如何使那不勒斯获得大量金银而提出的建议。舍拉的著作最后以其写作的时代对罕见的质量指数的详细说明①而结束。但是，人们注意到，按17世纪的标准来看，舍拉的语法结构有些糟糕。然而，我们同意贝利尼（Rodolfo Benini）的观点：他认为这反映出舍拉不太熟悉书面语言。事实上，这本书的语法结构完全来自于拉丁语，而不是来自于意大利语（Benini，1892：225）。

与20世纪前的许多经济文章不同，从总体上看，舍拉的《简论》具有和平主义者的特点。孟德斯鸠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L'Esprit de Lois*）同样也对和平贸易进行了歌颂。即使作为启蒙运动基础的这本书称赞“贸易的好处”可以“打碎欧洲野蛮主义的脊梁”，但是，经济学从未完全抛弃其暴力主旨（Montesquieu，1748

① 关于质量指数请参考《穷国的国富论》（上卷）第一章。然而，我们对这句话的翻译持有疑虑，因而把英文原文附录如下：He concludes the work with a detailed index of uncommon quality given the period in which it was written. ——校订者注

book xxi，chapter 20）。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舍拉与李斯特一样具有和平主义者的倾向——李斯特1841年的著作专门对亚当·斯密赞扬战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Smith，1976：ii，456）。可以想象，舍拉的和平主义来自于他在揭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的努力，而一些以寻求短期财政盈余为特点的重商主义论文则完全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然而，《简论》稳固地树立了舍拉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现代认识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因为它不再局限于一种零和宇宙观，不再赞扬掠夺和征服。舍拉感兴趣的是**生产**财富的方法，而不仅仅是财富的再分配。

5. 舍拉的研究方法

“对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进行分析之后”，舍拉告诉我们，他“力求依据（自己）为数不多的知识所带来的一点启发，考察……金银在没有矿产的国家流动的原因”（4-5）。他说，自己努力的目标是在“国家的公共产品”方面“揭示出真理的本质”（6-6）。按照熊彼特的说法，舍拉的**观点**显然使得他属于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说的**积极和理想主义**的经济学传统，而不属于如今**被动和物质主义**的主流传统。在关于政府政策这一章的结尾，我们发现，舍拉批评了那些对他的方法表示挑剔的人。相反，他有意识地采纳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方法，这与那些“更看重事物的确定性而不看重主题的高尚性”的人正好相反（39）。因此，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亚马蒂·森（Amartya Senn）的话：“大多数经济学家宁愿完全错误，也不愿意大致正确。”舍拉所关注的是最终结果，而不是获取结果的方法。“科学本身并无一种理解真理的统一方法”，因为，其“主题是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12）。听到他的这种论断时，我们的耳边回响起了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各种声音。

舍拉声称，桑蒂斯所针对的只是一些表象，而并不是针对导致基本经济问题的原因——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才能使经济危机得到缓解。舍拉说：“在（问题的）原因仍然存在时，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6]他有着十分明确的信念：其他人只是在财政和货币政策领域解决那不勒斯贫穷的表象，而他自己却是在实际的生产领域解释其原因。舍拉的模型使经济得到简化：他认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导致了经济进步的偶然聚集。在舍拉的模型中，最重要的原因

始终是“治理”（governance）——一个定性概念，舍拉明确地将其作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媒介，支配能力和各种抽象层次之间的媒介。根据劳森（Tony Lawson）的观点，正是“这种流入和流出的循环，这种焦点和视角的不断改变”，才是“理解社会和经济的唯一方法”（Lawson，1997：236）。实际上，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对待经济问题的核心。《简论》为经济政策问题提供了指导原则，但它并没有对经济事件进行详细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许多现代模型都以**事先**接受某些假设为基础——从稀缺性假设到边际效用的“理性”计算。它们借助总量模型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用现在的话来说）娴熟的技巧来处理数量变化。然而，人类行为的定性特征却很难在现代模型的框架中进行分析[7]。当舍拉1613年撰写《简论》时，就已经十分清楚这种方法固有的缺陷了。可是，在最近创新体系这样的不同方法产生之前，为了使经济学变得更类似于自然科学，人们一直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这一点（20；Mirowski，1989；Weintraub，2002）。

6. 舍拉提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

根据舍拉的理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类：**自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从本质上讲，两类因素都能创造出“顺差”——通过丰富的自然资源或人们的辛勤劳动。其中，**偶然**因素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带来财富的**特定**原因和**共同**原因。舍拉认为，特定原因“只会出现在某一个国家，而不会出现在其他国家”，但是，“共同原因却可能出现在所有国家”。（21）**特定**原因表现在环境方面，它们由农业资源和地理两种因素组成。另一方面，**共同**原因是那些可以成为现实并且可以使任何国家得到改善的抽象思想所带来的结果，它们构成了国家财富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它们是：“**工业的数量**”、“**人口的质量**”、“**贸易的地域范围**”以及“**国家的管理**”。舍拉坚信，他的经济模型包括了所有与财富相关的原因——他认为“并不存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因为其他原因要么附属于所提到的那些原因，要么是那些原因造成的结果”。（39）

的确，这篇论文提出的简要模型表达了一种连贯的思想，并提供了一种思考经济问题的手段。这似乎与福柯的下列说法相抵触：尽管17世纪初，经济学就已经进入了实证论领域，但是，在洛克（Locke）和坎蒂隆（Cantillon）之前，它并没有进入认识论领域

（Foucault，2002：207）。舍拉的《简论》在其结构和论述的复杂性方面都大大超前于同时代的其他著作。用齐斯克（Walter Ziersch）的话来说："舍拉站在现实的基础上，他的作品中的每个论断都以事实为基础。"（Ziersch，1905：66）因此，人们对熊彼特的下列观点并不感到惊讶：这篇文章是最早论述经济原理和政策的一篇科学论文。

尽管舍拉在其作品的整个标题中有所暗示，但**自然**原因论述的内容很少，因为它们与上下文的关系不大。舍拉认为："**自然**原因这一组因素只包括了一种情况，即一个国家拥有金矿和银矿。"（20）然而，从总体上看，意大利是缺乏矿产资源的，美第奇大公所经营的托斯卡纳银矿是舍拉所看到的唯一的例外（20；Morelli，1976）。所以，《简论》中这部分内容的核心涉及的是财富的各种**偶然**原因。

在这些**偶然**原因中，舍拉首先讨论了其中的**特定**原因。根据舍拉的观点，这些原因是某些国家特有的，而且不可能通过政策来进行操纵。其中的第一个因素，即大量的农产品剩余，初看上去会使人感到意外，但它可以通过舍拉的写作环境来得到解释。除了6—9世纪欧洲北部的土地革命之外，从罗马时代一直到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农学理论的诞生，农业技术大体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White，1964：40；Duby，1974：189）。因此，增加农产品剩余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扩大生产力较低的土地的耕种，而不是集中于技术的改进——这就是舍拉在探讨国民财富的共同原因时的一个典型的规模报酬递减的例子（Benigno，1989：80）。土地的生产力和气候的偶然性是反映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因此，在当时看来，农产品剩余是不会由于人的干预而发生变化的。160多年之后，看到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进步时，亚当·斯密曾问自己：农业领域劳动分工的可能性为什么这么小？（Smith，1976：i，9）

在今天看来，舍拉的第二个**特定**原因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反映了一国与周围国家相比时的地理位置。舍拉认为这项原因是"一种强有力的偶然因素，它几乎是一国进行广泛贸易的原因"（22）。从理论上讲，虽然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但是，在实践中，地理位置是一个关键因素。尽管西方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城市有利的地理位置进行过思考——色诺芬的《*Poroi*》（大约公元前352年）（Xenophon，1984）、阿里斯蒂德斯（Aelius Aristides，公

元二世纪）的 Panathenaicus、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 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大约 1403—1404 年）（Bruni，1978）以及伯特罗（Giovanni Botero）的 Ragion di stato（1590）等，但是舍拉是第一位论述地理位置的经济优势与其他经济因素关系的作家。这样，《简论》也标志着经济地理学（目前保罗·克鲁格曼正在设法使作为经济学分支的这个不活跃的学科得到复兴）的诞生[8]。在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尤斯蒂（Gottlob von Justi，1717—1771 年）和后来的屠能（Johan 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 年）将舍拉的以报酬递增为基础的城市地区放在了其国家同心圆的中心[9]。

舍拉的四种共同原因（**工业的数量、人口的质量、广泛的贸易和国家的有利管理**）是动态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因为“尽管一个地方的需求有限，而且必须从国外获取各种资源；尽管这个地方没有金矿和银矿，但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必然会使得这个地方拥有大量的金银”。（23）在此，舍拉暗示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所称的**结构联系**（Strukturzusammenhänge）——能够带来累积效果的各种因素所产生的有机协同效应（它是创新体系理论的核心），即各种独立的因素相互之间产生累积性影响并最终导致有机的结果。在对这种重要的理论进行最后分析时，舍拉讨论了“大贸易”问题。尽管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很重要的，但舍拉认为，各种共同原因的重要性是有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造业的数量”。

7. 舍拉论制造业与报酬递增

舍拉认为，工业“不仅应该被放在**共同**原因的首要位置，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应该比剩余产品这种特定因素更加重要”。其理由是：工业只依赖于劳动力，而不会受到地理和气候因素的影响。（23－24）与伯特罗（Giovanni Botero）一样，舍拉也率先对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动进行了区分（Botero，1590：217－222）。但是，舍拉还以规模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理论（即如果一国在某一特定生产活动中选择专业化，其单位生产成本将上升还是下降）为基础，对两者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在论文的前面讨论**特定**因素时，舍拉提到了农业的报酬递减规律。现在，他以彻底敏锐的分析来提出报酬递增效果方面的第一个合理论断。舍拉认为，制造业是独特的，因为

随着产量的增加，总成本会下降：

> “制造业的产量可以成倍增加，并导致利润的成倍增长。这种情况在农业中并不存在，因为人们不可能使农业的产量成倍增加。比如，当一块地只能种100托莫拉（tomola）的小麦时，就无法种150托莫拉；但是，在制造业中，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它们不仅可以增长到原来的两倍，而且还可以增长到原来的200倍，同时，成本也会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24）

此外，与伯特罗一样，舍拉也认识到，制造业专业化和获取利润的可能性要大于农业。舍拉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品的利润要高于农产品”，因为工业品有可能进行“无数次”的交易。（25－26）用现代的话来讲，舍拉看到了工业劳动的众多分工——通过报酬递增和单位生产成本的下降，工业能够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以“市场定位”的形式），并把这种情况与获取更高的利润和更大的国民福利的潜能结合起来。这样，舍拉对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活动的区分无疑是以劳动分工理论（它可以追溯到色诺芬）为基础的。此外，舍拉还提出了一种协同效应观点：劳动分工越多，城市就越富有。150多年之后，斯密的著名论断——“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只是舍拉深刻见解的一种苍白的影像，因为在此报酬递增这个真正的原因完全消失了。色诺芬早已指出的这种“系统性的报酬递增”是重商主义政策中要求增加城市和国家人口的一个核心理由。

在重商主义和官房主义的整个传统中，报酬递增的可能性被看成是与制造业劳动分工机会的增加相联系的，因此，它与具体的生产活动高度相关。与农业和采矿业（这里的生产要素是由上帝的创造物——土地和矿石——来决定的）不同，在制造业中，随着生产的扩大，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在规模报酬不变或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获得。“崇拜制造业”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很少从理论上解释这种政策**为什么**是有益的，而且，只是到了19世纪，这种理论的复杂性才达到了舍拉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活动理论思考的转变。由于力求建立系统的经济科学，斯密对劳动的种类进行了简化，因此，将规模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造成的各种不同影响排除在外了。比如，在斯密看来，**生产**和**交换**这两个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因为两者都代表了“经济”活动中所花费的时

间。尽管两者可以在某种抽象的程度上被简化为“时间”，但是，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许多重要区别都消失了。经济史学家别尔纳茨（Biernacki）认为：“《国富论》在整个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它论述了先于产品销售的劳动是所有价值的源泉，但是，分析时却将劳动行为（生产）本身看成是一种交易活动。”（Biernacki，1995：252）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斯密的如下观点：“劳动是第一个得到支付的要素，即购买所有东西时，最初支付的是劳动的购买价。全世界所有的财富最初都是通过劳动而不是通过金银获得的。”别尔纳茨进一步敏锐地指出，斯密把“最初的生产过程——劳动创造商品的过程——与通过货币交换来获取商品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同起来，或者说混为一谈了。

在斯密的经济学中，生产和交换通过劳动的联系而成为了一体。经济活动（贸易或制造业）中的各种时间投资被统一在了劳动时间这一首要的概念（一种抽象的经济活动计量单位）之中。“难怪斯密没有对**贸易**和**工业**作出区分。他将生产过程纳入到了交换过程之中。”（Smith，1976：i，35；Biernacki 1995：252～254）实际上，“为了使工业生产得以进行”，斯密列出了如下的必要要素：人们需要“原材料、工具以及工资或报酬来使工作能够展开”（Smith，1976：i，313）。人们可能会问，使工业生产能够进行的知识——意会性的或其他的——在哪里呢？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的著作对这个方面进行了继续探讨——人们普遍认为他“对现代经济理论的作用要大于其他任何人”（Arrow，2000：172）。事实上，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数量，而并不取决于购买这种劳动所支付的报酬的多少。”因此，商品之间的质量差别仅仅反映了其生产上的质量差别。在一个系统中，如果技术进步只是降低了一种商品以劳动所衡量的交换价值，那么**知识**和**创新**就丧失了所有的意义（Biernacki，245～246）。根据这种理论，人类作为发明者和生产者的核心作用几乎自然而然地被忽视了，从而导致了一种以交换和贸易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其隐含结果就是一个经济和谐和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世界。

如果人们按照斯密、李嘉图和萨缪尔森的贸易理论来进行抽象分析（在他们的理论中生产和交换融合成了“劳动时间”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那么，就不会看到整个价值核心，即**反映经济活动**

之间本质差别的指标（Reinert，1999）。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些标准假设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将在自由贸易体系中趋于相等（Samuelson & Stolper，1948 & 1949，；Samuelson，1953）。可以说，正是这种理论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而这种理论的根源在于亚当·斯密将各种经济活动等同起来了。我们认为，如果按照舍拉以前的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发现，目前的全球化为什么给不同的国家带来了如此不同的结果。

在19世纪末期，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给了报酬递增理论致命的一击。实际上，该理论的消亡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前九个版本的《经济学原理》。克鲁格曼曾经说过："经济学倾向于……走数学阻力最小的道路"（Krugman，1991：6），而马歇尔（许多人——尤其是他的追随者——认为他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却未能抵制这种倾向。那些在全球创新体系及报酬递增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先是英国，随后是美国）使得创新和报酬递增都从经济理论中消失了，从而使得让自己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从经济理论中消失了。这就是理论骗局，即李斯特所说的"过河拆桥"（kicking away the ladder）——使其他国家无法模仿自己经济成功的道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维纳（Jacob Viner）拥有一种有问题的荣耀：他最终将报酬递增驱赶出了经济理论体系，其理由是它与竞争性均衡理论——即假设信息完全时市场将永久出清的理论——相矛盾（Viner，1937：475～482）。在追随亚当·斯密的过程中，维纳还使得重商主义的概念从文雅的经济讨论中消失了。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位经济学家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抛弃了重商主义和报酬递增。这样，与特定经济活动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从17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再到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这种具有明显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特征的做法，成为了简单的数学推论的牺牲品。然而，这种模型推导首先损害的正是使重商主义在历史上如此成功地创造出国家创新体系原型的各种要素和机制。

8. 舍拉的人口理论

"人口质量"（这又是伯特罗（Botero，1590）使用的一个术语）是舍拉经济引擎中的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如果一国的人民"天生勤奋、喜爱发明、关注让自己的勤奋发挥作用的机会、在本国和

国外都建立起贸易”（27），那么，该国就将富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industry”指的是勤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到了19世纪这个词才具有了其现代含义，此时，它丧失了最初所具有的品质特征（Sewell，1980：143）。舍拉称，在意大利的城市中，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居民因其勤奋而闻名。热那亚人最勤奋，其程度超过了威尼斯人。正如我们从舍拉论政府政策的那一章中将要看到的，在国家的有利监管下，单个经济主体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原因。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年）的《人口原理》在1798年出版之后，人们一般认为大量的人口会阻碍经济发展——尽管以前的理论家们持有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人们分析上的无知，因为“马尔萨斯原理”在马尔萨斯之前就已经闻名了几个世纪了。“去掉那些次要内容之后”，熊彼特写道，“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完全来自于伯特罗1589年的思想[10]”（Schumpeter，1954：254～255）。伯特罗认为，人口的增长要快于食物的增长，因此，人口始终会因为正面和负面因素（比如道德抑制和瘟疫）的影响而达到仅维持其生存的限度（Botero，1590：222～226）。在马尔萨斯之前，意大利就已经拥有了奥特斯（Giammaria Ortes，1713—1790年）① 这位悲观主义的马尔萨斯经济学家。

考虑到舍拉的物质环境，他关于人口的结论似乎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他身处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其中一个城市中，但仍然被饥荒、贫穷和苦难所包围（Marino，1982：226）。显然，居民的数量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经济的繁荣，因此，舍拉在描述人口方面的思想时，强调了人口质量的作用——这就是人文主义者的基础以及**积极和理想主义者**的写作传统。

9. “大贸易”和累积因果理论

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大贸易”（great trade）。舍拉的这种说法并非仅仅指从远距离贸易中获取利润，它还包括原材料的进口（对原材料的加工能够获得大量的增值）以及随后的制成品的出口。舍拉观察到，几个世纪内，威尼斯利用世界贸易中心的

① 奥特斯（1713—1790年）：意大利威尼斯的牧师，经济学家。其主要著作是《国民经济学》。他认为，人口的增加受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食品的限制。人口增加会以几何级数进行。奥特斯的观点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重要来源。——译者注

地位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因为“所有从亚洲运往欧洲的商品都要经过威尼斯，然后销往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从欧洲到亚洲的商品也是从威尼斯装运出去的”。而那不勒斯则苦于没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处于意大利半岛的顶端，人们都认为这里不便于展开贸易”。(32～33)

按照德国历史学派、现代结构主义者和依附论者的解释，用于随后出口制成品的原材料的进口，是建立早期现代国家的核心。事实上，利用进口替代工业化获得出口带动的增长几乎是每一个成功实施工业化的国家（从梭伦时代的雅典到四小龙①）的基础，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通往自由市场的必经之路（Sombart，1902：ii，55～56；E. Reinert，1999，Kay and Gwynne，2000：52；Chang，2002）。这种理论建立在如下观点的基础之上：必须使出口品中的劳动投入最大化以及进口品中的劳动投入最小化。进口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后出口，这样，产品增值的过程将由国内而不是国外劳动来完成。通过学习这种方法，报酬递增活动在国内得到最大利用，而报酬递减活动则集中在国外，就好比后来的殖民体系一样。这种观点产生的基础在于，人们能清楚地看到人力资源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与我们的看法一致，佩诺特（Cosimo Perrotta）认为，重商主义的核心就是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来建设国家（Perrotta，988），而舍拉的著作似乎对这种制度为什么如此成功作出了最早的理论解释。这种政策会同时创造出就业和财富，而外国人力资本的进口是这种论断的自然延伸。所以，舍拉认为，那不勒斯总督应该仿效当时的威尼斯人的政策而特意让国际专有技术流入。弗里曼认为，这种国际知识的交流是“目前国家创新体系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Freeman and Soete，1997：297)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极为有利，威尼斯是一个特例，因为**特定**的地理原因使得大贸易这个**共同**原因得到了扩展。根据这一点，舍拉对经济分析史上第二个重大创新——**累积因果**的观点——进行了讨论：

> “制造业的数量也对城市有利。这个因素能够使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其原因不仅在于制造业本身（这样的话结果将归

① 泛指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译者注

功于它们），还在于这两种因素共同发生导致的结果——因为两者会相互强化。贸易和地理位置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汇集会因为制造业而得到强化，贸易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汇集会使得制造业增加，而同样的人口汇集又会使得贸易更加壮大。”（32）

在此，舍拉首次描述了经济分析史上的累积因果，即创新体系理论中的**良性循环**（Lundvall，1992：2）。尽管系统效应在重商主义者的分析中很重要，但是，直到300多年之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才无意中使得舍拉的思想复活和再次闻名于世（Myrdal，1956，1957）。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明确地认为，累积因果的存在是其演化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前提条件。如今，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了演化和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Veblen，1898）。正如已经提到过的，该理论以各种因素有机的相互依赖为基础，而且对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解释具有重要作用。在舍拉看来，威尼斯的强大，是由于它设法使得工业、创新、贸易和人口等因素偶然聚集在一起——他十分明确地认为（再一次根据明确的累积因果）这种结果来自于良好的统治权。（48）通过相互强化，这些因素共同使得威尼斯走上了一条与那不勒斯非常不同的发展轨道。如果不创造出类似于威尼斯的生产结构，那不勒斯将无力解决其经济问题。

10. 政府的政策

从最后的分析来看，《简论》是一本宣传手册，其目的是传播舍拉所称的**公共利益**（这反映了他写作时的人文主义传统）。（36）从本质上讲，舍拉是一位相对主义者。他主张在立法活动中抛弃所有的绝对原则。在解释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观点时，舍拉告诫统治者们应该“仔细考虑许多问题而不是某一个问题”，因为“同样的原因一般会对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太阳使黏土变硬，但却使得石蜡变软；轻柔的口哨声能够使狗活跃起来，但却能使马安静下来”（35）。由于国家“要考虑无数的问题”，而且“国家在执行各种规定时，有可能导致一些麻烦”，这就意味着优秀的政治家是十分罕见的。作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传统的反映，舍拉认为，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唯一不变的因素就是“人的意志”（25），即尼采（Nietzsche）后来所称的经济中**人类的智慧和意志**（Geist-und Willens-Kapital）。政府政策最终是所有原

因中最强有力的，因为它完全以“意志”为基础，所以能够鼓励其他原因的发展：

> “如果一个国家的这种因素是完美的，那么，在使该国获得大量金银的所有因素中，它将是最强有力的一个因素，因为它可以被称为有效原因，比所有其他的因素都重要。因为它能够带来这些以及无数其他的机会。它能够使这些机会处于有利的状态，能够消除一些障碍。它能够通过其他方法带来同样的结果——无论是在拥有这些因素并且在这些因素方面拥有较好条件的国家，还是在缺乏这些因素而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国家。”（36～37）

所以，我们可以说，舍拉的经济增长理论以政府有意识地控制环境的差异（从地理环境到各种经济活动创新潜能的差别）为基础，即提高制造业的比重并降低农业的比重（在1590年的著作中伯特罗就强烈地提出了这种观点——这是一本很有名的著作，这本书在舍拉写作之前就已经出版了许多次[11]，而且舍拉很可能熟悉这本书）。

对于增加国民财富这个问题，老练的重商主义者认为应该采取国家支持个人努力的做法，而不是采取国家单边干预的办法。除非行业规模本身使得国家受到损害（太高的准入障碍使得经济中的单个参与者无法进入该行业）——这种情况下重商主义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否则，国家只能作为一种引导力，而不能作为实际所有者（参看遵循舍拉传统的Costantini的著作，Costantini，1742：103～104）。根据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的观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现代公共经济领域只能在一个引导性的中央政府的有利监管下得到发展。社会的集体成就以单个主体的共同成就为基础（Heckscher，1934；Habermas，1965：34～35）。穆勒（Reinhold C. Mueller）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经济奇迹的论断似乎验证了舍拉的分析：“反映威尼斯历史和编史特点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家在城市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共生关系。”（Mueller，1997：576）

与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1670—1733年）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同，这种传统强调了国家积极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法律所起的重要作用（Mandeville，1714；Smith，1976：i，477）。如果没有皇家许可的特殊关照赋予企业家在某些经

济行业具有某种特权，英国就不可能在16和17世纪进入世界市场。但是，曼德维尔和斯密著作的事后特征使得他们把一些有利的制度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Appleby，1978：101～102；Hintze，1975：428）。因此，创新体系理论遵循的是一种久远和崇高的传统，它认为“在作为私人领域自我组织力量的补充时，公共部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Lundvall et al.，2002：222）

11. 结束语

在政治支持报酬递增产业的500年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这两个抢先行动者之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没有暂时经历一个培育和保护这些报酬递增活动的阶段[12]。舍拉似乎确立了一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铁的规律”。然而，这个规律没有在如今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中反映出来。以经济福利来衡量，过去几十年内，第三世界部分国家的脱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种做法与舍拉曾经提出的建议完全相反（Reinert，2003 & 2004）。

因此，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当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们再次利用新重商主义方法来鼓励经济增长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Kay and Gwynne，2002）。重商主义的部分内容针对的是建立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将影响经济的各种不同因素结合在一起。地理、历史、制度、知识、技术、法律和经济学（实际上是作为经济学存在基础的整个社会）都被看成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理论和政策相关的，但这种关系却无法在正统经济理论简化论的框架中得到理解。亚当·斯密忽略了经济体系中的协同效应、联系、创新以及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活动之间的区别。这样，在宏观层次上，我们就丧失了如今被人们称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动态系统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期，保罗·克鲁格曼把握住了报酬递增因素，而且实际上在其“新贸易理论”中再次构建起了重商主义贸易理论（Krugman，1990）。以进口品和出口品报酬递增为基础，许多模型都假定贸易是对等的，因此，导致了对自由贸易的普遍赞同（重商主义者也赞同这一点）。然而，与舍拉的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模型一样，克鲁格曼的有些模型又导致了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的不对称（这是殖民贸易的特点）。就像维纳排除报酬递增规律（因为它不符

合均衡模型）一样，为捍卫意识形态和数学的纯洁性，主流学派显然也成功地消除了最重要的东西：现在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① 得意洋洋地宣布，克鲁格曼“年青时代”对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模型的“非理性狂热”已经结束了，因为“尽管看不见的手是脆弱的，但是看得见的手却是残废的”（Bhagwati，2002：22，31）。换句话讲，虽然面对着舍拉理论的复活，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学界总体上不相信政府能够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然而，作为正常的活动，政府不断地在发挥作用，而且大多非常成功，包括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经济重建。这样，科学与意识形态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结合起来了。

作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目前，**被动的和物质主义的**主流经济学阵营发现自己受到了制度学派、新熊彼特演化学派、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围攻。由于它们只是共同作为异端邪说在反对主流学说，所以，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克服阻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学术惰性。然而，随着主流经济学对第三世界边缘化国家的损害日益明显，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在柏林墙即将倒塌时，美国经济学会所属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表达出了对经济学状况的担忧。与舍拉一样，他们担心方法的僵化使得分析目标偏离了方向，因此，他们告诫：“研究生项目培养出的一代人中可能会有许多**低能专才**（idiot savants），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拥有（数学建模技术的）特殊技能，但却对实际经济问题是无知的。”（Krueger，1991：1044～1045）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华盛顿机构所操纵的全球化过程正是由上面所描述的这些经济学家来施行的。他们在实际经济问题上的无知给60多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痛苦——在过去10年内，这些国家的国民产出和实际工资下降了，而且，有些国家的下降非常严重。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以这种新的多元论经济学视角来

① 巴格瓦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贸易组织顾问、联合国经济政策特别顾问。195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随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师从萨缪尔森、索罗以及希克斯和麦克道格尔。他于1971年和1989年先后创办《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学和政治学》杂志，曾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和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1980年至今一直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该校A. 雷曼（Arthur Lehman）经济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译者注

重新考虑创造了欧洲民族国家和工业革命的这种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类型。只要我们仍然受到亚当·斯密的**迈达斯谬误**（欧洲的文明和民族国家都是“坏的社会科学”的产物）的束缚，我们就无法解决第三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舍拉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报酬递增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多样化经济（否则就不会产生财富的累积因果）以及开明的政府政策——有望使得一种更全面的、以历史为基础的和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理论取代主流经济学说。我们在努力以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取代正统教科书中的经济理论。虽然我们的这种理论的抽象程度比不上主流经济学，但它却包含了舍拉的观点。关于我们的成果，请参见下列网站：www. othercanon. org。

注释

1　实际上，迈达斯谬误是许多人共有的一种集体错觉，用福柯（Foucault）的话来说，经济学“突然产生于西方思想，在李嘉图和萨伊时代被全副武装并已经充满了危险”（Foucault，2002：181）。

2　几年之后，吉诺维西（Gerovesi）的兄弟彼得罗（Pietro）将一位布里斯托商人卡里（John Cary）1695年出版的论述英国贸易的著作翻译成了意大利文（一共三册）。作为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卡里极其看重技术变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3　如果我们认可熊彼特对当时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地位的判断，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人也是那一时期全球最伟大的经济学家（Schumpeter，1954：176～177）。

4　有趣的是，亚当·斯密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天文学的）也是以相同的问题开头的（Smith，1811：55）。

5　参见 Serra，Antonio，*Breve trattato*. p. 60. In Italian：“Essendoci l'esperienza maestra delle cose，alla quale cede ogni potentissima ragione.”

6　参见 Serra，Antonio，*Breve trattato*. p. 135。

7　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请参见德雷克斯勒（Drechsler，2004）。

8　尽管经济学家们一般都不认可经济地理学，但它一直作为经济学边缘学科而存在。最近，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使得这门学科有所复活。参见克鲁格曼（Krugman，1990，1991，1995）和萨克森妮安（Saxenian，1994）。

9　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请参见 E. 赖纳特（E. Reinert，待出版）。

10　我们引述的是1590年的版本。

11　甚至有一本英文翻译著作《论城市的伟大》于1607年在伦敦出版。

12　1725年之前，荷兰共和国一直都没有系统地保护自己的制造业。直到在其经济开始下滑后，作为对英国和法国成功的关税政策的回应，才开始采用此措施。

参考文献

Anonymous, "Giornali del governo de Don Pietro Giron Duca d'Ossuna [1616—1620]", in Archivio Italiano, Florence: n. p., 1846.

Appleby, J. O.,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Arpaia, P.,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from a Created Literary Past: Giosuè Carducc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Literature", in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7: 2, 192 ~ 214, 2002.

Arrow, K. J., "Increasing Returns: Historiographical Issue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7: 2, 171 ~ 180, 2000.

Benigno, F., "Reflections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The Sicilian Experien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4: 1, 77 ~ 87, 1989.

Benini, R., "Sulle dottrine economiche di Antonio Serra", in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2nd series, 222 ~ 248, September 1892.

Bhagwati, J. N., Free Trade Tod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Biernacki, R., The Fabrication of Labor: Germany and Britain, 1640 - 19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Botero, G., Della ragion di stato libri dieci: Con tre libri delle cause della grandezza, e magnificenza delle citta, Roma: Appresso Vincenzio Pellagallo, 1590.

——, Le relationi universali, Venice, Giorgio Angelieri, 1599.

Bouwsma, W. J.,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 1550—1640,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roda, P., "Commons and Veblen: Contrasting Ideas about Evolution", in Moss, L. S. (ed.),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ian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96.

Bruni, L., "Panegyric to the City of Florence", in Kohl, B. G.; Witt, R. G.; Welles, E. B. (eds.), The Earthly Republic: Italian Humanists 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8.

Bruno, G., La Cene de le ceneri, London: John Charlewood, 1584.

Chang, H. J.,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2000.

——, (ed.), Rethin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Anthem, 2003.

Costantini, G. A. [Sappetti, G.], Elementi di commerzio, Genoa: Giambatista Novelli, 1742.

Croce, B.,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Custodi, P., "Proemio dell'Editore",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Antica, tomo 1, Milan: G. G. Destefanis, 1803.

Drechsler, W. 'Natural versus Social Sciences: On Understanding in Economics', in Reinert, E. (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4.

Duby, G.,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Warriors and Peasants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Ernst, D.; Lundvall, B. Å,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Learning Economy: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einert, E.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come Inequality, London: Edward Elgar, 2004.

Finkelstein, A., Harmony and the Balanc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2002.

Freeman, C.; Soete, L.,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London: Pinter, 1997.

Gould, J. D., "The Trade Crisis of the Early 1620's and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5: 2, 121 ~ 133, 1955.

Granata, L., Antonio Serra: economista e meridionalista inconsapevole e il suo Breve Trattato, n. p.: Santelli, 1998.

Habermas, J.,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Neuwied am Rhein: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1965.

Hecksher, E., Mercanti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4.

Hinton, R. W. K., The Eastland Trade and the Common Wea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Hintze, O.,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Gilbert, F. (ed.),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Kay, C.; Gwynne, R. N., "Relevance of Structuralist and Dependency Theories in the Neoliberal Period: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16: 1, 49~69, 2000.

Kindleberger, C. P., "the Economic Crisis of 1619 to 1623",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1, 149~175, 1991.

Krueger, A. O. et al., "Report on the 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9: 3, 1035~1053, 1991.

Krugman, P. R.,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Kuhn, T. S.,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 Cambridg,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Laffemas, B., Reiglement (sic) general pour dresser les manufactures en ce rayaume, et couper le cours des draps de soye, & autres merchandises qui perdent & ruynent l 'Estat: qui est le vray moyen de remettre la France en sa splendeur, & de faire gaigner les pauvres…, Paris, Claude de Monstr' oil and Jean Richter, 1597.

Lawson, T., Economics &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97.

Levi-Faur, D., "Friedrich Lis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ation-State",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 1, 1997.

List, F.,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Stuttgart and Tübingen: G. Cotta' scher Verlag, 1841.

Lundvall, B. Å (ed.),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 Pinter, 1992.

Lundvall, B. Å. et al., "National Systems of Production, Innovation and Competence Building", in Research Policy, v. 31, 213 ~ 231, 2002.

Magnusson, L.; Ottoson, J., "Introduction", in Magnusson, L; Ottoson, J. (e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Path Dependen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7.

Magnusson, L., Merkantilism: Ett ekonomiskt tänkande formuleras, Stockholm: SNS Förlag, 1999.

Malthus, T.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Printed for J. Johnson, 1798.

Malynes, G., The 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 According to the Three Essentiall Parts of Traffique, Namely, Commodities, Moneys, and Exchange of Moneys, by Bills of Exchanges for Other Countries. London,: Printed by I. L. for W. Sheffard, 1622

Mandeville, B.,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 London: J. Roberts, 1714.

Marino, J. A., "Economic Idylls and Pastoral Realities: TheT 'Trickster Economy'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4: 2, 211 ~234, 1982.

Mirowski, P., 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Misselden, E., Free Trade or the Meanes to Make Trade Flourish Wherein the Causes of the Decay of Trade in This Kingdom Are Discovered, London, 1622.

Misselden, E., The Circle of Commerce or the Balance of Trade, London, 1623.

Monroe, A. E., Early Economic Thought. Selections from Economic Literature prior to Adam Smi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Montesquieu, C. S., L'esprit des Lois, Geneva: Chez Barrillot & Fils, 1748.

Morelli, R., "The Medici Silver Mines (1542—1592)", in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1, 121~139, 1976.

Mueller, R. C., The Venetian Money Market: Banks, Panics, and the Public Debt 1200—15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Myrdal, G.,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A Note on the Mechanism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equality, Cairo, 1956.

——,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G. Duckworth & Co., 1957.

Nelson, R. 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North, D. C., "Needed: A Theory of Change", in Meier, G. M.; Stiglitz, J. E. (eds.),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 Nre York: World Ban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adula, R., "Um Ensaio sobre as Politicas Públicas e o Desenvolvimento partindo do pensamento de Antônio Serra", in Oikos, 87 ~ 105, July 2000.

Perrotta, C., "Is the Mercantilist Theory of the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Really Erroneous?",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3: 2, 301 ~ 336, 1991.

——, Produzione e lavoro produttivo nel Mercantilismo e nell'Illuminismo, Galatina: Congedo, 1988.

Reinert, 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i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6, No. 4/5, 1999.

——, 'Increasing Poverty in a Globalised World: Marshall Plans and Morgenthau Plans as Mechanisms of Polarisation of World Incomes', in Chang, Ha-Joon (editor), Rethin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Anthem, 2003.

——, 'Globalisation in the Periphery as a Morgenthau Plan: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Mongolia in the 1990's, in Reinert (ed.), 2004.

—— (ed.),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4.

——,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 (1717—1771):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Economist Adventurer', in Backhaus, J. (ed.) 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 and the Beginning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eries The European Heritage in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Kluwer, forthcoming.

Reinert, E. & Daastøl, A. M., "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Economic Innovation: The Religious Gestalt-Switch and the Duty to Invent as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 233 ~ 283, 1997.

Robbins, L.,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LSE Lectur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Roncaglia, A., La ricchezza delle idée: Storia del pensiero economico, Rome: Laterza, 2001.

Rosselli, A., "Early Views on Monetary Policy: The Neapolitan Debate on the Theory of Exchange",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2: 1, 61 ~ 82, 2000.

Ryan, M. T., "Assimilating New World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4, 519 ~ 538, 1981.

Salfi, F. S., Elogio di A. Serra, primo scrittore di economia politica. Milan: Nobile e Tosi, 1802.

——, "Minuti di Salfi a [Giuseppe Prina?] 1802", in Froio, R. (ed.), Salfi tra Napoli e Parigi: Carteggio 1792—1832, Naples: G. Macchiaroli, 1997.

Samuelson, P. A., "Price Factors and Goods in General Equilibrium", i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1, 1953.

Samuelson, P. A. & G. Stolp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in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48.

——, "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 in Economic Journal, June 1949.

Saxenian, A. L.,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di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chefold, B. (ed.), Antonio Serra und sein Breve Trattato—Vademecum zu einem unbekannten Klassiker, Düsseldorf: Verlag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GMBH, 1994.

Schmoller, G.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1884], New York: A. M. Kelley, 1967.

Schumpeter, J. A.,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Seligman, E. R. A., Curiosities of Early Economic Literature, San Francisco: Privately Printed by John Henry Nash, 1920.

Serra, Antonio,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i regni d'oro, & 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 Con applicazione al Regno di Napoli. Del dottor Antonio Serra della città di Cosenza. Divisione in tre parti, Naples, Lazzaro Scorriggio, 1613

Serra, Antonio, Breve Tratado das causas que podem fazer os reinos desprovidos de minas ter abundância de ouro e prata, Curitiba, Brazil, Segasta, 2002.

Sewell, W. H.,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Sombart, W.,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2.

Sumberg, T. A., "Antonio Serra: A Neglected Herald of the Acquisitative System", i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0: 3, 365 - 373, 1991.

Veblen, Thor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1898.

Viner, J.,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7.

Wallerstein, I. M.,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Weintraub, E. R., How Economics Became a Mathematical Scien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hite, L. T.,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Xenophon, Ways and Means (The Poroi), ed. E. C. Mercha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Ziersch, W., Antonio Serra,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Bonn: Carl Georgi, 1905.

第十九章　经济学中的创造性毁灭：尼采、桑巴特和熊彼特[1]

雨果·赖纳特　埃里克·S. 赖纳特

从所有事物的内心
发出了痛苦的呼唤——
“醒来吧，醒来吧，伟大的湿婆
我们的身躯渐渐厌倦了
固定不变的东西
赋予我们新的形态
歌唱我们的毁灭
以便我们获得新生……”
——印度诗人　泰戈尔

1. “创造性毁灭”的流行

20 世纪 90 年代，熊彼特（1883—1950 年）成为经济论战的中心人物。从 1932 年到其离开人世，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随着围绕“新经济”的各种事物似乎暂时使得通常的经济重心规律失效，艾伦·格林斯潘宣称熊彼特为理论家和预言家[1]。这些事物的核心就是与熊彼特这个名字相关的创造性毁灭过程。这一概念似乎正好可以用来描述下列过程：为了替新的事物留下发展空间，信息和通信技术毁灭了以前的技术手段，并淘汰了旧的企业。

① 原载 Backhaus, Jürgen and Wolfgang Drechsler (editors.)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2000: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Springer, 2006, pp. 55 ~ 85. ——译者注

在如今的正统经济理论中，熊彼特的理论是非常新颖的。然而，他在思想上的高度独立性经常被人们误解为其思想只属于他本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参见 Reinert 2002①），包括他的“创造性毁灭”这一关键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是非常古老的。在本文中，我们要论述的观点是，“创造性毁灭”这一概念通过尼采的著作而成为了 19 世纪后期的**时代精神**。再往前追溯，创造和毁灭过程在印度教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它使得尼采的老师（Erzieher）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受到了很大启发）。尼采自身的创造性毁灭思想因其《苏鲁支语录》（Also Sprach Zarathustra）② 而广为流传，它对德国的几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Sokel，1959）。我们还要进一步论证，与经济学界所坚信的看法相反，“创造性毁灭”这一术语不是由熊彼特，而是由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 年）这位受尼采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引入经济学的。

尼采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使西方文化获得新生。他追求这一目标的办法就是对腐朽的制度和哲学基础进行攻击。由于意识到不可能以上帝为基础建立现代道德体系，以及即将发生的虚无主义危险，尼采试图建立一种“超人”的内在道德，以取代以前的超自然道德。为了创造这种新的道德，尼采必须毁灭旧的道德：新的道德必须非常严格地建立在旧道德的废墟之上。我们认为，这种新的道德建立在创造性毁灭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因为它要求每一个人在“书写自己的牌匾”时，必须毁灭“旧的牌匾”。因此，尼采的重要著作《苏鲁支语录》同时也是对创造性毁灭的思考（因为书中提出了这种“道德创新”）以及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它在攻击现有道德的同时，力求以这种新的道德取代之）。

在黑格尔看来，有些人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缩影。他认为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和拿破仑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尽管尼采本人强烈反对这种提法，但他无疑也是对时代精神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人物——黑格尔认为，他“……**自身的特定目标包含了强大的世界精神意志**”（Hegel，1953：39～40）。这种人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对他们的圈点。

① 见本书上卷第五章。——译者注

② 又名《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译者注

在某种程度上，熊彼特本身就是一个**超人**（Übermensch）（他肯定也希望以这种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事实上，在写给熊彼特的悼词中，其哈佛的同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引述了尼采对叔本华的赞美：“**你看他，无人能比。**”（‘Seht ihn nur an- Niemandem war er untertan’）（Haberler，1950：344）。25 岁时，熊彼特就出版了一本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1908）；29 岁时，他写成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31 岁时，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经济学史的书（1914）。熊彼特从来就不是一位创始者。他最著名的逸事是有人听他说自己一生只有三个愿望：做维也纳最好的情人、做奥地利最好的骑手、做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但后来，他承认自己对马术不太在行。

熊彼特通晓各种经济学流派。然而，尽管他的著作包含了经济思想史的方方面面以及各个时期经济思想的来龙去脉，但他自己却非常不清楚自己思想的起源。因此，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将他误认为一位孤立的、具有高度创新性的思想家。虽然熊彼特常被人们看成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与当时维也纳流行的观点不同。在门格尔（Carl Menger）和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著名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中，熊彼特不愿意选择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在 25 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中，熊彼特试图理智地解决这场纷争：他认为，实际上各种不同层次的抽象理论之间应该被看成是互补的，而不能被看成是相互冲突的（Schumpeter，1908）。

自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开创德国经济学以来，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的作用一直是该领域的典型特征（Reinert & Daastøl，1997）。然而，随着尼采的**超人**和苏鲁支的“创造性毁灭”的出现，这些思想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且，它们拥有了新的崇高特征和新的说法。实际上，作为熊彼特经济学主要特征的企业家（变革的促进者）和企业家的“权力意志”，以及创造性毁灭都来自于尼采。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像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939 年出版的《西方的衰落》（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它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和兰德（Ayn Rand）1957 年出版的《巨人的颤动》（Atlas Shrugged）（它对冷战时代的辩论产生了影响）等畅销书，都反映了尼采的“要么创造，要么灭亡”这一道德价值。与熊彼特不同，斯宾格勒明确地指出了尼采对自己的

著作产生了影响……（Spengler 1939：xiv）。

2. 尼采之前的创造性毁灭

2.1　作为普遍思想的创造性毁灭

认为新事物的诞生以先前事物的毁灭为基础的思想具有古老的历史。希腊人从埃及人那儿继承了关于凤凰（象征太阳升起的贝奴（Bennu）鸟）的神话。这种鸟的生存时间为500年，到500年时，它借助翅膀的风力点燃埋葬自己的柴火。凤凰化为灰烬的同时生出了一只新的凤凰。这只凤凰又将经历500年的周期。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作品中，凤凰是基督复活的象征，这就是创造性毁灭的原始例子。

印度教对创造性毁灭这一概念的描述最清楚：在此，我们看到了对创造和毁灭这一动态过程最复杂，而且肯定也是最丰富的宇宙哲学式的描述。其核心是神殿中的三个主要的神：创造之神梵天（Brahma）、保护之神毗湿奴（Vishnu）和毁灭之神湿婆（Shiva）。梵天创造宇宙；毗湿奴保护被创造出来的人——包括在必要时拯救人类；而湿婆是宇宙的毁灭者，其使命是在宇宙衰退时消灭它，以便其再生。在湿婆完成自己的毁灭任务之后，梵天又开始宇宙的创造，因此这种循环是无止境的。

在其他传统中，湿婆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被描述为**舞神**（Shiva Nataraja）。他的舞姿就是宇宙的舞姿，因为宇宙不断地从诞生走向灭亡，又从灭亡走向诞生。宇宙的本质包含了这两方面，因为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据说，隐居的哲学之神独自住在一座山的山顶，从这里他可以用苦修而成的敏锐目光观察全世界。据说，当年轻的爱神有一次愚蠢地打扰湿婆的瞑思时，他的火热目光就将其化为了灰烬。

人们很容易在尼采身上看到这些神话和神话主题的反映。尼采本人从未直接提到过印度神话中的创造性毁灭这一主题，但是，我们知道，印度的思想和神话（其中包括湿婆神话）在尼采当时所处的知识界广为流传。尼采在巴塞尔大学的老同事和亲密朋友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hhardt）这位历史学家对湿婆的再生作用进行了探讨："印度人崇拜湿婆这位毁灭之神是有道理的。满怀毁灭的喜悦，战争像暴风雨一样使空气清新。他们的勇气得到了强化，并再次以当初建立国家时的英勇行为代替了懒惰、狡诈和胆怯行为。"（Burckhardt 1979：217）

2.2　创造性毁灭成为“德意志的”思想：从歌德到尼采和桑巴特

“蜘蛛网是永恒的吗？

如果佣人不将其扫除，蜘蛛自己也会将其撕破。” [2]

——歌德，Zahme Xenien Ⅷ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 年）是一位哲学家，他将印度的创造性毁灭神话首次引入德国哲学中。他对印度文明以及印度政府的形式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可以从他的四卷《人类历史哲学》（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的内容中看出来（Herder，1790—1792）。在赫尔德出版的著作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本关于所谓“科学政策”的书，其书名叫《论政府与科学的相互影响》（On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on the Sciences and Sciences on the Government）（Herder，1781）。他对印度的认同（Herder，1790—1792：Ⅲ 41 ~ 64）与他对所谓的**东方专制政权**（Despotismus des Orients）的否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781：17）。赫尔德对希伯来人和埃及人的等级制政府也持否定态度（1790—1792：Vol. Ⅲ）。同时，罗马帝国也不符合赫尔德的自由和人权标准（Kantzenbach，1970：103）。

是歌德（Johann Wolfgarg von Goethe，1749—1832 年）使赫尔德进入了魏玛的奥古斯特（Carl August）大公的宫廷，而且在歌德的作品中我们还清楚地看到了他所提到的为了创造必须毁灭的观点。如果我们要像熊彼特那样探索知识的来龙去脉，那么，印度宗教的宇宙观很有可能是尼采的“老师”叔本华（1788—1860 年）通过东方学者马野（Friedrich Majer，1772—1818 年）而传给他的，而马野本人却是赫尔德的弟子。

在下面的诗中，歌德强烈地表达了第一天生存时创造的痛苦，即战胜尼采后来所称的惰性和维持现状的力量时的痛苦：

当世界深躺在
上帝永恒的怀中时，
他为崇高的创造性快乐
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他说：让它诞生吧！
随后便是一阵痛苦的叫声，
伴随着全能的现实的突然诞生。[3]

——歌德，Divan，Buch Suleika

创造力（Schöpfungskraft）的关键作用在德国当时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反映——在此，**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s）被看作是创造国民财富的关键性因素。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 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他的早期著作是在歌德去世之前完成的）。在美国 19 世纪的经济学中，生产力这一术语同样经常被人们提起。我们认为，在 19 世纪，“提高生产力”这一术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提高竞争力”这一增进国民财富的方法（Reinert，1995）。德国经济学强调的是桑巴特所说的“*生成永远是积极的和有活力的*”（Sombart，1930：299），这与英国当时以交换为基础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德国的经济学家们经常强调的一个事实）。

创造力的必然结果就是歌德在此所使用的关于上帝创造力的术语——创造的**欲望和快乐**（Schöpfungslust）。创造力与创造过程中的快乐紧密相关。这反映了文艺复兴的思想：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影像创造出来的，因此，他的责任就是去愉快地发明事物（Reinert and Daastøl 1997）。20 世纪，这种相同的思想在熊彼特所称的企业家身上得到了反映：企业家是“惯例的毁灭者”（routine breaker），他的创新不仅来自于利润的激励，而且来自于他必须完成的内在冲动。但是，正如从歌德的诗中所看到的，这种行为是痛苦的——当上帝说“让它诞生”时，伴随着一阵“痛苦的叫声”（这一定是最初的**人间痛苦**（Weltschmertz）），这个世界便诞生了。

歌德和当时的德国哲学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全面强调**整体**（die Ganzheit）的作用。同样，作为经济学家的桑巴特将这些思想引入了经济学领域。在这方面的核心著作是桑巴特的《三种类型的经济学》[4]（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Sombart，1930）——一本主要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许多与**整体**有关的词条都与歌德和尼采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瑞典经济学家赫尔兰德（Sven Helander）（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国工作并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将德国经济学称为“浮士德经济学”。这反映了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强调将他们的科学拓展到包括所有与经济运行相关的行为。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的最后一章（第七章）的标题就是“作为整体的经济”。特别地，在这本书 1926 年的第二版中，熊彼特删除了这一章，因为他当时正在构建一种与地位日益上升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和新古

典思潮更为一致的经济理论（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参见 Industry & Innovation，No. 1 - 2，2002）。

对整体的本质**理解**（Verstehen）[5]要求能够理解整个经济的**结构联系**（Strukturzusammenhänge）。在《三种类型的经济学》这本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著作中，桑巴特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话：

> 我承认，最深处的东西
> 使得世界联结在一起，
> 展现所有权力和创造的欲望
> 不要在闲聊中浪费时间[6]
>
> （桑巴特，1930：106）

在同一页书上，桑巴特引述《浮士德》的内容反映了以下思想：人类是按上帝的影像创造出来的；人类**与上帝是类似的**（Gottähnlichkeit）；人类对自己与上帝类似的品质感到害怕。在此，桑巴特通过引述歌德的话来表达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类应该**像上帝那样**愉快地从事发明。诺贝尔（Noble，1997）生动地探讨了同一个主题——人类**与上帝**的相似性——与现代发明和创新相关的主题。

《三种类型的经济学》第 106 页简洁地描述了文艺复兴时的歌德和《浮士德》后来对德国经济学的影响。歌德将**意志**（Willenskraft）看成是主要的动力，这与尼采把**人类的智慧和意志**（Geist-und Willenskapital）看成是主要的动力是密切相关的——在今天的主流经济学中，人类的智慧和意志显然不属于生产要素。事实上，桑巴特的《三种类型的经济学》可以被看成是具有苏鲁支式的特征：它围绕着人类创造力这一本质内容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书中大量引述了希腊和德国哲学家的观点。

2.3　创造性毁灭、历史的循环和德国经济学

"……人世间所有的东西都在循环"

——歌德，致奥古斯特·冯·歌德，1808 年 6 月 3 日

创造性毁灭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观的产生。正如凤凰 500 年的循环周期一样，创造性毁灭导致了一种循环而不是线性的历史轨道。熊彼特的"创新集群"（它是导致商业周期的基本原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早期的人类历史理论一般都包含了此类循环，比

如具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年）[①] 的理论。武士部落征服一座城市，随后是该城市的繁荣和衰落，最后该城市又被新的部落占领。马基维利（Niccol Machiavelli，1469—1596年）（文艺复兴的开拓者之一）则持历史循环具有累积向上趋势的观点，即进步的观点（Reinert，2000）。

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哲学家，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年）[②] 也强调了历史的循环特征（Vico，1744/1984）。我们曾经引述的歌德的“痛苦地创造”的思想也可以从维科的身上看到。在他身上，我们还看到了其他的“德国”主题思想，比如尼采式的思想——为了理解事物，人类必须置身于最初无法区别“天使和野兽”的环境之中（Lilla，1993：16）。

古典经济学的诞生以及年轻的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理论与此类循环以及“发展阶段”的观点密切相关（Reinert，2000）。在英国的经济学中，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们既忽略了总体的历史，也忽视了使以前的历史阶段结束的技术变革。在德国的经济学中，经济发展阶段的作用仍然是历史学派的重要特征。在熊彼特理论框架（1939）的启发下，如今，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成为了佩雷斯（Perez，2002a，2002b）和弗里曼（Freeman & Louca，2001）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在此，博丹（Bodin）[③] 及其同时代的人所看到的历史发展与创造性毁灭所导致的历史的循环结合起来了。

以创造性毁灭为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从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精英循环”思想中反映出来（Pareto，1916/1935）[7]。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托马斯·孟（Thomas Mann）有同样的思想——他是受尼采影响很大的一位作家。在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1901）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精英循环（帕累托后来在总体层次上使用了这一概念）：第一代企业家挣钱；第二代介于企业家和**剪息票者**（rentier）两类人之间；

① 阿拉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阿拉伯历史哲学奠基人”，认为历史的对象是社会生活，著有穆斯林北部非洲史巨著《历史导论》。——译者注

② 意大利哲学家，提出历史循环论，认为人类社会要经过“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三个历史阶段，尔后又回到起点，循环不已，著有《新科学》。——译者注

③ 博丹（1530—1596年）：法国政治学家、法学家。主要著作有《国家论六卷集》。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国家主权学说。——译者注

第三代就只剩下剪息票的人了。在英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它比德文的首次出版几乎晚了20年）中，熊彼特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比喻表达了这种观点："实际上，上层（资本家）社会就像旅馆一样，的确总是客满，但旅客却总在变换。"（Schumpeter，1934：156）[8]。

3. 尼采和创造性毁灭

显然，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我们无法对尼采在创造性毁灭方面的复杂思想进行完整的介绍。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勾画出尼采在这一主题上的主要思想，以引导人们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对后来的作者——本文中的桑巴特和熊彼特——产生影响的。

毫无疑问，创造、创造力和艺术等是尼采整个一生关注的主题：从他早期论述希腊艺术的论文及《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到他对瓦格纳及其艺术的大量论述，再到他在意大利精神崩溃之前对音乐的神秘体验。尼采在创造与毁灭方面的特殊兴趣成为了他"宗谱似的"探究道德历史（Nietzsche，1994）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的许多与历史、道德、社会和演化相关的整体思想的基础。

本文的论述集中于《苏鲁支语录》（完成于1883—1885年），因为这篇文章可能最接近于尼采本人针对垂死的基督教道德体系所描绘出的另一种积极的观点。一些不幸的解释[9]，比如将**超人**列入到了纳粹的种族思想之中，使得这一术语最初产生的环境和含义变得模糊不清，从而使其成了种族优越性、优生学和暴力的象征。对超人的这种不正确的引用[10]使得我们认为理解超人最初的、哪怕只是部分的核心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论述的简便，我们的讨论围绕这篇文章的一系列核心思想而展开。这些思想从整体上大致描述了一种创造和毁灭的"宇宙观"。

这些"原理"或中心思想包括：

（1）创造和毁灭

（2）创造和毁灭的对立面是停滞不前

（3）权力意志

（4）生命是不断战胜自我的过程

（5）战争是一种疗法

原理1：创造与毁灭

“任何创造者必然永远是一位毁灭者。”（Nietzsche，1968a：59）[11]

在苏鲁支看来，创造与毁灭是不可分离的；创造者必然总是在进行毁灭。因此，毫无疑问，在新的创造之前始终存在着已有的旧形态的毁灭。“打破已有道德标准的人——无论是一位毁灭者还是一位违法者——同时也是一位创造者。”（Nietzsche，1968a：23）[12]。更一般地讲，对某种事物的肯定始终意味着对其他事物的否定，甚至是毁灭。正如尼采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肯定要求否定和毁灭。”[13]苏鲁支用具体的道德术语解释了这一原理，但是，这同时也表明从“宇宙哲学”角度来看，这一原理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这一思想也经常从尼采的其他著作中反映出来（如Nietzsche，1994）。

苏鲁支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思想是“自我”是自我创造的结果：作为最早的存在主义者，苏鲁支要求他的学生们对自己的现状负责，创造出自我以及自己的法则。从上面提到的创造与毁灭的关系来看，这种思想显然反映了如下含义：为了创造出新的“自我”，必须消灭旧的“自我”——“你必须希望自我燃烧：在化为灰烬之前，你怎么能够希望自己获得新生呢！”（Nietzsche，1968a：64）[14]

对这种“自我死亡”学说特别重要的一种描述就是苏鲁支首先讨论的三种精神转变的寓言。这个寓言讲述了一种崇高精神如何通过一系列转变来实现自我：首先变成一头骆驼，然后变成一头狮子，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小孩。第一个阶段是骆驼背负着最重的道德法则漫无边际地走进沙漠。在沙漠中，骆驼转变成了一头狮子，它所背负的道德法则也变成了一条“大龙”。狮子打败了龙，从而为小孩的诞生做好了准备。狮子的作用是“给自己和新创造的事物带来自由”[15]。没有了龙之后，狮子就可以自由地转变为具有创造力的小孩了（他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场游戏，一种自我驱动的轮子的首次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Nietzsche，1968a：27）。

因此，创造与毁灭是不可分离的。这种联系只以一种方向而存在，而相反的方向则是行不通的。否定并非意味着肯定，毁灭本身并不会导致创造。尼采认为毁灭本身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的行为。按照三种转变的寓言，创造与毁灭这两种品质或过程是通过原文中不断出现的**高贵的人**（Der Edle）来体现的——这位“高贵的人”代表了苏鲁支的道德和精神理想。这位“高贵的人”

是尼采对他当时所认为的颓废精神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回答。他的崇高和力量反映了尼采对人类未来的期望。这位“高贵的人”拥有众多特点：从总体上看，他身体健康，具有自我意识，慷慨大方，没有怨恨，“单纯”和喜爱欢笑，既残酷又善良。然而，他的最重要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它是苏鲁支对未来的希望）在于他的极端的能力：做好事和做坏事、崇拜和蔑视、热爱和仇恨、贪恋和厌恶、创造和毁灭——“大鄙视者也是大崇敬者”[16]。

在苏鲁支看来，这位“高贵的人”主要是一位创造者：“这位高贵的人想要创造某种新的事物和新的美德。”（Nietzsche，1968a：44）[17]创造离不开毁灭，正是在这一点上，两种完全相反的能力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这位高贵的人的创造力通过相同的毁灭潜力反映出来。由于拥有动力，因此，他从不会屈从于平庸。他面对的风险在于，如果不能创造，就会转变成虚无主义，即只有毁灭而没有创造。“但是，这位高贵的人带来的危险不在于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善人，而在于他有可能成为一个粗暴的人，一个嘲笑者和一个毁灭者。”（Nietzsche，1968a：64）[18]

一种内在需要驱使这位“高贵的人”去创造，但是，他创造出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自己。为了创造新的自我，他必须毁灭旧的自我。由于他必须不断地创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始终只存在于某一阶段：他**目前**的自我将化为灰烬，以作为建立**未来**的自我的基础。这位“高贵的人”的前景在于，在一系列战胜自我的某一个时刻，他将超越人类而达到“**超人**”这一地位。因此，这位“高贵的人”就是“超人”的开始。

这种必要的动力既反映了他的高贵也反映了他的能力。这位“高贵的人”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一定表现在体力方面，而是表现在道德和精神方面。这种力量的特点在于：它越强大，被迫寻求增长的力量就越大，这样，他就会成长得更为强大。这种内在动力就是他的“权力意志”。

> “任何人想成为一位创造者（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毫无疑问，他首先必须是一位毁灭者和价值观的破坏者。因此，最大的邪恶属于最高尚的行为，但这就是创造性的活动。”（Nietzsche，1968a：114）[19]

原理2：创造和毁灭的对立面是停滞不前

如果创造和毁灭相互联系，而且通过“高贵的人”来体现，那

么，反过来它们又与另一个原理相对立。这个原理通过尼采整个作品中的各种人物（牧师、苦行僧、“躯体鄙视者”以及其他众多“不健康”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保守者”）来体现。《苏鲁支语录》中主要的“保守者”就是那些“善人和公正的人”。从本质上看，这些人是各种病态形象，他们是保守、停滞、麻痹和衰落等思想的化身。病态，苍白，不健康和软弱，因此，他们无法战胜**惰性**（vis inertiae）及维持现状的力量。他们还喜欢聚集在一起。尤其重要的是，苏鲁支始终以复数形式来称谓“善人和公正的人”，而以单数形式来称谓“高贵的人”。因此，这两种人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个人与集体的斗争——这是苏鲁支这位隐士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由于无力创造，“善人和公正的人”紧紧地抓住已有的东西而拒绝接受变化。“善人想要旧的东西，这样旧的东西就得到了保留。”（Nietzsche，1968a：44）[20]这种态度使得他们陷入麻痹、停滞、衰落，并最终导致精神甚至躯体的死亡。因此，他们的道路将导致虚无主义：

> “创造性的自我创造出尊敬和蔑视，创造出欢乐和痛苦。创造性的躯体创造出精神，以作为实现其意志的工具。甚至你的愚蠢和蔑视，你对躯体的鄙视都有助于你的自我。我告诉你：你的自我本身想要死亡，对生活已经感到厌恶。除了创造自我之外，它再也不能做到别的什么了。这是它首先要做的事，这是它的强烈愿望。但是，现在在这方面已经太晚了：于是你的自我想要沉没，成为躯体的鄙视者。你的自我想要沉没，这就是你变成躯体鄙视者的原因！因为你无力创造出自我之外的东西了。”（Nietzsche，1968a：35）[21]

在苏鲁支看来，他们守旧的意志**既**来自于受到阻碍和不健康的生命力，**也**来自道德的失败。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正在阻挠生命过程的展开以及**超人**诞生的前景。这些守旧者**既**可悲，**又**可鄙，他们**既是**虚无主义的工具，**又是**虚无主义的牺牲品。

正如我们目前看到的，尼采对人类外形的分析围绕着健康以及健康的“人类动物”。躯体健康是尼采对文化、智力和精神现象的主要比喻。健康既是指躯体方面，也是指道德、精神和智力方面。精神上不健康的“守旧者”（在《苏鲁支语录》中，他们主要由“善人和公正的人”来代表），只不过是整个人类最坏结果——“最

可鄙的人”，作为衰退化身的“最后的人”，或最后时刻遍及地球的麻木的人类残余——的一个开端。“‘什么叫爱？什么叫创造？什么叫欲望？什么叫命运？’最后的人眨着眼睛这样问道。”（Nietzsche，1968a：17）[22]。这一“准人类”就是尼采对颓废的现代人类动物所作出的凄凉的推测。它是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在此进程中，人类由于拥抱已有的舒适的平庸而使自己陷入了停滞和衰落。最后的人标志着人类意志和创造力的最终消亡。

因此，健康以及创造力和创造热情方面的区别使得“高贵的人”与“善人和公正的人”相对应。两者之间的斗争反映了“最后的人”（人类历史的终结）与**超人**（远大未来的希望）之间的斗争。如果“高贵的人”在战胜自我以及最终战胜自己人类的持续内在压力下，逐步走向**超人**，那么，由于一心想抵抗变革的需要，“善人和公正的人”将逐步走向“最后的人”。这两种未来代表了人类生活过程的两种可能的结果：前者代表了它的衰落，后者代表了它的上升。控制这一过程的力量（它因此决定了人类的未来）就是“权力意志”。

原理3：权力意志

按尼采的话来说，**最后的人**（letzte Mensch）和**超人**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必须通过他们相对的“权力意志”来加以理解。阐述这种区别时，需要我们（至少简单地）对尼采的“权力意志”这一概念的某些成分进行考察。

权力意志是尼采最复杂及矛盾的概念之一，它很容易被人们简单化或被人们误解。它时常表现为一种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适者生存”的理论，它以征服其他人类及残酷的自然优势为荣耀。主要由于这种理解，以及对权力的简单假设和尼采的妹妹在其死后所作的注释中表现出的对残酷的热情，才使得尼采的理论被纳入到了纳粹的思想体系中（Peters，1977）。

与这种简化的理解（reductive reading）相反，在此，我们将利用尼采和苏鲁支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证明了一种更为复杂和模棱两可的解释，并且反映了“权力意志”学说与创造力和慷慨等概念之间的联系。

对苏鲁支而言，创造力是权力意志作用的结果：意志就是创造者（Nietzsche，1968a：141）[23]。对某种事物而言，意志的作用就是要使其产生：“意志使人获得解放，因为意志就是创造——我是这

样教导人们的。为了创造，你必须独自去学习。”（Nietzsche，1968a：206）[24]生活和权力意志是动态的力量，它们在不断地寻求创造，而且（正如德国经济学传统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必须学习。获取知识是实现未来创造的一种手段。

权力意志会减弱。当它减弱时，其结果就是堕落。当权力意志太微弱时，它就无法扩展到自身以外了，这样就会出现停滞。“潮流”发生逆转，出现了停滞，物质和精神颓废，最终导致彻底毁灭——尼采将其称为“最终消亡的灵魂的表现”[25]。在《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中，尼采以一章的内容分析了禁欲的冲动，认为这是权力意志开始攻击自己时的一种毁灭的表现（Nietzsche，1994）。

颓废带来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慷慨精神”的萎缩：

> “弟兄们，请告诉我：什么是不好的和最坏的东西？难道不是堕落吗？我们始终认为，正是堕落才导致了慷慨精神的缺乏。我们在向上发展，从一种层次到更高的层次。但是，我们面对‘一切归我所有’这种堕落意识时却战栗不已。”（Nietzsche 1968a：75）[26]。

因此，当生活富足及权力意志上升时，其表现形式就是慷慨大方。自私的贪婪是衰退或权力意志扭曲的结果。

这样，权力意志就不能仅仅被归结为统治他人的欲望：最初的权力意志并不是一个社会概念，按照上面更广义的理解，它是对健康状态的一种衡量标准[27]。正如尼采所分析的，有机体的“健康”表现为慷慨、崇高和“超出自我”的创造性动力。除了推动其他的创造性过程之外，权力意志还会驱动自我的创造（和再创造）过程。从这一点以及上述几段的讨论来看，权力意志最重要的创造性表现形式或许就是战胜自我。因此，权力意志是与个人、人类和社会相关的所有变化、进步和演化过程的驱动力。

原理4：生命是不断战胜自我的过程

权力意志机制控制着个人及物种的发展过程，而且，从广义上看，它控制着所有的生命过程：“生命本身向我吐露了这样一个秘密：‘你看’，它说，‘我必须不断地战胜自己’。”（Nietzsche，1968a：115）[28]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选择”存在于创造—毁灭和维持现状之间。前者导致进入更高的层次，后者导致衰落。甚至生命本

身也服从这种“法则”——要么被迫战胜自我，要么在现状的基础上慢慢地衰落。从本质上讲，成长与衰落之间的选择就是“高贵的人”与“善人和公正的人”之间的选择——两者都是相同的权力意志基本过程的内容。

生物进化就是创造性毁灭在实践中的例子。生命战胜自我，并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新的自我，这样来经历生物进化的各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只是“高于猿人”，或者说是猿人战胜自我的结果。

>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生命都创造出了某种超出自我的东西。你想成为这股洪流的低潮甚至退化成野兽，也不愿意战胜人类吗？在人类的眼中，猿人是什么？是一个笑柄或者说是一个痛苦的困窘。在超人眼中，人类也是如此：一个笑柄或者说是一个痛苦的困窘。”（Nietzsche，1968a：12）[29]。

“人类”这种形态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动物，他要么必须走出自我，要么逐步衰落下去。

在苏鲁支看来，人类必然超越自我的前景及未来的伟大非常接近于他的本质描述：“弟兄们，我对人类的热爱，是因为它是一个开端，一个即将没落者。”（Nietzsche，1968a：287）[30]。

对人类超越的大体定义只能表现在道德方面：“‘人类必须完善和更为邪恶’——我是这样教导的。”（Nietzsche，1968a：288）[31]。因为高贵的人及其不屈不挠的权力意志有可能导致超人的产生，而且，因为崇高通过极端能力和创造的动力来衡量，所以作为崇高对立面的“仁慈”不能用来衡量道德价值。实际上，善人必须被“消灭”，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的自满和对变化的抵抗，正好阻止了人类超越自我这一机制发挥作用：

> “弟兄们，谁对整个人类的未来构成了最大威胁？难道不是善人和公正的人吗？正如他们所说的及在心中所想的：“我们已经知道正确和公正的含义，而且，我们已经拥有正确和公正。那些仍然在此寻求这些东西的人，是多么的可悲呀！”无论邪恶会造成多大的损害，但善人造成的损害是最严重的……善人必定会迫害那些自己寻求美德的人。情况真的如此……他们最恨的是创造者——他打破了已有的牌匾和旧的价值观念。他是一个毁灭者，但善人却称他为违法者，其原因在于善人无力去创造。善人始终标志着毁灭的开始……”（Nietzsche，

1968a：212～213）[32]

“善人和公正的人”是人类未来的最大威胁，因为，他们只会使得人类在愉悦中慢慢地陷入精神麻痹，陷入动物式的安逸，以及陷入“最后的人”的平庸之中。

这就是苏鲁支的恳求所表达出来的意识：“消灭善人和公正的人！弟兄们，你们真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吗？”（Nietzsche，1968a：213）[33]。他对未来的最大担心是：在自我满足以及“善人和公正的人”的影响下，人类将走到尽头，而不会在此基础上进入更好的未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苏鲁支（和尼采）亲自投入到了战斗之中：“人类必须被战胜。”（Nietzsche，1968a：37）[34]

原理5：战争是一种疗法

苏鲁支被一种战斗精神激励着：

> “你应该自己去寻找敌人，你应该自己去发动战争，以捍卫你的思想。如果你的思想被征服了，那么，你的诚实将仍然为你找到高兴的理由。你应该热爱和平，并把它作为一种发动新的战争的工具——热爱短暂的和平多过长期的和平。”（Nietzsche，1968a：47）[35]

正是这种“辩证的”哲学理念，才使得尼采声称：“攻击行动是良好意志的证明。”[36]生命的活力来自于变化、挑战和极端行动。事物的延续将导致停滞和衰退。挑战和苦难将使得生命变得更加强大：“未能使我死亡的事物，将使我变得更加强大。”（Nietzsche，1968b：23）[37]。软弱思想必须被摒弃。

尼采感到西方世界处在虚无主义和颓废的阵痛之中，他的任务就是确定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促使它获得必要的新生。作为治疗这种堕落的药方，苏鲁支的教导是一种“强身剂”，一种理论疗法。它用于治疗现代社会的安逸，以及顺从和屈服这种毁灭生命的道德——他认为这些是阻碍人类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障碍。尼采并非仅仅是一位“无道德论者”或“非道德论者”，相反，他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和文化的“辩证医师”：他的治疗手段是“最激烈的斗争”。文化的重建和再生必须通过某种文化休克疗法来获得：

> “虽然地震埋葬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并使得许多人在痛苦中挣扎，但是，它们也使得内在的力量得以爆发，秘密得以揭露。地震使新的美好事物得以显现。当地震袭击已有的人们

时，新的美好事物脱颖而出。”（Nietzsche，1968a：211）[38]。

由于起源于奴隶的反抗，基督教宣扬一种高深莫测的理论，以及一种服从、克己和屈服的道德观。但是，基督教体系的中心却是上帝死亡的躯体。尼采的批评是为了清除基督教体系支离破碎的残余，消灭它们[39]，以便为新的道德扫清道路。这种新的道德将以上帝无处不在的观念代替超然的观念，以人世代替天堂，以人类代替上帝：

> “弟兄们，让你们的精神和美德为人类的意识服务；你们要针对所有事物提出新的价值观念。为了做到这一点，你们必须去战斗！为了做到这一点，你们必须去创造！”（Nietzsche，1968a：77）[40]

为了使“更高层次”的人类有可能在未来出现，必须消灭温顺的基督教人类，“善人和公正的人”以及他们卑屈服从的道德观：“所有的上帝都死亡了：现在，我们要让更高层次的人活着。”（Nietzsche，1968a：79）[41]。这才能导致超人——“未来的人类”——产生：

> “这位未来的人，将把我们从流行的理想以及这种理想的后果中拯救出来，将把我们从极端的厌恶、从无所事事的意志、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这种正午的钟声和伟大决策的钟声，将再次解放人类的意志，恢复人类的目标及希望。这位反基督教者和反虚无主义者，这位上帝的征服者和虚无主义的征服者，必将在某一天到来。”[42]

尼采对道德、文化、德意志民族和制度的攻击，的确是为了达到创造性毁灭的目的：与其说是否定，倒不如说是对即将产生的事物的肯定。以超人取代上帝，以欧洲取代德国，以努力取代自满，以才智取代平庸：

> “我们这些非道德者给美德带来了任何损害吗？没有，这就好比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给君主带来损害一样。只有当君主们被消灭之后，他们才能再次稳坐在王位之上。其含义是：人们必须消灭道德。”（Nietzsche，1968b：26）。

道德必须被消灭。一部分原因在于挑战和反对能培养力量；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只有通过毁灭，才能导致新事物的产生。按照尼采自身的逻辑，一种事物的肯定必须要有另一种事物的否定。然而，尼采的问题是，他的广博的知识和雄辩的才能使其更像一位批评

家，而不像一位缔造者。毁灭遮盖了创造：变革的指导被斥责声掩盖了。

对原理的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

- 苏鲁支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可以被描述为创造、毁灭和保守这三种观念之间的斗争。
- 这三个概念主要通过两种人之间的关系来反映：一种是“高贵的人”，他代表了创造和毁灭；另一种是“善人和公正的人”，他们代表了保守、停滞和衰退。
- 上述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他们的“权力意志”的相对差别来解释：“高贵的人”由于受到其权力意志的驱使而去创造；“善人和公正的人”由于缺乏创造力，因此，只能通过维持已有秩序来获得既得利益。
- 作为“权力意志”学说基础的“权力”这一概念，既不能简单理解，也不能直接去理解。相反，它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一种复杂和“深奥”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权力通过创造力和慷慨而表现出来。
- 由于权力意志的特点在于不是上升就是下降，因此，生命必须不断地战胜自我。“高贵的人”遵循了战胜自我这一做法，因此，他代表了人类战胜自我的未来希望。
- 这一目标要借助于挑战和战斗来完成——但并非仅仅指的是物质方面的斗争。尼采的“更高级”的战争，针对的是象征性的东西、价值和理想。他的整个文化事业的治疗功能，取决于他的创造和毁灭的整体哲学观。

> “与太阳一样，苏鲁支也要下山了。现在，他坐在那儿等，他的周围是被打碎的旧牌匾和已经被书写了一半的新牌匾。”（Nietzsche，1968a：198）[43]。

尼采的事业始终未能完成，或许严格地说，它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我们的任务是要去解读他的“写完了一半”的牌匾，以及他的巨大的遗产——他的写作方法和反映其学术声誉发展过程的浩瀚著作。

我们以威廉姆斯的话来结束这部分内容：

> “我同意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的一句话：并不存在单一的尼采主义，正确的问题是：尼采的理

论可以真正用于哪些方面?”（Williams，in Schacht 1994：238）

尼采去世后的一个世纪里，他的理论被应用到了许多方面。有些应用的确非常严肃认真；但其他一些应用则是戏谑的或是艺术性的：苏鲁支舞蹈中的鬼怪同时进入了20世纪的艺术、科学、诗歌和战争宣传之中，这种影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无论是在印象主义中还是在后结构主义中，均可以看到。

出于多种原因，这种影响有时被掩盖起来了。在许多领域，尼采仍然背负着纳粹主义、非理性主义、**血与地**（Blut und Boden）的神秘主义和超人优生学等恶名。所以，他的影响时常是**潜藏**着的，尤其是在那些摒弃已有价值观并以他的理论为基础建立新的价值观的论著和学科中。记住这些后，下面一节要讨论的问题是：通常认为经济学没有被尼采所打扰，情况果真如此吗?

4. 经济学中的尼采：从桑巴特到熊彼特

“创造性毁灭”几乎成了熊彼特的象征。然而，“创造性毁灭”在经济学中的首次使用应该归功于桑巴特：森林的大规模毁灭，使得欧洲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临着木材的短缺；森林的毁灭正好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基础：

> “然而，毁灭再一次带来了一种新的创造精神。木材的短缺以及日常生活的需要……迫使人们去发现或发明木材的替代物，迫使人们使用煤炭取暖，迫使人们发明焦炭以用于铁的生产。然而，这些事件使得19世纪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成为可能——毫无疑问，任何知识丰富的人都会同意这一观点。因此，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即使是商业利益和军事利益也似乎通过一种无形的联系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Sombart，1913：20）[44]。

桑巴特（1863—1941年）是德国新新历史学派中的首席经济学家（Backhaus，1996）。在熊彼特理论的创造及形成时期，桑巴特在德语经济学中占有支配地位。他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的开拓性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Sombart：1902年第一版共两卷；后来的1919年版共有四卷；1927年最后的一版共有六卷）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但至今还没有被翻译成英语。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桑巴特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的所有德国经济学理论都失去了影响。解释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经济学专业领域数学化的兴起——这种倾向与德国传统的理论完全相反；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后来在扫除纳粹思想这种糟粕时，在很大程度上将一些科学精华也一同扫除了。因此，德国经济学传统仅仅由马克思和熊彼特来代表，从而使得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独特性超出了其自身历史环境下的实际情况。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熊彼特本人也促进了这一变化过程，因为《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将德国经济哲学基础彻底地忽视了（Reinert, 2002）。

熊彼特在盎格鲁—撒克逊环境中的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之外的人对其理论所依赖的传统的不了解所导致的。熊彼特的部分工作，就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桑巴特所写的著作以及德国的经济讨论介绍给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许多赞同熊彼特观点的人（尤其是德国之外的人）可能会因为一本德语著作的下列说法而感到意外：熊彼特194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正是这本书使他在大众中闻名）完全是对几十年前德国的一场讨论的重新描述。正如该书作者小心地指出的，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既未提到这场讨论本身，也未提及这场讨论的主角桑巴特。

>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这本书中），熊彼特既未提到桑巴特，又未提到20和30年代的一般文献资料，因此，从本质上讲，他所论述的内容只不过是几十年前德国人在探讨‘资本主义的未来’时，曾经论述过的东西。”（Appel, 1992：260）[45]

在熊彼特的传记作家中，只有盐谷（Shionoya, 1997）和斯威德伯格（Swedberg, 1991）提起过尼采，而且，两人都是在涉及企业家精神时提到的，而在涉及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这一核心概念时，两者均未提到尼采（Shionoya, 1997：173, 321；Swedberg 1991：192）。详细论述熊彼特和尼采之间关系的文章是由两位意大利经济学家桑塔雷利和佩西里利完成的（Enrico Santarelli and Enzo Pesciarelli, 1990）。这篇文章关注的也是企业家。

尼采对桑巴特的著作产生了影响，这既能从桑巴特多次引述尼采的行为中看出来，也可以从桑巴特的传记中看到。同时，对桑巴特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些人（其中一些是他的亲密朋友）也受到了尼

采的强烈影响（Lenger，1994：141）。人们知道，桑巴特本人经常会引用尼采的《苏鲁支语录》中的话（同前：247）。

在其主要的方法论著作《三种类型的经济学》中，桑巴特经常引用尼采的观点来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历史、经济哲学以及人类的演化。桑巴特认为，科学和人类**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发展符合尼采提出的各个阶段。世界起初**从神秘状态中清醒**（entzaubert），最后才**进入了无神状态**（entgottet）（Sombart，1930：102）。

桑巴特发现，社会科学能够从自然科学中学到的东西是：相同的（或相似的）情况会重演，即历史具有循环性。在这方面，他也引述了尼采的话：

> “事件的可预测性，不是来自于遵守某一规则，满足某一必要条件，或对每件事因果联系的预测，它来自于‘相同事件’的再次发生。”（Sombart，1930：118）（Nietzsche，2000a：9384）[46]

桑巴特在其最重要的方法论著作的结尾使用尼采的话来表达了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 “但是，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应该‘服务于生活’。这是如今的每个人都要求的东西。几十年以前，尼采就告诫过我们。在心灵深处，我们都认为这种告诫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在如今更是如此。我们不需要脱离实际的学识，不需要有人贩卖华而不实的东西，不需要‘无用的’的知识。（在一个脚注中，桑巴特提到了尼采这本书的名字《不合时宜的思考》（Untimely Meditations）[47]，并且说‘这本书如今仍然是非常合时宜的’）。”（Sombart，1930：334～335）[48]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尼采才说出了：“科学是‘权力意志’最明确的形式。”“权力意志”本质上就是“创造意志”，因此，它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显然是桑巴特的观点，而且，在此桑巴特将尼采和弗朗西斯·培根结合起来了（1930：333）。尼采和培根的结合，能够有效地划清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经济学领域里两个阵营之间的界线。带头反对李嘉图的经济学家——英国的琼斯（Jones）和美国的约翰·雷（John Rae）（19世纪30年代初期，两个人都在著书立说）——都希望再次按培根的思想去理解经济学。培根和尼采的理论都主张把作为创造者的人类当成经济学的中心，因此，要遵循我们所称的另类教规（The Other Canon）或**文艺复兴**

经济学（Renaissance Economics）传统。在探索创造性毁灭这一思想的起源时，我们可以看到培根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密切联系。下列事实更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这种观点：在反对康德的形而上学时，赫尔德也在从培根那儿“寻求庇护”（Kantzenbach，1970：20）。

5. 尼采与他逝世百年时的经济学

5.1　研究方法

尼采对经济学的影响，一般都是通过他对所处时代的影响间接地反映出来的。然而，他自己偶尔也会提到经济学，这表明他熟悉经济学领域的讨论。有一次，尼采曾批评过**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经济学对所有国民道德的不利影响[49]。在没有点名道姓的情况下，尼采还对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中的关键性概念进行了有趣的歪曲。根据曼德维尔的“私人邪恶，公共利益”——经济学从以责任为基础转变为以自我利益为基础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尼采发明了“公共舆论，公众懒惰”这一说法（Nietzsche，1994：172）。社会的集体化将最终导致消极，而消极必然会导致衰败。

尼采参与经济学讨论的又一个例子是，在批评现代科学时，他持肯定态度地引述了英国经济学家比齐哈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 年）的一段话。这段话用在 2002 年比用在比齐哈特写作时更为恰当。“无数未经证实的抽象原理，被一些乐观的人们急忙采用，并随后细心地写成了用于解释整个世界的著作和理论。但是，世界的发展与这些抽象理论完全相反……”[50]（Nietzsche，1994：249）

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就人类认识和科学的客观性这类流行的论题而言，尼采也有一些重要内容需要向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传达：

> “从此以后，亲爱的哲学家们，让我们警惕那些古老和危险的神话——它们认为‘有一种纯粹的、无意志、无痛苦和永久性的认知主体’。让我们小心，以免被‘纯粹理性’、‘绝对精神’和‘知识本身’等矛盾的概念所缠绕。这些概念总是要求我们有一种完全无法思考的眼光，一种没有确定方向的眼光。在这种眼光中，缺乏主动的理解力——通过这种理解力，思考变成了针对某种事物的。这些概念总是要求一种矛盾和无

意义的眼光。唯一存在的思考就是一种透视法，一种有洞察力的思考。我们对某一问题的感受越多，我们就能够使用更多的眼光——不同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我们对这一事物的理解就越全面，这样，我们的理解才具有客观性。意志的消失……不正如扼杀了理解力吗？"[51]

正统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它关注的是交换（供给和需求），而不是生产。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们曾经抱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变成了一种只**关注交换的科学**（Catallectics）。尼采对英国哲学的批判完全与下列说法一致："在英国人的身上，尼采认为他发现了道德和交易政治的原型：计算和估算。计算和估算不仅仅是商业领域的核心，而且也是道德和政治领域的核心。在这方面，使尼采感到困扰——不，是愤慨——的是，交换和经济计算中必须存在的平等闯入了生活领域——而该领域不应该存在这样的一种平等的逻辑关系。"（Ottmann，1987：131）[52]这就是桑巴特具有民族主义特点的著作《交易商和英雄》（Traders and Heroes/ Händler und Helden）（1915 年出版）中的中心思想。在这本著作中，桑巴特大量引述了歌德、费希特（Fichte）①、叔本华和尼采的观点。在如今的方法论讨论中，人们关注的核心仍然是"等同性假设"②（Buchanan，1979：231）以及将无法量化的一些因素和定性"理解"（verstehen）（Drechsler，2002）排除在外的问题。

为了从自己的分析中努力创造出某种层次的恰当的抽象理论，经济学家必须不断地对"不相等的事物"进行比较并将它们相提并论。这种研究导致了如下智力工具的产生：韦伯的"理想类型"、卡尔多的"典型化事实"以及佩雷斯和弗里曼的"技术经济范式"等。使用这些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在杂乱无章的观察和事实中创造出某种秩序。关于这种研究方法，尼采说出了下述一段令人鼓舞的话：

"每一种概念的诞生，都是由于我们将不同的事物同等看待。没有哪一片树叶会与另一片树叶完全相同。'树叶'这一

① 费希特（1762—1814 年），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现代哲学的奠基者。——译者注

② "等同性假设（the equality assumption）"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在质上是相似的，这种假设导致了保罗·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诞生，参见《穷国的国富论》（上卷）第七章第 5 节。——译者注

概念的形成，是由于对个体差别的武断的抽象，以及忽视它们的特点的结果。这个概念使我们想到，在大自然中，除了各种各样的树叶之外，还有一种可以被称为‘树叶’的东西，即某种原始形态——所有的各种树叶都是以不熟练的手法依照它的脉络、色彩、形状等编织出来的，因此，没有哪一片能够正确、可靠和真实地反映其原始形态……那么，什么是真理呢？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隐喻，换喻（metonym）和拟人。简言之，是人类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通过理想化的和夸张的手法而得到提升、改变和修饰，而且，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它们就被一个民族看成是固定的、权威的以及必须服从的东西。真理是人们忘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产生的幻觉。真理是一些逐步失去作用和缺乏实际效力的隐喻。真理是丧失了图案的钱币，它现在只是一块金属，而不再是钱币了。”[53]

5.2　熊彼特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

当代十分流行的熊彼特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以尼采及其**超人**企业家和创造性毁灭为基础。在此，通过桑巴特和熊彼特，我们看到了尼采的经济思想。与桑巴特（他仔细地记录了尼采对他的影响）不同，熊彼特一般都没有透露自己思想的起源。然而，通过对熊彼特“黄金时期”（20几岁时）的知识环境、总的**时代精神**以及欧洲大陆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著作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在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正在衰落的时代。为了获得一定的重要性，任何取代这种机械的、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观点的理论，都必须含有尼采的特征：如果没有人类的智慧和意志，没有人类永无止境的创造性过程，没有人类的推动作用，那么，经济学将（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始终是在上演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

45年的冷战使得尼采以及那些朝着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发展的经济学家被排挤——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话来说，这些经济学家既仇恨自由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Giddens，1998）。尼采自己的遗产因他的妹妹对其著作的误解和公然歪曲而黯然失色——她使得尼采看上去像一位纳粹同情者。尼采仔细阅读过经济

学家杜林（Eugen Dühring）[①] 的作品。通过阅读原始文献，阅读尼采对杜林日益增强的反犹太人态度的猛烈抨击[54]，阅读杜林的追随者由于把尼采视为犹太人的朋友和事业的支持者而向他发起的猛烈反击，我们终于认识到，认为尼采反犹太人而对其加以攻击是多么的荒谬。

我们建议，现在人们对尼采的理解应该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29 年的版本中，奥斯卡·列维（Oscar Levy，他是被授权翻译尼采作品的英文编辑）讲述了对尼采的理解过程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 “在早期，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反对同情的学说来自于他对健康生活的热爱，对道德的反对，对更高层次的伦理的热爱，以及对爱国主义的反对（他主张统一欧洲）……后来，这个世界才慢慢地开始改变对这位‘反基督教者’的看法，从而感觉到他并非仅仅是‘反对者’，并意识到这位旧的价值观的毁灭者同时也是一位新的价值观的创造者。”（Lery，1929：433）

作为创造者的人类以及人类的智慧和意志，是尼采理论的核心，同时也是所有有用的人类经济进步理论的核心。与文艺复兴的传统一样，尼采认为，创造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是将我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方法：

> “创造——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伟大力量，而且它会使生活越来越轻松。然而，尽管有了创造者，仍然需要有痛苦和巨大的变革。”（Nietzsche，1968a：87）[55]

我们曾经提到过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 年）的著作《西方的衰落》。这本书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知识界的讨论产生过强大影响。该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完成的，与桑巴特的《战争和资本主义》（Krieg und Kapitalismus）在同一年完成。在桑巴特的这本书中，“创造性毁灭”首次进入了经济学。在《西方

---

① 杜林（1833—1921 年）：德国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1867 年在报刊上撰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抨击。其后，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和《哲学教程——严格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等著作，宣扬折中主义的哲学、庸俗的经济学和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译者注

的衰落》这本书的修订版（1939；1922年为第一版）前言中，斯宾格勒这样描述了他所受到的学术影响：

> “最后，我不得不再次说出那些实际上对我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的人：歌德和尼采。歌德告诉我研究的方法，尼采赋予我怀疑的能力。如果有人要我对我和尼采的关系给出一种说法，那么，我认为，我从他的‘观点’（Ausblick）中获得了一种总体看法（Überblick）。但是，人们不知道，在其整体思考方式上，歌德是莱布尼茨的学生。因此，尽管经历了这些年的痛苦和厌恶，我认为，最后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能够骄傲地说，一种德国哲学得以在我手中形成。”（Spengler，1939：Xiv）

我们认为，斯宾格勒在此所描述的是他的学术观点与真正的熊彼特经济学之间的共同点。实际上，如果熊彼特能够像他自己追索其他经济学家学术观点的来源那样熟练地追索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来源，那么，他就会与斯宾格勒有着同样的看法，只不过会再加上桑巴特这个名字而已——正是桑巴特将莱布尼茨、歌德和尼采的思想引入了经济学之中。

注释

1　艾伦·格林斯潘在2001年4月4日和10月24日的发言。

2　'Und ein Gewebe, sollt es ewig sein?

Zerstört's die Magd nicht, reiβt die Spinne es selber ein.'

3　'Als die Welt im tiefsten Grunde

Lag an Gottes ewger Brust

Ordnet er die erste Stunde

Mit erhabner Schöpfungslust

Und er sprach das Wort: Es werde!

Da erklang ein schmerzlich Ach!

Als das All mit Machtgebärde

In die Wirklichkeiten brach'

4　斯潘（Othmar Spann）是另一位十分强调整体性（das Ganze）的经济学家。他的非常畅销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在1929年就已经达到了19版，并在德国销售了95 000册。这本书在英国出版时的书名叫《经济理论的类型》（Types of Economic Theory），在美国出版时的书名叫《经济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Economics）（两者都是1930年出版的）。请注意斯潘的英语版书名与同一年桑巴特的书名（《三种类型的经济学》）之间的相似之处：与目前的情况不同，当时人们普遍意识到存在着几种类型的经济学。

5　参见德雷克斯勒（Drechsler，2002）的讨论，载E. 赖纳特主编（Reinert，E. editor，2002）。

6　'Dass ich erkenne，was die Welt

Im Innersten zusammenhält，

Schau alle Willenskraft and Samen

Und tu'nicht mehr in Worten kramen.'

7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从第2233段及后面的内容中看到。

8　在最初的德文版中没有这个隐喻。

9　在阅读尼采的作品时，会遇到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与生俱来的（他的散乱、夸张、讽刺、好争辩和格言式的风格），有些则是有意造成的（深奥的观点、文学人物的复杂使用、多重的讽刺、极度的夸张等）。尼采的作品绝对不是为"大众"而写的。其他的一些困难来自于人们接纳尼采的观点时遭遇的长期混乱的历史：在尼采精神崩溃之后，他的妹妹像一位权威人物一样控制了他的成果，对他留下的书信和文件进行了篡改和歪曲，使她的哥哥变成了纳粹政权的思想炮灰。但是，甚至在此之前，尼采就已经被可笑地纳入到民族主义理论家的阵营中：外国评论家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尼采似的战争"。这些都是人们在阅读尼采的作品时，必须考虑的问题。然而，尼采对读者最重要的要求是不要立即作出判断，而应该在探究其著作的直接含义的同时，探究那些作为其著作基础的暗藏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读者的反应有可能仅仅只是映照出了每位读者针对其著作而形成的"理论包袱"。人们很容易强烈地反对（或赞同）尼采的观点，但却很难抛开自己的初始反应，并探究其著作产生的复杂环境体系。

10　关于尼采和他妹妹复杂关系的讨论，以及他的妹妹对他的学术名声的影响，还可以参阅彼得斯（Perers，1977）的相关作品。

11 'Immer vernichtet, wer ein Schöpfer sein muß.' (Nietzsche 2000: 6427)

12 'Den, der zerbricht ihre Tafeln der Werte, den Brecher, den Verbrecher-das aber ist der Schaffende' (Nietzsche 2000: 6367)

13 '... im Jasagen ist Verneinen und Vernichten Bedingung'. (Nietzsche 2000: 7884)

14 'Verbrennen mußt du dich wollen in deiner eignen Flamme: wie wolltest du neu werden, wenn du nicht erst Asche geworden bist!' (Nietzsche 2000: 6435).

15 'Neue Werte schaffen-das vermag auch der Löwe noch nicht: aber Freiheit sich schaffen zu neuem Schaffen-das vermag die Macht des Löwen.' (Nietzsche 2000: 6372)

16 'Die großen Verachtenden nämlich sind die großen Verehrenden.' (Nietzsche 2000: 6794)

17 'Neues will der Edle schaffen und eine neue Tugend' (Nietzsche 2000: 6400)

18 '... nicht das ist die Gefahr des Edlen, daß er ein Guter werde, sondern ein Frecher, ein Höhnender, ein Vernichter'. (Nietzsche 2000: 6400).

19 'Und wer ein Schöpfer sein muß im Guten und Bösen: wahrlich, der muß ein Vernichter erst sein und Werte zerbrechen. Also gehört das höchste Böse zur höchsten Güte: diese aber ist die schöpferische.' (Nietzsche 2000: 6520)

20 'Altes will der Gute, und dass Altes erhalten bleibe.' (Nietzsche 2000: 6400)

21 'Das schaffende Selbst schuf sich Achten und Verachten, es schuf sich Lust und Weh. Der schaffende Leib schuf sich den Geist als eine Hand seines Willens.

Noch in eurer Torheit und Verachtung, ihr Verächter des Leibes, dient ihr eurem Selbst. Ich sage euch: euer Selbst selber will sterben und kehrt sich vom Leben ab.

Nicht mehr vermag es das, was es am liebsten will-über sich hinaus zu schaffen. Das will es am liebsten, das ist seine ganze Inbrunst.

Aber zu spät ward es ihm jetzt dafür-so will euer Selbst untergehn, ihr Verächter des Leibes.

Untergehn will euer Selbst, und darum wurdet ihr zu Verächtern des Leibes! Denn nicht mehr vermögt ihr über euch hinaus zu schaffen.' (Nietzsche 2000: 6386)

22 '' Was ist Liebe? Was ist Schöpfung? Was ist Sehnsucht? Was ist Stern?'-so fragt der letzte Mensch und blinzelt.' (Nietzsche 2000: 6357)

23 '... der Wille ist ein Schaffender' (Nietzsche 2000: 6562)

24 'Wollen befreit: denn Wollen ist Schaffen: so lehre ich. Und nur zum Schaffen sollt ihr lernen!'. (Nietzsche 2000: 6663)

25 '... anzeichen einer verzweifelnden sterbensmüden Seele.' (Nietzsche 2000: 6878)

26 'Sagt mir, meine Brüder: was gilt uns als Schlechtes und Schlechtestes? Ist es nicht Entartung? -Und auf Entartung raten wir immer, wo die schenkende Seele fehlt. Aufwärts geht unser Weg, von der Art hinüber zur Über-Art. Aber ein Grauen ist uns der entartende Sinn, welcher spricht: 'Alles für mich'.' (Nietzsche 2000: 6454 ~ 6455)

27 显然，对权力意志存在着众多可能的理解。关于这一概念的历史的初步哲学分析，以及它的各种学术解释，可以参见 Williams (2001)。

28 'Und dies Geheimnis redete das Leben selber zu mir: 'Siehe', sprach es, 'ich bin

das, was sich immer selber überwinden muβ'.' (Nietzsche 2000: 6519)

29 'Alle Wesen bisher schufen etwas über sich hinaus: und ihr wollt die Ebbe dieser groβen Flut sein und lieber noch zum Tiere zurückgehn, als den Menschen überwinden? Was ist der Affe für den Menschen? Ein Gelächter oder eine schmerzliche Scham. Und ebendas soll der Mensch für den Übermenschen sein: ein Gelächter oder eine schmerzliche Scham.' (Nietzsche 2000: 6349)

30 'O meine Brüder, was ich lieben kann am Menschen, das ist, daβ er ein Übergang ist und ein Untergang.' (Nietzsche 2000: 6793 ~ 6794)

31 'Der Mensch muβ besser und böser werden'-so lehre ich.' (Nietzsche 2000: 6795)

32 整段话的德文内容是: 'O meine Brüder! Bei welchen liegt doch die gröβte Gefahr aller Menschen-Zukunft? Ist es nicht bei den Guten und Gerechten? -

-als bei denen, die sprechen und im Herzen fühlen: ≫Wir wissen schon, was gut ist und gerecht, wir haben es auch; wehe denen, die hier noch suchen! ≪

Und was für Schaden auch die Bösen tun mögen: der Schaden der Guten ist der schädlichste Schaden!

Und was für Schaden auch die Welt-Verleumder tun mögen: der Schaden der Guten ist der schädlichste Schaden.

O meine Brüder, den Guten und Gerechten sah einer einmal ins Herz, der da sprach: ≫es sind die Pharisäer≪. Aber man verstand ihn nicht.

Die Guten und Gerechten selber durften ihn nicht verstehen: ihr Geist ist eingefangen in ihr gutes Gewissen. Die Dummheit der Guten ist unergründlich klug.

Das aber ist die Wahrheit: die Guten müssen Pharisäer sein-sie haben keine Wahl!

Die Guten müssen den kreuzigen, der sich seine eigne Tugend erfindet! Das ist die Wahrheit!

Der zweite aber, der ihr Land entdeckte, Land, Herz und Erdreich der Guten und Gerechten: das war, der da fragte: ≫wen hassen sie am meisten? ≪

Den Schaffenden hassen sie am meisten: den, der Tafeln bricht und alte Werte, den Brecher-den heiβen sie Verbrecher.

Die Guten nämlich-die können nicht schaffen: die sind immer der Anfang vom Ende: -

-sie kreuzigen den, der neue Werte auf neue Tafeln schreibt, sie opfern sich die Zukunft-sie kreuzigen alle Menschen-Zukunft!

Die Guten-die waren immer der Anfang vom Ende.' (Nietzsche 2000: 6673 ~ 6674)

33 'Zerbrecht, zerbrecht mir die Guten und Gerechten! -O meine Brüder, verstandet ihr auch dies Wort?' (Nietzsche 2000: 6675)

34 'Der Mensch ist etwas, das überwunden werden soll.' (Nietzsche 2000: 6349)

35 'Euren Feind sollt ihr suchen, euren Krieg sollt ihr führen, und für eure Gedanken! Und wenn euer Gedanke unterliegt, so soll eure Redlichkeit darüber noch Triumph rufen! Ihr sollt den Frieden lieben als Mittel zu neuen Kriegen. Und den kurzen Frieden mehr als den langen.' (Nietzsche 2000: 6406)

36 'Angreifen ist bei mir ein Beweis des Wohlwollens.' (Nietzsche 2000: 7752)

37　'Was mich nicht umbringt, macht mich stärker.' (Nietzsche 2000: 7535).

38　'Das Erdbeben nämlich-das verschüttet viel Brunnen, das schafft viel Verschmachten: das hebt auch innre Kräfte und Heimlichkeiten ans Licht. Das Erdbeben macht neue Quellen offenbar. Im Erdbeben alter Völker brechen neue Quellen aus.' (Nietzsche 2000: 6672)

39　或许出人意料，或许并非如此，在遭到尼采的攻击之后，基督教神学不仅幸存下来了，重新恢复了活力，而且变得更加强大了。目前，神学家们建议授予尼采博士学位。尼采曾经暗地里预测到这一点了吗？

40　'Euer Geist und eure Tugend diene dem Sinn der Erde, meine Brüder: und aller Dinge Wert werde neu von euch gesetzt! Darum sollt ihr Kämpfende sein! Darum sollt ihr Schaffende sein!' (Nietzsche, 2000: 6457)

41　'Tot sind alle Götter: nun wollen wir, daβ der Übermensch lebe' (Nietzsche, 2000: 6460)

42　(我们翻译的《论道德的谱系》中的第二篇论文)：'Dieser Mensch der Zukunft, der uns ebenso vom bisherigen Ideal erlösen wird als von dem, was aus ihm wachsen muβte, vom groβen Ekel, vom Willen zum Nichts, vom Nihilismus, dieser Glockenschlag des Mittags und der groβen Entscheidung, der den Willen wieder frei macht, der der Erde ihr Ziel und dem Menschen seine Hoffnung zurückgibt, dieser Antichrist und Antinihilist, dieser Besieger Gottes und des Nichts-er muβ einst kommen...' (Nietzsche, 2000: 7354)

43　'Der Sonne gleich will auch Zarathustra untergehn: nun sitzt er hier und wartet, alte zerbrochene Tafeln um sich und auch neue Tafeln-halbbeschriebene.' (Nietzsche, 2000: 6651)

44　'Wiederum aber steigt aus der Zerstörung neuer schöpferischer Geist empor; der Mangel an Holz und die Notdurft des täglichen Lebens drängten auf die hin, drängten auf die Auffindung oder die Erfindung von Ersatzstoffen für das Holz hin, drängten zur Nutzung der Steinkohle als Heizmaterial, drängten zur Erfindung des Kokesverfahrens bei der Eisenbereitung. Daβ dieses aber die ganze Groβartig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m 19. Jahrhundert erst möglich gemacht hat, steht für jeden Kundigen auβer Zweifel. Sodaβ auch hier, in diesem entscheidenden Punkte, unsichtbare Fäden die merkantilen und die militaristischen Interessen eng miteinander zu verknüpfen scheinen'.

45　'Ohne auf Sombart und die allgemeine Literatur der zwanziger und dreiβiger Jahre hinzuweisen, bot Schumpeter (in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im wesentlichen nur daβ, was bereits Jahrzehnte zuvor in den deutschen Diskussionen über die 'Zukunft der Kapitalismus' geschrieben und gesagt worden war...'

46　'Die Berechenbarkeit eines Geschehens liegt nicht darin, daβ eine Regel befolgt wurde, oder einer Notwendigkeit gehorcht wurde, oder ein Gesetz von Kausalität von uns in jedes Geschehen projiziert wurde-: sie liegt in der Wiederkehr 'identischer Fälle'.'

47　斯坦福大学将这本书名译作"过时的评论"(Unfashionable Observations)。

48　'Aber die Wissenschaft und gerade auf die Geisteswissenschaft soll doch 'dem Leben dienen'. Das ist die Anforderung, die heute jeder stellen wird, nachdem vor ein paar Menschenaltern Nietzsches Mahnruf erklungen ist [Sombart's footnote reads:' die heute immer noch zeitgemäβ ist'], den wir alle im Tiefsten unserer Seele für berechtigt halten und der heute mehr

denn je am Platz ist. Wir wollen keine Stubengelehrsamkeit, keine Antiquitätenkrämerei, kein 'totes' Wissen.'

49　'Der Verkehr mit der Wissenschaft, wenn er durch keine höhere Maxime der Erziehung geleitet und eingeschränkt, sondern, nach dem Grundsatze≫je mehr desto besser≪nur immer mehr entfesselt wird, ist gewiβ für die Gelehrten ebenso schädlich, wie der ökonomische Lehrsatz des laisser faire für die Sittlichkeit ganzer Völker'. (Nietzsche 2000: 4008)

50　德文的原话如下：'Wer ist nicht fast im voraus überzeugt, daβ ihre Prämissen eine wunderbare Mischung von Wahrheit und Irrtum enthalten und es daher nicht der Mühe verlohnt, über die Konsequenzen nachzudenken? Das fertig Abgeschlossne dieser Systeme zieht vielleicht die Jugend an und macht auf die Unerfahrnen Eindruck, aber ausgebildete Menschen lassen sich nicht davon blenden. Sie sind immer bereit, Andeutungen und Vermutungen günstig aufzunehmen, und die kleinste Wahrheit ist ihnen willkommen-aber ein groβes Buch voll deduktiver Philosophie fordert den Argwohn heraus. Zahllose unbewiesene abstrakte Prinzipien sind von sanguinischen Leuten hastig gesammelt und in Büchern und Theorien sorgfältig in die Länge gezogen worden, um mit ihnen die ganze Welt zu erklären. Aber die Welt kümmert sich nicht um diese Abstraktionen, und das ist kein Wunder, da diese sich untereinander widersprechen.' (Nietzsche 2000: 4124～4125)

51　(我们对《论道德的谱系》的翻译)：'Hüten wir uns nämlich, meine Herren Philosophen, von nun an besser vor der gefährlichen alten Begriffs-Fabelei, welche ein 'reines, willenloses, schmerzloses, zeitloses Subjekt der Erkenntnis' angesetzt hat, hüten wir uns vor den Fangarmen solcher kontradiktorischer Begriffe wie 'reine Vernunft', 'absolute Geistigkeit', 'Erkenntnis an sich'; -hier wird immer ein Auge zu denken verlangt, das gar nicht gedacht werden kann, ein Auge, das durchaus keine Richtung haben soll, bei dem die aktiven und interpretierenden Kräfte unterbunden sein sollen, fehlen sollen, durch die doch Sehen erst ein Etwas-Sehen wird, hier wird also immer ein Widersinn und Unbegriff vom Auge verlangt. Es gibt nur ein perspektivisches Sehen, nur ein perspektivisches 'Erkennen'; und je mehr Affekte wir über eine Sache zu Worte kommen lassen, je mehr Augen, verschiedne Augen wir uns für dieselbe Sache einzusetzen wissen, um so vollständiger wird unser 'Begriff' dieser Sache, unsre 'Objektivität' sein. Den Willen aber überhaupt eliminieren, die Affekte samt und sonders aushängen, gesetzt, daβ wir dies vermöchten: wie? hieβe das nicht den Intellekt kastrieren?' (Nietzsche, 2000: 7394～7395)。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考夫曼 (Kaufmann) 的翻译如何经常使得尼采更为"仁慈"："Fangarme" 被译成了"陷阱" (trap)，而不是"束缚" (tentacles)。

52　'Nietzsche hat bei den Engländern die, wie er meinte, prototypische Moral und Politik der Krämer und Händler vorgefunden, das Rechnen und Berechnen, Kalkulieren und Taxieren nicht nur als Schlüssel zur Welt des Geschäfts, sondern auch zur Welt der Moral und Politik. Was ihn daran störte, ja empörte, war das Übergreifen tauschnotwendiger Gleichheit und ökonomischen Taxierens auf Bereiche des Lebens, die solcher Logik der Äquivalenz gerade nicht gehorchen sollten.'

53　('Ü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βermoralischen Sinn', our translation): 'Denken wir besonders noch an die Bildung der Begriffe. Jedes Wort wird sofort dadurch Begriff, daβ es

eben nicht für das einmalige ganz und gar individualisierte Urerlebnis, dem es sein Entstehen verdankt, etwa als Erinnerung dienen soll, sondern zugleich für zahllose, mehr oder weniger ähnliche, das heißt streng genommen niemals gleiche, also auf lauter ungleiche Fälle passen muß. Jeder Begriff entsteht durch Gleichsetzen des Nichtgleichen. So gewiß nie ein Blatt einem andern ganz gleich ist, so gewiß ist der Begriff Blatt durch beliebiges Fallenlassen dieser individuellen Verschiedenheiten, durch ein Vergessen des Unterscheidenden gebildet und erweckt nun die Vorstellung, als ob es in der Natur außer den Blättern etwas gäbe, das≫Blatt≪wäre, etwa eine Urform, nach der alle Blätter gewebt, gezeichnet, abgezirkelt, gefärbt, gekräuselt, bemalt wären, aber von ungeschickten Händen, so daß kein Exemplar korrekt und zuverlässig als treues Abbild der Urform ausgefallen wäre. Wir nennen einen Menschen≫ehrlich≪; warum hat er heute so ehrlich gehandelt? fragen wir. Unsere Antwort pflegt zu lauten: seiner Ehrlichkeit wegen. Die Ehrlichkeit! Das heißt wieder: das Blatt ist die Ursache der Blätter. Wir wissen ja gar nichts von einer wesenhaften Qualität, die≫die Ehrlichkeit≪hieße, wohl aber von zahlreichen individualisierten, somit ungleichen Handlungen, die wir durch Weglassen des Ungleichen gleichsetzen und jetzt als ehrliche Handlungen bezeichnen; zuletzt formulieren wir aus ihnen eine qualitas occulta mit dem Namen:≫die Ehrlichkeit≪. Das Übersehen des Individuellen und Wirklichen gibt uns den Begriff, wie es uns auch die Form gibt, wohingegen die Natur keine Formen und Begriffe, also auch keine Gattungen kennt, sondern nur ein für uns unzugängliches und undefinierbares X. Denn auch unser Gegensatz von Individuum und Gattung ist anthropomorphisch und entstammt nicht dem Wesen der Dinge, wenn wir auch nicht zu sagen wagen, daß er ihm nicht entspricht: das wäre nämlich eine dogmatische Behauptung und als solche ebenso unerweislich wie ihr Gegenteil. Was ist also Wahrheit? Ein bewegliches Heer von Metaphern, Metonymien, Anthropomorphismen, kurz eine Summe von menschlichen Relationen, die, poetisch und rhetorisch gesteigert, übertragen, geschmückt wurden und die nach langem Gebrauch einem Volke fest, kanonisch und verbindlich dünken: die Wahrheiten sind Illusionen, von denen man vergessen hat, daß sie welche sind, Metaphern, die abgenutzt und sinnlich kraftlos geworden sind, Münzen, die ihr Bild verloren haben und nun als Metall, nicht mehr als Münzen, in Betracht kommen.'（Nietzsche 2000：8591～8592）

54　除此之外，尼采还将杜林描述成：'jenen Berliner Rache-Apostel Eugen Dühring, der im heutigen Deutschland den unanständigsten und widerlichsten Gebrauch vom moralischen Bumbum macht: Dühring, das erste Moral-Großmaul, das es jetzt gibt, selbst noch unter seinesgleichen, den Antisemiten.'（Nietzsche, 2000：7402）

55　'Schaffen-das ist die große Erlösung vom Leiden, und des Lebens Leichtwerden. Aber daß der Schaffende sei, dazu selber tut Leid not und viel Verwandelung'.（Nietzsche, 2000：6468）

参考文献

Appel, M., 1992, Werner Sombart. Theoretiker und Historiker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Marburg: Metropolis.

Backhaus, J. (editor), 1996,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Social Scientist, Marburg: Metropolis, 3 vols.

Buchanan, J., 1979, 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Burckhardt, J., 1979, Reflections on History,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Drechsler, W., 2002, 'Natural vs. Social Sciences: On Understanding in Economics', in Reinert E. (edit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come Inequality, Cheltenham: Elgar.

Freeman, C. & Louca, F., 2001,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berler, G., 1950,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LXIV, No. 3, August 1950, pp. 333 ~ 372.

Hegel, G. W. F., 1953, Reason in History-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Herder, J. G., 1781, Vom Einfluss der Regierung auf die Wissenschaften, und der Wissenschaften auf die Regierung, Berlin: Decker 1790—1792,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Karlsruhe: Schmieder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 9, Nos. 1 ~ 2, April—August 2002, Special Issue: Schumpeter's "Lost" Seventh Chapter, J. A. Mathews, editor.

Kantzenbach, F., 1970,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Hamburg: Rowohlt.

Lenger, F., 1994,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eine Biographie, Munich: Beck.

Levy, O., 1929,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entry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ition vol. 16, Lond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Company.

Lilla, M., 1993, G. B. Vico. The Making of an Anti-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ietzsche, F., 1968a,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lated by W. Kaufman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8b, Twilight of the Idols, (translated by R. Hollingdal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translated by C. Dieth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Unfashionable observations, (translated by R. Gr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Digitale Bibliothek Band 31: Nietzsche, Berlin: Directmedia (CD-ROM).

Noble, D. F., 1997, The Religion of Technology. The Divinity of Man and the Spirit of Invention, New York: Knopf.

Ottmann, H., 1987, Philosophie und Politik bei Nietzsche, Berlin: de Gruyter.

Pareto, V., 1916, Tratta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 Florence: G. Barbèra, 2 volumes. (English edition The Mind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5).

Parkes, G., 1991, Nietzsche and Asian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rez, C., 2002,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heltenham: Elgar 2003,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Paradigm Shifts, And Socio-Institutional Change', in Reinert E. (edit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come Inequality, Cheltenham: Elgar.

Peters, H. F., 1977, Zarathustra's Sister: The Case of Elisabeth and Friedrich Nietzsche, York: Crown Publishers.

Rand, A., 1957, Atlas Shrugg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Reinert, E, 1995,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predecessors-a 500 year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 6 2000, 'Karl Bücher and the Geographical Dimensions of Techno-Economic Change', in Backhaus, Jürgen, (editor) Karl Bücher: Theory-History-Anthropology-Non Market Economies, Marburg: Metropolis. 2002, 'Schumpeter in the Context of two Canons of Economic Thought', in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 6, No. 1. 2003 (edit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come Inequality, Cheltenham: Elgar.

Reinert, E. & Daastøl, A., 1997 '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Economic Innovations: The religious gestalt-switch and the duty to invent as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 No. 2/3, 1997, and in Christian Wolff. Gesammelte Werke, Materialien und Dokumente,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1998.

Santarelli, E. and Pesciarelli, E., 1990, 'The Emergence of a Vision: The Development of Schumpeter's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Vol. 22, Winter 1990, no. 4.

Schacht, R., 1994, Nietzsche, Genealogy, Moral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ionoya, Y., 1997,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edition, Tokyo 1995).

Schumpeter, J. A., 1908, Das Wesen und der Haupte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2,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4, Epochen der Dogmen-und Methodengeschichte, Tübingen: Mohr.

——1939,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McGraw-Hill, 2 volumes.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Sokel, W., 1959, The Writer in Extrem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ombart, W., 1913, Krieg und Kapitalismus,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2/1927,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München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5, Händler und Helden, München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30, 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 München &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Spann, O, 1930, Types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Allen & Unwin, published in the US a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New York: Norton.

Spengler, O., 1939,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wedberg, R., 1991, Schumpeter. 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ico, G., 1984, The New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L. L., 2001, Nietzsche's Mirror: The World as Will to Power,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第二十章　卡尔·比切尔与技术经济变迁的地理学维度[1]：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

埃里克·S. 赖纳特

"每次探究人类社会的活动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因此，当生存方式改变时，人类的法律和政策也一定发生了变化。"

——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 年），《美洲历史》（1777 年）

1. 阶段论思想——从塔西佗到卡尔·比切尔和卡罗特·佩雷斯

据说，历史的诞生是为了防止所有的事件同时发生。历史意味着事件是按顺序发生的。阶段论试图按不同的标准将历史组织成一系列的阶段。一般的阶段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是生存方式**，即一个社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何种手段生产。作为一种工具，阶段论既可以用来研究劳动分工的演变过程这种质的变化，也可以用来研究伴随这种质的变化而产生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转变过程。阶段论研究的领域是人类知识在某一时间的集中状况，因此，这种理论是从本质上理解技术经济变化过程和收入不平等过程的基础。

大多数社会科学中都使用了阶段论。在历史学领域，人类制造工具的材料（比如石头或青铜）被广泛认为是确定早期历史阶

① 原载 Backhaus, Jürgen, (editor) Karl Bücher: Theory-History-Anthropology-Non-Market Economies, Marburg, Metropolis Verlag, 2000, pp. 177 ~ 222. ——译者注

段——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基础。除了选择**技术变量**之外，也可以使用其他标准（比如以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划分阶段。不只是在历史学领域，而且在人类学中早已存在这样的观点：技术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对灌溉和中央集权的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典例子。在政治学中，人类发展阶段的思想是随着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对共和国的研究而与这门学科同时诞生的。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学起源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①，那么，这门学科刚开始时就已经包含了阶段论思想。在经济学中，阶段论既是法国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杜尔哥②（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年）理论的核心，也是亚当·斯密（1723—1790年）学说的核心。在论述早期（1750—1800年）的阶段论时，米克（Ronald Meek）不遗余力地阐述了下列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讲……18世纪伟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实际上来自于四种阶段论"[1]。尽管如此，现在任何经济阶段论都在经济学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而且几乎被排斥在外了。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与经济学相关的阶段论，并且从理解人类福利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作用。

阶段论思想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人们阅读塔西佗（Tacitus，55？—117年之后）③的《日耳曼志》时，会感受到这样的观点："德国不同部落之间相对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农业和畜牧业（而不是狩猎活动）在其生存方式中所占优势的大小。"[2]阶段观念来自于循环观念（这是政治学史中的一个古老思想）。权威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年）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年）都很重视循环论。作为文艺复兴的开拓者之一的让·博丹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历史循环具有累积向上的趋势，即进步的思想。在博丹看来，发展阶段的思想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乐观主义精神。与此同时，博丹还对新生的民族国家（共和国）以及这些国家的制度、法律和税收等进行了

① 孔德：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等。——译者注

② 杜尔哥：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重农主义者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译者注

③ 塔西佗：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史》。——译者注

探讨。

在探讨全球各地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时，博丹着重强调了地理和气候条件，而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 年）却在他的《新工具》中给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培根认为："这种差别并非来自于土壤、气候和种族，而是来自于技术。"[3]或许，培根才真的是我们所说的以生产和具体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福利理论的奠基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培根的思想——一个民族的物质条件由其技术（即所从事的职业）来决定——是 19 世纪德国和北美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与英国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说，在启蒙运动时期，尤其是在 1750—1800 年间，阶段论处在一个核心的位置——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在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地域扩展时期（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阶段论再次成为经济学家的分析手段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当时，可以看到的一些根本性变化使人们明显地感觉到，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本质上不同于以前的历史时期。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诞生的阶段论（18 世纪 50 年代杜尔哥的理论和亚当·斯密早期的理论）认为：人类首先是猎人和采集者，然后开始驯养动物，成为农民，最后才进入了商业阶段。重要的一点在于，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习惯于将自己的分析集中于商业这个最后的演化阶段（集中于供给、需求和价格），而不是集中于生产。19 世纪时，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坚持对发展阶段持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以前的各个阶段都是以商品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因此，他们认为，以商业而不是生产为标准来对后来的发展阶段进行分类的做法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从本质上讲，这种理论上的差别，构成了 19 世纪德国和美国经济政策与英国经济政策不同的基础。

英国的阶段论（18 世纪）（亚当·斯密）	德国和美国的阶段论（19 世纪）（李斯特和伊利）
（1）狩猎时代	（1）狩猎时代
（2）畜牧时代	（2）畜牧时代
（3）农业时代	（3）农业时代
（4）商业时代	（4）农业和制造业时代

这种阶段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问题。哥伦布之前北美的人口（主要是狩猎者和采集者）数估计为 100 ~

200 万，而哥伦布之前安第斯的人口（他们已进入农业阶段）数为 1 200 万。明显不适宜居住的安第斯地区的人口密度是丰饶的大草原地区人口密度的 30～60 倍。只有引入了技术变量之后，可持续性的概念才有意义。

由于分析的焦点是贸易和商业而不是生产，因此英国经济理论以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慢慢地就把所有经济活动看成了性质相同的东西。从本质上讲，后来被纳入到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传统的生产理论（即如今的正统理论）将生产看成了一种十分机械的过程，即在劳动基础上加上资本——就好比给相同环境下生长的同类植物浇水一样。这种理论传统没有考虑到技术状况如何影响某一时刻不同生产活动（资本与劳动结合的潜在盈利方式）所具有的潜能。正统经济理论还完全忽视了在给植物浇水（将资本加入劳动）过程中的“土壤”，即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政治和制度环境。正统经济理论既没有考虑某一时刻技术变革的明显聚集现象，也没有考虑这种聚集效应所导致的各种不同经济活动在“机会窗口”方面的巨大差别，以及这种过程产生的环境。我们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的这个盲点是我们无法解决全球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古典、新古典和如今的正统经济学，都与德国和美国的传统理论（它一直持续到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1985 年）的理论为止——其中包括库兹涅茨的理论）完全相反。后者将经济增长看成是与特定经济活动相关的，即不同经济活动创造财富的潜能是有巨大差别的。在这种背景下，阶段论成为了一种聚焦手段（focusing devise），它突出了某一时刻人类活动中的知识聚集领域，反映了人类知识的边界位置。

1949 年，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正统假设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国际贸易将使得全球的工资均等化（要素价格均等化）。在德国和美国的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理论中，一个专门从事畜牧业的社会与一个专门从事先进工业生产的社会之间的工资均等化是一个荒谬的论断。由于其理论核心建立在交换而不是生产的基础之上，因此，新古典理论创造出了一种和声学（Harmonielehre）——不管各国专门从事哪种经济活动，自由贸易都将自动地使全球的工资均等化。我们认为，无论怎样强调 17 世纪后期经济理论分裂（它是由于对人类演化过程中后一阶段的理解不同

造成的）的重要性都不算过分。对下一阶段看法的不同——商业时代导致了以交换为基础的理论，而农业和制造业时代导致了以生产为基础的理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在经济发展和福利的原因方面完全不同的观点。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职业选择仍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要大于地理、气候、种族和宗教等因素。居住在挪威的一位坦桑尼亚农业经济学家最近告诉我说，他发现坦桑尼亚部落（他们以畜牧业为生）和挪威拉普人（Lapps）（他们以喂养驯鹿为生）的生活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秘鲁首都利马的股票经纪商的生活方式，更类似于纽约的股票经纪商，而与本国的收获甘蔗的工人的生活方式相差较远。然而，经济生活中这种与特定经济活动相关的特点，在如今的经济理论中完全消失了。如今的世界经济秩序完全以下列假设为基础：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里，收获甘蔗的国家与提供股票经纪服务的国家一样富有。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忘记培根的见解是我们无法理解全球财富分配不公的原因。换句话讲，我们之所以不能理解收入不平等，其核心在于不能完全理解生产。

从韦伯的观点来看，阶段论是“理想类型”。按照卡尔多的说法，每个阶段都由与某一社会形态相关的众多“典型化事实（stylised facts）”所组成。当然，很难确定各阶段之间固定的转折点。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转折点同样很难确定，但是，人们并不会认为这个问题将使得“儿童”和“老年”这些概念失去作用。阶段论并非铁的规律，而且也不存在使一国从某个阶段进入下一阶段的自动机制。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保守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工业社会在全球的扩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过去的 50 年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一体系中，不仅不存在自动的晋级和提升，而且始终存在着降级或“掉队”的可能性。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历史顺序：在驯养动物之前，美洲某些印第安部落的妇女就已经开始在其住所周围种植玉米了。记住阶段论的所有这些局限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次把它作为经济理论的分析工具了。

理解各经济阶段之间的本质差别（技术和财富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社会收入的分配、设计以及实施恰当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机制的必要前提。熊彼特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认为，阶段论是“一种简便的理解手段，它可以被很好地用来教导初学者（或公众）这样一个

道理：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不能由一套固定不变的方法组成。”[4]但是，熊彼特并不十分赞成使用阶段论，这或许是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阶段论和“生产方式”的理论都只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

如今，世界经济正在从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转向以信息技术为标准（它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组织常识）的社会。佩雷斯（Carlota Perez）和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利用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对李斯特和伊利所称的制造业阶段进行了分析。相反，人们也可以认为，具有非物质化消费特点的新生信息社会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人类历史阶段，即第五阶段。在189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的形成》中，卡尔·比切尔（Karl Bücher）论述了这种转变（全球化）的地域特征。

2. 发展阶段、后现代社会与经济理论中的“和谐”

因此，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似乎需要一种更广阔的视野，需要从本质上和动态地理解“一些更大的问题”。在历史领域，目前的范式转换又唤醒了人们对“全球历史”的兴趣。尽管全球历史的想法很容易被人们排除在深入的文献研究之外，但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长时期的历史就成为了一个专业传统，而且，至今仍然与历史学家使用的手段是一致的。在19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学领域的经济阶段论也被看成是“经济分析手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5]

然而，如今的正统理论认为，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中，阶段论的三个关键性特征都遭到了重创，即新古典理论显然使得时间、空间（地理）和人类知识这三个因素消失了。在如今的经济学中，阶段论再也不能像在历史领域那样与其融合在一起了。正统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定量的、静态的和非历史性的。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它提出了19世纪的阶段论）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就消亡了。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指出了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英国古典学派是如何以及何时通过不再以生产为标准划分发展阶段，而使自己从以前的经济学传统以及19世纪美国和德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中分离出来的。我们认为，这种分裂对于理解如今的经济“领先”国和“滞后”国非常重要。

阶段论通常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产物。它们都是与所有社会科学相关的一种动态的、整体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观点的产

物。阶段论属于动态的和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比如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和德国的莱布尼茨）都是现代主义者。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新古典传统阶段论正好相反，因为他们的理论不仅没有包括时间因素（因此也没有包括任何历史顺序），而且也没有包括经验事实[6]。

与现代主义者的动态理论及其累积的、进步的、倒退的或周期性的“阶段”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包含知识和创新，因此，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特征[7]。新古典经济学利用其众多的均衡点展示了一种不确定和“无法确定”的特征，而这通常也是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特征——比如斯泰因（Gertrude Stein）① 和庞德（Ezra Pound）② 的诗歌[8]。与后现代主义者的诗歌一样，新古典世界观似乎描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创新已不再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9]。当其极端的静态判断和确定性观点（比如要素价格的均等化）遭到质疑时，今天的正统经济学家一般会退回到相反的立场，即退回到极其复杂和混乱的不确定性理论中去。正统经济理论从预测和证明普遍自动和谐的要素均等化理论这一庇护所（罗宾斯（Lionel Robbins）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为一种“和声学”[10]）退回到了另一极端，即一种完全缺乏预测能力的模型。换句话讲，现代经济学倾向于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看成是性质上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的。一些中间层次的抽象（在此，“某些经济活动比其他的更为相似”[11]）所提供的线索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的收入分配，但这些东西显然都被排除了。

如今，“看不见的手”等同于下列说法：“经济就好比是天气”，或者飓风和地震。[12]这两种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一方面是“看不见的手”所带来的自动和谐和可预测性，另一方面是天气所带来的各种混乱和复杂性。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对隐喻导致了相同的政策结论：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都只能

① 斯泰因（1874—1946年）：美国女作家，生于匹茨堡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曾在加州、欧洲、莱德克利夫女校（与哈佛为邻）及巴尔的摩城约翰霍金斯大学读书。1902年辍学后随兄定居巴黎。她的主要著作有《地理与戏剧》、《毕加索》、《法国巴黎》和《我见过的战争》等。——译者注

② 庞德（1885—1972年）：美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面具》（1909）、《反击》（1912）、《献祭》（1916）、《休·西尔文·毛伯莱》（1920）和《诗章》（1917—1959）等。——译者注

任凭某种无法控制的力量摆布。无论是在看不见的手这种情况下，还是在飓风和地震的情况下，人类的意志、技术、知识、直觉和领导才能，都几乎无法影响历史的进程。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以及克鲁格曼关于经济像天气的隐喻具有共同的核心：人类被“上帝”的手所掌控——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① 在一本有趣的书中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13]

与这种策略（即被动的人类受到外在力量——无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天气因素——的控制）相反的是阶段论。这种理论认为，历史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人类计划执行的结果”[14]。这与克鲁格曼对大萧条的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许多的繁荣和萧条都没有明显的外在原因。很明显，所有经济萧条（包括1929—1933年的大萧条）似乎都是从天而降的，就好比飓风一样。”克鲁格曼的另一个隐喻（如果的确存在一种“典型的衰退”的话）是：“衰退更像地震，而不像飓风。”[15]看起来，克鲁格曼认为，经济萧条就像地震或飓风一样，不受人类的影响。与斯密看不见的手一样，在克鲁格曼的世界观中，人类又被看成是受文艺复兴前的“上帝”或“信仰”所控制的。

把新古典经济学看成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新的观点。在麦克洛斯基（McClokey）看来，弗里德曼1953年的论文“就是后现代主义的，这对于只要稍稍熟悉其论文内容的人来说，再明显不过了”[16]。此外，正如另一位作者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经济学的内在特征。”[17]后现代主义和正统经济学，看上去的确都具有静态“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与经济学历史学派的累积动态特征正好相反。克鲁格曼最近的新书正在使经济学进入一种动态的不确定性。如今的“后现代主义”正统经济学与“现代主义”历史学派之间对立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两者分别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18]正统经济理论是启蒙运动时期机械的和定量的世界观的产物。此时的理性导致了不确定性，而且在缺乏创新性的情况下，这种理性“将最终使我们成为规则的奴隶”[19]。另一方面，阶段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此时，新的思想、知识和领导才能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并且像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过程那样，不断地

① 维纳（1892—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鼻祖之一。在成本与生产理论、国际经济学及经济史等方面有重大贡献。——译者注

对系统和阶段进行构建和毁灭。

阶段论是典型的德国经济理论的产物。[20]它属于维尔纳·桑巴特所称的理解的（verstehende）经济理论的类型（Sombart，1929），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又把其称为有鉴赏力的经济学（appreciative economics），这种经济学与有关秩序的经济理论相对立。德国经济理论不仅在德国有影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对美国的经济学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阶段论是根据下述观点而构建起来的：事物的最初是一个“整体”。该理论诞生时，人们仍然认为现实显然是由相互联系的学科构成的，而且人们还没有开始把对周围世界的研究分割为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之间极少交流）。以这种整体的观点来对待经济学时，任何看上去与经济学相关的东西（无论某一特定的事实严格来说属于哪一个学术圈子），都是该领域的一部分。比如，如果在某一时期和某一地点，人们认为营养对经济增长很重要，那么，相关的营养理论很显然就成为了经济学的一部分。正如如今的经济哲学家所承认的，这种对本质的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学中消失了——“科学主义损害了人们的理解能力”[21]。

阶段论以及传统的德国经济学一般也把钱德勒①（Alfred Chandler）[22]1990年企业经济学地图中的范围和规模效应纳入到了自己的体系内。从本质上讲，阶段论属于非均衡的经济学理论。它们本质上反映了历史上人类知识（及创新）累积增长的各种特征及其对劳动分工和经济的规模、范围和地理等因素的影响。

或许，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阶段论都是对历史的经济解释，尽管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它们并非全部是对历史的唯物解释。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对历史的经济解释做出了如下定义：“我们懂得，对历史的经济解释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历史都可以仅凭经济来得到解释，而是意味着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一些社会因素，而且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因素。对历史的经济解释并非意味着只有经济关系才对历史产生影响，而是意味着经济关系对社会进步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3]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关注的是经济阶段的某一特定方面——社会阶

① 钱德勒：哈佛大学教授，商业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战略与结构》、《看得见之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等。——译者注

层之间的冲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只是阶段论中所分析的众多因素当中的一个。

我们自己倾向于持有如下观点：经过100多年的无情斗争（两种非常奇怪和徒劳的理论视角之间的斗争——将来人们无疑会这样来看问题），从总体上看，现在的经济学领域以及政治发展处于一种停滞状态。第一套理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正统理论”。由于它本质上以交换为基础，因此，创造出了一种静态的和声学——一种社会和经济自动和谐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模型中，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一样的，全世界所有工薪阶层都将一样的富有。另一套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集中关注的是各个经济阶段的某一特殊方面，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斗争以及社会和经济固有的无法和谐——除非进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假设阶段之后。在19世纪，第三套经济理论声称，社会不公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经济制度，而在于干预所有经济过程的政治、社会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已有的产权关系以及随后的阶级斗争被看成是历史和政治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生产方式本身自动带来的结果。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可以创造出社会和经济的和谐，但这需要有意识地设计出经济制度、贸易政策和巧妙的收入分配机制。第三种经济理论（现在已经消亡）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凯里（Henry Carey）、德国的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杜林（Eugen Dühring）。他们的观点与佩雷斯对当今的社会挑战（世界经济正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发展阶段转向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阶段）作出的解释是一致的。[24]

作为19世纪的另一种经济理论，“第三条道路”（它拒绝接受英国古典经济学、盎格鲁—撒克逊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已经非常少见了。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在一场冲突中，首先牺牲的就是一些温和改革派，因为它们会受到两方面的攻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是这样的一种猛烈攻击——它攻击的是企图使资本主义成为公正和平等社会的一套理论。杜林（他十分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标，但却不同意他们的方法）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仍然存在于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中，但非常遗憾的是，社会民主的经济理论大部分都变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这使得我们完全无法将实用的社会民主输送到第三世界——经济学领域并不了解政治上“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根源。

3. 以人类为中心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核心的人类及其需要

比切尔的著作《国民经济的形成》论述的是经济阶段的地理特征。这本书是围绕同一主题的一本论文集，它于1893年首次出版。在其回忆录中，比切尔明确地表示他不喜欢长篇巨著，而更喜欢简短的论文。在他的作品远未完成之前，出版商就开始为其作品排版了。此外，比切尔告诉我们，当排版的速度正要赶上他的写作时，他便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如果出版商要求开始排版之前所有的文稿必须完成”，他在其回忆录中说，“那么，我这一辈子出版的作品中，可能有一半都无法产生。”[25]文学史学家同样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尽快出书，出版商的催促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写作速度。

《国民经济的形成》中的第三章（这是他介绍阶段论的核心章节）写到了比切尔1885年在巴塞尔大学的演讲（p. V）。这个单行本一共印刷了10次，其重印的年份分别为1897年、1900年、1904年、1906年、1908年、1909年、1911年、1913年和1917年。1918年第11次印刷时，又增加了一卷文选，两卷用的是相同的名字。第二卷（它的出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似乎重新引发了人们对第一卷的兴趣，因为第一卷在1919年上半年的第十二和十三版中又印刷了两次。[26]这本书的英文版于1901年以《产业演化》为名在美国纽约出版，1904年以《工业社会》为名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出版。

从其核心内容来看，比切尔的《国民经济的形成》是一本反映德国传统的古典著作。从本质上看，这本书与如今正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在如今的“地球村”占支配地位的一种经济学）所代表的世界观截然相反。尽管如今的公共舆论越来越关注如何维持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人们反对克隆），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关注经济理论多样性的缺乏。在关于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方面，如今几乎所有现存于世的经济学家们都是按照一种思维方式克隆出来的——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卡尔·比切尔和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理论的思维方式。在此，我们将把比切尔的经济学理论与如今的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学进行简要的对照。

首先，该书的名称《国民经济的形成》就是对当时英国经济学的一种冒犯。（即使在今天，玛格丽特·撒切尔还在说，“并不存在社会这样的事物”。）在德国的经济学中，国民经济是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但是，正如李斯特所说的，英国经济学是世界主义政治经

济学。决定民族国家地位的因素，一般都被英国经济理论、后来的新古典理论以及如今的正统理论忽略了。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在所有参与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之间创造出了（按罗宾斯贴切的话来讲）一种自动的和声学。新古典理论创造社会和谐的一种基本方法就是，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经济发展的载体。这就是布坎南（Buchanan）所说的等同性假设（the equality assumption）。如果没有这种假设，主流经济学就将丧失其分析能力。与所有的阶段论一样，比切尔的理论属于一种不同层次（较低）的抽象。比切尔的理论是结合实际的——更接近现实。他瞧不起理论经济学中那些他所认为的陈旧的学院真理。[27]

其次，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国经济学家们经常指出的，英国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交换理论，而不是一种生产理论。[28]很早的时候，亚当·斯密就在其《国富论》中，把“人类对交换的偏好”看成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29]在这一点上，比切尔与斯密存在着明确的不同：“原始人类并非天生喜欢交换，相反，他们反对交换。”比切尔说，在古老的语言中，交换和欺骗这两个动词是同一个意思。众多证据表明，在许多古老的文化中，贸易是一种地位极其低下的职业。一位拜占庭皇帝在发现自己的妻子拥有一艘从事粮食贸易的船只之后，派人将整艘船连同其货物一起烧掉了，以表示自己要尽可能地远离这种“粗俗”的业务。[30]可以想像，由于没有标准的价值计量方法，在早期的交易中人们很有可能受到欺骗。人类学对贸易的研究表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一种稳定的价值联系，比如“一只绵羊交换一袋土豆”。然而，比切尔说，屠能（von Thünen）这位德国经济学家的《孤立国》是从交换经济的假设开始的。[31]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在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著书立说的德国经济学家有许多，但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学和地理学论文中只引述了屠能这一位德国经济学家。

这样，亚当·斯密认为，“最初存在着交换和市场”，而比切尔则认为，“最初存在着生产和社会关系”。对比切尔而言（以及后来的博兰尼（Karl Polanyi）[32]而言——他从比切尔那儿得到了启发），在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生产和消费过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交换这一概念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已经指出的，我们认为，对生产的忽视（以及上面所讨论过的等同性假设）是盎格鲁—撒克逊

经济学的和谐理论（比如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正统经济理论忽视了：（a）不同的生产过程吸纳新知识的能力的差别；（b）这种新知识创造出的历史性的报酬递增。因此，它给那些从事新阶段或新范式经济活动的国家带来了一种“国家租金”。

再次，在沃尔夫之后，另一个在德国传统中占有稳固地位的人就是比切尔。在这种传统中，人类及其需求是经济理论的核心。这与以经济人效用最大化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英国经济理论截然相反。比切尔对国民经济的定义，同时也包含了经济生活中的所有制度因素。这一定义明确地告诉我们（下面是本人大致的翻译）：“国民经济是满足一国需求的制度、措施和方法的总和。”（Die Gesamtheit der Veranstaltungen, Einrichtungen und Vorgänge, welche die Bedürfnisbefriedigung eines ganzen Volkes hervorruft, bildet die Volkswirtschaft）[33]显然，建立在国家的制度、措施和方法上的政策和法律，都是比切尔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核心。这样，最近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正好与比切尔的国民经济概念相适应。

正是这第三点区别，使得我们将德国的古典经济学称为以人类为中心的经济学，以区别于以交换和资本为中心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人类一般被简化成了一种生产要素——一种投入。在德国的传统中，满足人类这种生产要素的需要是经济学发挥作用的总体目标，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人类这种生产要素的回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4. 阶段论与经济发展：概述

4.1　早期理论——从循环论到阶段论

当我们试图在时间概念中加入次序的时候，显然就会想到历史年代的排列顺序。依据统治者来排序似乎是一种“自然的”体系。自从《圣经》开始，人们就想到了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性质不同的时期或阶段。人类的第一个阶段是天堂，随后是另外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人类只能凭借“自己辛勤的汗水”来生活（Genesis 3，19）。在这种最早的“阶段论”中，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时，不会自然发生改进，实际上，本质上还会退步。只有在世上最后的生存阶段，人类才再一次努力去获取第一阶段被迫失去的品质。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性质不同的阶段的

想法，实质上来自于进步这种观念本身，来自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再生）思想本身就是由于敏锐地意识到退化而产生的结果：与以前的成就相比，人类已经“落后了”，但是，如果能够构建一种激励和管理人类创造力的社会制度，那么，人类将能够“稳步前进”。法国的让·博丹（1530—1596 年）和荷兰的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 年）① 这两位律师都拥有同一种历史观，他们都强调，不同历史时期的劳动分工是在不断变化的。[34]正如比切尔指出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发生在家庭内部，即畜牧和（人们长期所说的）家务劳动之间的分工。“经济学”这一称呼来自于希腊语，它是对“家政管理”的描述。劳动的进一步分工的思想可以从柏拉图的《国家篇》② 和《法律篇》中看到，同时也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之城》[35]中看到（只不过不太明显）。在格劳秀斯看来，第一次分工发生在农业和畜牧业之间。[36]

与其前身，即历史循环理论不同，历史阶段论认为历史可以得到持续改进，但这种结果并不一定会发生。从所有的阶段论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世界不同的区域一般会处在不同的阶段，而其中有些区域明显地存在着退化的可能。

14 世纪，除了进入早期文艺复兴阶段的锡耶纳市以外，欧洲的大多数地区都被认为是处在“蒙昧”时代。这个世纪诞生了一位著作等身的伊斯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1332—1406 年，在西班牙文学中，他的名字叫 Abenjaldún）。他出生在突尼斯，为众多的君主（他们瓜分了北非和西班牙的穆斯林居住区）效劳过，而且，他还在开罗担任法律教授和法官。他以对阿拉伯民族的研究为基础，强调了游牧者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区别。但是，他认为历史是循环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会退回到以前的阶段（这是文艺复兴前的典型思想）。赫勒敦说，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是根据血亲而组成的家族。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对他的介绍更进一步地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循环：“家族对公正的需求导致领导者产生。当这些群体的人数达到足够的数量时，他们就会迁移到富饶的地

① 格劳秀斯：荷兰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 年）不仅是重要的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译者注

② 又译《理想国》（Republic）。——译者注

方，并最终变成城镇居民；或者是征服已有的城镇社区，并接纳已有的文明。城镇居民过上奢侈的生活后，会失去他们的防御能力。随着统治者欲望的增加，他们一定会持续增加税收。由于对家族成员的平等要求表示反感，统治者需要外部支持者的帮助。家族成员中武士的减少使得统治者更需要外部支持者。因此，这个国家逐步衰落并成为新的游牧群体的猎物，而这个新的游牧群体又会有同样的经历。”[37]

赫勒敦认为，人类社会循环的周期为120年，即4代人（每代30年）。14世纪，赫勒敦以某种机制为基础，描述了社会的衰退。该机制类似于波特（Michael Porter）1990年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所描述的机制。本文稍后将描述波特的衰退循环。佩雷斯—弗里曼技术经济范式框架中也明确地包含了如下可能：一种范式转变，不仅为改进开启了机会之窗，而且也为某些国家的落后打开了“后门”。我们认为，在如今的全球化过程中，很有必要对衰退的可能性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敏锐地觉察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暴力有可能出现历史性的循环。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经济增长这种手段可以使人类的力量远离战争和毁灭而进入财富创造活动。[38]由于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人类应该愉快地从事发明，并使上帝的创造力持续下去。[39]今天的非洲提醒了我们衰退的可能：我们看到了残酷的种族大屠杀，民族国家的瓦解以及军阀控制下的“索马里化”使得国家变成了封建领地。我们正在以某种方式重复着“私人殖民主义”——如今的采矿企业的经营方式类似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罗利（Walter Raleigh）① 爵士的做法。

所有的阶段论都以某种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的趋势为基础。在这种框架内，阶段论的焦点集中在不同的方面，我们将在后面详细探讨这一内容。李斯特关注的是生产类型，比切尔关注的是地域特征，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冲突，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关注的是一种抽象支付体系的发展趋势，如今的佩雷斯和弗里曼关注的是技术方面的内容。正如伊利（Richard Ely，1903）[40]和奥本海

① 罗利（1554？—1618年）：英国探险家、政治家、历史家及诗人，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早期美洲殖民者。——译者注

默（Franz Oppenheimer，1927）[41]所指出的，这些理论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和相关性，它们关注的是同一发展过程——即“现代化”过程——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因此，阶段论描述了不同时间的劳动分工程度。我们可以说，福特主义瓦解之前，这种劳动分工程度在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增加。后福特主义为小规模生产的报酬递增提供了可能，因此，它通过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同时使得经营规模下降和业务种类增加。然而，如果我们的分析单位是劳动分工（而不是生产规模），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如今的后福特主义是古代家庭经济发展趋势的延续。

阶段论按照人类知识的进步来考察劳动分工的程度，将人类社会的最小效率规模从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国民经济一直扩展到了全球经济。劳动分工（尽管它或许是亚当·斯密最重要的理论）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如今我们已经看不到劳动分工理论了。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劳动分工本质上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学，是重商主义的一种分析工具。早在1613年，舍拉（Antonio Serra）就使用劳动分工将生产活动分成了两类：一是那些遵循报酬递增规律的活动（它们会导致财富增加），另一些则是使国家处于贫穷状态的活动。舍拉认为，报酬递增和高水平的劳动分工两者都是协同效应（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共福利）的基础。[42]

劳动分工完全以固定成本（工具或人类知识）的存在作为基础（它会带来协同效应）。重商主义者总是认为，采用某些经济政策（比如建立工厂）能够“促进公共福利”。在我们看来，公共福利增加的原因，是机械化导致的更高层次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它实际上否认了固定成本的存在）是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核心。由于德国经济学包含了劳动分工及其结果，因此它就自然地使其经济理论中既包括了个人也包括了社会。

比切尔认为，阶段论是“使经济理论能够利用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唯一方法”。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发展阶段与历史学家所划分的物质阶段搞混了。历史学家对每个时期的研究都不会忽略这一时期的任何重要特征，而理论家的阶段论中则只包含了一般的事物而大胆地忽略了一些不明了的事物。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认为，比切尔的阶段与佩雷斯和弗里曼的技术经济范式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切

尔还提到过类似于佩雷斯和弗里曼称之为范式转变的东西："在转变时期（Übergangsperioden），所有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wenn alle Erscheinungen sich im Flusse befinden）"。

4.2　李斯特和希尔德布兰德——第一个现代阶段论（19 世纪 40 年代）

比切尔本人列出了两类不同的阶段论：李斯特的阶段论和希尔德布兰德的阶段论。[43] 德国经济学中最早的阶段论是由李斯特提出的。正如前面介绍过的，李斯特将历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狩猎时期；（2）畜牧时期；（3）农业时期；（4）农业和制造业时期；（5）农业、制造业和贸易时期。另一个类似的早期阶段论，是由贾格托（Carl Rodbertus-Jagetow）提出来的[44]。

希尔德布兰德（比切尔十分崇敬的一位经济学家[45]）的阶段论以交换方式为标准。他划分的阶段包括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46]。这种理论发表于 1864 年，但其基本思想已经包含在希尔德布兰德 1848 年的著作《国民经济的现在和未来》之中了。他的理论正符合 1848 年当时的环境，它针对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恩格斯在努力消灭资产阶级，而希尔德布兰德却要使工人成为有产者（Bürger）。从这一点来看，希尔德布兰德的方法与几年之后杜林提出的方法非常相似——杜林也认为消除无产阶级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

希尔德布兰德认为，自然经济是把人类束缚于土地耕作的一种制度。货币经济的产生是分工的必要条件，因此，也是市场经济（它使得人类从土地耕作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货币充当价值储藏手段和价值计量标准，这种发展就不会产生。在希尔德布兰德看来，交易方式是导致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根本力量。货币经济能够使社会改善，但是，从长远看，货币经济的优势将发展成为劣势。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工人很容易在个人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中，使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家庭和血缘关系很容易破裂）所带来的竞争中受到伤害。希尔德布兰德认为，信用经济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能够使交易和投资过程中人类的信任和相互联系得到本质上的改善。

4.3　里查德·伊利（美国主要的阶段论者）及其对各种阶段论的比较（1903）

美国经济学家里查德·伊利（Richard Ely）是克尼斯（Karl Knies）① 在海德堡大学的学生，他在1903年的著作《产业社会演化研究》[47]中对阶段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美国的经济学家中有几位是接受德国教育的基督徒，伊利（1854—1943年）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罗斯福）新政时代（包括新政时代）。根据《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记载，伊利“在美国经济学形成的关键时期对该学科造成的影响，可能要大于任何其他人”。他通常被人们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这一事实表明，构建美国社会的思想与如今正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伊利没有将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而是把收入创造和收入分配看成了经济学的两个重要方面。

伊利自己对阶段的划分类似于李斯特：（1）狩猎和捕鱼阶段；（2）畜牧业阶段；（3）农业阶段；（4）手工业阶段；（5）工业阶段。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伊利借助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表格②，对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特征的五种不同的阶段论——生产的观点（他自己的阶段论）、比切尔的观点、希尔德布兰德的观点、劳动的观点和吉丁斯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吉丁斯（Giddings）③ 的主要阶段属于礼仪经济学（Ceremonial economics）和企业经济学（Business economics）的内容。这两个大的阶段又可以分别细分为三个小的阶段：幸运经济、魔力经济和祭祀经济；奴隶经济、贸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当然，这些不同的阶段在时间上通常并不重叠。在这种分析框架中，佩雷斯的技术经济范式（它以每个时期的主要技术为基础）似乎正好可以成为第六个阶段（参见后面的内容）。从总体上看，这些阶段论强调了不同的因素，其中每一种因素都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4.4　奥本海默的构造学

在1923年的《社会学体系》第三卷第一册中，奥本海默[48]从多

① 克尼斯（1821—1898年）：德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② 见《穷国的国富论》（上卷）第七章附录2。——译者注

③ 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13年）：美国社会学家，1894—1928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吉丁斯的思想体系受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主观的社会事实即“同类意识”是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社会学原理》、《社会学基础》、《归纳社会学》、《人类社会的理论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等。——译者注

个角度对阶段论进行了精辟和系统的分析。他首先分析了导致阶段产生的两个因素：劳动分工和一体化，并从政治和贸易角度对这两种因素进行了分解。奥本海默用一章专门介绍了他所说的运输障碍，即远距离和由此而造成的时间与运输成本对一体化的阻碍。他的运输障碍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概念，通过它可以将基础设施的作用引入技术经济阶段的讨论中。

奥本海默透彻地分析了两种主要因素（劳动分工和一体化）对下列社会演化阶段共同产生的影响：（1）劳动分工阶段；（2）一体化阶段（本质上与比切尔的相同）；（3）演化阶段（从企业经营的规模来看，即手工业、制造业、工厂和托拉斯）；（4）流通阶段（反映货币使用程度的阶段，即希尔德布兰德所划分的阶段）。鉴于目前正转向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以前的阶段论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在于，那种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的“自然的”趋势似乎随着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范式的开始而停止了。

4.5　罗斯托的非共产主义宣言（1960）

产生最晚的一种引人注目的阶段论是罗斯托（W. W. Rostow）在其著作《经济增长阶段论》[49]中提出的五个发展阶段的理论。书的副标题“一本非共产主义宣言”暗示了这本书的任务：“提供一种与马克思不同的社会演化理论，一种全面、现实和有合理依据的理论。”（这句话清晰地印在书的护封上）

罗斯托的阶段包括：（1）传统社会；（2）起飞的前提条件；（3）起飞；（4）成熟阶段；（5）高水平的大众消费时代。然而，他认为决定这些阶段的基础是收入中储蓄所占的比重（储蓄率）以及新增投资的生产率（产出资本比）两个比率之间的关系。他的模型代表了一种十分简单的经济增长观点，这种观点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许多年内流行，而且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世界经济秩序中。罗斯托的模型显然代表了熊彼特所称的“缺乏想象的观点——认为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引擎的推动力”。罗斯托并没有论述社会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和生产的机制——没有论述人类的直觉、技能、工具、意志和领导才能，也没有论述尼采所说的人类智慧与意志。

4.6　波特及退化的可能性（1990）

正如曾经提到的，波特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50]中包含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阶段论的例证，即明显地存在退化的可能性——如果

不尽力去防止，这种退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波特的模型显然与熊彼特的观点是一类的。根据这种模型，社会的进步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2）投资驱动阶段；（3）创新驱动阶段；（4）退化阶段——波特将其称为财富驱动阶段。

当过去创造的财富不能创造出新的财富时，就进入了退化阶段。投资者、经营者和个人积极性的转变一般都会损害创新的持续性。实力强大的企业由于获得保护（经常是在政府的帮助下）而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劳资关系会因为各自努力争夺日益减少的利益而变得紧张。与此同时，社会负担增加，并最终会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

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罗斯托的著作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期，波特的著作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然而，波特的产业集群思想——马歇尔、佩鲁（Perroux）和瑞典经济学家达门（Erik Dahmén）都以不同的称呼表达过这一思想——是最受关注的。他的熊彼特式的阶段论应该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4.7　技术经济范式——佩雷斯和弗里曼（1983/1991）

正如导论中所说的，历史学家习惯于把人类早期的历史划分为以各个时期主要技术命名的历史阶段，比如以石头使用技术命名的石器时代和炼铁技术命名的铁器时代等。佩雷斯和弗里曼把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分成了不同的时期，即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51]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阶段论是培根思想的延续——技术（职业）是决定人类生产条件的最重要的因素。各种时期可以被看作是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不同模式（不同方法）。每个时期快要结束时，人们会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以前的技术已被“用尽”，技术潜能已经完全丧失。在以前的技术发展道路上，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基础，世界就不会发生变化。这些时期与经济史中的长波理论密切相关。

显然，技术经济范式是与比切尔的理论一样的一种阶段论，只不过其关注的焦点是基本技术对经济的驱动。这种阶段论可以理解为李斯特和伊利阶段论的延续。在现代史中，佩雷斯和弗里曼识别出了提高生产水平的五种方法，每种方法都持续了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根据佩雷斯和弗里曼的理论列出了这些历史时期的总体特征：承载这种范式的产业；廉价的资源（它们的价格快速下降且供给似乎是无限的）；降低运输障碍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参见表20－1）。

表 20－1　历史上的技术经济范式

时期	产业名称	重要的廉价资源	基础设施
1. 1770—1840	早期机械化：纺织业，棉花，羊毛	水能	运河、公路
2. 1830—1890	蒸汽和铁路：铁	汽能、煤炭	蒸汽船、铁路
3. 1880—1940	电力和化学工业：重工业、电动机械、钢铁	电能	轮船、公路
4. 1930—1990	大规模生产（福特主义）	石油、合成材料	公路、航空、电缆
5. 1990—?	信息和通信、数据/软件、生物技术	微电子	数字通信卫星

佩雷斯—弗里曼模型与波特的阶段论十分一致——两种模型本质上都代表了熊彼特的观点，而且都以创新为驱动力。两种模型都承认存在落后的风险——创造性毁灭过程很容易发展成如下结果：一个国家发生了创造，而另一个国家则出现了毁灭。

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根本动力在于人类知识水平的变化。只有假设这一因素不存在时，新古典经济学才得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结论。下列事实构成了以技术经济范式观点为基础的另类理论的一部分：无论两者的相对效率如何，以旧的和普通知识为基础而生产出口品的国家，其生活水平要低于那些以先进的、新颖的和罕见的知识为基础而生产出口品的国家。海地人为美国人提供棒球，他们是全球效率最高的棒球生产者，但每小时的收入只有 30 美分。在这个即使投入美国所有的资本也无法机械化的行业中，他们的生产效率是全球最高的。棒球由各地的人们手工缝制而成。全球效率最高的高尔夫球生产者（机械化生产）的名义工资大约是海地棒球生产者的 30 倍。机械化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全球收入出现了巨大的失衡，并且使得许多穷国长期陷入贫穷和无知的比较优势中。19 世纪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没有忽视这个事实，但是，如今对这一事实的忽视使得主流经济理论的视角中产生了最重要的盲点。只要我们不把知识（人类的“智慧和意志”）作为一种要素纳入经济理论中，那么，我们将继续在贫穷的表象方面浪费金钱，而无助于纠正贫穷的根源。

5. 比切尔的四个技术—地理经济阶段

比切尔的《国民经济的形成》对技术经济阶段的地域特征进行了研究。不断变化的技术会使许多方面发生质的变化。技术和技术体系能创造出特定的核心领域。它们有自己的地域“足迹”：每种不同的技术都创造出自己的地域范围，就像每一个冲积盆地都有自己独特的流域一样。这种地域特征就是比切尔的研究对象。

技术经济阶段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基本观点——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发展而来。斯密这句话的基础在于劳动分工受规模的影响。市场的大小之所以重要，其原因仅仅在于生产规模：分工随着固定成本的增加而扩大，从而导致了规模报酬递增①。新古典经济学以规模报酬不变或规模报酬递减为基础，因此就不能将斯密关于市场范围的基本见解纳入自己的理论中——现代经济学中不存在劳动分工理论。正如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所说的：“过去以及现在几乎都没有人使用劳动分工理论，其最好的理由就是这种理论已十分罕见……没有一种正统的和切实可行的理论来对斯密所认为的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进行分析。”[52]正统经济学的报酬不变假设成了一项障碍，它使得正统经济理论无法将斯密所认为的（以及100年前配第所认为的）经济进步的根本源泉吸纳进去。然而，比切尔的分析框架却能够探寻劳动分工历时而增加的地理学维度。

5.1　家庭经济（Hauswirtschaft）

在比切尔的体系中，人类发展的第一个地域范围就是家庭经济（Hauswirtschaft）。在家庭经济中，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循环都是在家庭和家族这个封闭的区域里发生的。在这一阶段，不可能对生产和消费进行区分：它们“彼此转化”（fliessen in einander über）。交换通过相互帮助（gegenseitige Hilfeleistung）完成——即现代人类学家们所说的互惠交易（reciprocity）。博兰尼（他显然从比切尔身上得到了许多启发）将这种社会的收入分配体系描述为：“在非市场经济中，互惠交易和再分配这两种形式的结合实际上通常是同时发生的。”[53]

比切尔对原始社会的这种看法显然受到了比利时学者拉夫林

① 虽然总固定成本增加，但单位固定成本下降，因此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译者注

（Emile de Lavelene）（他来自列日（Liege）①）的巨大影响——1875年在爱森纳赫（Eisenach）② 召开的社会福利政策协会会议上，比切尔遇见了拉夫林。拉夫林的《所有权的原始形态》（De la proprieté et de ses formes primitives）于1874年首次出版。比切尔将这本书翻译成德文后，以《本质特征》（Das Ureigentum）为名于1879年在莱比锡出版。在回忆录中，比切尔强调了与拉夫林沟通的重要性，尽管他后来发现自己的著作“在许多地方都需要扩充和修改”。[54]

这一阶段的社会严重依赖于土地[55]，而且重要的是集体劳动而不是劳动分工。这种集体劳动成为了比切尔另一本著作《工作与节奏》（Arbeit und Rhythmus）[56]的研究对象。基本的政治单位是氏族（Sippen），氏族中的财产为集体所有（Gesamteigentum）。房屋是公共的（Gemeinschaftshäuser）。写这本书时，比切尔指的是非洲的情况。这里显然不存在个人主义，在有些团体中，甚至死刑也可以由部落中另一位成员来负责执行。专业化的劳动（比如部落的牧羊倌）是在为所有的人工作，而且每个人都要靠所有的人而生活（如今的阿尔卑斯地区仍然是这样的情况）。

同一部落内部的食物几乎都是共有财产[57]（使用的术语是共同财产制（Gütergemeinschaft））。当时存在着一些远距离的贸易，比如食盐的贸易。从博兰尼对哥伦布之前墨西哥远距离贸易商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当时仅有的一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氏族的名义来完成的。在比切尔的体系中，这一阶段不存在家庭之外的行业，手工业者完全受制于家庭（Handwerkssklaven）。比切尔强调，这种制度为大量的劳动分工提供了便利（他列举了同一罗马家庭中的许多职业），但是，这种劳动分工并不是伴随贸易而产生的。

5.2　城镇经济（Stadtwirtschaft）

下一个演化阶段就是城镇经济。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专业手工业者与公众之间在城镇市场的贸易是在没有中间商的情况下完成的。城镇通常围绕城堡而建——战争时期，这些城堡向城镇居民及周围乡村的居民提供保护。能够享有这种优待的人是有产者。此时需要建立经济制度，建立法律和交易规则（这些在以前的社会形态

① 比利时东部城市（列日省省会）。——译者注

② 德国中部城市。——译者注

中是不必要的）。城镇市场要求有度量衡。中世纪时，欧洲城镇的度量衡各不相同，早期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不同城镇之间的度量衡进行换算。如今，在意大利城镇的古老教堂的墙壁上还可以看到当地的计量标准。

城镇出现在港口、河流交汇处以及贸易站。在这些地方，盐和铁这样的商品的交易不断增加。市场与宗教仪式相互促进：人的聚集总是对贸易有利。城镇居民拥有一技之长，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品和手工制品从周围乡村居民那儿换取食物。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从而降低了奥本海默所说的运输障碍。

5.3　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制度和协同效应会发生缓慢的变化——有利于城镇经济水平的制度和协同效应会慢慢转向有利于全国经济。这一阶段会涉及大规模生产，而且贸易不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完成的，而是通过中间商来完成的。

比切尔清楚地看到了重商主义政策在创造国民经济时的重要性："重商主义并非是一种无用的教条，而是所有重要的政治家——（从查尔斯五世（Charles V）到菲特列大帝（Friedrich The Great）——活生生的实践。科尔贝尔的政策就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在某一阶段采用科尔贝尔那样的经济政策，任何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圣马利诺这样的小国除外）——都不能创造出一种较高的生活水平。

国民经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它可以通过劳动力的流动，通过共同的教育、语言、技能和价值观来进行收入分配。工资以及（放弃金本位之后的）货币供给与经济中的实际产品生产率同步增长。理发师理发的价格上涨速度与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一致，这样，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同行高出许多。这种分配技术进步成果的方法就是经济学中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所称的"福特主义"——佩雷斯和弗里曼理论中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福特主义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这种机制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变革利益的共谋（collusive）扩散——这种扩散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国劳动力市场内部发生的。国民经济成为了一个保护较高生活水平的城堡，就好比城镇经济中的城堡保护有产者免遭敌人的攻击一样。

5.4　全球经济

今天阅读比切尔的《国民经济的形成》时，人们会因为书中的思想而受到震动——该书论述了人类向全球化经济的迈进。比切尔本人暗示了世界经济的可能性，但是他看到的是遥远的未来[58]。利用比切尔的《产业社会演化研究》的框架，伊利在1903年就明确提出了全球化的观点："目前，我们正处在这一（国民经济）阶段。可以说，根据这种观点，下一个阶段将是世界经济阶段。货币市场真的是一个世界市场。"[59]

与前几个阶段一样，贸易和技术是开路先锋，必要的人类的制度会缓慢跟进。如今，我们仍然拥有比切尔所有四个不同的"经济"领域。我们在家庭经济领域生产三明治和洗漱用品；我们在区域经济中购买水管工的服务；我们在国民经济中享受教育和医疗体系提供的服务；我们在全球经济中购买计算机和观看电影。在人类制度创造出"好的"社会方面的同时，全球经济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认为，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6. 四个阶段中的收入分配问题

阶段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国际贸易理论，并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世界的收入分配。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是19世纪英国之外的贸易政策的典范）建立在他对人类演化阶段的理解的基础之上。下面是伊利针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所说的一番话：

"他（李斯特）对保护性关税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认为适合一国某一时期增长的政策并不一定适合于下一个时期。换句话讲，他明确地教导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说自己是自由贸易者或者贸易保护主义者，但是，人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自己在（一国的）某一发展时期是自由贸易者，在后来某一时期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在接下来的某一时期又是……一位自由贸易者。"[60]按照这种观点，任何主宰新的阶段或范式的国家都将从自由贸易中获利，但是，那些有可能长期陷入以前范式的专业化活动中的国家需要暂时的保护。19世纪的常识是，自由贸易对处于同一演化水平的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如果各国处于不同的演化阶段，那么，自由贸易就只是有利于较富裕的国家。

比切尔的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收入分配机制。在表20－2中，

我们尽力对各个阶段及其各自的收入分配机制进行了概括。在所有阶段中，最重要的收入分配机制或许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体系下的）区域性的或全国的劳动力市场。美国理发师收入的增长速度与整个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是一致的，而不是与理发师生产率的增长一致。正因为如此，第一世界国家理发师、公交车司机、餐馆服务员以及众多传统服务业劳动者的收入要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同行高出许多，尽管后者的生产率和效率与前者相同。

表 20－2　比切尔的经济学和地理发展阶段

经济类型	收入分配机制
（Ⅰ）家庭经济	家庭：根据“社会关系”的需要而不是“市场”的需要
（Ⅱ）城镇/区域经济	家庭＋劳动力小范围内的流动＋教会
（Ⅲ）国民经济	上述所有各项＋面向所有国家的分配范式承载活动（＝“产业体系”）＋国家（税收、教育、医疗，“福利国家”）
（Ⅳ）全球经济	除了“发展援助”之外，上述各项均不存在（欧盟内部除外）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如今的全球经济与以前所有的经济地域阶段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原因在于劳动力的流动（首次）局限于经济体系的广阔领域中。由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非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我们看来，新的范式中的生产活动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比以前显得更为重要。否则，在全球化经济中，我们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许多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将始终处于贫穷和无知的境地（这种情况甚至会比福特主义范式下更为严重）。

7. 各个阶段是“必经之路”吗？或者是否可能存在着捷径？

正如曾经讨论过的，阶段论并非铁的规律。比切尔明确地称它们的发展过程为“常态”——奥本海默说，它们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阶段论并不代表辉格党的历史观（Whig conception of history）——任何事物总是会得到改善。在我看来，它们一般都符合佩雷斯的观点：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所有的阶段或生产方式都提供了广泛的选择，其选择结果取决于社会所推崇的价值。

然而，阶段论从几个方面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先后顺序是必然的，尽管明显地存在着退化的可能（自我引致的退化和外界造成的退化）。这就是佩雷斯的观点：范式转变不仅开启了新的机会窗口，而且也打开了退化的后门。文艺复兴的整个思想就是要在经历了长时期明显的退化之后赶上以前曾经丧失的阶段。

所有的作者都认为发展阶段与人类知识的积累相关联，而人类知识会带来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比切尔和其他作者都深刻认识到了劳动分工的扩大在历史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正如曾经提到过的，奥本海默将劳动分工的程度称为分化阶段——他将这种分化阶段与一体化阶段中的地域特征（比切尔提出的阶段）联系在一起。

显然，范式和阶段的持续时间可以大幅度地被缩短。韩国在短暂的40年内的“跳跃式增长”或许就是如何缩短工业革命时间的一个最好的例子。韩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消除似乎是这种跳跃式增长的必要前提。然而，1952年之后的玻利维亚和1968年之后的秘鲁的大部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消除证明，这只是“经济起飞”众多必要条件之中的一个。

在我们看来，下面两个特征指出了技术史学家所称的“必经之路”——演化过程似乎必须经过的阶段：

（1）人类知识的累积特征。这种累积特征可以从教育中清楚地看到：许多人都是从一年级开始，然后一级又一级地读到大学毕业，尽管有时可能出现捷径（跳一级），但这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同样，技术变化似乎也有一种自然顺序。比如，机动化的陆上运输（小汽车）可能要先于机动化的航空运输，这就好比以自然材料为基础的时代（比如石器时代）可能要先于以人造材料为主体的时代（比如铁器时代）。然而，我不愿意过分相信任何发展顺序的“自然性”，我认为——以保罗·大卫（Paul David）键盘（QWERTY）经济学[①]的观点来看——存在着诸多可能的发展轨道，而且许多发展轨道最终都不是最优的。可是，这并不会减弱累积性的程度：石器

① QWERTY打字机键盘的布局于1870年发明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32年有人发明出据说可以大大提高打字速度的DSK键盘，但这种键盘未能推广开来。大卫等人将这个事例当作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一个重要证据（P. David，“Clio and Economics of QWERTY”，Economic History，May 1985），认为对QWERTY键盘的路径依赖排斥了效率更高的DSK（The Dvorak Simplified Keyboard）键盘。——译者注

时代不可能在铝器时代之后。

正如莱布尼茨所认为的，人类知识的发展可以被看成是有意识地攀爬各种层次的单子（monads）而不断地达到更高的知识层次。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由于人类是按照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他应该愉快地承担这样的责任：爬过一层又一层的单子而不断地达到更高的知识层次。从这种意义上讲，莱布尼茨的单子学反映了人类知识增长的累积特征。

（2）经济演化阶段与人类的需求层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德国的阶段论学者非常明确地指出，农产品剩余是人类进一步演化到下一阶段的“必经之路”。农业革命是第一个演化阶段，它向人类提供食物，满足了人类的大多数基本需要。接下来的是工业革命，这一阶段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带来了一连串的技术经济范式——从14世纪威尼斯的早期工业化一直持续到19世纪曼彻斯特的工业化。人类的需求层次（通过需求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变革的顺序：当人们的吃、穿、住等基本需求还未得到满足时，我们无法想象出一种由高层次消费服务所带来的范式。

这样，演化阶段的进程具有某种有机联系——无论判断阶段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可以应用于佩雷斯—弗里曼的技术经济范式。我们的观点是，有特殊的理由使我们相信：为了创造出一个收入分配公平的后福特主义社会，福特主义是一条必经之路。其基本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的大规模收入分配方面，福特主义范式曾经有过、而且今后还将具有独特的潜能。大规模的经营以及人数众多的劳动者的政治力量使得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速度快于资本价格的上升。这会加速机械化的进程，而机械化的加快又会（通过一种良性循环）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如此循环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变革利益的共谋分配——一种三个层次的寻租：生产国的资本家、劳动者和政府“串通”起来将技术变革的大部分利益保留在本国之内。这与经济理论中技术变革利益的古典型分配——消费者得到了更低的价格——相反。在后福特主义时代，网络社会的小规模经营似乎使得技术变革利益的共谋型分配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现在我们的富有更多地来自于价格的下降，而不是名义工资的增加。这种趋势由于全球市场的规模而得到强化，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赢者通吃”的市场情景。因此，我们认为，直接从

半封建主义社会进入后福特主义社会将使得封建主义的收入分配结构得以延续——即使按其他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我们非常赞同佩雷斯的观点：所有的阶段和技术经济范式都有可能导致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然而，我们担心，如果一个国家不把以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作为必经之路，那么要想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分配公正将是十分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范式下的经营规模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是：由于需要众多的劳动者，因此，劳动者讨价还价的力量有史以来首次使得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在政治上切实可行。

第二，正如佩雷斯所指出的，福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大规模生产的影响下，许多种类的物品都成为标准化的和“相同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亨利·福特所说的一句话：“只要有黑色的汽车，你就可以拥有任何颜色的汽车。”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强调的是人类的平等。在毛泽东时代，甚至每个人的穿戴都是一样的。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所有雅利安人都是相同的，所有犹太人都是相同的，所有吉普赛人也都是相同的。如今，大多数社会都面临着一种转变，从将所有人看成是相同的转向另一个阶段（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除了具有同等价值之外，所有的人都是不同的（独特的）。尚未经历“人人平等”这一阶段的社会有可能达成“除价值之外人人不同”的共识吗？这种共识能够在亚马逊这样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仍然被看成不比动物高级多少）形成吗？从某种累积的意义上看，为了形成“除了价值之外人人不同”的思想，首先必须经历“人人平等”的观念吗？

8. 结论及简要的政策含义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阶段论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的任何时刻，所有阶段论的共同观点是：不同地域范围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阶段。如今，由于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面对的是全球超级市场，因此这种情况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了。然而，如果我们按照比切尔的传统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生产方面而不是消费方面，那么将清楚地看到：虽然索马里或海地的消费者（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购买先进的商品，但是，他们自己的生产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处在以前的技术范式所决定的专业化生产中。海地是全球最大的棒球出口国，也是全球效率最高的棒球生产国——迄今为止，美国所有的资本家都还不能使这种产品的生产机械化。所有的

棒球都是手工缝制的，因此，所有的棒球生产都处在几个世纪前就应该消亡的技术经济范式中。由于海地人在以前范式的残余活动中从事专业化生产，因此他们日益强化了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在贫穷和愚昧中从事专业化生产。

我们认为，对经济阶段的研究（只要记住这种论断的某些告诫）的确有助于对当今世界的理解。如今，妇女从事农业劳动是非洲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于我们看到的如今非洲的农业生产以及对卢旺达大规模屠杀图西人的恐怖描述，美国经济学家伊利在1903年对人类某一发展阶段的描绘非常发人深省："大规模屠杀敌人与妇女劳动是劳动力发展早期阶段的主要特征。"[61]非洲的问题显然是世界银行的政策（诚然，这些政策现在正在发生细微的变化）无能为力的。它们都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其解决办法不在"财政紧缩"和货币经济、不在经济的"开放"和"自由贸易"、不在"使价格趋于合理"等措施的范围之内。

我们认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处于分裂和极端贫穷状态的非洲国家生产的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生产，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今的政策并未了解这一点。或许，通过坚持让这些国家根据自己在原材料方面的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我们正在阻止它们进入曾经给其他国家带来过财富的创造性阶段。或许，通过解决贫穷的表象而不是其根源，通过使非洲国家与我们国内的失业者一样"领取救济"，我们在社会退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或许，通过集中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我们妨碍了他们生产的发展。或许，文艺复兴式的格式塔转换（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对新知识重要性的看法）是一条亚洲国家已经经历过、但非洲国家尚未经历的必经之路。

假设这些因素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它们显然并没有被包括在"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政策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目前的政策在本质上把人看成了一种学会了交换的动物，而没有把人看成是学会了生产的动物。[62]如今我们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过分地偏向了货币方面，从而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货币只是"一层面纱，而实际经济因素的作用隐藏在它的背后"。[63]集中关注货币和消费方面的内容而不集中关注实际商品和服务以及生产的做法很容易导致对贫穷的治标不治本。通过努力将早已被人们忘却的阶段论（它们使得我们能够扯下妨碍我们理解事物本质的货币面纱）之中的直觉知识

和实际知识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或许我们能够找回已经丧失的见解。

阶段论都是一些推断，而且与其他任何推论一样，它们也会被误用以及容易受到批评。然而，如果没有推断或抽象，就不存在科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如今的正统经济学就是一种发展到极端的抽象。这种理论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的力量被省略了），从而导致了熊彼特所说的“死的均衡”。

如今的世界经济秩序建立在一种没有对与人类知识相关的具体生产活动的特征以及这种活动与人类福利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进行正式的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不能解决那些仍然处在过去演化阶段的国家（比如海地）所面临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的理论建立在所有经济活动（无论本国处于哪个演化阶段或哪种范式之中）都能创造福利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们国家没有看到不顾具体环境立即就“开放”国际贸易的根本要求有可能使本国瓦解和在演化阶段上后退。经济理论的核心假设对于正在推行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国家来说是无关的和无害的，但是，它们对于那些在演化中处于落后阶段的社会的福利而言却是既无关又有害的。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人希望看到“一个、两个和许多的越南”。如今，我们正面临着文明社会崩溃的危险，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居民在全球化经济中处于绝对缺乏竞争力和绝对无法雇用（无论在何种工资水平下）的状态。利比里亚、卢旺达和索马里就是一些最新的例子：民族国家完全瓦解，退回到了部落经济，退回到了比切尔所说的氏族经济。通过再次引入比切尔所谓“必不可少的工具”的阶段论——以生产为基础（而不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全球化为什么一方面给某些国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财富，而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一个、两个和许多的索马里”。

注释

1　Meek, Ronald,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19. Emphasis in original.

2　Ibid., p12.

3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quoted in Meek, op. cit. p. 13.

4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i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42.

5　'Die Aufstellung solcher "Wirtschaftsstufen" gehört zu den unentbehrlichen methodischen Hilfsmitteln', Karl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1th edition, Tübingen, Laupp, 1919, p87.

6　我们认为，报酬递减是新古典理论中唯一的历史证据。

7　关于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的想法，我要感谢 Wolfgang Drechsler。

8　对后现代主义和不确定性的分析，请参见：Hoover, Paul (Editor), Postmodern American Poetry, New York, Norton, 1994, p. xxxix。

9　Art critic Suzi Gablik, quoted in Hoover, op. cit., p. xxxix.

10　Robbins, Lionel,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in English Classical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52, pp. 22 ~ 29.

11　这里要向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道歉。

12　Krugman, Paul, The Self-Organizing Econom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6.

13　对这种学术传统的分析，请参见 Viner, Jacob, 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2。

14　Adam Fergusson (1793), quoted in Meek, op. cit. 这与那不勒斯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 年）以前所表达的历史思想是相近的。

15　Krugman, op. cit., p. 5.

16　McCloskey, D.,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9.

17　Wendt, Paul, Comment on Amariglio's 'Economics as a Postmodern Discourse', quoted in McCloskey, D., 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2.

18　对这一问题更一般的讨论，请参见 Reinert, Erik. and Arno Daastøl, '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Economic Innovations: the religious gestalt-switch and the duty to invent as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 June 1997, pp. 233 ~ 283。

19　McCloskey, D., ibid., p. 72.

20　对德国阶段论的总体分析，请参见 Kalveram, Gertrud, Die Theorien von den Wirtschaftsstufen, Leipzig, Hans Buske, 1933。

21　McCloskey, D., ibid., p. 50.

22　Chandler, Alfred,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3　Seligman, Edwin,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XVII, 1902, p. 76, quoted in Ely, Richard,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The Chautauqua Press, 1903, p25 ~ 26.

24　Perez, Carlota,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llenge of the Present Paradigm Shift', in Reinert, Erik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ldershot, Edward Elgar, forthcoming.

25　Lebenserinnerungen, Tübingen, Laupp, 1919, p. 199。（书名注明为"首卷"（1847—1890），但这显然是唯一的一本出版物。）

26　后面的信息可以在比切尔回忆录（Bücher's Memoirs, Lebenserinnerungen, Tübingen, Laupp, 1919）第462页之后的广告中找到。

27　Lebenserinnerungen, p. 197.

28　对此比切尔说道：'Die englische Nationalökonomie ist darum im wesentlichen Verkehrstheorie.', Die Entstehung, p. 89.

29　1976年芝加哥版第17页。

30　此故事来自于：Nicol, Donald M., Venezia e Bisanzio, Milan, Rusconi, 1990。

31　Die Entstehung, p. 90.

32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inehart & Co., 1944.

33　第85页，所有只注明页码的地方都是指的《国民经济的形成》的第11版。

34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请参见 Kuczynski, Jürgen, Studien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8, Vol. 8, pp. 69 ~ 71。

35　相关的原始文献参见 M. L. W. Laistner's translation in his Greek Economics, London, Dent, 1923. (The Library of Greek Thought)。

36　引自 Kuczynski (1978), p. 71.

37　Margoliouth, David S.,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7,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p. 564 ~ 565.

38　这方面最好的论述请参见 Hirschman, Albert O.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39　Reinert, Erik S. & Arno Daastøl (1997) 'Exploring the Genesis of Economic Innovations: The Religious Gestalt - Switch and the Duty to Invent as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i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 Nr. 2/3, s. 233 ~ 283.

40　Ely, op. cit.

41　Oppenheimer, Franz, System der Soziologie, Vol. 3, Tome 1, 5th edition, Jena, Gustav Fischer, 1923.

42　Serra, Antonio,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i regni d'oro e 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 Napoli, Lazzaro Scoriggio, 1613.

43　Entstheung, p. 88.

44　关于19世纪阶段论的分析，请参见：Sommer, Artur: 'Über Inhalt, Rahmen und Sinn älterer Stufentheorien (List und Hildebrand), in Salin, Edgar (Editor), Synopsis. Festgabe für Alfred Weber,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1948), pp. 534 ~ 565.

45　他在《回忆录》（Erinnerungen）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46　希尔德布兰德关于阶段论的两篇文章——‘Natural-, Geld-und Kreditwirtschaft’和‘Die Entwicklungsstufen der Geldwirtschaft’——分别登载于：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Vol. Ⅱ, 1864, pages 1-24 和 Vol. XXVI, 1876, p. 15 ~ 26。两篇文章都重印过——参见：Gehrig, Hans (Ed.), 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und andere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Bruno Hildebrand, Jena, Gustav Fischer, 1922。

47　New York, Chautauqua Press, 1903.

48　Oppenheimer, op. cit., pp. 254 ~ 309.

49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50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 545 ~ 573.

51　参见 Perez, Carlota,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in Futures, Vol. 15, 1983, No. 4, pp. 357 ~ 375, Freeman, ‘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ductive System’, i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The Challenge for Economic Policy, Paris, OECD, 1991.

52　Stigler quoted in McCraw, Thomas, ‘The Trouble with Adam Smith’,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61, Summer 1992, p. 362.

53　Polanyi, Karl, ‘The Economy as an Instituted Process’, Polanyi, Arensberg and Pearson (eds.), 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 Chicago, Gateway, 1971, p. 253.

54　Erinnerungen, p. 197 ~ 198.

55　P. 94.

56　Sixth edition, Leipzig, Emmanuel Reinicke, 1924. First edition 1896.

57　P. 62.

58　P. 149.

59　Ely, op. cit., p. 68 ~ 69.

60　Ely, op. cit., p. 21 ~ 22.

61　Ely, op. cit., p. 72.

62　参见 Reinert, Erik S. (1997)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SUM Working Paper No. 5, 1997.

63　Pigou, A. C., The Veil of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49, p. 18.